

丛书总顾问◉李学勤

十六国北朝　无序的车辙

张耐冬◎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学者精彩解读　　正史原本如戏】

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有着太多的传奇，令人禁不住想一窥究竟。但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三百年，即使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也显得头绪繁多，难以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本书没有按照教科书的方式描述这段历史的大线索，而是选择了站在历史关节点上的八个重要人物，通过展现这些历史人物最个性化的一面，以及这种个性与时代之间的一种错位关系，揭示了中国历史在中古时期的看似无序却非常清晰的走向。人物的命运，历史的大势，在流畅而深邃的文字间显示出来。这是一部具有深厚专业素养又极具可读性的十六国北朝历史普及读本。

——刘后滨

一个社会的历史自觉，往往取决于国人的历史认识，事关未来社会发展，事关社会基本正义。本来可以充当国人国史知识普及之用的电视剧，承担不了这样伟大的使命。回归阅读，依然是提升国人国史知识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当今的科研体制之下，非学术的文字不在国家鼓励的范围之内，面对社会大众的需要，学术界置若罔闻。这是中国诸多荒谬现象之一。现在，已经有很多业余爱好者动手，填补这项空白，但最让人放心的，显然还是学者的文字。耐冬师出名门，不仅有很好的学术功底，更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正是他学术思考的通俗表达，有理由相信，读者定会有热烈的响应。

——孟宪实

【内文掠影】

十六国北朝为古代中国的各类问题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在不同的政权中通过不断试错，提炼出可行的方案，并将这些方案与江南保存的中原文化相结合，造就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型文明。这种情况，就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ISBN 978-7-5339-3331-9



定价：28.00元

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

张耐冬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 / 张耐冬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4

(读史馆)

ISBN 978-7-5339-3331-9

Ⅰ. ①十… Ⅱ. ①张… Ⅲ.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十六国时期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北朝时代 Ⅳ. ①K820.38②K820.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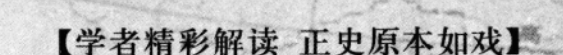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0427号

整体策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柳明晔
整体设计 刘 炜

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

张耐冬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202千字
印张 12.75
插页 2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331-9
定价 28.00元





丛书总顾问　李学勤



前言

在国人的心中，“十六国北朝”往往是乱世的代名词，因为它的前半段，是所谓“五胡十六国”的黑暗时期，后半段，则是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同时，由于汉人并非舞台中心的主角，因而谈及这个时期时，人们往往有“何处望神州”的慨叹。

在我们的常识中，涉及十六国北朝的话题就是“五胡乱华”、“淝水之战”，就是胡人滥杀汉人、社会动荡不安，勉强算得上积极的一个词，就是“民族融合”，是以“汉化”为趋势的发展方向。因此，十六国北朝似乎是“非主流”的，是不能代表“中国”的，无论它如何热闹非凡，都只像不停公转的地球，与之并立的两晋南朝才是真正体现“中国”文化与时代发展趋势的太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时期，产生了兼容性极强的文化，并造就了隋唐时代恢弘大气、兼收并蓄的文明；这个时期，将西域、草原与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北中国的版图有了重新的勾画；这个时期，通过战争、改制，将游牧部族与中原汉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并使“文化”超越种族，形成古代中国鲜明的文明特征。可以说，没有十六国北朝，就不会有空前强盛的隋唐，更不会有生命力极强的中国文化。

那么，十六国北朝究竟有没有“发展方向”的问题呢？如果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坚持儒家的“华夷之辨”，这个时期势必被视为发展中的曲折期，作为华夏文明的从属者。事实上，十六国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与中原王朝的发展轨迹不同，才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可能性。

它开创了将草原与中原纳入一个帝国进行统治，甚至以草原为中心的模式；它还创设了以民族文化为价值核心，改造中原制度的发展思路；更重要的是，它将两汉时期未能解决的发展问题纳入非中原的框架，并提出了全新的解决办法。

华夏文明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进入一个瓶颈：面对幅员辽阔的版图，面对庞大的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君主与大臣在政治上应该是什么关系？汉光武帝就着手进行了加强皇权、突出君主在国事处理中决定性地位的改革，但实力雄厚的大族、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却试图从儒家思想、机构权力等方面确立"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政治模式，因此，东汉时期的外戚与宦官之争、党锢之祸等重大事件，都蕴含着这种统治理念的交锋，但问题并未真正被解决。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游牧部族以军事体制为基础的贵族议政制转向君主裁断，在军事贵族被抑制的过程中，皇权独尊，真正从实践的角度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而且，在对游牧部族的生活与组织方式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中原大族也被纳入到改造范围，只有通过皇家认定，才能确立政治地位，这使皇权成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头，君臣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十六国北朝的时候就能够解决？中原被游牧部族所占据，旧有的统治方法不能延续，是君臣关系进行变革的时代条件。不受旧有的条条框框限制，从现实出发思考出路，是君臣关系能够最终解决的关键。在具体环境下，不同政权下的君主不断调整解决方案，使之不断充实、完善，是其能够长久推行的根本。北方实力强于南方，最终通过军事征服统一全国，将统治模式推广，保证了新君臣关系实施的延续性。君臣关系问题如此，其他问题莫不如此。十六国北朝，为古代中国各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在不同的政权中通过不断试错，提炼出可行的方案，并将这些方案与江南保存的中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型文明。这种情况，就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这样的发展自然不能仅靠历史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完成，一个个真实的人物，才是历史画卷得以展开的基础。苻坚、王猛、拓跋宏、独孤信……这些性格迥异、经历非凡的人，织就了十六国北朝的锦缎。而我们只能从中抽取几缕丝线，管窥其中的纹理。

本书重点描写了八个人物：苻坚、王猛、拓跋宏、尔朱荣、独孤信、高洋、魏收、祖珽。其中三个汉人——王猛、魏收和祖珽，其他皆为胡人；帝王有三个——苻坚、拓跋宏、高洋，其余五人或为治国良相，或为一代枭雄，也有才子词人、风流俊士。

也许这个选择标准会引起疑惑：为什么不选一些其他的人呢？比如开创十六国的刘渊、石勒，比如大名鼎鼎的慕容垂、慕容冲，比如北魏分裂后的霸主宇文泰与高欢，比如文臣武将中最负盛名的崔浩、侯景？

通过人物看时代，最重要的就是看人物的个性、命运与时代的节奏之间的关系。其他人物或是特征不强，或是命运的代表性不够，或是与时代的关系不够，而这八个人物，在不同的时段上，体现了十六国北朝这个整体时代的特性。当然，历史的舞台上不会只有这几个人的表演，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是会出场，只不过并非我们细致分析的对象。

这八个人物都有悲剧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独特的个性。正是个性，使他们或是不屈从于时代的主题，或是在时代的列车上左顾右盼彷徨四顾若有所失。凭着个性与时代硬拼的人，往往不会胜利；随波逐流在时代中逐利的人，则无法不朽。生前身后，成了一对非此即彼的矛盾，因此这个时代的人身上若没有悲剧性，他的人生就没有价值。

荣格有一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而这八个人物的个性，恰恰造就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种命运。第一类是苻坚、拓跋宏与高洋。他们都有理想，而且都要依靠自己的意志与权力付诸实施，但明里暗里总遭到反对，他们的目标无法真正实现，但客观上会对历史做出贡献，因此可以概括为夸父型。第二类是王猛和尔朱荣。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或实力，对一个百废待兴或是千疮百孔的政权进行治疗，能够收到成效，但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只能将接力棒不断地传下去，把未竟的事业留给后继者，如愚公移山一样漫长，故而可以概括为愚公型。第三类是独孤信、魏收和祖珽。他们的个性并不适合做权力机构中的建设性或机械性工作，更适合在不受条条框框限制的领域发挥才能，比如战场，比如学术与艺术。一旦勉强为之，就或是“不得开心颜”，或是进退失据为他人所笑。这种情况，就像庄子所讲的“神龟”，要么得到尊奉，但生命已不在，空余尸骨，要么快乐地活着，但拖着尾巴在泥潭中滑行。权且称之为神龟型。

夸父、愚公、神龟，都有一种渺小的崇高。夸父豪情万丈，但离天边的太阳却总有距离；愚公勤劳、积极，可移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奋斗目标；神龟在选择给自己的价值定位时，要直接面对生与死的终极选择。仔细去想，会觉得这些场面有点滑稽，但这就是历史的本相。要么就做《摩登时代》里那个拧螺丝的小人物，要么就去中流击水，看浪遏飞舟。这时代没有虚幻的风车巨人，也没人去做堂吉诃德，因为金戈铁马的岁月中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都数不胜数，很难容得下浪漫地去战斗的愁容骑士。

也许有点矛盾——既然都是失败者，那么十六国北朝怎么又能解决秦汉以来中原的发展问题？其实，那些被解决的问题，是夸父和愚公们在实现理想中的副产品，而非真正的目标。比如，苻坚本来要造就一个儒家学说中所讲的清平治世，但他真正做的，就是调整北中国的版图与民族关系；拓跋宏要实现的，是一个超越了胡、汉界线的空前强大的新帝国，但他只做到了将鲜卑人中原化，以及对皇权和士族权力进行了重新界定。就像寓言中所说的，夸父的目标是逐日，可是壮志未酬，但他的木杖化作桃林，让后人受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最终的走向如同凌乱无序的车辙，人们永远不知道它的下一站是哪里——但他们还是努力地试着驾驭这辆充满野性的车，尽管最终的目的地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地方。



目录

苻坚——投鞭难断流，草木亦惊魂

王猛——扪虱而谈真名士

拓跋宏——奔向中原的夸父

尔朱荣——"小胡"乱大政

独孤信——三朝国丈独孤郎

高洋——文明时代的疯癫者

魏收——书生意气，留得"秽史"名

祖珽——才子为何变成权臣



苻坚

——投鞭难断流，草木亦惊魂

公元 316 年冬，长安城门缓缓打开，或许是因为被围困日久，城中的军民食不果腹，所以城门开启时有些摇摇晃晃，并没有帝都的气派。

围城数月的匈奴骑兵从开启的城门缝中看到了胜利的光影，事实上，首领刘曜早已接到了长安城中的来信，所以这个时刻对他而言并无悬念；然而对城中之人来说，尽管也有了心理准备，但在开城之际，仍不免有国破家亡的悲凉感。城门里边，正是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他坐在羊车上，准备出城投降。

至此，西晋王朝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而作为中原王朝的代表，避难于江左的东晋将与占据北中国的“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展开百余年的战争，又不知有多少才智之士成为其中的主角。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百年战争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毫无疑问，就是前秦君主苻坚和东晋名相谢安之间的那一场决战：淝水之战。

淝水一战，也成为苻坚一生中的谢幕之作。空前强大的前秦，也因为这次失败而土崩瓦解。如果能够预知结果，他是否还会作出挥师南下的决定？

文学家们喜欢对历史提出一些假设，而假设对于读史者而言应该慎之又慎。若没有根据，只是就“性格”、“谋略”方面入手，为古人献计献策，就

会或者剑走偏锋，陷入阴谋论与厚黑学，或是空发议论，流于浅薄的个人好恶之说。

从苻坚所处的时代和他个人一生的发展来看，如果上天给他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他也会选择南征东晋，决战淝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而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什么会选中苻坚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又为什么在交予他任务后抛弃他？

且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五胡”与十六国

传统的史书总给我们一种误解，让我们觉得所谓“五胡”是心怀不轨的强盗，原本与中原互不相干，因为抓住了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中元气大伤的机会而发动偷袭，占据了物产丰富、温暖宜居的中原，并建立了所谓的“十六国”政权，让北方长期处于民族压迫状态下，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他们觉得中原的汉文化生命力之强大、汉人民族精神之顽强，才“被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所征服”。因此，十六国时期，就是“五胡乱华”，其黑暗程度，就如同罗马帝国崩溃后几百年间“蛮族”统治时期一样。

事实远非如此。

“五胡”并非都是在西晋末年才进入中原的。早在东汉时期，由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在北匈奴的威胁之下，南匈奴获得了东汉朝廷的认可，南迁到长城沿线，与中原的交流开始走向日常化，羯人也随着匈奴的南迁而逐渐进入中原地区。氐与羌在两汉时期经营西部和西南地区的过程中被动进入了中原的统治之内，到魏晋时期更是成为野心家们争夺的对象。鲜卑人在北匈奴远走、南匈奴入塞之后，占据了原来匈奴控制下的大漠，在东汉时期与中原产生密切接触，曹魏和西晋时期，拓跋部首领之子沙漠汗还长年居住在洛阳。可以说，这“五胡”原本就生活在中原的视野之下，而不是突然袭来的天外陨石。

刘曜以匈奴人的身份灭西晋，石勒以羯人的身份横扫中原，都是事实，于是古代很多史家就以此强调胡人对中原文化的打击。然而，他们从未深究

过背后的原因：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西晋？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要消灭中原政权？

从东汉末年开始，战乱频仍，中原几成焦土，但这并没有给“五胡”带来什么好处，各地的割据者对他们是能拉拢就拉拢，却并不是出于“团结”的目的——在战乱年代，能获得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劳力和兵源，所以这些部族处于被驱使的地位，而且得不到信任。著名的匈奴贵族、汉（前赵）政权的缔造者刘渊，在西晋时期就由于才能出众而遭到猜忌，未被晋武帝司马炎委以重任；鲜卑拓跋部世子沙漠汗更是由于通晓中原典故、熟知中原虚实而被西晋王朝施以反间计害死。贵族尚且如此，这些部族的一般族人更是悲惨，像石勒一样被汉人贩卖为奴的人不知有多少，“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家中就有“鲜卑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原政权对“五胡”的欺凌，让他们把仇恨埋在心底。当西晋王朝因为“八王之乱”而争战不休时，机会终于来了。交战的各方又开始招兵买马，把“五胡”当做雇佣兵一样拉拢。一旦探知了这些皇族们的虚实之后，这几个部族都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公元 304 年，西晋王朝内部的争斗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西晋东瀛公司马腾招引乌桓与鲜卑拓跋部骑兵、大将王浚引鲜卑段部骑兵入境，大败成都王司马颖。就在这一年，賨（cóng）人（秦至南北朝时湖南、四川等地的一个少数民族）李雄自称成都王，匈奴人刘渊称汉王。然而，西晋诸王们仍然忙于内战，在他们的眼中，谁控制洛阳朝廷才是最重要的。

是争斗中的西晋诸王自己开启了大门，让这几个部族摸清了中原的门路。起初，他们只是皇族内战的帮忙者，皇族们对他们的态度一如往昔，只不过是利用，一旦出了乱子，就采用“以夷制夷”的战术，拉一个打一个。这种思路历经千百年而不变，一直到近代都是如此，也算是“中国特色”了。可是，采用这一战术的王朝，最后没有不灭国的。

与其说“五胡”灭了西晋，倒不如说西晋的皇族们自掘坟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刘曜在长安城下为西晋王朝送葬。在此之前，石勒攻陷洛阳，将几位西晋亲王生擒后处死，他还给当时的名士领袖王衍一个特殊的死法：把墙推倒将其压死。

在中国的正史和民间传说中，“五胡”一向是被妖魔化的，贪婪、残暴、嗜血、荒淫这些邪恶的标签长期贴在他们的头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有些汉人做胡人也做的事情，在强烈的汉文化优越论下，就被采取双重标准看待。

“五胡”在西晋末年四处征伐抢掠，确实杀了不少的中原百姓，但与汉末到西晋的内战相比，伤亡人数似乎并不算多。

后赵的统治者石虎被描写成一个商纣王一样的暴君，骄奢淫逸，独断专行。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怀疑这种描写的真实性，但是怀疑的声音一直被边缘化。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石虎无论是个人生活的奢侈程度，还是执政的混乱程度，和西晋中后期相比，都是望尘莫及的。



“十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胡人建立的国家，因此被看做一个人头与玉玺齐飞、战旗共鲜血一色的黑暗时代。殊不知，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就曾经提出对汉人和自己族人分别管理的措施，以稳定中原局势又不至于让本部族人迅速改变习俗而无所适从。这项政策，石勒也沿用下去，而且他还曾强调不得虐待汉人，并成立了“君子营”招纳中原士大夫。至于那位传说中最为可怕的君主石虎，其在位期间严格贯彻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为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统治留下了很好的基础。——倒是汉人出身的冉闵，大权在握之后对羯人进行种族灭绝，屠刀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一点儿也看不到“仁恕”。

假如我们冷静地对十六国的建立者做一个民族区分的话，就会发现，这十六个先后存在的政权中，还有三个汉人建立的政权（前凉、西凉、北燕），数量上仅次于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五个）。

从对中原文化的态度来看，刘渊本人精通汉文化，《诗经》、《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他都曾系统学习过，《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他也曾阅读过，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左传》和孙吴兵法。石勒出身低微，不识汉字，但他在军中也经常命令儒生们给他讲中原历史，为他读《汉书》，他还常就此发表议论。

当事实浮出水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义愤填膺的言辞竟然显得有些荒唐。是“五胡”乱了中原吗？是他们的铁骑践踏了大好河山吗？如果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一次次抹黑他们？

因为中原汉政权的失败。失败并不可怕，失败而找不到理由就可怕了。西晋时期，贾后专权，惠帝暗弱，公卿贪利，竞逞浮华，皇族内讧，生灵涂炭。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说起这些事情时，我们往往只归罪于某一个人的阴险狡诈，但当这种

情况一再发生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阴谋家们会一次次得逞了——是不是这个社会、这个皇帝制度乃至这个文化出了问题？这种追问，是让人不愿面对的。司马氏以世家大族为根基，以儒家教条为纲领，却闹得如此乌烟瘴气，当时人作何想法？他们是否宁为西晋犬，不为“五胡”人？

还是石勒的一句话说出了时人的心声。他评价曹操、司马懿的时候说，这两个人是靠着欺负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无独有偶，在江东，东晋名相王导给晋明帝讲述西晋开国过程时，详细介绍了司马懿夺权过程中的杀戮行为和司马昭执政时期逼杀曹魏皇帝曹髦的事情，听得晋明帝无地自容，羞愧地说：“果真如此的话，怪不得我家国运不长啊！”

开国都如此不光彩，加上赖以为宗旨的儒家教条缺乏约束力，让全社会对西晋王朝产生失望情绪，也难怪会出现种种乱象。此时，文化、制度、政治风气都已经无法维系帝国的统治，中原文明正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假如不是“五胡”将西晋王朝摧毁，它也会轰然崩塌，而且它除了崩塌外并无他法找到出路。尽管西晋灭亡后不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当时诸般问题的出路，但是它不灭亡就绝对不会有出路。

可是，一旦它真的灭亡了，事情就会转向另一方面，更不要说是亡于胡人之手。人们对西晋的失望和对出路的迷茫，此刻终于可以用非理性的方式发泄出来，指责胡人的背信弃义、狼子野心。

十六国的前期，可以说是“八王之乱”的继续。各政权之间混战，盘踞于中原的前赵和后赵尽管采取了一些促进稳定的措施，但终究敌不过兵强马壮者为王的丛林法则。中原需要安定，中原也需要一个能够革除魏晋时期政治、文化弊病的新政权。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许，苻坚就该扛起这副重担。

二、杀掉僭主的僭主

按照辈分来算，苻坚是前秦王朝的第二代皇族，出身于原关中地区（陕西省可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部分，其中今陕西渭河平原一带被称为“关中”）的氐人部族。他的祖父苻洪在后赵时期率族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后来又与东晋交好，被东晋任命为“征北大将军”——东晋还是延续着“以夷制夷”的策略，希望氐人能够对当时横行中原的羯人起到牵制作用。然而，苻

洪在得到东晋赐予的名号之后不久就自称“秦王”，成为一支独立的北方力量。

据说，苻坚的家族原本姓“蒲”，后来因为有“草付应王”的谶语，苻洪想要让这个政治预言在自己的身上应验，便改姓为“草付”叠加而成的“苻”。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传说，那就是苻洪听说东汉末年的孙坚背后有“草付”两个字，后来孙坚、孙策和孙权父子就开创了江东孙吴政权的基业，他便将自己家族的姓氏改成“苻”。无论如何，苻洪作为前秦王朝的奠基人之事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

苻洪自立为王后，后赵政权内部分裂，苻洪抓住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其子苻雄（苻坚的父亲）将后赵君主石虎生擒。但后赵毕竟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此时苻洪的力量不足以吞并中原地区。他临终向世子苻健交代，让他先以关中为根据地，等强大之后再争夺北中国的霸权。

苻健遵照苻洪的遗嘱，进攻关中，并分兵出其不意地夺取长安。东晋永和七年（351），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建立了前秦政权。苻坚此时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他的父亲苻雄是苻健的弟弟，被封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协助苻健四处征讨，立下了汗马功劳。苻健誉之为“吾姬旦也”——把他比做辅佐周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苻雄在苻健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不幸的是，前秦建国三年以后，苻雄就在出征途中暴毙。苻健闻讯恸哭，乃至呕血。

苻雄去世时，苻坚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的身上，已经表现出很多与同龄人不同的特质。当然，关于苻坚童年与少年的记载，不完全是事实，有些是苻坚已经做了前秦皇帝后的附会与吹捧。古代的史书有这样一种通例，凡是帝王将相，从出生到成长，神迹总在他们周围出现，以此来证明他们是世间少有的英杰。

在关于苻坚的记载中，就有很多此类故事。有一种关于苻坚身世的说法是，他的母亲苟氏曾经在漳河游玩，还特意到西门豹的祠堂去求子。西门豹果然是有求必应，当天晚上，苻坚的母亲就在梦里遇到了天神，天神与她缠绵一番，于是她就怀了孕，生下了苻坚。这个说法，比刘邦的母亲与一条龙生下了那个粗豪的汉高祖还要离奇。如果按照野史研究者的思路，这故事背后一定存在着一段苻坚的母亲与他人私通的秘闻。实际上，这种故事无非是要表现她所生的孩子绝非常人，将来会成为天下之主，不能过于较真。



还有一个故事，说苻健在刚刚占领关中时，梦到天神派来一个红衣红帽的使者——如果加上一副白胡子，可能就是圣诞老人了——命令苻健封苻坚为龙骧将军，苻健认为这是天神的旨意，不可违背，第二天醒来马上在曲沃（今山西临汾曲沃）设坛拜将，按照天神的命令让苻坚做了龙骧将军。——事实上，苻坚能够在十几岁就被任命为这样的官职，是因为苻健非常器重他的父亲苻雄。

一旦某个人突然成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生平经历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会被拿出来附会出各种神秘主义的说法。这些说法中，有些是民间以讹传讹的流言，有些是帮闲文人的杜撰，当它们被史官记载在史书之中后，现代人从中能感受到的，是古人对于权力的崇拜与迷信。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帝王，有的人只能暂时做稳奴隶，而有的人却欲做奴隶而不得，于是，他们只能从神秘主义的角度为这一切寻找一个答案，用以解答自己的困惑，并安慰自己脆弱的心灵。因为这种想法的存在，所以帝制在古代中国一直有肥沃的滋生土壤，而帝制的不断延续，也给了这种土壤以丰富的营养，所以中国古代平民起义次数众多，成功的也不少，但最后总会有一个神灵附体的、“上天注定”的帝王出来主宰一切。二者相辅相成，就像一个难以打破的魔咒，于是民国建立，尚有袁世凯称帝，可见要打破这个魔咒，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

关于苻坚的这类神秘主义故事还有很多，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

真实的少年苻坚是什么样的呢？

与一般的氐族少年不同，苻坚八岁的时候突然要求请教师来家里教授儒学。他的这个要求令爷爷苻洪十分诧异，苻洪又惊又喜地说：“我们这些被汉人视为蛮夷戎狄的人，世世代代就喜欢饮酒，不喜欢背书，你居然想要读书了！”

苻洪也觉得孙儿的这个想法不错，氐人长年在中原地区生活，如果不懂得中原文化，不要说进行统治，就是和中原人正常沟通都做不到，所以他很支持苻坚的选择，请了儒学之士到家中讲习经典。等到前秦建立之后，苻坚已经是一个博学多才、胸怀天下的少年豪杰了。而且，他还非常愿意与有抱负、有才能的人结交，王猛、吕婆楼、强汪与梁平老等一批有才能的人都成为他的好友——后来前秦使者说服西部的前凉政权向自己称臣时，就列举

了包括这四人在内的精英，以震慑前凉统治者，可见这几个人在当时地位之显赫。与他们结交，使苻坚在前秦朝中拥有了实权派支持者。换言之，通过他们，苻坚就能很快对朝廷局势进行控制。

作为皇族成员，与大臣结交容易引起皇帝的猜疑，尤其是他结交的人都是贤人能士。但苻坚还是这样去做，原因就在于，当时他的父亲苻雄已经去世，而苻坚兄弟几个还都是少年，因此他结交大臣对苻健的皇位没有什么威胁。而且，按照常理推测，在父亲亡故、兄弟年少的情况下，要保证家族的地位，也非得有朝中大臣援助不可。因此，苻坚此举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当然，苻坚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在内。当时苻健所立的太子苻生在别人看来，确实不适合做一国之君。

苻生是苻健的第三个儿子。苻健的长子苻苌在桓温北伐危及前秦统治时战死，苻生便递补成为太子。据说苻生在幼年时便令祖父苻洪厌恶，但这也许是后人为了丑化他而进行的诋毁。他力大无穷，勇武过人，能够徒手与猛兽搏斗，行动起来奔跑如飞，马上步下的功夫都十分精湛，是前秦著名的勇士。凭借着这身武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因为这一点，苻健才决定让他做自己的接班人。



不过，苻生有两大缺陷。一是在外貌上，二是在与臣下的关系上。

苻生的相貌与常人不同，出生时就只有一只眼睛。对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都是严重的生理缺陷，何况是国家的储君、未来的皇帝？作为皇帝，未必要相貌英武，但起码应该仪表堂堂，在这一点上，苻生就得了一个不及格。另外，以他的性格，更愿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朝堂之上摆正姿势与大臣们讲话，他不习惯。因此，他“望之不似人君”。

苻生与臣下的关系，也是很多大臣觉得他不适合做继承人的重要原因。苻健在称帝之后，就立其子苻苌为大单于，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个名分确定下来，大臣们也就像对待君主一样事奉苻苌，就连东晋永和十年（354）桓温北伐时，苻苌都担任前敌总指挥，作为苻健的代表率众将出战。苻生在此时，只是一个战斗英雄，与众将一起冲锋陷阵。可是苻苌突然死于战场，苻健于是立苻生为储君，大臣们自然一时之间不好接受，况且苻生不像苻苌，没有经过继承人培养的环节，而喜欢按照自己的性格、用自己的军人方

式与大臣们相处，后果可想而知。

首先发难的是皇族苻菁。苻菁对苻健立苻生为继承人十分不满，想要在苻健死后篡权，他便在苻健重病不起时带兵闯入东宫，想要杀死苻生后自立为皇帝，碰巧苻生在皇宫服侍病中的苻健，苻菁扑了个空。他以为此时苻健已经去世，苻生赶赴皇宫去奔丧，便马上攻打皇宫。苻健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便强打精神，登上皇宫的端门，并派兵排开阵势。苻菁的部众见到苻健不但没死，相反还怒气冲冲地站在城楼上指挥军队，顿时泄了气，纷纷丢下武器逃跑，苻菁被抓获，押到苻健面前。苻健当众处死了苻菁，暂时稳定了局势。几天之后，苻健就因病不治，撒手归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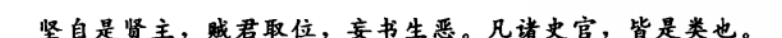
苻健去世后，苻生登基做了前秦皇帝。他继位之后，依旧按照过去的方式与臣下相处，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国家政事。而且，鉴于苻菁反叛的行为，苻健感觉到朝中不支持苻生的大臣为数不少，临终对苻生说："大臣们和各个部族首领们，如果不听从你的命令，可以除掉他们。"这句话给了苻生负面的心理暗示，让他以为自己就是绝对的权威，谁与自己作对，就应该被处理。因此，有的大臣因为犯颜直谏而被杀，有的大臣因为苻生一时的异想天开而遇害，整个统治阶层陷入惶恐之中。

苻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如果有人对他阿谀奉承，他会说此人是小人，立即处死；如果有人对他提意见，他又会说这个人诽谤皇帝，处以极刑。据说，他接见大臣的时候，经常在殿前准备锤、钳、锯、凿等刑具，把讨论国家大事的朝堂变成了阴森森的森罗殿。

当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成为国家意志时，所有的法律和社会准则都会被践踏。这是政治权力一只独大的恶果，也是古代中国与现代社会相比，最受诟病者。

史书中还有很多关于苻生暴虐的描写，其恐怖程度，比最血腥的恐怖电影都可怕。到了北朝末年，东魏的杨衒之在他的著作《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一件轶事。有一位隐士赵逸，自称是晋武帝时期的人，一直活到北魏时期。他说：

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



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

其实，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提起曹操被塑造成奸臣的原因，就在于后人的诬陷，大意与“推过于人，引善自向”一致。因此，对于苻生的残暴，史书中的描写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可以肯定的是，大臣们对他又恨又怕，但他是否疯狂地无差别杀人，却不一定。



在苻生任性地统治着前秦帝国时，又有大臣在策划对他的谋杀。

姚襄一直是前秦的威胁。他原是后赵政权的将领，后赵灭亡后，他为了争夺地盘，多次与前秦作战，还与东晋有着紧密的联系。东晋出兵北伐，他也积极配合。为了除掉这个心腹之患，苻生派皇族苻黄眉、苻坚与将领邓羌等讨伐姚襄。经过苦战，苻黄眉等人终于得胜，将姚襄斩杀。可是，班师回朝之后，苻生并没有对苻黄眉进行封赏，而且还总是在公众场合对他恶语相加，横加侮辱。苻黄眉忍无可忍，便打算除掉苻生，然后自己称帝。可是他的计划败露，苻生将他处死，为了免除后患，苻生兴起大狱，对苻黄眉的亲属和王公大臣进行了大清洗。

在这种情况下，苻坚也感受到了危机。其实，苻坚对前秦皇位也是有野心的。就在苻生刚刚即位的时候，薛赞、权翼两人就建议苻坚杀掉苻生而自立，当时苻坚并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他还是将这两个人收在身边作为谋臣。等到苻生杀了很多大臣之后，梁平老等人也劝说苻坚取而代之。苻坚于是开始着手准备。

苻坚等人的计划，苻生虽然没有全部知道，但也感觉到了风吹草动。他本来对苻坚是比较放心的，那么多宗室、大臣被处死，苻坚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够与大臣结交，可见苻生是没有想到苻坚会背叛自己的。当他有所察觉后，便在夜里对在身旁侍奉的婢女说：“阿法兄弟也不可信，明天我就要除掉他们。”阿法，就是苻坚的同父异母兄长苻法。

也许，知道了苻坚背叛自己的消息，苻生有了众叛亲离的感觉，所以才会把这么机密的话说给一个普通的婢女听。但是，这个婢女却把消息通报给了苻坚兄弟，直接加速了他的死亡。

按照史书的记载，当苻生说过这句话之后，苻法在当天夜里梦见有神灵对他提出警告，马上从睡梦中惊醒，思绪不能平静。正在担心时，苻生身边

的婢女就来通风报信，苻坚与苻法便决定马上动手。他们作了分工，苻法与梁平老、强汪率领数百名死士潜入皇宫的云龙门实施暗杀行动，苻坚与吕婆楼率领三百余人在后面虚张声势，向皇宫进军。当时负责守卫皇宫的将士不知虚实，又见到侍中吕婆楼在对方的阵营之中，便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当苻法等人闯进皇宫时，苻生还在呼呼大睡。苻法等人将苻生控制起来，苻坚进宫后还表示宽容，将他废黜为越王，但过了不久就将他杀死。苻生临死之前喝了几斗酒，所以临刑之时完全是酣醉状态，死得并不痛苦。

杀掉苻生之后，苻坚先推举苻法做皇帝。苻法以自己不是正室所生推辞。其实，苻法也看得出这是苻坚的试探，不只是试探自己，而且在试探满朝文武。当时苻坚虽然借助吕婆楼、梁平老等人控制了朝廷，但他怕有人不支持自己，便想先推出苻法作一个过渡。

苻法推辞，大臣们也表示拥护苻坚，苻坚便顺水推舟，做了前秦的第三任统治者，称“大秦天王”。

在后代的史学家看来，前秦政权是一个“伪政权”，因为当时的正统是东晋王朝。因此，无论是苻健还是苻生，称帝都是僭越。而苻坚通过武装政变杀掉苻生而夺权，这种非常态的掌权方式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是“僭主”，因此，他是杀掉苻生这个“僭主”的新僭主。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

苻坚做了前秦君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苻生执政时期彻底告别。他将苻生的宠臣董荣、赵韶等二十多人处死，在前秦境内实行大赦。此举显示了一种姿态，象征着取代苻生的苻坚不会再走苻生的老路，他要让前秦摆脱无章法的统治，要让大臣们从人人自危的环境中放松，将精力放在壮大前秦基业上。

尔后，苻坚先是将自己的兄弟、儿子都封为亲王，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重新任命，他的亲信吕婆楼、梁平老、强汪和王猛等人都成为朝廷中最重要的官员。

这些拨乱反正的工作完成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巩固皇位的问题了。苻坚自己没有出面，而是让母亲苟氏代表自己对苻法下了最后通牒。苟氏要杀掉苻法的理由是，苻法比苻坚年长，而且功勋卓著，众人都十分拥戴

他，恐怕他将来会生异心夺权。实际上，苻坚在杀死苻生后就对苻法进行过一次试探，苻法顺利地通过了测试，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岂能允许有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潜在威胁者存在？而且，苻法并非苻坚之母苟氏所生，按照权贵之家的血统观念，苟氏和苻坚也没有将他真正看成自己人。当然，苻坚为了表现出自己的仁慈，还跑到苻法被囚禁的地方放声痛哭，与苻法作最后的诀别。苻法死后，苻坚终于暗暗地长出了一口气，从今而后，在皇族内部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通往皇位的道路上总是遍布鲜血，苻坚就沿着这条用鲜血铺成的红地毯，走向他人生的辉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对氐族豪强进行限制。

氐族豪强是在前秦政权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社会阶层，当时他们依靠自己掌握的部族势力支持苻洪、苻健父子建国，因此在前秦建立后，他们成为国家的重要官员。但是，他们在朝廷上依旧像在过去的军事体制中一样，将苻氏视为大家共推的盟主而非乾纲独断的一国之君，因此苻健才会在临终前特别嘱咐苻生，假如他们不听号令，可以将他们除掉。

苻坚称大秦天王后，氐族豪强们的跋扈之气依然未改。苻坚并不想像苻生一样通过滥杀的方式树立权威，他要迂回地实现让氐族豪强低头的目的。所以苻坚就利用他们对王猛的轻视制造了一场血案。

王猛有治国之才，苻坚对他十分信任，但一些氐族豪强因为王猛是汉人而轻视他。其中老臣樊世对王猛最为蔑视，经常当众辱骂王猛。苻坚就抓住这个机会，在朝廷上激怒樊世，并以樊世盛怒之下大骂自己的言辞作为罪名，将其处斩。很多氐族豪强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在朝堂上大呼小叫，苻坚就对那些目无君王的大臣进行体罚。通过这件事，苻坚树立起了皇帝的权威，并要求氐族豪强遵守国家的各项法规。

在整顿政治秩序的同时，苻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前秦政权的建设上。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让前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因此，苻坚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选拔在各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官员，效法中原王朝建立祭祀礼仪，鼓励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兴办教育，恢复儒学，对社会上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维持生计的百姓予以照顾，并对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进行表彰。这些政策，都说明苻坚治国的基本方针是按照中原的价值标准将前秦引入正轨。

此外，苻坚还遵从秦汉时期的礼仪制度，在都城长安建造明堂，修建南



北郊祭祀的场所，时刻通过自己的礼仪活动向众人表明他要建立一个中原式政权的决心。到了春季，他还亲自去耕种籍田，他的皇后苟氏也亲自采桑养蚕，以此来劝慰百姓以耕织为本。

为什么苻坚会制定这样的治国方针？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当时北方长期处于中原政权的统治之下，深受秦汉帝国的价值观念影响，以农耕为业，崇尚儒学，重视教育；只有尊重当地百姓的习俗，才能将他们与进入中原地区的各个游牧部族融为一体，而不至于让他们互相仇视、互相斗争。

苻坚及其部下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应该说，大臣们比苻坚的认识要清晰一些。一次，苻坚登上陕西龙门山，驻足远眺，喜不自胜，对身边的群臣说："山河险固，真是天地之间的大美！当年汉代的娄敬说'关中四塞之国'，此言不虚。"他话音刚落，给事黄门侍郎权翼、中书侍郎薛赞当即回答他："为臣听说夏、商两朝的都城也都以险要坚固而闻名，周、秦两代的人口也非常多，但是这几个朝代到了最后不是都免不了灭亡的命运吗？就因为他们不推行道德教化，才会导致王朝的倾覆。吴起曾经说过：'在德不在险。'希望陛下能够不以山河之险、城池之固作为统治的要务，而是以仁德之心对待天下苍生。"

苻坚采纳了权翼和薛赞的建议，开始以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治理百姓。称帝的第二年发生了旱灾，苻坚主动缩减自己的饮食开支，撤下钟鼓等乐器，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灾情的忧虑。他还将皇宫内的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都赐给将士，并命令后宫女子都不得穿着质料精良的衣物，不能穿拖地长裙。

苻坚的这些举动，都是要向天下人表明他在为百姓担忧，而且愿意和大家一起共渡难关。这完全是按照汉代以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做法来做的。苻坚让百姓感觉到，他与中原的君主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他不是汉人。

除了表态，还有实际的惠民政策。苻坚将山川湖泊这些以前由国家独享开发权的自然资源开放给百姓，为百姓提供了一条大旱之年的谋生之路。除此之外，在发生旱灾之后，他还停止对外战争，让百姓不用负担战争的支出，从而使民间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自救。

苻坚的中原式政权建设在几年后取得了成效。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持续上升，境内的盗贼也日趋减少。而且，苻坚即位之后，恰逢南方的东晋政权将北伐的重点放在了被前燕政权控制的中原地区，因此前秦能够休养生息。苻坚抓住这个机会，充分发展境内的农业生产，使前秦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另外一方面，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让苻坚有了更大的余地对官僚队伍进行整顿。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苻坚最信任的大臣王猛，他的职务是侍中、中书令、京兆尹，相当于苻坚的直属办公厅主任兼长安市市长。

王猛有一次处理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特进强德是前秦开国君主苻健的内弟，此人经常酗酒滋事，蛮横无理，欺男霸女，成为百姓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王猛将其捉拿处死，并将他的尸体放在闹市中示众，杀一儆百。人们看到皇亲强德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对前秦政权的信心就增强了。王猛再接再厉，和时任御史中丞的名将邓羌一起查办了二十多个不法的氐族豪强与当朝权贵，官员们再也不敢仗势欺人。百姓的正常生活不受侵扰，自然更加拥护前秦的统治，前秦境内出现了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气，令行禁止，天下太平——这十分不容易，要知道，从苻坚即位到此时，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而被当做中国古代明君楷模的唐太宗，也是经过了四五年时间才造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贞观之治"局面的。而且，唐太宗从即位开始就隔三差五地找大臣们讨论治国方针、治国路线、治国思想、治国理念，频频引经据典，以上古尧舜时代作为参照，而苻坚和王猛等人，没有那么多思想工作会议，没有那么多大讨论，就实现了太平。两相比较，不禁令人感叹：踏实做事的，往往被尘封在史册之中；善于口头表达的，就会被当成偶像膜拜。

王猛和邓羌之所以能够放开手脚整顿吏治，使前秦的社会机体出现良性循环，就是因为有苻坚在背后的有力支持。苻坚深谙为君之道，他知道君主不应时时刻刻出面，只要思路明确，将具体工作交给有能力的大臣，就可以高枕无忧。一旦执行君主意志的大臣被质疑，他还可以动用君主的权威对其进行支持，以裁决者的身份把握大局。

王猛和邓羌的工作取得成效后，苻坚高兴地对他们说："我今天总算看到了天下有不可违抗之法，也看到了天子真正的权威！"这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的肯定。接下来，他派遣使者到各地观察，继续贯彻鼓励农耕、劝学劝善、褒奖孝道、为民造福的治国主张，并对地方官员队伍进行了整顿。这种持续的一以贯之的做法，也不断推动着前秦的发展，而发展之后的前秦对边境的游牧部族也产生了威慑力和号召力。

当时，匈奴的左贤王刘卫辰请求归顺前秦，并请求苻坚将一部分关内的田地赐给匈奴部众。苻坚同意了他的请求，谁料前秦边境地区的将领贾雍趁



匈奴人未作防备之时，派兵对其进行偷袭，掠夺了匈奴的牲畜和财宝。苻坚闻讯大怒。他认为好不容易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边境上的匈奴问题，此时主动挑起战争是不智之举，不但很容易让匈奴与前秦反目成仇，而且还会给人以前秦出尔反尔、因蝇头小利而不顾信义的印象。于是他将贾雍掠夺的物资全部归还，并将贾雍免职，还亲自派使者到刘卫辰处再次表示了与匈奴和平相处的诚意，这才打消了刘卫辰的疑虑，率领部众进入塞内定居。

苻坚对匈奴的招纳、对贾雍的处理，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怀。很多人面对民族问题与边境问题，喜欢"彻底解决"，即用肉体上消灭对方的方式解决对手，甚至不惜动用各种卑鄙手段：暗杀、偷袭、欺骗……无所不用其极。而苻坚想到的要更远，他将匈奴看做一个边境上的样本民族，如果处理好了匈奴问题，那么边境上的其他游牧部族自然也会效仿匈奴，与前秦和平相处。果不其然，在匈奴成功归顺之后，乌桓、鲜卑的一些部落也先后归顺前秦，边境地区从此安定了许多。

就这样，到了苻坚执政五年之后，前秦已经从一个氐族政权脱胎换骨成为中原式的地方政权。就在这一年，苻坚宣布大赦，并为文武官员普遍升官一级。

回顾前秦这五年走过的路，正是一个系统改造的过程：在上层，推动政治体制变革，尽量摆脱氐族豪强这个群体对朝廷政治的影响，并通过各项法律的颁布以及监察官员的工作，让朝廷成为建设前秦的发动机而非牟取暴利的抽水机；在中层，通过提倡儒学、兴办教育，让适合中原地区统治形势的人才进入各级政权组织，并用儒家文治、德治的主张鞭策他们，使国家政令得以准确、顺利地贯彻；在基层，通过休养生息政策让百姓能够踏实地从事生产，通过鼓励生产让百姓自食其力，通过整顿吏治让百姓不受侵扰，通过国家保障让百姓幼有所养、长有所用、老有所依。

这几个层次若干环节的改造，缺一不可。当年秦始皇平定六国，在制度上也推行了一系列变革，但因为急于让原来的六国地区与秦国融为一体，推行了一些过于严苛的政策，引起了各地百姓的不满，在他去世之后，偌大的秦帝国就土崩瓦解；汉武帝注重兴利开边，将国家作为敛财工具和战争机器，虽然取得了赫赫战功，但晚年却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曹操注重恢复经济、安抚百姓，但因为缺乏理性的制度，导致统治阶层后继乏人，政权的中高层最终被他有意压制的大族门阀把持。

回望古人之成败，再来看苻坚执政五年的成果，确实令人惊喜。可是，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执政的前期，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局面，只是因为他们或是出现政策转变，或是一直没有解决制度问题，才出现了后来的困境。那么，这位前秦的新皇帝，是否能将这个政权的春天维持下去呢？



四、"走进新时代"

苻坚即位之后，一共使用过三个年号：永兴、甘露和建元。在使用"永兴"和"甘露"这两个年号的八年间，前秦已经成为北方的强国。公元365年，苻坚把年号改为"建元"。从字面上理解，这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从历史上追溯，汉武帝开始采用年号纪年法，其即位之初的年号就是"建元"。

苻坚是否想要成为汉武帝那样的一代雄主呢？

可以看到的是，苻坚一直将自己与中原的帝王比较。他即位之后就大力兴办儒学教育。当时中原久经丧乱，要找到一大批儒学修养高、可以作为教师的人并不容易。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他特准官府学校中能够通一经以上的学生担任教师，并要求官员子弟必须要去学习儒家经典，并专门定期表彰儒学造诣深、才能突出、品德高尚的人。为了表示对儒学的重视，苻坚还亲自到长安的太学去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并对他们的儒学水平进行评级。有时他还就儒家经典的内容提出问题，连太学的教师太学博士都无法回答。

一次，苻坚问太学博士王实："我一个月内三次到太学来考察大家的学习状况，对优秀者进行褒奖，对后进者给予处罚。对此，我一直不敢懈怠，好让儒家先贤的微言大义不会在我这个年代失传。我的贡献，和汉武帝、汉光武帝两位提倡儒学的前代帝王还能相比吗？"

王实回答说："自从西晋灭亡、刘曜和石勒在中原征战，汉代的故都长安和洛阳都变成了废墟，很多儒生或是被杀，或是逃到南方，传世的典籍也都消失了，儒家文化遭受了大的劫难，就像秦始皇焚书之祸一样。陛下您拨乱反正，修建学校，恢复儒学教育，还在社会上提倡儒家的道德，这样的功德足以流芳百世，汉武帝和汉光武帝又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苻坚闻言，自然非常高兴。从此以后，他每个月都要到太学观摩，并将此作为一项固定的活动。有了他的亲自督导，学生们自然也格外用功。

这一次改年号为“建元”，苻坚也确实想成就一番事业。到了建元五年，机会终于来了。此前，东晋大臣桓温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将政敌从军事领域清除，逐步控制了东晋的军权。这一年，桓温率大军讨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浚县以西）与前燕对峙。前燕的军队与桓温作战屡次失利，前燕君主慕容暐（wěi）十分惊慌，派使者向苻坚求援，并答应割让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以西的地盘给前秦。

前燕和前秦分别控制着中原的东部和西部，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消灭南方的东晋政权。苻健在位时，桓温曾经进攻长安，造成了大恐慌，前秦还几乎因此而迁都。苻坚对此事记忆犹新，因此他始终将东晋作为前秦政权的头号敌人，想要联合前燕一起对付东晋。但前燕一直觊觎前秦控制的关中地区，所以双方一直没有和平谈判。这一次慕容暐终于主动要求联合，苻坚自然乐得接受，便派将军苟池等人率领两万人马前去救援。不久以后，桓温在枋头战败退兵，苟池等也班师凯旋。

战事刚刚结束，慕容暐就后悔自己过于轻率，将虎牢以西的中原要地割让给了前秦。他便派使者对苻坚说，当时割地的条件是使者个人开的空头支票，不是出自自己的心意，而且邻国之间互相救援是分内之事，不能乘人之危侵占土地。慕容暐这样说，就是要公开反悔，苻坚自然不同意，他派王猛等人率领三万军队讨伐前燕，并让在前秦政治避难的前燕皇族慕容垂担任向导，围困洛阳。慕容暐派兵前去救援，又被前秦将领梁成等人在荥阳阻击，洛阳孤立无援，只得投降。

第二年，苻坚又派王猛带领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员大将，率六万军队进攻前燕。苻坚亲自到长安城外的灞桥以东送别，并面授机宜，让王猛出其不意深入前燕腹地，而后自己将率军亲征，与王猛在前燕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漳河沿岸）会合。王猛按照苻坚的吩咐行事，他自己进攻壶关（今山西长治壶关），杨安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两路出击，打得前燕守军措手不及，这两座军事重镇迅速被攻克。接下来，王猛使用火攻，将慕容暐派去救援的四十万大军粮草辎重烧毁，邓羌等人又发动突袭，斩杀了敌军十五万人，王猛的军队便包围了邺城。

苻坚闻讯，马上率领十万精兵直奔邺城，与王猛合兵之后发动猛攻，邺城也成为前秦的战利品，慕容暐在出逃途中被擒，前燕的官员和部族首领全部归降。苻坚将前燕皇宫中的金银珠宝全部赏赐给将士们。吞并了前燕之

后，原来在前燕控制下的二百四十五万余户、将近一千万人口都成了前秦治下的百姓。苻坚将前燕统治地区的地方豪强和各部族共十万户迁徙到关中，以加强管制，还允许那些因为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回乡生活。

对前燕皇族，苻坚也采取了优待政策，把他们全部带回长安，并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员。对此，很多大臣表示不赞同，过了几年之后，依然有大臣借出现彗星这一"异变"提出前燕皇族将会对前秦不利，应该把他们全部诛杀，苻坚不答应，反而任命慕容暐为尚书、慕容垂为京兆尹、慕容冲为平阳太守。这一任命出台后，苻坚的弟弟苻融上书表示反对。苻融认为，慕容氏并不是因为心悦诚服而投靠前秦的，而是经过战士们的浴血奋战将他们擒获的，苻坚不将他们处死或是流放，而是把他们安排在朝廷重要的职位上，无异于养虎为患。苻坚依然没有同意。

为什么苻坚会如此厚待前燕皇族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想要效法儒家标榜的古代圣王，以德服人。儒家宣扬周武王灭商之后，依旧将商代的后人分封为诸侯，并通过联姻等形式将各地的割据政权也团结到自己的阵营之中。苻坚似乎是真相信儒家的这一说法，因此才会对慕容氏如此照顾。

其实，早在灭亡前燕之前，他就显示过自己的大度与宽容。投降前秦的匈奴左贤王刘卫辰曾经在建元初年伙同右贤王曹毂发动叛乱，被邓羌生擒。苻坚并没有处罚他，反而封他做夏阳公，依旧统领匈奴部众。这种"怀柔远人"的做法，是苻坚执政的一大特色。当然，这一政策后来带给他极大的麻烦，我们留待后文再说。

将前燕吞并之后，苻坚并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而东晋内部出现的政治动荡，也给了他机会。

却说桓温在遭遇枋头之败后，开始了对东晋政权的全面控制。公元371年，他将当时的皇帝司马奕废为海西公，改立简文帝司马昱，并试图控制简文帝朝廷。苻坚闻讯，对大臣们说："桓温这个人，先是在灞上战败，又在枋头失利，十五年间损失了东晋多少军队！而他一个六十岁的人，战败之后不引咎辞官、闭门思过以谢罪，反而还废黜君主来满足个人的野心，他把天下人看成什么了？"显然，苻坚觉得东晋桓温擅行废立之举必将引起东晋内部的反对，所以他要抓住机会对外开疆拓土。



苻坚先将枪口对准了氐族人杨世的仇池国政权。此政权建立于西晋时期，由于其占据了甘肃南部，所以对前秦的后方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苻坚要

对外用兵，仇池就是首先要清除的定时炸弹。

杨世曾经投降苻坚，后来又归顺了东晋。他去世之后，继承人杨纂与其叔父杨统不睦，双方兵戎相见，苻坚便趁乱进兵，派杨安、苻雅等率领七万军队出征，经过一番战斗，杨统、杨纂先后投降，苻坚任命杨统为平远将军、南秦州刺史，并任命杨安为都督镇守仇池。

尔后，苻坚决定继续西进。这一次，他使用了和平的手段，对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进行招抚，将之前俘虏的前凉兵将释放回去。前凉君主张天锡听闻苻坚先灭前燕，后平仇池，觉得若不归降恐怕凉州会成为一片焦土，便马上派使者到长安请求归顺。苻坚若干年来推行的怀柔远人政策，终于在前凉取得了成效。

这一系列变化产生了多米诺效应，接下来，吐谷浑首领碎奚也进贡了五千匹马、五百斤金银，并向前秦称臣。

在南征北讨之余，苻坚对内政也毫不懈怠。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时，前秦境内再次发生旱灾。为了应对旱情，苻坚让百姓采用能够抗旱的"区田法"种植，他还担心来年旱情继续，于是减少官府的衣食开支。这样，虽然连年用兵，但前秦还是顺利渡过了旱灾。而且苻坚还亲自到太学去，通过对学生的经学水平进行考察，选拔了一批官员。

在公共设施建设上，苻坚还要求从长安到地方的道路两旁都种植槐树和柳树，每隔二十里修建一座供来往行人歇脚的临时休息室，每隔四十里则建一座官府的驿馆，大大方便了国内迁徙和交通。当时的人写了一首歌谣来赞颂此事："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建元八年（372），东晋简文帝和权臣桓温先后去世，东晋内部各大家族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政权过渡上。此时苻坚再次出兵，从东晋手中夺取了西南的梁州（相当于今天的陕西汉中、四川东部、重庆以及贵州北部）和益州（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盆地）。

尽管取得了如此多的军事胜利，但前秦并非一帆风顺。就在取得梁州和益州的三年之后，最受苻坚信任的大臣王猛去世。对于事业一帆风顺的苻坚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王猛死后，苻坚几次痛哭失声，并对太子苻宏说："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夺去王猛的性命啊！难道是不想让我一统天下吗？"

但苻坚没有沉浸在王猛去世的哀伤之中，而是更加勤勉。内政方面，他征发了公卿大臣与富豪之家的三万名奴婢开凿运河，灌溉关中地区；对外扩张方面，他平定了梁州张天锡的叛乱，并出兵消灭了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至此，前秦已经成为地跨草原与中原、东西疆界与秦汉相同的强大政权，占据了整个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二。

另外的那三分之一，就是东晋的统治区域。东晋与前秦，早晚要发生一场生死决战。



五、失败是失败者的墓志铭

苻坚要攻打东晋，可以说是既定的政策。生活在分裂时期的君主，只要才能与志向都基本正常，就不会放弃消灭对手、实现统一。苻坚也不例外。他对周边各政权的吞并，就是为了消除后患、全力对付东晋。

据说，王猛临死之前曾经留下遗言，劝苻坚继续推行仁政，并提出东晋在江南立足几十年，又享有中原政权的正统身份，不可与之开战的建议。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所谓的王猛遗言，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首先，王猛在世之时，前秦就与东晋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局部战争，但我们找不到王猛劝谏苻坚与东晋保持和平的记录；其次，在王猛去世之前，东晋国内的统治已经滑落到最低谷，无论军事力量还是内部凝聚力都无法与前秦相比，作为一个有见地的政治家，王猛不会如此迂腐；再次，王猛去世之后苻坚说过，“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夺去王猛的性命啊！难道是不想让我一统天下吗？”这恰恰说明王猛在消灭东晋、实现统一的问题上与苻坚是同一立场的。

大多数人只知道淝水之战中苻坚一败涂地，而对苻坚统一天下的计划却并不知晓。事实上，苻坚采取的是稳健的策略，他并不希望通过一场战争消灭东晋，而是要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步吞并东晋的领土，然后再对其作最后一击。

在吞并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之后，苻坚就开始实施对东晋的蚕食策略。他派苻丕、慕容暐、苟苌、慕容垂等率领十余万大军，分兵四路进攻襄阳（今湖北襄阳襄城区内）。

襄阳是东晋在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一旦失守，位于下游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内）将无险可守，因此苻坚将攻取襄阳作为打击东晋的

第一选择。苻丕最初打算强攻襄阳，但苟苌建议他采用围城战术，襄阳将不战而降。苻丕便和从南阳赶来的慕容垂等人把襄阳团团围住，但并不攻城。此举引起了苻坚的不满，他给苻丕下了命令，如果第二年还不攻下襄阳，就让苻丕自尽。

苻丕无奈之下只得攻城，而东晋的将领桓冲、谢玄等人都不出兵救援，困守襄阳的东晋将领朱序被擒。苻丕将他押送到长安，苻坚因为朱序尽忠于东晋，不但赦免了他杀伤前秦军队的罪过，而且还封他为度支尚书（掌管赋税与地方贡品的官员）。

接下来，前秦军队以襄阳为中心，在江淮一带四处征伐，甚至一度打到距离东晋都城建康附近的最后一座重镇扬州州城的百里之地。东晋朝廷大为震惊，急调谢玄、谢石等率军保卫扬州。经过一番战斗，东晋取胜。不过，前秦军队虽然在进军扬州的过程中失利，但依然能够控制江淮一带的若干战略要地。

可以说，此时前秦已经具备了大举进攻东晋的一切条件：国富民强、兵力充足，占据了江淮之间的军事据点，并且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蜀地，可以分兵几路直取建康。但苻坚当时却没有出兵，一方面是因为进军扬州遭遇了失败，当时前秦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王猛去世之后，内政方面缺少了核心人才，再也找不出像王猛这样能够出将入相而且能让苻坚绝对信赖的人。而连续发生的几场叛乱，尤其是皇族苻洛、苻重的叛乱，让苻坚觉得必须先对统治阶层内部进行调整，而后才能发兵南征。他任命苻丕等人分别镇守四方，同时分别负责对乌桓、鲜卑、匈奴等部族的管理。

另外一方面，苻坚本人在对外连续取胜之后，心理上也出现了变化。他开始讲究排场，在宫殿中陈列奇珍异宝，向西域各国前来朝见的使者摆出天朝上国的姿态。尚书郎裴元略劝他放弃奢侈的习气，而加强道德修养，苻坚这才将华贵的珠帘等奢侈品撤下。有形的珠帘虽然已经撤掉，但在他心中，自己已经是全天下的帝王的自许和骄傲却并没有撤除。自傲情绪一旦产生，就很容易穷兵黩武。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段对苻坚的评价极为精彩："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数，多次，屡次。）

苻坚确实沉浸在“数战数胜”的幸福感中，却没有料到，他要发动的这场对东晋的最后一战，竟是他人生的终点站。

苻坚觉得，灭亡东晋的日子已经快到了。他先是任命皇族苻朗担任青州刺史，主持东部前线的军务，接着任命裴元略为巴西（今四川绵阳梓潼）、梓潼（其地域约为今四川南充）两郡太守，让他在蜀地准备战船，打算从东西两线水陆并进，与东晋决战。此时距离上一次攻占襄阳、进逼扬州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东晋王朝已经从低谷中走了出来，以谢安为首的执政大臣也已经让朝政走上了正轨，谢玄等人组建的北府兵也越来越成熟，与之相比，前秦却危机四伏。

苻坚一直坚信，只要以德治下，无论是多么顽固的敌人都会被感动。所以，他对刘卫辰、慕容暐、慕容垂、朱序等人都以礼相待，而且还任命他们做朝廷中的重要官员。但是，如果对方并不领情，那么他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流水。刘卫辰作为匈奴首领，又与拓跋鲜卑关系密切，在他的头脑之中，根本就没有本本分分地做一个大臣这种逻辑；前燕慕容氏建国几十年，虽然因兵败而亡国，但并不把胜利者苻坚作为自己真正的主人，相反，由于苻坚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留在身边，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前秦的最高权力，只要前秦内部发生不可控制的危机，他们就会趁机作乱；而朱序本人因战败被俘，虽然苻坚对他十分器重，但在他心中，依然以东晋为祖国。就是这样一群人，日后成为苻坚败亡的重要干预者。



有时一个政治家也会表现出天真的一面，苻坚也是如此。他相信儒家所描绘的推行教化、感化他人的政治理想真正可以实现，也许这也和他笃信佛教有关。当初攻占襄阳，他专门派人将东晋的著名僧人道安接到长安，让他在长安翻译佛经，弘扬佛教。就在准备出征东晋之前，他还专门派大将吕光出征西域，并嘱咐吕光攻占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之后要将名僧鸠摩罗什（原籍印度，精通汉语，与真谛、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译有《般若波罗蜜经》等）带到长安。佛教倡导的劝善、修身与宽恕之道，与儒家的道德理想都对苻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他才会如此厚待这些敌人吧。

建元十八年（382）九月，东晋名将桓冲派扬威将军朱绰进攻襄阳，掠夺了民户六百余家。苻坚就以此为由，召集群臣进行商讨。他说：“我继承皇位已经二十多年了，四方基本已经平定，只有东南一隅的晋国还负隅顽抗。我现在想要出兵征服东晋，一统天下。我国兵马总计约有九十七万，我

打算亲自出征，各位以为如何？”

权翼进谏说：“晋国文有谢安，武有桓冲，而且现在其国内比较稳定，我国此时出征，恐怕难以取胜。”大臣石越也赞成权翼的说法，可苻坚却不以为然，他非常迷信自己的兵力，说：“以我百万大军，假使把马鞭投入长江，足以让长江断流。我们有如此雄厚的实力，还怕什么呢？”但是因为大臣们意见不统一，苻坚只得散朝。他留下自己的弟弟苻融商议，可苻融也不同意他的南征计划。

满朝上下，只有前燕皇族慕容垂极力称赞苻坚的南征计划，并劝说他及早发兵。连连受到大臣们反对的苻坚感觉慕容垂是自己的知音，殊不知，慕容垂是想趁着苻坚南征东晋两败俱伤的时候，发兵恢复前燕的基业。

大臣们知道苻坚笃信佛教，非常信赖僧人道安，就请求道安劝说苻坚放弃南征。有一次，苻坚邀请道安一同出游，向道安询问征伐东晋是否可行。道安作为一个僧人、一个东晋僧人、一个见到前秦太平景象的东晋僧人，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不愿意见到两国之间战火纷飞的场面，便借此机会委婉地劝说苻坚最好是偃武修文，不要妄动干戈。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苻坚连道安的话也听不进去，败兴而归。

建元十九年（383），苻坚正式进行全民动员，准备出兵攻打东晋。他要求民间每十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人参军出征。在出征之前，苻坚还对东晋进行了舆论攻势。他宣传说，自己已经准备任命东晋皇帝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宰相谢安为礼部尚书，名将桓冲为侍中。按照苻坚一向的政治作风，这个政治许诺还真不是空头支票，假如他取胜了，真会作出这样的任命的。

当时大臣们都不希望苻坚出征，只有慕容垂、姚苌等居心叵测的人极力鼓动他早日起兵。

当年八月，苻坚率领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余万从长安启程，向前线进发。据说苻坚的大军绵延千里，后军与前军首尾相望，十分壮观。当苻坚的先头部队到达前线时，后军才行进到咸阳，而蜀地的水军刚刚出发。事实上，前秦军队还未开战，就在调度方面暴露了问题：军队过多，指挥不灵，而且效率不高，很容易受意外因素的影响。

东晋得知苻坚发倾国之兵前来，自然不敢轻敌，便派谢玄、谢石等驻守前线，而宰相谢安却整天优哉游哉，下棋赌博，一点没有紧张的表现。桓冲对此十分担忧，他甚至悲观地觉得东晋将要亡国。



的确，苻坚的近百万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时，很多人都认为东晋必败。而且因为前秦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几场胜利，于是就连谢石、谢玄这些东晋前线将领都已经对战事失望。

苻坚听说前线取得胜利，亲自率领八千名轻骑兵赶赴寿阳（在今安徽寿县境内），并派与东晋将领们熟识的朱序前去劝说谢玄等投降。然而朱序到了东晋营中，却为谢玄等分析战局，认为苻坚的大军如果到达，则东晋败局已定，不如趁前秦军队还未集结的时候将其先头部队击破，那样前秦将自乱阵脚，东晋也就能转危为安。

朱序的这番分析，不但是建立在对当时军事布局的了解上，而且是建立在对前秦国内局势的了解上。苻坚违背群臣之意坚持南征，本身就是一步险棋，一旦出现失利，战将们将丧失信心，从而重弹退兵的论调；而且，姚苌、慕容垂这些怀有异心的人肯定会趁火打劫，所以不如赌上一局。

谢玄得到鼓励，重新打起了精神。他派手下将领刘牢之进攻前秦梁成部，取得胜利。苻坚开始动摇，他与苻融一起登上寿阳城眺望东晋的营寨，发现东晋部队严整有序，心里开始打鼓。

一个骄傲的人一旦遭遇失败，很容易从极度自负变成极度自卑。苻坚就是如此。多年来前秦军队一直取得胜利，而这次他一亲征就遭遇失败，在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使他开始反思群臣的议论，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他看到八公山上草木摇动，以为那也是东晋的部队，十分惊恐。

而谢玄此时开始使用计策，这应该是朱序和他商量好的。当时前秦军队驻守在淝水岸边，东晋军队无法渡河，谢玄就派使者面见苻融，对他说："您现在孤军深入我国境内，而且还在水边驻扎，这是要打持久战的架势，不像是要速战速决的样子。如果您能暂时后撤，让我国军队渡河与您展开决战，不是正合您一战定胜负的心意吗?"当时前秦众将都认为应该与之相持，等待东晋军队出现疏忽再渡过淝水予以痛击，但苻坚急于通过一场战斗证明自己的正确，便同意了谢玄的请求。可是寿阳前线的前秦军队有三十几万，一旦开始退兵，后军听不到前军的号令，便停不下来。谢玄等见状马上渡河，对阵形不整的前秦军队进行猛攻，而朱序又在后军高喊"前秦打败了"，这下场面不可收拾，前秦军队马上溃散，自相踩踏者无数，被东晋军队所杀者无数，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败退过程中，前秦兵将听到野外的风声和仙鹤

的叫声，都以为是东晋的追兵赶来，不敢停留，继续逃亡。而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前秦军队听到失败的消息，也跟着逃跑，慕容垂和姚苌等人趁机率领军队自立，九十几万的大军，瞬间崩溃。

淝水之战，虎头蛇尾，苻坚没想到居然会因为自己下的退兵命令而导致了前秦的失败。他更没有想到，这一次战败会让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前秦帝国土崩瓦解。

前秦大军溃败时，只有慕容垂率领的三万人马没有损失，他马上率领同族子弟，到前燕旧地去重建慕容氏燕国政权。看到自己以诚相待的慕容垂叛乱，苻坚心中十分难过。当时，慕容氏子弟纷纷起兵响应慕容垂，苻坚盛怒之下，召见前燕末代皇帝慕容暐，斥责他说："我现在遭遇了一点点失利，你们慕容氏就想要造反，慕容垂在山东称王，慕容泓、慕容冲也起兵响应，你去不去？你要是去的话，我给你路费！你们慕容氏，真是人面兽心，不可以期望你们做我大秦的国士啊！"慕容暐假装忠诚，让苻坚暂时相信了他。后来他想杀掉苻坚，就谎称自己的两个儿子结婚，请苻坚过府赴宴，在如此危急存亡的时刻，苻坚依然十分看重他，答应了他的请求。结果他谋杀苻坚的消息走漏，苻坚盛怒之下将其一家处死。

前秦境内烽烟四起，慕容冲又对长安发起进攻。无奈之下，苻坚离开长安，逃到五将山。姚苌派兵将此地包围，生擒了苻坚。姚苌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拒不交出；姚苌又要求苻坚举行禅让典礼，将大秦天王的位子让给他。苻坚还是拒绝。姚苌大怒之下，在新平的佛寺中将苻坚缢死。一生信奉佛法的苻坚，在寺中涅槃，不知是否死得其所？

淝水之战，是前秦从极盛转向败亡的一战，但这其实只是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是在东晋军队使诈的情况下出现的失利。一般来说，这样一场局部战争的失败不会产生动摇大局的结果，苻坚之所以会在这场战败之后遭遇亡国的命运，就因为他急于求成，在内部问题尚未真正解决时就想完成统一大业。

东晋从建国开始，到淝水之战时已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东晋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从流亡政府到江南政权的过渡，而且立国方针也从"光复中原"转变成保境安民，因此才会有道安、朱序这样的人愿意为东晋出力。

反观北中国，尽管苻坚极力营造一个太平世界，但由于西晋末年的那一

场大动乱影响至深，很多中原百姓流亡到江南，他们对前秦并不十分了解，但凡谈起汉人之外的游牧部族，都心有余悸。如果前秦不让他们充分地了解中原的变化，不让他们体会到前秦统治与东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就不会真正完成统一。

统一应该是在几代人努力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否则就只会出现军事征服。而军事征服则需要高效率、极强的行动力和作战能力。在满朝反对出兵的情况下，苻坚一意孤行，又怎么能有效率和执行力呢？

统一应该建立在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前秦政权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暗流涌动。前燕慕容氏的人员基本原封不动地被纳入前秦朝廷，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复国，大臣们曾经建议苻坚斩草除根，但苻坚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靠真诚感化他们，这种不可救药的天真，不也是他败亡的原因吗？

实际上，苻坚如果早几年出兵——在桓温和东晋简文帝去世、东晋经过了桓温专权后朝中一团乌烟瘴气的情况下出兵，未必不能成功。又或者，苻坚将这个任务交给他的继承者，再等若干年——东晋内部爆发统治危机、桓温之子桓玄开始篡权时，统一局面都会出现。退一步讲，就是在建元十九年，如果大军调动有方，而且将危险人物都放在自己身边进行有效监控，并且采取步步为营的打法，军事征服也可以完成。但苻坚，偏偏作出了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选择，最终导致了前秦政权错误地被终结。



当然，他的错误会有后人来改正。又过了二百余年，一个北方的君主，避免了苻坚的各种错误，消除了内部的各种危机，成功地实现了南北的统一。他就是隋朝的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

从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的统一，其实就是一个从苻坚到杨坚的过程。

后人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是简单的。讲到苻坚，人们只会记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记得淝水之战的失败，却不会记得，他是一个曾经让中原恢复和平、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君主。也许，失败就是苻坚的墓志铭，在后人的印象中，这是他不变的标签。



王猛

——扪虱而谈真名士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同样的情景在不同的年代总会反复上演。大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李世民出兵攻打高丽，终因天时、地利等问题黯然回师。当时，唐太宗十分后悔发动这次不成功的战争，感慨说：“假如魏徵还在世，肯定不会让我如此贸然出兵的！”——魏徵在贞观十七年（643）病逝，距离唐太宗发出这段感慨不过两年的时间。

与这一幕极其相似的是，公元4世纪，一位雄才大略的北方君主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军队，对偏安于东南的东晋王朝发起了一场“渡江战役”，最后铩羽而归。在败退的路上，这位君主——前秦皇帝苻坚——想起了自己身边第一谋士的临终遗言，劝他不要轻举妄动、擅兴兵戈，然而，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他的王霸雄图已经尽归尘土。

在名士云集的公元4世纪，这位谋士的名字看上去并不文雅：王猛。

一、被山神眷顾的寒士

从王猛的一生来看，可谓生逢其时——这对于十六国这个后人眼中“神州陆沉”的时代而言，未免是一个黑色幽默。

王猛字景略，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根据史书的记载，他的籍贯在北海

剧县，而他生活在魏郡，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他的籍贯在山东，出生地和早年活动区域则是在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河南一带。而他的家境似乎也不好，“少贫贱，以鬻畚为业”，靠着编织簸箕一类的容器，做点自产自销的小生意。

既然他的生活如此困苦，为什么还要说他生逢其时呢？

首先，他出生在北方，当时的北方几乎都在“五胡”的铁蹄践踏之下，处于所谓的“乱世”。可恰恰是乱世，给了王猛发展的机会——很多魏晋时代的士族都陆续南迁，到江东的东晋政权荫庇下寻求安定，一些留在北方的大族也都或者迁居到人迹罕至之地，或者率领族人与乡亲们建立“坞壁”，实行军事自治。而南下的胡人们，特别是那些想要经略天下的霸主，往往要听取汉人的建议，以求对中原进行最有效的统治。在大族们不肯合作甚至纷纷逃亡的情况下，王猛这样的普通士人自然就有了被发现、被赏识的机会。



其次，王猛出身贫寒，不是高门大族，这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人生财富。大族们往往依靠高贵的出身、光荣的家史，获得比常人多得多的做官与升迁的机会，但普通人只能凭借自己的能力与才学去求取功名，因此会有真才实学。另外，富贵人家出身的人，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他们更多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之中，与出身相近的人来往，不知人间疾苦，不知天下大势，但出身贫寒的人则可以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更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而且，出身贫寒者比大族子弟更能放下个人荣辱，为天下苍生考虑。这些，恰恰都是王猛在他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中显示出的优势。

可惜，只有“生逢其时”还不够，因为与他拥有相同际遇的人何止千万，要想成功，必须得有些特殊的才能。

王猛仪表堂堂、身材魁梧，性情深沉、不苟言笑，从不将细碎的小事放在心上，颇有大将风度。也许，对出身贫寒的他来说，早就明白了锱铢必较无法富甲天下这个道理，因此，他才能放下一些俗务，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更重要的事情上。

根据后人的描述，王猛博学多才，尤其喜欢兵法，但是因为太过醉心于学习，所以不常和人往来，特别是那些与他志向、爱好不同者，他甚至不屑于与之相识。这种旁人看来颇为古怪的性格，使他在邺城生活时毫无名气，那些浮华无学的富贵子弟都笑话他的古怪，也没有多少社会名流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是奇才，而且他日后会成为雄踞北方的霸主苻坚身边的第

一谋士，总应该有人识英雄于微时吧？

确实有一位慧眼识珠的名士看出了王猛的不凡之处，这个人叫做徐统。在茫茫的历史荒原中，徐统还真不是第一流的名人，但有趣的是，被徐统发现的英雄还确实不算少。王猛在邺城一带生活的时候，邺城是后赵政权的都城，徐统在后赵做过司隶校尉、侍中，是朝中的重臣。据说，徐统这个人有辨识他人才能的特殊能力。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苻坚，当时的苻坚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徐统见到他，十分惊异，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后生看上去有霸王之气"。

徐统对王猛的才能十分重视，尽管这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性情有些古怪，不爱和人交往，而且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圈里没有名气，但徐统认为他是个人才，派人召他做自己手下的功曹。可是，王猛并没有欣然前往，相反，他逃到山中隐居起来，一方面潜心读书，另一方面静观时变。

说到此处，我们应该检讨一下：既然王猛出身贫寒，靠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产品过活，那么他怎么能获得读书的机会，而且还博览群书了呢？是因为他的生意做得特别好吗？似乎不是，在那个时代，这种家庭生产的小本生意并不赚钱，最多只是维持温饱而已——王猛有一位前辈叫做刘备，因为早年丧父，只能靠和母亲一起织草席、卖草鞋为生，后来他的母亲让他向当时的大儒卢植求学，这时候做小生意的钱就不足以在保证生活之外提供学费、路费等开销了，刘备便经常靠同宗的长者刘元起资助才能完成学业。王猛的家境不会比刘备更好，因此，王猛读书的钱从何而来，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

古人其实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唐朝贞观年间修《晋书》的时候，就试图解决王猛读书的"经济难题"。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

王猛因为要维持生计，所以一直在卖自己编织的畚（簸箕一类的容器）。他曾经扛着畚去洛阳城贩卖，遇到了一个人，那人说要出高价买下他的畚，但是自己身上并没有现金，并且说自己的家并不远，希望王猛跟着他去取钱。王猛觉得高价卖出货物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十分愿意，就一路跟着那个人去取钱。走在路上，王猛并不觉得走出很远，但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进入深山之中。当时他心头一惊：莫非是遇到了强人贼寇？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并非富商，也不是名流，强人贼寇犯不上耗费如此的精力诓骗自己，而且自己素来并无仇家，料想这也不是寻仇的……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突然看到面前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端坐于

胡床（矮凳子）之上。老者左右站立着十几个人，颇有气势。老者身边的一个人走到王猛面前，将王猛引见给老者。王猛摸不清底细，急忙对老者大礼敬拜。老者见状，急忙扶起王猛，说："王公，为什么要拜我这小老儿啊，使不得！"接下来，老者命令左右拿出相当于王猛所有的货物十倍的钱，交给王猛，然后派人护送他离开。王猛走出山林之后，回头一望，不由得一愣：身后的深山，正是中岳嵩山，自己竟然不知不觉离开洛阳，到了此地！

这就是《晋书》中描述的王猛的个人奇遇。这段记载可以与《聊斋志异》中那些遇仙、遇狐之类光怪陆离的神怪故事大同小异。只不过，这个故事没有结局，我们不知那位老者为什么要向王猛赠送钱财，他们日后是否还有相遇，更不知道那老者是人是仙，是狐是鬼。这是一个唐朝人所能接受的传奇，它产生于想象力丰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精髓也被唐朝人继承，用来描述一个不得志者日后必将发达的预兆。

根据唐朝的笔记小说《隋唐嘉话》介绍，唐朝的名将李靖早年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奇遇。

当时，李靖十分"贫贱"，社会地位不高，经济状况也很差。有一次，他到华山山神庙中，对神灵讲述自己的情况，希望山神给自己一点启示，到底自己会做到什么样的官职。他本来是为着拜祭神灵，谁想越说越激动，声色俱厉，让其他来拜神的人都十分惊诧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对神像咆哮。他对着神像倾诉了好久，心情稍微平和一些之后才离开。当他走出一百多步之后，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声说："李仆射走好！"他回头四望，找不到说话的人——其实正是他所拜祭的神灵在回答他——他会做到尚书右仆射。



王猛在嵩山获得意外之财，和李靖在华山得到山神的启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给那些日后将要飞黄腾达的人作预言，而预言者，基本上都是天地神灵。不同之处在于，华山之神并没有解决李靖眼下的"贫贱"问题，而嵩山老者则对王猛以重金相赠。那么，这个故事背后是否另有隐情？王猛的"第一桶金"究竟是怎么得来的？是有好心人赠与，还是偷窃、杀人越货？

无论事实是怎样，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那位以"闻鸡起舞"而知名的东晋名将祖逖，也曾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在渡江到东晋不久，因为物资匮乏，他便纵容手下到处抢掠，并把战利品穿在身上，而且毫无愧色地对旁人说起此事。

就王猛遇仙的事件而言，历史的真相已经不得而知，因为历史总是被成功者所书写，但可以想见，十倍于货物的钱财，对王猛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也许正是凭借这笔钱，他才开始积累财富，为日后的读书求学打下基础。

对很多戏剧来说，遇仙往往是剧情高潮的来临，而对王猛来说，他的人生戏剧才刚刚揭幕。

二、扪虱会枭雄

王猛由于拒绝了徐统的征召，逃入山中隐居，因而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就在他隐居的岁月里，北方的政局风云变幻，后赵政权已被推翻，而新君主们也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各领风骚三五日的北方群雄依旧在不停地寻找人才，但他们觅得的人才，往往也和他们自己一样，随着皇位易手而成为阶下之囚。在北方还远未达到安定的时刻，对王猛而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能是唯一安全的策略。

就在北方纷争四起的时刻，南方的东晋王朝也在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渡江之初支撑危局的王氏、庾氏已经日渐人才凋零，而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势力还在成长之中，东晋百年不遇的枭雄桓温已经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桓温的家族在东晋并不算第一等高门，而且他自幼丧父，家族背景十分薄弱，但他就是靠着自己的才干，以及步步为营的谨慎，日渐成为东晋上层人士眼中的政治新星。他一面为自己积攒政治资本，一面不动声色地撤除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官员。后世因为桓温试图颠覆东晋政权而对他口诛笔伐，但他在早年并没有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夺权欲望，相反，还曾被门阀士族们视为东晋的未来之星。他担任荆州刺史期间，曾经出兵伐蜀，灭掉了割据一隅的成汉政权，而这一次，他即将和王猛在长安相见，促成这次会面的，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伐。

东晋永和十年（354），桓温率军北伐——此前一年，正是书圣王羲之万分惆怅地写下《兰亭集序》的"永和九年"——这一次，桓温手下共有步兵、骑兵四万余人。由于选择以子午道（由秦岭直通汉中的栈道）为行军路线，北方的前秦政权猝不及防，其君主苻健亲自指挥的军队也在蓝田被桓温的军队击溃。桓温驻军灞上，兵锋直指长安。

长安是汉代的旧都，也是中原的象征，那些在北方豪族铁骑下偷生的中原父老没有想到，象征着中原正统的东晋军队会突袭至此，而接下来可能就是光复长安，收复中原。怀着对故国的眷恋和对现实的不满，当地父老们纷纷携带物资前来慰问，而且还对桓温哭诉："没想到今天又见到我们中原的军队回来了！"

可是，桓温却按兵不动。此时，王猛有点按捺不住，便决定出山与桓温谈谈。只不过，他没有做隆重的准备，只是穿着百姓的服装——"被褐"，前去求见。

桓温作为东晋的代表，作为北伐的英雄，作为胜利的统帅，接见了王猛。也许，桓温不会想到，这次会面，将成为王猛光辉人生的起点，更会成为令他尴尬不已的往事。

王猛并没有和桓温做太多的客套，该表扬的、该感慨的、该感谢的，都由当地父老们说过了，因此，他乍一见面，就开始和桓温讨论时局，交流对当时一些重要的人和事的看法。这个场面我们并不陌生，曹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都是此类事件的经典名篇。只不过，和曹操的雄心万丈、诸葛亮的娓娓道来相比，王猛表现得更为世俗和洒脱。他一边谈论，一边用手捉着身上的虱子，似乎全不当这是个不雅的举动，就不知他有没有像阿 Q 一样，捉到之后用力一捏。

面对如此重要的人物，讨论如此重要的话题，王猛没有正襟危坐，没有举止矜持，而是一边纵论时局，一边在身上摩挲，不时揪出一只虱子捏一下或是信手弹开。人们全被他的这一行为震惊，可他却旁若无人，捉虱不倦。这就是王猛见桓温的第一个闪光点，后人只留下了"扪虱而谈"这个成语，而对于王猛当时谈了什么，却全无记录，可见人们更看重的，是他这种洒脱不羁的行为，而不是那些高谈阔论的内容。

没人记载桓温当时的表情，尽管桓温本人少年时期也做过很多荒唐的事，但总不至于做出正式场合挖鼻孔一类的举动吧——捉虱子和挖鼻孔，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要知道，这类举动如果发生在东晋，是会为人所不齿的，东晋的名士谢万，当着客人的面向家人索要便器，被老牌名士阮裕斥责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暴发户，不懂礼节）。在东晋名士看来，当着他人的面，做一些与个人隐私行为有关的举动，不但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捉虱子不但看上去不雅，而且从肌肤之间拎出一个个白色的



小虫随意处置，着实让他人难以接受。

桓温还是有度量的，他因此认为王猛不是一个普通人，必有常人所没有的见识。于是，桓温才敞开心扉，向王猛提问。

桓温说："我奉了天子的命令，率领精锐之师十万，伸张正义，讨伐逆臣，为天下百姓除害，所向披靡，可是三秦之地的英雄们却不来投靠我，向我效忠，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王猛回答说："您率领大军，从南方千里迢迢赶来，深入到北虏的统治区，与前秦的都城长安只有咫尺之遥，而且您刚刚击败了前秦君主苻健，若要收复长安、光复中原，可以说是指日可待。可是您却按兵不动，不肯渡过灞水，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因为不明白您在想什么，究竟您是要就此罢兵还是要休整之后攻打长安呢？您的想法不为人知，人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假如您打算就此撤兵，那些英雄豪杰如果来投靠了您，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肯定不能离开故土随您去南方，可是那样他们就会被前秦迫害，要么就得背井离乡逃走，要么就得遭受飞来横祸。请您替他们想一想，同时也希望您尽快摆明态度，究竟您是要一战消灭北虏，还是草草收场？"

桓温是个深沉的人，在一切条件还未明朗的时候，他会选择沉默。此时，桓温考虑的问题很多：他在东晋内部的政敌，会不会趁着他北伐之机暗中搞小动作，为他掣肘？如果长安久攻不下，自己孤军深入，归路被切断怎么办？大军屯驻在前敌，给养问题如何解决，是靠后方的物资运输，还是就地解决？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让桓温头疼，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他是不可能轻举妄动的。而王猛的一番话，是在逼他下决心，也是在逼他表明心迹——你桓温究竟有没有收复中原的决心？

决心当然是有，但如果为了决心就展开决战，可能会把自己逼向绝路。因此，桓温在王猛连珠炮式的追问面前，选择了沉默。他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还不完备。

此时的王猛，年近三十，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政治经验都不够成熟。他在北方生活了近三十年，作为"被统治者"的屈辱感和中原文化带给他的优越感交织在一起，让他十分纠结。因此，在桓温的北伐大军开至灞上时，他凭着一腔热血，质问桓温为何不与敌人决战于长安城下，为何不收复这象征着大汉四百年基业的故都，为何与敌人一水之隔却毫无动作。但是，他只得到了桓温的沉默。这份沉默，可以作多种理解，或是无奈，或是代表不足与

外人道，或是一种无地自容的表现，或是后知后觉者的痴呆。当时的王猛如何看待这份沉默？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作为后人不好妄自揣测，但是从另外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王猛大致的态度。

据记载，在第一次北伐因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兵之前，桓温想到了王猛。他专门派人赐给王猛车马器物，还任命他做“督护”的高级官职，邀请王猛跟随自己回南方，共图大业。

在这些条件面前，王猛的态度有些暧昧。他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马上接受。毕竟，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而言，这些条件不可谓不丰厚，跟随桓温，自己将来也许会平步青云。可是，他还是没有应允。为什么呢？因为他心存疑虑，这个疑虑就是，跟随桓温，是否真的会实现自己的志愿？东晋内部的情况，王猛有所耳闻，几大士族及其与皇族、寒族之间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东晋上层越来越不思进取的精神现状，都是王猛所不愿接受的。

就像当初，面对后赵高官徐统的征召时选择逃避一样，这一次，王猛依然选择了逃避。上一次逃避，一方面是因为后赵政权本身并非中原正统，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君王的暴虐与统治的日渐腐化；这一次逃避，一方面是因为东晋也许并非自己施展抱负的天地，另一方面是对桓温的不放心。

可是，后人在对这段历史作出解释时，凭空加进了一段故事：

王猛接到桓温的邀请后，举棋不定，于是便回到隐居的山中，向老师咨询——之前从没提到他有一个老师，这时就突然出现了。更巧的是，当他跑来此处隐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老师和他一样在此隐居，这对师徒真是缘分不浅。老师的回答是：“你怎么能和桓温这样的人共事呢？况且，你在这里就可以得到富贵，为什么还要巴巴地跑到南方去呢？”听了老师的分析，王猛才放弃了跟随桓温回归东晋的想法。

这段后人编造的故事，主题还是为了给王猛的后半生作出预言：选择留下，你将赢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此类预言在小说里经常可见：面前有一个南归的机会，你要不要？作出这个选择，将改变你人生的轨迹，你将离开故土，离开北方，你走不走？每当主角犹豫不决时，就或是出现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或是家中突然发生变故，导致其未能成行，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留下是正确的，因为你的机遇在这里，并不在异国他乡。

当然，这段编造出来的故事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借着讽刺桓温抬高王



猛及其老师的品德。王猛那个所谓的老师认为，王猛和桓温不能共事，原因就在于桓温是“乱臣贼子”。的确，桓温日后有不臣之心，虽然未曾等到改朝换代就去世，但他的“贼心”就已罪不容诛——古代史家与小说家大抵如是想。在他们的世界里，坏人生而凶恶，好人生而淳厚，即使一个忠臣后来变成奸臣，那也不是性情改变，而是他生性奸恶，在未曾得志时伪装忠心而已。桓温正是因为日后试图篡位，因此之前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追认”为伪装、险恶。而我们的传主王猛，早年虽曾受过桓温的一点恩惠，可是高洁的王猛怎么会和桓温同流合污呢？肯定要和这个“乱臣贼子”划清界限，所以，就有了这段“师徒对话”。

三十岁的王猛，真的能认识到桓温是个奸臣？恐怕当时桓温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有篡位的野心。所以，这段故事，不过是在被踏上亿万只脚的恶人身上再踩一下，以表明自己的先知先觉与洁身自好而已。

这时的王猛，并不成熟。他前面刚刚义正词严地质问桓温为什么不和苻健决一死战，却在桓温撤兵后不久，便成了苻坚的座上客。

三、前秦版“卧龙出山”

桓温撤兵后不久，前秦君主苻健去世，其子苻生继位。在史书中，苻生是个反面典型，暴虐贪婪，无恶不作，最后军民因为无法忍受他的残酷统治，公推苻坚取代他，于是苻坚作为民意代表，理所当然地除掉了暴君苻生，自己坐上了前秦君主的宝座。

事实上，关于苻生的负面消息，很多都是来自苻坚的宣传，因为他要给自己篡位弑君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君主无道无疑是最强有力的理由，再加上很多中原士人对异族统治者的妖魔化心理，苻生就成为史书中暴戾、残忍君王的代表。再加上他天生眇一目，因此在史家如椽巨笔的刻画下，就更具诡异色彩。

历史的真相，就是苻坚因为自己的野心而除掉了苻生。而推翻苻生、取而代之，身边必须有信得过的谋士与猛将，就在此时，苻坚听说了王猛的事迹。接下来，他派心腹吕婆楼（此人直接参与了推翻苻生的计划，为苻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儿子，就是占据河西、建立后凉的吕光）前去召见王猛。王猛这一次没有再矜持，也没有再逃避——是否吕婆楼用了强制手段，

我们不得而知。

苻坚与王猛一见如故，就像故友重逢一样。他们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都非常接近，对时局的判断也都高度一致，因此，苻坚十分放心地把自己篡权的计划告诉了王猛。这一行动，就相当于把王猛视为自己的心腹，王猛自然也是知恩图报，为苻坚献计献策，帮助苻坚完善篡权计划。

按照后人的说法，苻坚对王猛十分满意，认为自己遇到王猛，就像刘备遇到诸葛亮一样，“如鱼得水”。两个人志同道合，而且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经由王猛具体化、完善化，形成可操作方案，这是为君者最理想的状态：自己做战略上的把握，心腹大臣做战术上的安排，天衣无缝、同心戮力，何愁天下不治？

只不过，这份默契最初的应用，是在篡权上。

苻坚为什么和王猛如此投契？王猛又为什么能够效忠苻坚？这个问题是王猛一生中最大的谜。难道是因为苻坚有英雄气概，王猛被他的气场感召？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玄妙。



王猛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让中原恢复其固有的文化，让进入中原的边疆民族都能在一个共同的秩序下和平相处，各自保留原有的风俗，但都要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这种理想，就是所谓“以夏变夷”。而苻坚，无疑能够帮助王猛实现这个理想。事实上，在统一北方、推行教化、建立超越民族与血统的开放型国家这个目标下，苻坚和王猛的理想是一致的。

北方之所以从刘渊建汉以来就不断出现政权更迭的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族都强调自己本族对中原的统治，而拒绝接纳其他部族。这就出现了一个怪圈：一个边疆部族建立统治之后，对于和自己几乎同时期进入中原的其他部族都要采取打压政策，对中原汉人自然也是如此，由此，因血缘而引起的仇恨愈来愈强烈，复仇行为也愈来愈多，结果实现一族统治自然愈来愈难。可是，愈是如此，那些胜利者愈是要强化一族统治，生怕其他部族的人势力坐大后反噬自己。北方的长期动荡，背后就是被血缘这根红线牵着的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这使他们对血缘不同者的迫害症愈来愈恶化。

苻坚和王猛，携手解开了这一病入膏肓的病症。而他们用以解决这个难题的良方，就是以中原文化教化各族，实现文化的无差别与政治权力分配的无差别化。



这一对君臣，让人不由得想起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明镜魏徵。李世民也

是靠非正义的政治屠杀登上权力的巅峰，而他和魏徵能够达成谅解的共识，就是在教化百姓、宽待百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德治的政权，实现天下大治。

谁说理想主义者和务实的政治家没有对话的空间？

苻坚的篡位行动顺利成功，作为功臣，王猛自然也受到封赏，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不久，因为京城附近的始平（今陕西咸阳兴平）成为从各地来到前秦的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一时鱼龙混杂，豪强当道，暴民横行，闹得民不聊生。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王猛被苻坚调任为始平令，负责整顿当地的民生问题。

王猛这个理想主义者会怎么做？作为一个强调教化的士人，王猛是否会对凶恶之徒小惩大戒，或是以德服人？苻坚的心里也没底，说实话，他怕王猛那理想主义的劲头碰壁，毕竟这些从各地来的人里有为祸一方的南霸天，也有杀人越货的亡命徒。王猛能管理好这个暴徒出没的县吗？

事态的发展令所有人意外，苻坚更是意外，意外得让苻坚愤怒。

王猛并没有马上实行以德服人，甚至根本没打算号召全县学习“五讲四美三热爱”。他到任之后，马上使用严刑峻法，只要违法就要追查到底。同时，他还对县内情况进行了一个摸底，谁是安善良民，谁是不法分子，都一一做到心中有数。在摸底工作结束之后，他开始了对豪强的大清洗，禁止他们拉拢徒众，并且还鞭杀了一名犯罪的官吏。

王猛的强硬激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他们纷纷上书表示对王猛铁腕政策的抵制，因此，王猛迅速遭到弹劾，甚至被打入囚车，交到廷尉狱中进行羁押。苻坚大为惊诧，他甚至认为自己看错了王猛——他居然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原以为他会耐心教化当地之人，让他们由内而外地接受洗礼，从而成为恭顺的百姓，谁想他居然会使用高压政策！

疑惑、愤怒、被欺骗的耻辱感，让苻坚对此事高度重视。他决定亲自过问此案。以下是这对君臣的对话。

苻坚：“施政的大道，是要先推行德治，教化百姓，让他们从心理上归化，而不应该以严刑峻法逼人低头。王卿你到任以后便大开杀戒，企图杀人立威，太残忍了！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残忍的人！”

王猛：“小臣听说，治理秩序稳定的国家，要制礼作乐，由礼乐的教化感化万民；但治理秩序纷乱的国家，就必须法制严明，否则将纵容恶人为

恶，而不能保证善人行善。陛下您没有因为小臣才智平庸而轻视我，将我委派到形势最为严峻的地方去，我便一心一意想要为陛下惩处奸恶之徒，想要还百姓一个清明的局面。而现在，我只杀了一个奸徒，逍遥法外的恶人还有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活怎么能安定，陛下的统治怎么能安稳？如果陛下认为小臣无法肃清那些欺压百姓的恶人，无法胜任申明国法的工作，那么就算是将小臣掷入鼎中烹死，以谢我辜负陛下厚待之罪，我又怎敢有半句怨言？可是现在，我刚刚开始整顿局面，就说我滥用酷刑、残害良民，我可不能承担这样无中生有的说法！”

苻坚听得心潮澎湃，原来自己没有看错王猛，原来王猛也不是一个单纯天真的书生，而是一个有韬略的政治家，他不但有菩萨心肠，更有霹雳手段。稍稍稳定了一下心神后，苻坚对百官说：“王猛真是个像管仲、子产一样的治国能臣！”至于他还要不要被判罪——当然是赦免了。

为什么王猛要采取严刑峻法？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因为始平不是一个太平之地，不能遵循一般的德治办法来管理。这种理论，和兵法中的“正”与“奇”正为一理，遇到特殊的情况，就要用超出正常秩序的办法来处理，这就是所谓“以奇胜”。这种特殊办法并不是治理的目的，只是一个手段而已，等到事态回归秩序，还是要“以正合”。王猛酷爱兵法，兵书不是白读的，在治国方面稍一使用，便令人称奇，连苻坚这个自认为与他有默契的君主也不得不佩服。事实上，靠着这种奇正并用的方法，王猛顺利地压服了始平的豪强奸徒，扫除了京城附近的隐患。这次外放，也是他出山以来所立的第一功。

此后，王猛的仕途生涯便顺风顺水，在三十六岁那年，一年内升迁五次：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吏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尚书左仆射兼司隶校尉，权倾朝野，恩宠无以复加。这种状况，让一些前秦老臣不满，他们都认为王猛升迁过快，而且风头盖过了他们这批出生入死的宿将，完全是君主出于个人爱憎的提拔。因此，老臣们以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为代表，在苻坚面前数说王猛的不是。

老臣们的这番举动，让苻坚找到了突破口：为什么老臣们对王猛如此反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王猛是汉人，不是前秦建立者部族的氐人。一个汉人、士人、年轻人，得到君主的厚爱，如此快地升迁到前秦政权的核心地位上，让老臣们心中一族统治的思维反弹，对于王猛，他们欲除之



而后快。苻坚和王猛所计划的打破一族统治的努力，就此开始。

苻坚采用了雷厉风行的手段，贬黜仇腾、席宝，这个处理结果令老臣们十分震惊，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位君主并不只是对王猛有特殊的礼遇，他是对汉人、对中原文化有一种特殊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非理性的热情，而是一个君主为了进行统治而采取的理性策略。于是，没有人再对王猛的迅速升迁提出异议，王猛也毫无悬念地被提升为百官之首尚书令。

建立新统治秩序的第一回合，苻坚和王猛完胜。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氐人老臣樊世曾经为前秦立下大功，他看不惯王猛领袖群伦、统领百官的威风，明知苻坚站在王猛一边，也要与王猛对抗。一次，他当众羞辱王猛："我们这些老臣出生入死，追随先帝创立大业，却不能参与大计，而你呢，寸功未立，就胆敢成为百官之首？殊不知，前人播种后人收，你吃的都是我们种下的粮食，为你遮阴的，是我们当年栽下的大树！"

王猛知道樊世在挑衅，便不紧不慢地说："前人播种后人收，这还是好的，我不光要吃你种下的粮食，还要让你亲手做好了呈给我呢。"

樊世闻言暴怒，赌咒发誓说："我一定要把你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在长安的城门上，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不配做人！"

这本身只是一场口角，但也表现出了老臣们对王猛受器重的口服心不服。于是，王猛将樊世的鲁莽言辞汇报给苻坚，苻坚闻言大怒，说："一定要干掉这老家伙，才能让百官真正为我们效力！"二人计议一番，如此这般，便打定了主意。

这一天，樊世入朝进奏，苻坚假意和他商量事情，问他："我打算把公主许配给杨璧，您觉得杨璧这个人怎么样？"

樊世是个直肠子，杨璧与他的女儿早已订婚。他听到苻坚这番话，十分不满，便回答说："杨璧，是老臣的女婿，早就和我家女儿订婚了。陛下您怎么能让他停妻再娶、婚配公主呢？"

此时，王猛从一边闪出，指责樊世说："陛下是天下的主人，您作为老臣，不知进退，敢和陛下争夺女婿，是要和陛下分庭抗礼啊！这无异于谋反，成何体统！"

樊世哪里容得下这样的污蔑！面对王猛上纲上线的攻击，他的第一反应是"干掉他"，而不是"驳倒他"。他猛然跃起出手，打算将王猛毙于拳下，

左右群臣赶紧拉住他——在君主面前杀人，罪大恶极，樊世可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可是，头脑简单的樊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圈套，他破口大骂，用尽各种污言秽语辱骂王猛。苻坚作大怒状，下令将樊世斩杀。

如果说仇腾、席宝被贬黜让群臣认识到苻坚的威严，那么樊世的被杀就激起了他们的公愤。兔死狐悲，他们看着樊世因为和王猛口角就被处以极刑，都觉得现今的前秦已经不是他们旧日浴血奋战换来的江山。于是，他们七嘴八舌，纷纷指责王猛的谄媚奸佞——直到那一刻，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苻坚和王猛的双簧。苻坚没想到杀一未能儆百，恼羞成怒，与宿将老臣们对骂起来，还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者当庭鞭挞。

就在群臣已经领教了苻坚的凶猛但骑虎难下的时候，又一位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苻坚的另一个心腹权翼。他上前表示了对苻坚宽容、大度、英武的赞美，同时也建议苻坚在大臣面前不要再用粗俗的语言发泄不满。对此，苻坚自然是全盘接受，并笑着表示说粗话是自己的不对。眼看要陷入僵局的君臣对峙，顿时云开雾散，老臣们从此再无怨言，对苻坚的政策只有唯命是从，对王猛也是更为忌惮。

建立统治新秩序的第二回合，以苻坚和王猛的巧妙布局而收发自如，再次全胜，只不过，这一次赢得有些不大光彩，以老臣的鲜血铺就令行禁止的通道，以一国之君与群臣对骂来显示君威，未免胜之不武。

后来，苻坚为了树立榜样，任命王猛做司徒、录尚书事，但王猛坚决推辞，理由是他没有为国立下特殊的功勋。——打破一族统治的传统，这算是极大的功勋了，只不过，这枚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也有苻坚的一半。

遥想孔明当年，初出茅庐，关羽、张飞等人也是对刘备如此器重他表示强烈的不满与质疑，后来，诸葛亮在危难关头渡江结盟，赢得了孙吴的援助，让走投无路的刘备获得了翻身的机会，使刘备集团从一个草台班子变成了真正的地方统治者。

历史是如此相似，如果不是王猛，可能苻坚一直找不到打破一族统治的突破口。王猛，确实是他的孔明。

四、宽猛相济，出将入相

王猛与苻坚建立统治新秩序最大的阻碍，其实并不是老臣们对王猛为代表的中原人士的歧视。经过两个回合的交手，政治经验不足的老臣们已经丢盔弃甲，自乱阵脚，一族统治的局面已经被打破。

对于建立统治新秩序而言，更大的阻碍，是前秦功臣及其家人践踏法律、横行霸道的恶行。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苻坚和王猛考虑得更早，在王猛被提升为尚书令之前，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们采用的办法，就是王猛治理始平的经验：明确刑罚，让恶人无法作恶。

事实上，当初王猛出任始平令，以重典治国，就给苻坚上了生动的一课。此前，苻坚并没有什么治国经验，虽然有篡位的准备，但没有篡位后如何治理天下的考虑。而王猛的现身说法，教会了他治国不能死守一条纲领，要懂得变通的道理。因此，清扫权贵枉法的工作，自然也要交给王猛。

苻坚将王猛从咸阳内史的职位上提拔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负责京城长安地区的治理工作。王猛首先做的，就是寻找惩治目标。当时，苻健的内弟强德仗着自己是前朝的国舅爷，酗酒成性，欺男霸女，成为长安城中的一霸。百姓听到他的名字，无不咬牙切齿。于是，王猛将他缉拿归案，就地正法，长安百姓闻讯，无不拍手称快。这一案例，就起到了震慑豪霸的作用：前朝国舅违法也要治罪，何况是那些没什么来头的土豪？

为了进一步整顿统治秩序，王猛和御史中丞邓羌联手，整肃法纪，惩治奸恶，十天之内就审讯、斩杀了二十多名扰乱民生的豪强权贵。这次雷霆行动，让百官无不收敛行迹，豪强们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一时风气大变，长安城内路不拾遗。

要建立统治新秩序，实现以中原文化教化万民的目标，不能单凭严刑峻法，王猛本人也说过，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要贯彻统治新秩序的精神，实现天下大治，就要培养起一批与自己同心同德的人来管理地方。王猛提拔的地方管理者，多数是中原士人，因为他知道，要想从前秦氐人中培养出合适的人才，并不十分容易——他们受家族的影响，多少会有一族统治的思想，而且它们的风俗与中原差异过大，学习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劣势；相反，中原士人在推行教化、建立德治方面有着氐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他

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中耳濡目染成长起来的。

在用刑立威之后，进行文治教化，宽猛相济，一张一弛，正是王猛的治国之道。

文治教化，也不能单凭个人努力，还是要靠制度作为支持。因此，王猛与苻坚合作，制定了官员考核的新标准，要求官员既要有真才实学，又要有行政能力，而且要求他们爱护百姓、以德治国。通过制度保障，不但再次强化了打破一族统治的原则，而且还为官员的基本素质、基本职责、升迁和贬黜订立了标准。从此，官员们的荣辱升降，就和王猛与苻坚的治国精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前秦能够实现北方的短暂统一，能够实现短暂的治世，靠的就是这种制度。

除了为官员设立为官标准，王猛还推行了另外的一项政策，那就是在前秦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这项政策，同样是以制度为保障，恢复汉魏的学校制度，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开设学校、延请教师的标准与规格，并要求官员子弟都要入学读书，为的就是让他们从小接受中原文化，成为国家日后的统治基础。

有了这些制度，王猛的政治理想，苻坚的政治目标，就成为可实现的明天。

然而，仅有这些政策是不够的。当时的前秦，处于四战之地，其他政权环伺在周围，如果不扫平这些极具威胁的势力，前秦的统治新秩序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王猛研习了多年的兵法，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为苻坚制订了战略计划，首先要拔除的是前秦近处、可以被他人利用的小势力，其次解决战略上有威胁的强敌，最后再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除其他对手。形象一点来说，就是先拔钉子后打虎，最后做清扫。

第一步工作，以胡萝卜加大棒的形式完成。王猛再次运用了他得心应手的奇正之道，将一些处于前秦肘腋的游牧部族收编，让他们成为前秦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军事与政治单位。这一步工作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已宣告完成。接下来，王猛要解决的就是对前秦威胁最大的两个对手：鲜卑慕容氏的前燕与南方的东晋。

这两个对手中，王猛本来倾向于先灭前燕，后灭东晋，而且他认为只有将北方根据地巩固之后，才能挥师南下，否则一旦后院起火，将会自顾不暇。



然而历史为王猛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让他改变了原有的计划：东晋出

兵进攻前燕，已经兵至枋头，威胁前燕的都城邺城。前燕的君主慕容暐派人向前秦求救，表示愿意将虎牢关以西之地全部献给前秦作为谢礼。

前秦接到这一消息之后，群臣沸沸扬扬地议论此事，而且都表示前燕是国家的死敌，不应出兵援救，应该坐山观虎斗，然后收渔人之利。王猛则不这么看。在他看来，如果前燕战败，那么东晋将占有前燕的大部分土地，而这会让东晋内部光复中原的愿望空前高涨——想当年，桓温大兵进驻灞上时，王猛自己也是不能自已、赶去会面，所以这种故国之情他十分清楚。他认为，不能给东晋这个机会，一定要迎头痛击，但是也要让前燕在这场战争中消耗实力，接下来，就是前秦乘胜灭前燕的良机了。

苻坚采纳了王猛的连环计，而这一次，他们要面对的敌人，就是当年邀请王猛南下的那位东晋统帅：桓温。

王猛与桓温，已经分别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两人都变化很多。桓温已经成为东晋的霸主，夺权的野心世人皆知；王猛则成为前秦的栋梁，威势震慑朝野。

这一次，王猛依然没有站在桓温那一边，相反，他给了桓温沉重的打击。

公元 369 年，前秦出兵援助前燕，两国合兵大败桓温。这一次大败，给了桓温十分沉重的打击。桓温知道这次失利将会给自己在东晋的地位带来极大影响，因此加紧了夺权的脚步。

这一场战役，对前燕而言也是意义重大。前燕暂时摆脱了亡国的威胁，打算东山再起，便拒绝履行献出虎牢关以西的承诺，这样一来，前秦终于可以公然对前燕用兵。王猛亲自上阵，率领大军攻陷了前燕的重要城市洛阳，而后再陷荥阳，控制了黄河沿岸的战略要地。

公元 370 年，王猛再次统兵出征，连陷壶关、晋阳，又在潞川焚毁前燕粮草辎重，火光直照前燕都城邺城。之后，王猛将邺城包围，苻坚亲自出兵，王猛秘密赶到安阳迎接苻坚，接下来攻陷邺城，一战而灭前燕。

灭亡前燕后，王猛又协助苻坚将前秦周围的一些割据势力逐个击破，基本实现了北方的统一。而因为王猛的文韬武略，苻坚封他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又加任都督中外诸军事。王猛上表辞让，苻坚又用上古傅说、姜尚的故事以比拟王猛对前秦的功绩，认为他是前秦的第一功臣，无论担任什么官爵都不为过。

五、被背叛的遗嘱

公元375年，是为前秦建元十一年，王猛抱病卧床。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奔波劳碌，他早已积劳成疾。这次病来如山倒，可是已经没有抽丝病去的机会了。

王猛重病，让苻坚十分关注。他为了让王猛能早日康复，亲自举行南北郊、宗庙、社稷的祭祀活动，而且还分派群臣到各地的山岳河渎之处祭拜神灵，希望能够靠着天地的神力让王猛恢复如初，甚至动用君主的特权，在前秦境内实行大赦，以求为王猛积累功德。

王猛自知身体状况已经撑不了多久，便上疏谢恩，同时一如既往地对时局进行分析，其中有很多有助于统治的主张。苻坚看到王猛的上疏，既回忆起多年来君臣投契的情景，又为王猛重病不忘国事的精神感动，不住地流泪，他身边的侍从也感受到这种情绪，痛哭流涕。



苻坚也渐渐接受了王猛即将病逝的现实，在王猛病入膏肓之际，他前去探望，询问王猛身后之事。

王猛的遗言非常具体，也非常有挑战性。他对苻坚说："东晋虽然偏处东南一隅，守着吴、越的旧地，但仍然是中原正统的继承人。而且东晋在大事上能够做到君臣一心，推行教化，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旦他们遭到侵犯，会倾全国之力抵抗，我们要消灭东晋，几乎不可能。小臣去世之后，希望陛下不要对东晋打什么主意。鲜卑人和羌人，素来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虽然暂时降伏了他们，但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尽早消除这两个隐患，这样才能保证社稷的长久。"说完这番话，王猛便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一岁。

苻坚亲眼见到王猛去世，痛哭不止，等到入殓之日，他还几次来到王猛的灵前吊唁，对太子苻宏说："难道上天真的不让我一统天下吗？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夺去王猛的性命啊！"

非常有趣的是，这是个被背叛的遗嘱。王猛告诫苻坚不要打东晋的主意，但苻坚后来还是出兵南征，结果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逃亡之时，他才想起王猛的遗言，悔恨不已。

苻坚为什么要背叛王猛的遗嘱？是因为志得意满、自我膨胀，还是因为利欲熏心、急于统一？

且不要太早下结论。有关王猛的遗言问题，有关苻坚不听王猛的劝告而兴兵伐晋的原因，很多学者都有过阐述。在此，笔者只想提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王猛究竟有没有说过这番遗言？

这段遗言，和王猛此前的判断基本是相背离的。在此之前，王猛曾经选择不跟随桓温去东晋，因为他觉得东晋不是自己发展的舞台，桓温也不是自己可以投靠的英雄；在此之前，王猛和苻坚制定的大战略，就是先拔钉子后打虎，而东晋是要做全力准备去扑杀的猛虎；在此之前，王猛定计大败桓温，打退了东晋的北伐攻势……为什么弥留之际的王猛会推翻自己之前的一切论断，站到相反的立场上去？

而且，一向足智多谋、善于提出问题更善于解决问题的王猛，难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真的油尽灯枯，提不出解决东晋的方案了？他之前病中上疏，条理分明，临终之时，只讲了东晋、鲜卑和羌人的问题，只提出问题而不讲解决方案，而且明显是讲完了全部想法才撒手人寰——这是为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王猛在多年的历练中，认识到东晋不可使用单纯的军事攻势去解决——但是，为什么这个想法在之前不说，偏偏是在病重不治之时才说？难道真的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还可以解释说，他在病重之时，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所以不希望苻坚消灭代表着中原正统的东晋。但是，为什么他用警告的方式提出，难道是要对苻坚进行恐吓？

这些都不是王猛的风格，也都不符合王猛的性格。在当时，没有人能够操纵王猛，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因此背后有主使人的情况不会发生——除非有人掌握了催眠术。

也许，这是一个后人补充的预言，为的是让后来者知道，神州正朔、中原正统是不容侵犯的，侵犯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东晋与前秦并立的年代，已经没有一个代表中原正统的强势人物说出“犯天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只能让一个弥留之际的病人为强权者提出警告。而这个“预言”后来实现了，所以，在史书中，中原正统就成为刀枪不入的神物，而王猛也就成了维护其神圣性的预言家。

死后还要被再利用，成为“被预言家”，这是最让人感慨的，也是最让人汗颜的。套用余秋雨先生的一个句式：我们的民族，竟然拥有这么个朝代，果然有过这么一个时刻，用那些亡灵的伪预言掩盖虚弱的神经，而竟能游刃有余。

然而，这些毕竟与王猛无关。



拓跋宏

——奔向中原的夸父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是为公元493年。这一年的秋天，在破败不堪的中原旧都洛阳城，潇潇秋雨中，上演了一幕极富戏剧性的出征秀。

北魏皇帝拓跋宏端坐于战马之上，双目直视南方，踌躇满志，而马前却拜伏着一群反对他南征的大臣，双方僵持不下，拓跋宏的神色越来越严厉，大臣们的语调却越来越软，几乎到了一触即溃的窘境。

突然，拓跋宏说了一句什么，大臣们忙不迭地表示拥护，并齐声高呼“万岁”。这呼声虽然有点儿言不由衷，但也震天动地。

这一幕，掀开了北魏历史上新的一页，后代各种教科书中大书特书的“魏孝文帝改革”或“魏孝文帝变法”就此开始，而这个场景，就是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让群臣作出抉择的时刻。

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迁都事件，人们似乎都已习惯，但只有少数的几次被赋予了“划时代的意义”，譬如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明成祖迁都北京等等，因为这几次迁都，都伴随着巨大的变革，或者说迁都本身就是变革的一部分。

那么，魏孝文帝的改革，和他迁都洛阳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为什么他非要迁都洛阳，才能继续变法呢？



走进北魏历史的现场，我们如同置身于九曲黄河上的小舟之中，身在现

场的人都不知道颠簸起伏的这艘小船将开往哪里，更不会知道航路之上有一个大的渡口，叫做洛阳。

一、在草原与中原之间

北魏脱胎于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政权。以往说到鲜卑，我们总视之为一个整体，甚至将其等同于北魏政权，其实不然。鲜卑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混合体，它早期是居住在东北地区的东胡人的一支，但随着不断进入中原和塞外草原，它又和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匈奴、乌桓等部族相混杂、通婚，变成了北中国境内一个庞杂的军事共同体。

拓跋鲜卑作为鲜卑人的一支，是一个极富迁徙传统的部族。作为鲜卑人的一支，他们最早居住在大兴安岭腹地，从事游牧、围猎活动。到了东汉初年，在首领推寅的带领下，南迁到方圆千里的“大泽”地区，应是今日呼伦湖、贝尔湖一带。据史书记载，这里地势低洼、气候潮湿，估计拓跋鲜卑安身之所，就是湖泊周围的湿地。

八代以后，拓跋鲜卑的首领诘汾再次率部南迁，这一次他们迁徙得更远，穿越高山深谷，经历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匈奴故地。据说，这次迁徙的过程中，由于太过艰险，诘汾本来打算停止迁徙，但出现了一头外形像马而吼声似牛的神兽，在前面引导着拓跋部众，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走出了连绵的山谷。当然，所谓神兽本非实有，不过是后人为了渲染祖先非凡的大迁徙，在自己的想象中制造出来的，而这段“神兽引路”的传说，恰恰体现了两个信息：一是拓跋鲜卑在西迁过程中的困难，他们可能是在迁徙的过程中遭遇某些变故（可能是当时活跃在草原、荒漠地带的乌桓或鲜卑其他部族的追击、截杀，导致他们进入荒僻且贫瘠之地，边逃生边寻找安身之地）而迷路，后来沿山谷而行，待豁然开朗之时才发现自己到了匈奴故地；二是帮助他们完成迁徙的，是最能象征游牧部族生命线的两种动物——马和牛，这是任何一个游牧部族都十分重视的战备物资、生活必需品和财富象征，也许，正是成熟的放牧技术，保证了拓跋鲜卑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得以生存，不致全军覆灭？

当拓跋鲜卑到达新的家园时，草原地带已经尽是鲜卑部族，诘汾之子、被北魏尊为始祖的力微将族人迁到定襄郡的盛乐（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从此，拓跋鲜卑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到力微之孙猗卢时，由于参与西晋诸王的内部斗争，并与匈奴、羯人的军队作战，拓跋鲜卑的势力渗透到内地，后来建立了代国。前秦强大时，代国被灭，苻坚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得到机会复国，他改国号为“魏”，并把国都迁到平城（治今山西大同东北）。至此，北魏政权基本成形，并不断向草原地带和中原北部扩张。

对北魏政权而言，从拓跋珪时代开始，就有一种非常实用的精神，那就是什么方法能够促进北魏势力的发展，北魏就使用什么方法，不管这些方法内部是否存在矛盾，也不管这些方法是汉人还是匈奴人、鲜卑人发明的——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因而北魏上层其实没有什么不可变易的原则，也没有什么必须固守的文化精神，一切为了扩张，扩张就是一切。

因而，拓跋珪吸取了以往匈奴、羯人、氐人和鲜卑慕容氏失败的教训，实行了一项前秦发明的政策——离散部落。

所谓“离散部落”，就是将那些拓跋鲜卑的盟友以及被征服的部族原有的部落组织打散，将他们安置在不属于原有部落生活区的地方，把他们作为国家的普通百姓进行管理，建立地方组织进行控制，并让他们从事生产，为拓跋鲜卑的国家机器服务。

离散部落的政策，就其思路而言，是“强干弱枝”，保证拓跋鲜卑这一核心集团在军事上的优势，打压一切其他力量，通过制度的规定，巩固了拓跋鲜卑作为北中国唯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局面，消除了那些被征服部族和拓跋部的联盟（特别是历代皇后所在的部族）倾覆北魏政权的危险。因此，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维护拓跋鲜卑统治的地位，和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成金人是一个道理。

不过，这个政策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维护拓跋鲜卑统治的同时，对其他部族的安置政策，也改变了拓跋鲜卑。

离散部落的政策中，对其他部族的安置方法，就是让他们成为普通百姓，从事农耕生活，承担国家赋役，缴纳租税。这样一来，这些被安置的部族成员就成了北魏基层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而且不能由其部族原有的首领进行统辖管理，也就是说，北魏必须要建立地方统治的机构并委任官员，对



这部分百姓进行非军事化管理。由此，拓跋鲜卑统治者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权性质，从“逐水草而居”到定居，从部落军事首领制到地方社会的层级管理。这也促成了北魏国家机构的形成，虽然从其产生原因来看是被动的。

实行这样一个措施，其实与拓跋珪本人早年的经历有关。当年前秦灭代国，拓跋珪还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正处在学习期。几经辗转，前秦皇帝苻坚将他安置在了前秦的都城长安，因此，耳濡目染着高度发达的前秦政治体制，拓跋珪的早期教育自然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前秦创设的离散部落制，以及前秦对中原进行管理的编户齐民之法，都在拓跋珪心中打下了烙印。

一个政权在建立初期时，其首领的个人经验与意志往往就成为这个政权人格化的象征，北魏政权的早期发展，也因此打上了拓跋珪个人的烙印——其实，这也是苻坚的烙印，前秦的烙印。

曾经空前强大的前秦帝国，虽然在淝水之战后烟消云散，但其创立的制度和精神，却成为断壁残垣中被掩埋的珠玉，寂静地存留了下来，等待后人的发现，就像罗马帝国消亡后，其孕育的基督教和罗马法慢慢被接受，终于影响了千年后的世界一样。

所谓前秦的烙印、苻坚的烙印，从政策层面而言，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汉化。前秦皇帝苻坚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中原意识的人，他称帝后的很多政策也是效法中原的儒家治国之道，只不过步子迈得太大，和当时北中国实际的政治与社会状况脱节，所以未能真正发挥其功效。而经过了前秦的宣传推广，汉化政策对北方的游牧部族而言不再是洪水猛兽，他们不需要再费尽心力地去讨论要不要效法中原政权、要不要实行重农政策、要不要推广教育等问题了。

在拓跋珪的身边，还有一批出身于大族的汉人谋士。他们在进入拓跋珪的帐下之前，大都做过其他政权的官员，特别是和代国关系密切的鲜卑慕容氏政权。拓跋珪比较看重他们的计谋，也看重他们对中原的了解，而对他们作为汉人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却不是特别重视——虽然前秦的汉化政策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他也同样看到了前秦的崩溃，也看到了苻坚善待各部族首领却遭到背叛的结果，因此，拓跋珪对中原文化，是完全实用的态度，他并不看重汉人以儒家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而是“兼收并蓄”，儒家、法家、道家无所不用，貌似什么都感兴趣，其实什么都不信。

更有甚者，拓跋珪认为，中原的文化，只不过是为统治提供思路和方案，根本不能让拓跋鲜卑的族人接触，一旦接触，他们就会有投机取巧、争名逐利的“不良行为”，就会和汉人一样心机重重，而失去了作为战士最宝贵的品质——无欲无求，淳朴敦厚。

这自然也和拓跋珪的早期经历有关的。青少年时代经过的波澜起伏，看惯了一个政权又一个政权的兴亡，让拓跋珪觉得军事力量才是真正值得依靠的。他的这种思路，影响了后来几代北魏君主。在北魏已经成为中原的统治者后，游牧、狩猎依然作为拓跋鲜卑的重要产业和生活习俗被保留下来，北魏皇帝还要在每年夏季率领大批部众到距离平城六百里的阴山去“却霜”，一方面是通过狩猎等形式操练部众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是用这种一年一度的“回到草原”仪式不断提醒拓跋鲜卑的族人，他们是草原上的强者，而不是文质彬彬的书生。

类似“却霜”的仪式，也给了后代来自北方的统治者们以灵感。到了清代，著名的“木兰秋狝（xiǎn）”也是这样深具含义的固定仪式，一来操练军马，二来重温本族的习俗，三来可以与塞上各部族首领聚会。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也就成了清代统治者的“却霜”之地。



这种一面用汉地政策治理中原、一面强化本族风俗以维持传统的做法，对百姓而言其实无关紧要——中原的百姓本来就是以农耕为业，拓跋鲜卑的族人也一直过着游牧迁徙的生活，可是对治理者而言，就造成了精神上的冲击。作为北魏政权的统治者，拓跋珪既要吸收中原的治国经验，又要保持强悍的武人作风，在制度的草创阶段，很多事情都需要拓跋珪用领袖意志来决断，可是拓跋鲜卑原有的各部大人共同决策的体制又让他不能事事出于己意，这就使他格外感受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理念碰撞。深受这种冲击的同时，他还要和自己毗邻的政权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所以他急需一种简单可行的策略来应对这么多麻烦。很多时候，他把对内治理与对外讨敌的策略混为一谈，简单粗暴地使用“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如果一个君王使用在战场上消灭敌人肉体的方式来处理国内问题，必然要引起国内的恐慌与仇恨。拓跋珪在国内采取的铁腕手段，也引起了王公大臣们的不满。偏巧，拓跋珪因病痛而服食致幻药物“五石散”，而且依赖性越来越重，导致他更加喜怒无常。作为北魏政权人格化象征的拓跋珪，这时已经进入神经错乱的状态。根据史书记载，他当时的精神状况已经到了崩溃

的边缘，“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傍（旁）有鬼物对扬者。”——他常常回顾一生的功过，一个人自言自语，就好像旁边有鬼魅神灵在倾听一般。

在面对大臣时，他的反应更为强烈，他经常想起大臣们以往犯下的过错，因此将他们处死，而那些往昔与拓跋珪没有仇怨的大臣，则或是因为面部表情有变化而让他厌恶，或是因为呼吸不调让他生疑，或是因为行走的步伐与交谈时的言语让他感到不快，他经常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处罚大臣，有时还亲自出手责打大臣，被打死的大臣尸体都堆在天安殿前，很有种人间地狱的感觉。

喜怒无常的皇帝，简单粗暴的责罚方式，让大臣们人人自危。终于，这种又恨又怕的情绪因皇室内部的斗争爆发开来。

拓跋珪认为拓跋鲜卑之前内乱不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族势力过大。一旦出现继承人问题时，与拓跋氏世代联姻的一些家族就靠着手中的兵权进行干预，甚至篡夺最高权力。在建立北魏之后，为了保证皇位的传承不受影响，在实行“离散部落”政策的同时，拓跋珪还推行了一项残酷的后宫政策：子贵母死。这项政策的内容很简单：但凡有皇子被立为皇位继承人，就要将其生母杀死，以保证母族无法通过后宫的途径控制北魏朝廷。

“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是配套制度，离散部落是从根本上消除母族的势力，子贵母死则是从路径上切断母族对政治的干预，一表一里，充分保证了拓跋氏权力的稳固。但是拓跋珪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性。

拓跋珪在身体受病痛折磨之下，决定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于是，他将拓跋嗣之母刘贵人赐死，并将用意告知了太子。拓跋嗣无法接受这一点，愤而出走。拓跋珪无奈之下，只好寻找别的继承人。他接下来又囚禁了次子拓跋绍之母贺夫人，而且也打算将她处死。可是，此时的拓跋珪犹豫了，他怕杀掉贺夫人，拓跋绍会像拓跋嗣一样无法接受，因此他举棋不定。不甘就死的贺夫人和拓跋绍抓住了时机，趁拓跋珪在思想斗争的时候先发制人，发动了宫廷政变，将拓跋珪杀死。拓跋嗣闻讯后又举兵将拓跋绍等消灭，自己即位称帝，是为北魏明元帝。

拓跋珪为了让拓跋氏的皇权稳固，为了让北魏成为统治中原的强大政权，可谓殚精竭虑，甚至不惜违背人性，以滥杀作为策略。而他的反对者，只是从基本的人性出发，否定他所采用的策略存在的正当性。结果，拓跋珪

本人也成为滥杀的牺牲品。可见，走向文明的过程，永远不应该是用野蛮的方式实现的。

到了拓跋嗣之子拓跋焘统治时，北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拓跋焘善于用兵，他先后消灭了夏、北燕、北凉，彻底结束了十六国的割据局面；击败了盘踞在大漠、威胁北魏多年的柔然汗国，打退了对西域各国影响力颇大的吐谷浑，使北魏成为北方世界的霸主；两次击溃南朝刘宋的北伐军，吞并了刘宋政权在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在拓跋焘铁骑的征战之下，北魏国势一时无两，甚至超过了当年前秦的极盛时期。因为拥有如此的战绩，他被后世尊为“北魏太武帝”。

统治地域的扩大，也将北魏的发展推到了必须作出选择的路口：如何统治这么大的国土？是派出值得信任的人对这些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还是由各地原政权中选拔人员进行管理？是任用官吏进行秦汉帝国那样的层级控制，还是分封拓跋部的王公大臣们去全权负责各方面事务？

拓跋焘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刚刚消灭北凉、击败柔然之后两年——神䴥（jiā）四年（431），拓跋焘下诏，征召几百名汉人大族人士到平城，根据才能任命他们做各级官员。这样大规模的征召行为，说明采用中原的统治经验、建立地方的各级管理体制，是十六国到北魏时期所有进入中原的政权发展的主流，这种发展趋势，并非拓跋珪或是拓跋焘个人的选择，而是中原管理方式的胜利。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采用中原的管理经验、中原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不等于接受中原文化。拓跋焘在位期间，由于任用了大批汉人官僚，造成了拓跋焘倾心于汉文化的表面现象，这种现象，给了那些汉族官僚虚假的信息。他们非常想实现“以夏变夷”的文化理想，因此每每主张推行全盘汉化的政策。这种倾向，造成了拓跋部贵族们的不满，汉人士族所坚持的用士人治天下的理念也触犯了他们的政治利益，最终造成了以司徒崔浩为首、牵连甚广的一场大清洗。看来，虽然中原化是北魏发展的趋势，但冒进势必会造成灭顶之灾。北魏王朝还需要在草原与中原这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之间慢慢调节，这一调节，可能就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二、改变历史进程的女子

尽管拓跋焘时期出现了清洗中原士人的事件，但北魏在政治上中原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真正将中原化的政策进行到底，还要有一些特殊的机缘。

要彻底推行中原化，就必须要消除巨大的阻力，这股阻力来自拓跋鲜卑内部。一旦实行中原化的统治政策，必将出现各级汉人官僚掌握实际权力、各部王公大人失去对中央的控制的局面。而王公大人们一直坚持着拓跋鲜卑的传统，分头掌握国家权力，并与皇帝一起商议国是。如果对他们采取强硬手段，将会使权力核心分崩离析，可能会导致内乱或分裂的局面。因此，王公大人的问题，可不是简单地杀几个人就能够解决的。

每当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偶然因素出现，来解决正常情况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偶然因素，就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偶然因素发挥作用的原因，总是和个人的私欲结合在一起的。对北魏来说，这个偶然的因素，就是后宫中的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姓冯，是北燕皇族后裔。北燕灭国之后，她的家族归顺了北魏，后来其父冯朗因犯罪被杀，刚刚十岁左右的冯氏也以罪臣家属的身份被充入后宫。幸好她的姑母是拓跋焘的左昭仪，因此冯氏入宫后得到了这位左昭仪的照顾，她不但在生活上给予冯氏诸多帮助，而且还教她后宫礼仪、读书识字等技能。拓跋焘去世后，皇孙拓跋浚即位，冯氏被封为贵人，而后被立为皇后。

冯氏做皇后之后十几年的经历，在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文献记载中，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唯一了解的信息，就是拓跋浚的七个儿子之中，没有一个是冯氏所生。这是否说明冯氏与拓跋浚感情不好呢？也不能，只能说明冯氏很聪明。

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孕育子女，这在其他的时代可以作为失宠的力证，但在北魏则不同。自从拓跋珪制定"子贵母死"的政策之后，生下皇子的女人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一旦儿子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则另一只脚也被搬进去了。所以，北魏的后宫就流传出一种特殊的祝福形式，妃嫔们彼此祝愿对方生下亲王和公主，没有人愿意做皇太子的母亲，因为一旦成为太子

之母，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被史书称为“性聪达”的冯氏不可能不知道此中关键，因此她膝下无子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而她与拓跋浚的感情，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据记载，拓跋浚去世后，按照宫中的惯例，在葬礼后三日要将先皇用过的仪仗、器物等一律焚烧。这一次，在焚烧的现场，朝廷官员和内宫之人都流下了眼泪，而冯氏的反应更为激烈，她悲恸地呼叫着拓跋浚，纵身跳入火中，好在两旁的人将她救起，但也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可见，她与拓跋浚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在没有任何外在威胁的情况下，她为何投火轻生？

被救起之后，冯氏没有再寻短见，她找到了人生的新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权力。

拓跋浚去世后，太子拓跋弘继承皇位，是为北魏献文帝。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当时冯氏刚刚二十出头，而拓跋弘十一岁。

皇太后的身份并没有给冯氏带来权力，因为从拓跋珪时代起，就尽力阻止后宫干涉国事，特别是“子贵母死”制度推行之后，后宫对朝政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被尊为皇太后的冯氏，尽管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但恐怕也在惆怅，惆怅着漫长的人生只能与一个个无眠之夜相伴了。

也许冯氏注定不会无声无息地度过后半生。在拓跋浚去世、拓跋弘即位前的权力真空期，车骑大将军乙浑趁机控制了朝廷。在献文帝即位后，乙浑利用自己手中的兵权滥杀无辜，很多朝廷重臣都成为他专权路上的牺牲品。乙浑自封为太尉、录尚书事，后来又加封自己为丞相，并且声明丞相的地位在诸王之上，距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

北魏王朝到了危急关头，如果任由乙浑掌权，献文帝的安全、北魏王朝的命运都十分危险。可是，正在乙浑的气焰最嚣张的时刻，冯太后发动了一场政变，除掉了乙浑，罪名是谋反。

乙浑在当时权倾朝野，很多与他意见不合的大臣都遭了他的毒手，其中不乏出身于北魏开国以来地位显赫的家族之人。冯氏居然能一举消灭乙浑，可见她不是实力强大，就是智略超群。但是要知道，拓跋浚去世前，冯氏根本不可能发展自己的势力，拓跋浚去世后到冯氏发动政变除掉乙浑，时间过短，冯氏也绝无机会招揽心腹。因此，除乙浑，冯氏靠的应该是过人的智谋。而这次政变的经过，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载，究竟冯氏有多少助手，采取何种手段让乙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范，我们一无所知。事实上，冯氏



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后人无法获知真相的谜团，就如断臂的维纳斯一样，成为后人牵挂于心的话题。

除掉乙浑之后，冯氏宣布临朝听政。这是冯氏染指北魏最高权力的第一次尝试。按照常理，乙浑专权而被诛杀之后，应该将最高权力交还给献文帝，可是冯氏却接管了乙浑的权力，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可能是知道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冯氏专门邀请三朝元老、出身于汉人高门的高允到后宫中商议国家大事，与高允同在被邀请之列的，还有文学之士高闾。

从冯氏邀请的人，可以看出一个政治格局。在当时，冯氏所能联络并依靠的，基本是有文化修养的汉人文臣，而北魏立国的根基——拓跋鲜卑的王公大臣对她似乎并不支持。正因为如此，她在临朝听政之后一年左右，就匆匆地还政于献文帝了。当时，后来的魏孝文帝拓跋宏刚刚出生不久，想来献文帝与拓跋鲜卑的王公们是以皇子出生为由，逼冯氏交出大权的。

冯氏为什么会在消灭乙浑后抓住最高权力不放？单纯地从权力对人的诱惑来解释无疑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显得苍白无力。从冯氏所处的状况来看，拓跋浚去世后，献文帝虽然奉她为太后，但由于二人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她如果按照常规生活，恐怕只能任岁月漂去所有光彩，最后老死于宫中。乙浑擅权给了她一个机会，一旦除掉乙浑，掌握了最高权力，也许就能改变人生的轨迹，让以后的日子不再暗淡。

这似乎才是冯氏留恋权力的真正原因。同样，还有另外一批人，也有着同样的想法，这批人，就是一直以来处于权力核心之外的汉人大族。自拓跋焘以来，汉人普遍被任命为北魏官僚，但是真正参与到国家重要事务决策的却很少，汉人士族一直受制于鲜卑亲贵，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他们也要改变处境，因此需要有人带领他们冲击最高权力。碰巧，与北魏皇族相比，冯氏出身于汉人，对汉文化也较为接受，因此容易与汉人士族达成一致。

没有汉人士族的支持，冯氏无法有效地临朝听政，而没有冯氏个人对前途的焦虑和试图改变命运的尝试，汉人士族恐怕也很难打开局面，成为北魏真正的号令者。

冯氏为期一年左右的第一次临朝听政，以失败告终。无论是献文帝本人，还是献文帝身后的那些王公大人，都不允许汉人士族成为朝廷的主宰者，更不可能允许冯氏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他们之上。

被迫交出权力之后，冯氏——她此时的称号是冯太后——并没有就此罢

手。在政治中心生活的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便很难全身而退。退居二线之后，她寻找着翻身的机会，一方面是继续和汉人士族接触，另一方面则要寻觅能够与鲜卑亲贵周旋的制胜法宝。

很快，她就找到了这件法宝，那就是刚刚出生不久的皇子拓跋宏。她将拓跋宏接到自己的身边抚养，并且将他作为皇位继承人来栽培。在她的推动下，皇兴三年（469）六月，拓跋宏被册立为太子。为了保证对这个未来的皇帝有独一无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冯太后动用了“子贵母死”制度，将拓跋宏的生母李夫人处死。据记载，一直到她临死时，拓跋宏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如此用心良苦地隐瞒真相，冯氏无疑是要保证拓跋宏对自己的依赖和信任不受任何因素的左右，也是要保证自己对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

两年之后，还不到二十岁的献文帝宣布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拓跋宏，当时拓跋宏只有四岁。有一种说法认为，献文帝之所以在血气方刚之时就将皇位让给太子，是因为冯太后的逼迫。那么，冯太后是怎样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的呢？这是冯氏留给世人的另一个谜团。当时掌控大局的，依然是鲜卑亲贵，冯太后难道团结了他们，对献文帝实行逼宫？



根据记载，献文帝本来“打算”把皇位让给京兆王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是何许人？他是献文帝之父拓跋浚同父异母的兄弟，在朝中颇有威望。作为献文帝的皇叔，拓跋子推身边聚集了一批汉人，其中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就有出身于大族的韦珍与汉人官僚子弟辛凤达。

在商议禅让事宜的时候，献文帝提出要将皇位让给叔叔拓跋子推，鲜卑亲贵中最强硬的一批人纷纷反对。显然，他们觉得拓跋子推与汉人亲近，不适合做北魏的皇帝。为了与拓跋子推相抗衡，他们表示，如果献文帝非要退位，他们都愿意辅佐皇太子拓跋宏。经过权衡，献文帝觉得有这些王公大臣的帮助，拓跋宏继位更为安全，也更能保证国家不会被汉人所同化，于是应允。

显然，这是一场献文帝无论怎样选都不会赢的赌局，虽然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拓跋子推与冯太后串通，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汉人官僚对于变革的期盼，越来越热烈，他们已经想要通过改换君主的形式来进行变法了。

这场较量过后，冯太后和献文帝暂时妥协，双方都尊奉拓跋宏，合力将这个幼童扛上了皇位。作为利益划分，献文帝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掌权，冯

太后也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势力。从此开始，大批汉人士族逐渐成为冯太后的座上客，冯氏对朝廷的控制越来越强，也导致了献文帝和冯太后二元政治格局的终结。献文帝将冯太后的情人李奕兄弟处死，冯太后也采取了报复措施——献文帝在处死李奕兄弟后暴毙，当时人们议论说是太后下毒害死了他。

扫除了专权路上最大的障碍，冯太后终于成为北魏的主宰者。由于太上皇献文帝驾崩，她被尊为太皇太后，宣布“临朝称制”。北魏加速中原化的时代，终于来临。

三、再见，平城

再次临朝，冯氏比以往成熟了许多。她深知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网络对于稳固权位的重要，所以她提拔、重用汉人士族，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同时，对冯氏家族成员委以重任，以他们为自己的亲信；她还在内宫中建立统治秩序，牢牢地控制宫廷，避免因宫廷政变而失去权力的危险。

对冯氏来说，要维持权力，必须要有三大法宝：权术、对皇帝的控制、可行的施政方案。古代的史家，抓住权术这一条对冯氏进行批评；现代的史家，看重施政方案而褒扬冯氏。就好像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样，他们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刻画”冯氏的形象。殊不知，这三大法宝是三位一体的，不能割裂。

冯氏的权术，就是对有名望的大臣给予礼遇，但不将大权交给他们；她扶植亲信，并采纳他们提出的施政建议，让人们看到臣服、效忠于她的好处；她不去主动打击拓跋鲜卑的王公大人，但通过政策的变化逐渐让他们边缘化。冯氏对皇帝的控制，就是一面架空拓跋宏，将国家大事都揽于怀中，一面强化她和拓跋宏的亲情；同时，通过给拓跋宏编制“教材”、进行体罚，让拓跋宏感受到她的权威。她的施政方案，就是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全面转向文治，转向中原化。

可以看出，冯氏的施政方案除了切合当时北魏的状况之外，还有与权术相配合这一点。对此，我们当然不必义愤，因为任何执政者的施政方案都不可能只对事而不对人，只是这方案重在对事还是重在对人罢了。

冯氏二次临朝时，由于之前已经做足功课，所以选择施政方案更为得心

应手。已经普遍担任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中下层官员的汉人士族是她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要的是更多的权力与更多的权利。于是，在汉人名士李冲的建议下，冯氏一口气推行了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官员定薪制一揽子制度与政策。

这些制度与政策的具体内容，我们没必要一一罗列。简言之，均田制就是保障普通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权益，同时有限度地保护官员、大族对农业经济的控制；三长制是重建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保证了征收租税、征发徭役与兵役的可能性，同时还将那些控制地方的豪族纳入了北魏的政权体系；官员定薪制是改变北魏原有的官员管理上只有赏赐、没有基本俸禄的局面，为官员定级定薪，原来的赏赐则从官员收入的唯一来源转变为“奖金”或“分红”；租调制则是重新确定百姓对国家的财政义务，保证了国家财政的稳定收入，既可以用来供给官员俸禄，又可以用于大规模战争和国家建设。

这些制度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它们与冯氏执政的关系，倒是值得注意。在这些制度与政策中，均田制是基础，租调制是均田制实行的目的，三长制是这两者实行的基本保障，官员定薪制是租调制的副产品，也是冯氏对大臣们加强管理的措施。它们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整体。可以说，这是冯氏执政时期的大动作，通过这套整体的改革方案，北魏在中原的统治，才真正实现了中原化。

在实行这些改革之前，北魏的国家财政，主要靠的是战争收入。每征服或击败一个敌人，就将其宫廷与官府仓库中的金银财宝与生活物资占为己有，用于赏赐给大臣与将士，在对北方各政权作战时，有一项重要的战后安置工作就是掠夺其牛羊驼马等牲畜并进行分配。当边境的敌人一个个被消灭后，靠着掠夺建立起的国家财富积累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与之相配套的对大臣的赏赐自然也不好维持，因此，依靠中原这片土地，为北魏提供无穷无尽的财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时代性课题。

但是，北魏朝廷对这个问题一直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原因就在于鲜卑亲贵们不愿意按照中原政权的统治方式行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习俗与观念的差异，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原化的统治方式是汉人士族所提倡的，鲜卑亲贵与他们在政治权力上多有争夺，因此也要反对政敌的主张。冯氏再度掌权，以汉臣为统治基础，中原化的政策也就得到了实施的机会。但冯氏也没有轻举妄动，在自己所依靠的政治力量已经在朝中站稳脚跟之后，她才开始中原化

的动作，当时她已经执政将近十年了。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太皇太后冯氏去世，魏孝文帝拓跋宏终于掌握了政权。他对冯氏怀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冯氏一直在控制他，将他作为一个政治傀儡利用，甚至一度想要废掉他，改立他的兄弟咸阳王拓跋禧；另一方面，冯氏将他养大，二人之间也有着温暖的回忆——更重要的是，冯氏塑造了他，让他从小就开始接受中原文化，成为一个思想上的中原人。

当然，冯氏还留给他一笔财富，那就是作为统治基础的冯氏外戚与汉人士族的势力。由于太皇太后的安排，拓跋宏先后娶了冯家的两个女儿，因此冯氏外戚在太皇太后去世后依然支持拓跋宏；由于太皇太后灌输的中原文化，拓跋宏在思想上与汉人士族的理念非常接近，汉臣们也依然作为他的坚强后盾，在朝廷上对他给予援助。

可是，拓跋宏毕竟不是冯氏。太和十四年他亲政时不过二十出头，而且政治经验不足，完全比不上沉稳老辣的冯氏，因此难以驾驭位高权重的鲜卑亲贵们。继承了冯氏的政治遗产，同时又“潜龙勿用”了十几年、终于坐正了皇位的拓跋宏本有一种大展拳脚、“飞龙在天”的冲动，可是几年下来，除了颁布新的律令之外，他在政治上可以说毫无建树。

为什么会没有建树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正如前文所说，此时北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冯氏的改革已经解决了地方管理、财政收入这些基本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其实就是和南朝政权的关系问题了，但那个问题和内部制度、政策的关系不大，不需要马上进行变革。

但是，青年皇帝拓跋宏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人。在被冯氏控制了多年以后，他想要采取一些大动作来证明自己，也想要建立一些祖先们没有建立的制度传之后世，更想让那些在朝廷上与自己分庭抗礼的王公大人臣服。这些理由，显然与时代需求、发展需要无关，但都是拓跋宏需要的。

至此，我们有必要对拓跋宏的个人性格作一个交代。略作了解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性格与他的政治举措关系非常密切。

据记载，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在他四岁的时候，其父献文帝生了“痈”，这在古代是恶性疮疤，致死率非常高。为了救回父亲一命，拓跋宏亲自吮吸疮口，为的是将脓血全部吸出。第二年，献文帝将皇位禅让给他，他

悲伤地不停哭泣，献文帝问他为什么这么难过，他的回答是“代亲之感，内切于心”。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他孩提时代，史书的作者记录这两件事，是为了证明他对亲人的“孝”，同时也表现他的早慧。但是，这些记载，总让人感觉有点儿虚伪——四岁的孩子为亲人吸脓血还可以理解成本性的善良，五岁的孩子突然变成一国之君后的哭泣还可以理解成茫然失措，但是他对献文帝的回答，则完全不是一般的孩子所能说出的，若非有人在背后教唆，就是虚情假意。综合其他的事件，我们可以认为，拓跋宏从小时候起，就有一种假装诚恳的伪善癖。

冯氏第二次临朝时，觉得拓跋宏将来掌权会对冯氏外戚不利，于是就打算废掉他。当时，冯氏让他在寒冬时节穿着单衣，将他囚禁在宫中内室，而且在他的弟兄中寻找可以立为皇帝的人选。后来大臣们劝冯氏收回成命，拓跋宏也没有表现出对冯氏的怨恨，依然非常尊敬她，对于几乎取代自己的弟兄，他在与他们相处时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怨恨，似乎毫无芥蒂。可以说，从外在表现来看，他已经将“以德报怨”做到极致，甚至冯氏因为误会而责打他时，他也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



这么一个“不以己悲”的人物，拥有如此完美的人格，可是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偏偏还有值得玩味的地方。拓跋宏自己经常说，做君主的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均”和“诚”的问题，能做到“均”，就能保证治下的百姓都安居乐业，能做到“诚”，就能让四海一家，即使是蛮夷之人也可以被感化。那么，他能够做到对任何人都开诚布公、一视同仁吗？

显然不能。冯氏误会他、猜忌他、责打他、囚禁他，他都表现得无怨无悔，但是宫中负责饮食的侍者为冯氏端来的粥中发现了壁虎时，他是如何反应的呢？据记载，他当时“大怒，将加极罚”，貌似不那么有仁恕胸怀嘛。——这件事的高潮在于，在另外的场合，侍者端来的热汤烫到了他的手，他的食物里发现虫子之类的脏东西，他都笑着不予追究。

到底是宽容还是狭隘？到底是真诚还是虚伪？拓跋宏确实让人难以捉摸。不过有一点我们是能够看清的，那就是冯氏在世时，拓跋宏对冯氏十分紧张，事事都表现出以冯氏为中心，忠心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白居易有几句被后人用滥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也许，用来评价拓跋宏也不为过。政治人物的表现，本身就不必追究真伪，只能考问其是非。

那么，拓跋宏行事的是非又如何呢？看起来，他是个勤政的君主，朝廷之事无论大小都要亲自过问，政府文书都要一一过目审批，注意每个官员的言行，甚至连诏令都要亲自起草发布。这是儒家文化理想中的贤君圣主形象——夙兴夜寐，事必躬亲，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但是从政治学的观点来考察，他这种行为却有点胡子眉毛一把抓，搞不清君主与大臣的分工。究其原因，可能是对权力运用的无知，也可能是恐惧权力旁落。如果是无知而又拥有大权，那就有滥用权力的危险；但若是怀着恐惧而集权，那便会吞下独断专行的恶果。

无论是哪种情况，拓跋宏手握天下权，都有点儿有力无处使的劲头。当然，他很快就找到了实现政治抱负、证明自己的突破口，那就是继续中原化、彻底中原化，重建统治秩序。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的熟悉，是冯氏多年教育的成果，他已经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最美好的，而汉臣们所讲的中原制度，也成为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美好制度。——问题在于，这些他喜闻乐见的事物，是否就是北魏王朝需要的，是否是北魏发展的必然方向？

在当时，没有什么迹象体现出北魏要发展，就必须实行全面中原化，社会上也没有彻底中原化的要求。而且，从权力中心的情况来看，显然，王公大人们不会支持这项计划。于是，拓跋宏启动了一项大胆的计划，如果这项计划成功，那么不但彻底中原化的变革会一举成功，原有的王公大人在朝廷上举足轻重的局面也将得到彻底的改变。

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计划：迁都洛阳。

迁都，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建权力中心的惯用办法。东汉末年，为了控制朝廷，董卓就曾挟持汉献帝放弃洛阳，迁都长安；曹操为了大权独揽，也如法炮制，将汉献帝挟持到许昌；桓温想要摆脱大族对东晋朝政的影响，便请求将都城从建业迁到洛阳。除了桓温的计划没有被批准之外，其他几次都成功地重建了权力中心，因为迁都不仅仅是搬家那么简单，有些原来的朝廷重臣会被留下镇守旧都，从此远离政治中心；有些朝廷政要的家族、田产、军事力量无法随着迁都而迁徙，因此他们的力量也会被削弱——自然是提出迁都动议之人获利最多。这样的先例，为拓跋宏提供了思路。

孝文帝准备实施自己的迁都计划，但他知道鲜卑亲贵们不愿意离开塞上

这片适合游牧生活的土地，而且与他们在朝堂上讨论根本不会有结果，所以，在太和十七年（493）五月，孝文帝谎称准备兴兵攻打南齐，打算以此为由让朝中亲贵随同出征。

在孝文帝看来，让大臣们离开平城、离开以平城为中心的游牧文化圈，就相当于将大树连根拔起，在自己所拥有的皇帝权威面前，大臣们只能被动接受决定。

为了保证“南征”能够顺利成行，孝文帝命令太常卿王谌对这次军事计划进行占卜，卜得了“革”卦。孝文帝便对外宣布，“革”卦象征着商汤、周武王灭夏、殷的“革命”，顺天应人，是大吉之卦。百官无人敢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只有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您统治中原，是正统的君主，现在出兵征讨南方的敌人，但占卜却得到预示着将要发生‘革命’这种新旧政权交替的卦象，恐怕不是非常吉利。”孝文帝非常不悦，与拓跋澄争论起来，最后不欢而散。

在当时群臣噤声的情况下，拓跋澄公开表示对南征的不赞同，这让孝文帝非常不安，一旦大臣们附和拓跋澄的说法，南征无法成行，迁都自然就会化为泡影。因此，他特别召见了拓跋澄，将自己假意南征、实为迁都的计划和盘托出，提出要迁都到中原之地，实行文治。拓跋澄对孝文帝迁都的打算极力赞成，孝文帝非常欣慰。

这里有一个问题：反对孝文帝南征的拓跋澄，为什么对迁都一事却十分支持呢？这是因为拓跋澄本人就是一个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北魏皇族成员。他从幼时起就接受中原文化的教育，冯太后曾经对李冲称赞他，而他本人也曾与孝文帝就儒家经典中的典故进行讨论，并借此分析治国原则在具体环境中的应用问题。受到儒家文化熏染的拓跋澄，比较强调推行德治，反对大规模兴兵搞军事征服，因此，拓跋澄在治国理念上倾向于中原文化所倡导的“仁政”，并希望以此改变北魏军事立国、贵族专政的传统。对此，孝文帝自然心知肚明，因此才敢将自己的计划毫不保留地透露给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同时又有着理想主义的情怀，最重要的就是何时体现出政治家的务实，何时表现出理想主义者的完美主义。孝文帝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成功，他先用务实的眼光理性地选择能与之共同实现理想的人，然后才对他们展现自己追求完美理想的一面。在这方面，谭嗣同就是失败者，他用理想驱动自己，而放弃了政治家的理性，将戊戌维新的前途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导



致了失败。

孝文帝是一个事事都周密筹划的人。在争取了拓跋澄的支持之后，他在等待时机。同年六月，他下令在黄河上建桥，以备大军通过。七月，南齐武帝萧赜去世，这对孝文帝而言是一个喜讯，从军事上来讲，是进攻南方的绝佳机会，选择此时南下，大臣们无法反驳；从迁都这一本意而言，也是较为安全的时机，因为一旦率军大举南下，南齐必定有所反应，而此时萧赜去世，正是其内部权力交接的空当期，不会对北魏大举反扑。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孝文帝到冯太后的永固陵前祭祀辞行，而后发三十万大军，从平城出发，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渡过黄河，到达目的地洛阳。

孝文帝的大军自打从平城出发到洛阳的一路上，都是降雨不断，这对于行军而言都是不利的。身负武器、甲胄的将士们终日淋雨，颇为痛苦。天时如此不利，孝文帝的"南征"意志却丝毫不减，在到达洛阳的第七天，他下令大军继续前进。次日，孝文帝全身戎装、乘骑战马，斗志昂扬地指挥军队启程。

多数大臣们本来就反对南征，现在连日阴雨，军队行进受阻，他们更加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于是，他们拦住孝文帝的御马，要求孝文帝收回成命，就此罢兵还朝。孝文帝义正词严地拒绝，还说："我们运筹帷幄，已经将各种情况都考虑得十分清楚了，而且三十余万大军从平城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洛阳，马上就要和南朝敌人一决高下，你们还想说什么？"

一直以来和孝文帝保持步调一致、深得孝文帝喜爱的尚书李冲进谏说："臣等不能筹划统一之事，导致现在南方的敌人自立为帝，这是臣等的过错。陛下您为了一统天下而御驾亲征，臣等也想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从离开京城之日起就连降大雨，将士和战马都疲于在雨中赶路，现在到前线的路还长，而且南方的雨水更加令人困扰，不利于北方将士。洛阳这里附近的小河现在都阻碍了我们进军，何况是南征必须要经过的浩瀚长江？到时如果要营造渡江的战船，大军就要停驻，耗费钱粮、士气下降，我们就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臣等认为，现在停止南征、班师回朝是最佳的选择。"

李冲所说的这番话，完全符合行军作战的原则。此次南征，天时不顺，地利也不顺，这两者加起来，足以消耗军队的意志，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退兵。当然，孝文帝考虑的其实不是南征或退兵的问题，因此他要将当前的选

择从“进兵还是退兵”转移到“不能退兵，进兵还是听我的其他安排”这一点上。所以，他针锋相对地回答李冲：“关于统一天下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卿等现在将连日来的降雨当成难事，这是正常的天气，等到冬季降雨自然会停止，只要天一放晴，就会利于进兵。而且我们千里跋涉到了这里，哪能半途而废?”

孝文帝通过表现自己南征的坚定信念，否决了大臣们退兵的建议。这样，大臣们就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拼死进谏以求让孝文帝回心转意，要么顺从孝文帝的决定继续进兵。但是，继续进兵的结果，基本上注定了失败，那么大臣们是否能舍弃自己的性命去进谏呢？

李冲这时鼓起了天大的勇气，对孝文帝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军事行动，天下人都不支持，只有陛下您一个人想要这么做，为臣也不知道陛下您一意孤行，到底想要干吗！为臣等人有劝阻陛下南征之心，但是没有过多的言辞，愿意以死相谏！”



必须要说，李冲的这个举动确实出乎寻常。他作为冯太后执政时期和孝文帝亲政后都十分受宠的大臣，深谙与君王保持一致的道理，而且他也不是一个视原则为生命的人，当年他还曾为了自保而成为冯太后的“入幕之宾”，现在又与孝文帝十分亲密，参与制定了很多重要的国策，他如此强硬地出来进谏，显得非常不合常理，因此有后来的学者认为李冲此举实际上是在和孝文帝唱双簧。笔者倾向于这种说法，因为在此后孝文帝对他依然非常信任，将营建新都城洛阳的重任交付于他，并在迁都之后举兵南征时让他留守洛阳。此刻，他挺身而出，担任“意见领袖”，有点令人费解。

如果我们处在历史的当场，就会发现，如果不采取这种“双簧”的形式，其实孝文帝的计划要冒很大的风险。假如大臣们被孝文帝坚持南征的慷慨陈词感动了，纷纷表示“我们愿追随陛下实现统一大业，马革裹尸，战至最后一人”怎么办？或者大臣们抢在李冲前头表示要以死抗争逼孝文帝退兵——那都是朝中重臣，如果真因为此事而死，孝文帝的威望一定会受损——怎么办？就算不那么糟糕，大臣们如果不和孝文帝发生冲突，纷纷以连日阴雨发病为理由告假怎么办？所以，一定要选一个自己人，让他代表群臣的意见，同时又让他与自己的论争一直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为历史的残酷感慨。很多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其实就是这样被“导演”出来的。陈胜吴广的反秦义举，就是靠着怪力乱神的

“天命”争取了众人的支持——每到历史发展的关键之处，这种被导演的天命或是民意就会不失时机地出现，而真正身在当场的人们，总是以各种方式被代表着，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实施这些关键事件的核心，而显然，很多时候是很少的一批人在制造推动历史发展的事件，而非唤起众人的力量造就一场洪流。众人的力量，只能作为偶然因素展现出来。

即便是这样，风险也没有完全排除，假如在李冲之外真有急性子的大臣突然冲上来以死明志，孝文帝也很难收场，而这种偶然因素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孝文帝很幸运，没有遇到这令人尴尬的偶然，得以顺利地说出自己的台词：“我现在要经略天下，一统南北，但是你们这些儒生多次对我的计划进行非议，岂不知我的斧钺轻易就能斩断你们的脖颈？卿家不要再多说了！”

这回，孝文帝直接地对大臣们进行生命威胁，显然是要把“以死相谏”的路也堵上。试想，李冲和北魏皇室是什么关系？他是冯太后的宠臣，也受到孝文帝的倚重，他的女儿是孝文帝的妃子，现在他在御驾之前进谏，都被孝文帝叱责不识大体，而且看样子孝文帝似乎并不在乎李冲的死活，即使李冲不进行死谏，恐怕再纠缠下去孝文帝也会将他处决。李冲尚且如此，何况他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大臣们自然不愿再触犯天威。

如此一来，退兵、以死相逼这两条路都被堵死，而在雨季进军无疑是下策，在这样进退不得的境地中，安定王拓跋休、任城王拓跋澄等人只能以情动人，哭着请求孝文帝再考虑考虑——事情已经在起变化了，在李冲被孝文帝怒斥之后，大臣们明显底气不足，不能和孝文帝针锋相对地争论，只能使用情感战术，而请求的人中，就我们现在所知，任城王拓跋澄在平城就得知了孝文帝迁都的计划，可见在这个事件的每个步骤，孝文帝都安插了自己人担任重要角色。

大臣们明显处于下风，孝文帝便亮出了自己的条件：“现在为了南征，征发了很多军卒，劳师远征，如果没有点儿成果就返回是说不过去的，也无法成为将来兴兵的榜样。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大魏世代居住在北方，我想要南迁到中原，如果你们非说不能南征，那就迁都到洛阳这里吧，你们以为如何？同意迁都的，就站在左边，不同意的，就站在右边。”

就像前文所说的那样，孝文帝先是堵住了其他所有的选择，只留下大臣



们不同意南征的这条路，现在他居然愿意让步，让大家做个选择，在南征和迁都之中选择一个，大臣们自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尽管迁都也是很多人不愿意的，但比起南征来，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安定王拓跋休等人还是强硬地站在右边，反对迁都。在此情景下，南安王拓跋桢站出来赞同孝文帝的迁都主张，并称迁都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群臣也跟着站队，高呼万岁，迁都之议顺利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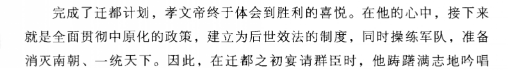
回望迁都计划得以实施的过程，很像一出荒诞的表演，它之所以荒诞，就因为它从形式上而言，整个过程都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从实质上而言，孝文帝并不是通过说服大家而获得支持，而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使众人不得不选择迁都。因此，孝文帝迁都计划的推行，与其说是改革压倒保守，莫如说是权术战胜信义。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对孝文帝这种靠权术的欺诈推行自己计划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迁洛阳，而以伐齐为辞，当时亦孰不知其伪者，特未形之言，勿敢与争而已。”

客观地说，王夫之的这段评论有些过于严苛，因为，真诚并不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美德——即使儒家经典著作中提倡他们这么做。真正应该研究的，是他为什么要采用连哄带骗的手法实现迁都。前文已经说过，实现彻底的中原化，是孝文帝个人的文化理想，同时也是他建功立业来证明自己、削弱王公大臣的权力以强化皇权的需要，所以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才会愤然采取对立的态度。

虽然大计已定，但洛阳城毕竟破败已久，于是孝文帝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通知那里的留守官员迁都的消息，而后又派李冲等营建新都洛阳。第二年，洛阳新城落成，孝文帝拓跋宏志得意满地搬了家，开始了君临天下的新生活。

四、夸父的日落时分



完成了迁都计划，孝文帝终于体会到胜利的喜悦。在他的心中，接下来就是全面贯彻中原化的政策，建立为后世效法的制度，同时操练军队，准备消灭南朝、一统天下。因此，在迁都之初宴请群臣时，他踌躇满志地吟唱

“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的诗句。在他看来，成就万世功业的唯一障碍，就是南方割据的南齐政权了。

事实上，一切绝非如此简单。虽然迁都洛阳之事顺利完成，但鲜卑亲贵们对于迁徙到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依然怀有抵触情绪。一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和塞上草原地带相比过于潮湿闷热，对他们来说难以忍受；二是因为当地保留了汉魏以来的文化传统，与鲜卑的风俗格格不入。他们纷纷想方设法不到洛阳去，孝文帝怕逼得太紧产生变乱，便允许他们在夏季返回平城一带避暑，冬季到洛阳居住。这样一来，两厢情愿，问题貌似解决了。

鲜卑亲贵们认为孝文帝的让步让他们获得了在平城和洛阳间自由往来的权利，殊不知，孝文帝通过这样顺水推舟的办法，让他们远离国家政务，从而将朝廷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当然，孝文帝也没有想到，亲贵们将鲜卑尚武之风保留下来，随着自己被边缘化，使北魏变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化地带，以及以平城为中心的拓跋鲜卑自留地。久而久之，这批冬来夏往的鲜卑亲贵，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由于他们穿梭于两京之间，如同不断迁徙的大雁，因此就被称之为“雁臣”。

这种两个空间对立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分高下，而且各怀心机。孝文帝虽然给了亲贵们自由往来迁徙的权利，但还是要推行其他政策改变他们的习俗，比如穿汉服、说汉语、改籍贯为洛阳、不许归葬平城、改鲜卑姓为汉姓以及与汉人大族通婚，试图把他们变成“中原人”。在这方面，孝文帝“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自己主动改名为元宏，并为兄弟子侄们选择汉人女子为妻。而亲贵们则抓住一切机会，想要让孝文帝重返平城，并打算将孝文帝扣留在平城，让他返回旧都。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的岳父、冯氏外戚冯熙在平城去世。亲贵们要求孝文帝返回平城奔丧，敏感的孝文帝认识到此事不简单，自己没有回去，派太子元恂代为前往。可是，心宽体胖的元恂本来就不喜欢洛阳，特别喜欢平城一带的草原气息。这一去，亲贵们与元恂就达成了一致，他们打算将元恂作为手中的王牌，让他回到平城继承皇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孝文帝退位，将都城迁回平城。

于是，元恂返回洛阳之后，趁着孝文帝到嵩山巡游之时，匆匆出逃，打算向平城进发。孝文帝闻讯后迅速作出了反应，他拦截了元恂，并把他囚禁

起来。经过权衡，孝文帝废掉了元恂的太子之位，将他软禁在河阳。

鲜卑亲贵们没有就此罢手，他们接下来又在其他皇族成员中物色人选。这一次他们原本是准备公开发动政变，推翻孝文帝的统治，可是事情败露，很多鲜卑亲贵都牵连进去，孝文帝对他们进行严惩，若干亲贵被赐死、处斩，他们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无法再公开与孝文帝作对。

尽管在政治斗争上取得了胜利，但亲生儿子与自己作对，孝文帝的内心也是深受创伤的。无独有偶，由于他迁都之后多次南征，想要快速统一全国，所以家庭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深受他宠爱的皇后冯氏寂寞难耐，便与宫中的官员高菩萨有了私情。孝文帝得知此事后，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为什么如此有抱负的皇帝，会连连遭遇家庭悲剧呢？这恐怕是他自己的原因。在鲜卑亲贵们没有变革风俗的情况下就宣布迁都，推行汉化政策，导致太子元恂叛逃，说明孝文帝在治国方面操之过急；在北魏与南齐的国力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时，就频频南征，导致了夫妻感情的疏远，加上他对冯氏不够关怀，才造成了冯氏的出轨行为。



我们可以说得再远一些。是不是家人都不支持的政策就不是好政策？当然不是。因为家人的判断可能出自个人经验，可能出自个人好恶，因此冯氏讨厌南征，并以出轨报复孝文帝，并不能说明孝文帝的政策不得人心。可是，太子元恂出逃，不但有他人支持，而且他们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那就说明这并非元恂个人的选择，而是政策本身就受到质疑和反对。但孝文帝没有做出政策调整，相反，他相信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进行妥协能够保证自己统治的安稳，并为继续坚持中原化政策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就不妥了。

就在孝文帝推行中原化政策差不多的时代，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这说明北方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定还十分明确，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和中原汉人毫无区别，而是在文化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而孝文帝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推行他的政策，不就是逆天行事吗？

当然，如果我们站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历史发展角度上看，应该说，如果没有孝文帝这一系列中原化的政策和制度，北中国不会出现如此快速的文化趋同和种族融合，隋唐时期大一统的重建就不会如此顺利。因此，孝文



帝的这一系列中原化政策，功在千秋，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有利。

功在千秋，是否就能利在当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中央集权体制，受到六国人的反对，但他对古代中国管理体制的贡献，“功在千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使用数不尽的民夫，导致山东州县劳动力匮乏，但建成了沟通南北水系的大型水利工程，为南北水道运输开创了新局面，也是“功在千秋”。与他们相比，孝文帝的中原化政策，虽然在当时没有太多的人支持，但有助于种族融合，有利于形成新的文化向心力，有利于结束分裂、走向统一，当然也是“功在千秋”。

可是，这些“功在千秋”的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人，在当代人的评价中似乎就不那么高尚了。当代人的看法也影响到后代人，所以后人给他们的历史评价也普遍不高。

那么，对执政者来说，是当代人的利益重要，还是后人的利益重要？是当代人的评价重要，还是历史评价重要？这是个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不会有统一的意见。不过，从拓跋宏——他也许更希望后人在提到他时，称他元宏吧——的遭遇来看，他似乎很在乎时人对他政策的态度，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不支持他的变革，可见他也并非真的只注重千秋万世名，而不在意时人的评价。

《山海经》中有一个传说：善于奔跑的夸父为了追逐太阳，跋山涉水，最后力尽而死。他追逐太阳的行为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但他死后，他的手杖化为一片桃林，让后人受惠甚多。这可能是古代中国最早的对于“千秋”与“当代”贡献的思考吧。

拓跋宏的中原化变革，也是这样。

当然，他的一生并没有随着中原化政策的推出而结束，他还要不断南征，为了那个“江左一隅独未照”的感慨而努力。这位一千六百年前的夸父，又要上路了。



尔朱荣

——“小胡”乱大政

鲁迅发明了一个名词：大时代。他曾经前后几次对“大时代”进行过描述，将之与北魏末年的时局相比较，我们会发现，鲁迅的说法是那样地恰如其分。在这里，不妨将他描绘大时代的句子摘录一下，让我们看看那个一千五百年前的历史场景：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变革制度，崇尚中原文化，使北魏王朝变成一个中原帝国。为了这个目标，有人牺牲，有人背上恶名，这就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变革之后，权臣当道，后宫干政，贪腐横行，确实可以“由此得死”，但也有着“由此得生”的可能。到了北魏末年，用暴力的形式将洛阳的中原文化与制度进行了清洗，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程序进行了简化，那便是除去重压的时刻。

让北魏将“重压除去”的，不是魏孝文帝那样醉心于中原文化的帝王，

也不是政治手腕高明的政客，而是一个军阀：尔朱荣。

一、孝文之后，尔朱之前

在叙述传主尔朱荣的生平之前，我们有必要知道，他和他的战友们开启的大时代，为何会诞生，以及如何诞生。

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给北魏王朝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政治上，以中原汉人为主体的官僚阶层取代了原有的拓跋鲜卑贵族，成为重要决策者；在国家权力运作上，分层行政取代元首命令，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层级分明、权责明确；在文化上，中原文化成为主流，鲜卑习俗处于被压制地位，只在帝国边境地区有所保留。另外，文官的权力与升迁速度都优于武将，禁军和受命南征的武将地位高于戍守北疆的武将，原来作为北部边境重要统治阶层的部族首领——“领民酋长”也逐渐被边缘化。

这一结构性变化，造就了一批新贵，他们的来源是：出身于高门大族的汉人，接受孝文帝改制的鲜卑王公，善写诗赋或精通掌故被前两者赏识的文士。他们除了处理国家政务，就是在洛阳城内外游览集会，探访古迹，吟诗作赋，饮酒听琴。此时的北魏洛阳城，充满了文化气息。

不过，浓厚的文化氛围并没有让北魏政权走向欣欣向荣的文治，反而使洛阳朝廷迅速早衰。早衰的原因，还是要从孝文帝改革讲起。

北魏国力强盛，加之孝文帝推行全面中原化的策略，几十年间，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洛阳伽蓝记》）连生活无所依靠的人都能够免于饥寒，说明当时的北魏已经进入全盛状态。而且，北魏政权对其他政权也抱着包容的态度——当然，南朝政权算是例外——这也使得北魏的国际商贸能够健康地发展，北魏都城洛阳也因之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在洛阳城的宫廷中、集市里、百姓家中，都能看到西域各国的特产。国际商贸推动了奢侈品的消费，而奢侈品的消费又促进了消费观念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攀比、炫富心理的膨胀和大肆挥霍现象的产生。

当时，北魏的皇族、外戚、公卿大臣们靠着朝廷赐予他们的财富与特权，竞相营建奢华的宅院，亭台楼阁、歌台舞榭修造得如同天上的宫殿一般，家中的装潢陈设之华丽也令人咋舌。这种畸形的消费行为，已经成为洛

阳城中的时尚。依附于这些公卿贵戚的文人儒士如果想要跻身于高消费的行列，就必须对他们曲意逢迎、阿谀奉承，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做法又导致了洛阳新贵整体性的腐朽，他们被赞扬之声包围，被舒适生活包围，沉醉于把玩奇珍异宝，得意于炫耀胸中才学，对于时务越来越外行，却还要外行指导内行，蔑视内行。

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河间王元琛是北魏后期生活最为奢华、最爱炫耀的皇族成员。一次，他在家中炫富，展示自己收藏的各类奢侈品，令人眼花缭乱，让自以为富可敌国的章武王元融自叹不如，元融回到家中羞愤交加，居然生了一场重病。而元琛有什么治国才能呢？没有。他出任秦州刺史，没有任何政绩，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寻找珍奇之物上。他曾经派人到西域去寻找名贵的马匹，后来在波斯得到了千里马，号称“追风赤骥”，此马奔跑如飞，旁人只能看到一团红色的影子。

这样的人去做地方的长官，百姓的生活如何自然可想而知。当地的羌人因为不满而发动叛乱，元琛多次出兵征讨，都没能将他们平定。元琛急中生智，想到了自己府中的歌姬朝云。



元琛在府中豢养了三百名歌姬，个个都是国色天香，才艺过人。朝云最擅长的是吹篪，吹奏时曲声婉转幽怨，催人泪下。元琛就想效仿“四面楚歌”的战术瓦解羌人的意志，便让朝云化装成一个贫穷的老妇人，在路边靠吹篪乞讨。朝云吹奏着羌人非常熟悉的乐曲，那些叛乱的羌人听到没有不落泪的。他们都循声前来寻找吹奏这乐曲的人，当他们来到朝云的身旁时，朝云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背弃祖先灵魂栖息的墓地，跑到山里做盗贼呢？你们看看我，因为穷困，没有办法回家，所以只能靠着乐曲怀念家乡。你们年轻力壮，不回家，难道想像我一样吗？”羌人闻言更加难过，失去了斗志，纷纷放下武器向元琛投降。人们听说了这件事，都觉得元琛毫无治理地方、指挥军队的才干，还不如作为歌姬的朝云，便写了一首歌谣来讽刺他：“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如此的社会风气，如此的无能大臣，让北魏成了一个滑稽剧的舞台。若是这个舞台上出现一个理性而又励精图治的帝王，也许还能移风易俗、扭转局面。但此时的北魏，扶不起的不单单是上层的这批新贵，还包括处于权力核心的执政者。

魏孝文帝之子宣武帝元恪去世以后，年仅五岁的唯一皇子元诩即位，是

为北魏孝明帝。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大臣们称之为“殿下”，国家大事都由她发布的“令”处理。后来，她又把自己发布的“令”升格为“诏”，自称为“朕”，大臣们上书都要称她为“陛下”。

胡太后临朝听政时，有两个主要的帮手：她的妹夫、皇族元叉与宦官刘腾。她赐予二人极高的官职，元叉担任领军将军，主管禁军，刘腾任大长秋。后来胡太后看中了俊秀的清河王元怿，强逼他与自己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又让元怿与自己商议机密大事。元怿与元叉之间发生了矛盾，元叉就与刘腾联合起来，跑到年幼的孝明帝那里诬告元怿谋反，在得到孝明帝的许可后，诱捕了元怿，并将他处死，软禁了胡太后。从此，元叉开始掌权。被软禁的胡太后韬光养晦，在五年之后终于抓到机会，与不满元叉弄权的孝明帝以及高阳王元雍联手，先解除了元叉的兵权，然后将其废为庶人，又以谋反的罪名将元叉赐死。

这样一来，胡太后二度临朝听政，但她的心思已经不在治理国家上，而在如何巩固自己的权位，防范可能出现的政治对手上。她的精神高度紧张，凡是与孝明帝关系密切的人，她都要斩草除根，而且对于皇族她也严加防范，只信任自己的情人郑俨、徐纥等人。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根本不会将整顿社会风气当做重要问题来解决，因此，浮华之气也就日盛一日。

胡太后自己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尤其是经过几年的幽禁岁月，她觉得自己能够再次享受荣华富贵、执掌生杀大权，完全是得益于佛祖的庇佑。于是她在执政期间，花了很大精力在“弘扬佛法”上，并营建了很多豪华的佛寺，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就是洛阳城的重要景观永宁寺。据说，永宁寺的大殿与皇宫的太极殿外形非常相似，寺中还有一座九层佛塔，高达一千尺，塔的顶端还有一只黄金宝瓶，站在洛阳城外，就能看到这座恢弘壮丽的佛塔。曾几何时，永宁寺成了洛阳的标志性建筑，其名头甚至超过了洛阳的街市与宫殿。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胡太后的带头提倡之下，北魏境内的佛寺数量激增，很多王公大臣也都将自己的宅院捐出，用以建造佛寺。一时间，洛阳城内外遍布了大小寺院，高高低低的佛塔就如工业城市的烟囱一样布满城市的每个角落，置身于此，有如到了天竺佛国。

醉心于佛教，无心于治国，而且本人也沾染上了外间奢侈的习气，以胡太后为首的朝廷，已经把北魏这架大车驱赶到了悬崖边上。

胡太后对文武官员的姑息纵容，让那些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胡太后喜欢掩盖矛盾、不愿解决现实问题的心理，策动了一场暴动。

在魏孝文帝推行全面的中原化改革之后，汉人文官的地位大幅度提高，成为当时朝廷中最显贵的大臣，而中下级文官的升迁也非常迅速。与之相比，原来作为北魏政权“爪牙股肱”的军人，地位却日渐低下。那些远在边境的军人，常年戍守边疆，很难进入朝廷；而在京城附近的羽林、虎贲等卫士，俸禄很低，在崇尚高消费的洛阳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更有甚者，洛阳新贵们自恃文臣身份，十分看不起这些羽林、虎贲卫士。军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孝明帝神龟二年（519）终于集中爆发。这一年，征西将军张彝的次子张仲瑀上书请求修改选官规定，并要求将武人不能担任清要显贵的官职写入规定。

张仲瑀的请求，代表了一大批洛阳新贵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武人没有文化修养，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国家重要事务的讨论和决策，所以不能授予他们清要的官职，更不能让他们成为朝廷显贵。他们要通过制度规定，确立文官的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对整个社会形成重文轻武的价值导向。

结果，张仲瑀的这个请求成为武人暴动的导火索。当时洛阳城中的羽林、虎贲卫士得到了消息，大为惊恐，群情激愤，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他们甚至在洛阳的街道上贴出榜文，互相串联，将矛头对准了提出议案的张仲瑀。他们相约聚集起来对张仲瑀一家进行屠杀。张仲瑀之父张彝闻讯毫不畏惧，他们父子也没有出逃避祸。神龟二年二月，近千名羽林、虎贲卫士集合起来到尚书省闹事，他们大骂张彝父子，并要求尚书省交出张彝的长子张始均。尚书省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他们就用瓦块、石头投掷、击打尚书省的大门，气势汹汹，气氛剑拔弩张。官员们见这些卫士随时有动用武力的可能，都不敢出来压服他们。卫士们点燃了火把，向着张彝的府邸进发。他们用手杖和石块做武器，沿途抢夺可以燃烧的柴草，冲入张仲瑀之父张彝的府邸，把张彝从堂上拽到庭院中，一拥而上，尽情殴打，口中还大呼小叫。之后，暴乱的军人烧毁了张彝的府邸。当时张彝的两个儿子张始均和张仲瑀已经越墙逃跑。张始均不忍老父受辱，便返回家中，对军士们倒身下拜，请求他们饶父亲一命。那些羽林、虎贲卫士已经被仇恨的情绪所左右，便又殴打张始均，还将他活活扔进火场中烧死。大火熄灭之后，张始均的尸体已经无



法辨认，只能凭着发间的簪子认出这是他的遗体，而其父张彝也已经奄奄一息。

张彝在这场浩劫之后几天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前口述了上书，呈献给孝明帝与胡太后。在这道上书中，他表示次子张仲瑀之前关于武人不可担任清要显贵之职的议案是有益于国家的，他和张始均虽死无憾，希望孝明帝和胡太后能够推行这个新的选官政策。但是胡太后对这件事的处理办法，依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路，只抓了八个参与暴动的士兵处以斩刑，在其他军士人人自危情绪不安时，胡太后马上发布大赦令，表示国家对此事不予追究。当时的有识之士从这件事上就看出国家将要陷入武力夺权的劫难，而胡太后自己还沉浸在社会安定的梦想之中。

为着文治理想、为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死的张彝父子，算是“已经由此得死”的牺牲者。只可惜，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国家的安定。

这件事对很多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一个从怀朔镇到京城送信的差役看到京城这番情景，而执政的胡太后却做了如此轻率的处理，就有了凭借自己的权谋打天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后来铲除尔朱氏势力的新霸主高欢。

当然，对于武人的升迁问题，胡太后也觉得不能等闲视之。按照她的思路，如果对武人采取强硬手段，势必引起更大的暴动，所以她打算将这一事件和平解决。当时，皇族元澄和以文章知名的士人袁翻等建议对边疆军镇的用人政策进行改革，以防止那些长期戍边的将士因不满而反戈一击；大臣魏兰根则建议将世代作为军人的府户落入平民户籍，以便地方管理机构对他们进行控制。这些建议固然有洛阳新贵出自文臣立场对武人的压制，但也能解决文武分裂成为两个利益集团，从而对国家不利的问题。可是，胡太后宁愿少一事不愿多一事，她觉得洛阳出现的军人暴动是因为他们长年得不到升迁的机会，那么只要给他们机会，就可以消除他们的怨气。所以，胡太后采纳了吏部尚书崔亮的建议，规定不论才能高下，一律按照资历排序，只要有官职的空缺，马上让等待选官时间最久的人补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神龟停年格”。

“神龟停年格”的出现，是洛阳政府对军人的让步，是文治对暴力的妥协。胡太后本以为如此一来必定天下太平，却不料，暴力的猛兽只要出笼后尝到了甜头，就不会轻易被驯服。事实是，在“停年格”颁布不到五年的时

间，北边的六镇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兵变和镇民起义。

随着六镇起义的战火逐渐从边疆燃烧到内地，孝明帝也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他和胡太后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日渐激化。郑俨为胡太后献上一计：将孝明帝的嫔妃潘充华所生的女孩对外诈称为男孩，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泰。过了一个月，孝明帝就突然驾崩，胡太后把那个刚刚降生不久的“皇子”立为皇帝。



很多人都怀疑孝明帝的突然去世是胡太后所为。当时人心惶惶，觉得朝廷也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没等胡太后作出良好的布局，一个人就抓住孝明帝去世的机会，以武力推翻了胡太后的洛阳朝廷。

这个人，就是尔朱荣。

二、“小胡”的大动作

尔朱荣的家族出自羯胡，他的祖先世代担任部落军事首领。因为其家族在农耕区与游牧区交界的尔朱川定居，便以此作为姓氏。尔朱荣的高祖尔朱羽健率领一千七百名武士追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平定晋阳、中山，道武帝将秀容川赐给尔朱羽健，让他担任当地的领民酋长，代替北魏朝廷治理当地的游牧部族。从此，尔朱氏世袭秀容川领民酋长，成为当地的实际统治者。

孝明帝时期，青年尔朱荣离开家乡，在北魏都城洛阳担任禁军将领，对洛阳朝廷有了初步的接触。这次洛阳之行，还为尔朱荣解决了终身大事，他娶了皇族之女北乡郡长公主为妻，从而与洛阳新贵们搭上了关系。但是，以文化自矜的洛阳新贵们对尔朱荣并不那么友善，北乡郡长公主的侄儿元略就对尔朱荣一向比较轻视，反倒是被新贵们所蔑视的“武人”与尔朱荣关系不错，比如当时的名将穆罴之子穆建，以及后来为尔朱荣献计献策的武卫将军费穆等。为了与这些禁军将领拉近关系，尔朱荣也花了一番功夫，他与穆建结成姻亲，穆建之妻就是尔朱荣的妹妹。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既然尔朱荣在洛阳做的是新贵们所不屑的武官，他又为什么能够娶皇族之女呢？这说来并不奇怪，那是因为尔朱荣有两方面的优势。

一是其家族对洛阳朝廷的作用。秀容川在北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原为北魏军马的重要产地之一。自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平城为中

心的军马产地渐渐被忽视，作战所需的战马出现了匮乏。尔朱氏作为秀容川的统治者，依然坚持着饲养战马的习俗，尔朱荣之父尔朱新兴就曾多次向魏孝文帝进献私人饲养的战马，得到魏孝文帝的封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尔朱新兴被特许冬天在洛阳朝廷，夏季回到秀容川去避暑。目的就在于让他坚持牧马，为朝廷服务。尔朱新兴每次到朝廷，也都为王公大臣们送上良马。尔朱荣继承了其父的产业，在胡太后被囚禁、元叉执政的岁月里，尔朱荣就几次向元叉献上名马，得到了元叉的信任。一直到后来尔朱荣成为控制洛阳朝廷的权臣，手中依然有大批良马。功利一点说，与尔朱荣结亲，就相当于有了良马的保证，因此皇族元桢将自己的女儿北乡郡长公主嫁给了尔朱荣。

二是尔朱荣个人的条件。据史书记载，尔朱荣"洁白，美容貌"。皮肤白皙是羯人作为中亚人种的外在特征，尔朱荣的相貌又十分俊秀，而其父尔朱新兴在孝明帝时期主动请求将自己的第一领民酋长身份让给尔朱荣。年纪轻轻就成为地方上的实权派，这样的人才也是皇族们愿意结交的。

显然，野心勃勃的尔朱荣并不甘心一生都在洛阳做禁军系统的将领。他青年时代就喜欢骑马射猎，喜欢在围猎的时候按照兵法让随从们摆开各种阵势。他军令严明，手下没有人敢触犯禁令。渴望在军事指挥方面施展自己的才华，做节度一方的诸侯，是尔朱荣的欲望，而禁军显然无法满足他的这一愿望。孝明帝正光年间，其父尔朱新兴去世，尔朱荣就以此为由解职回家。

此时距离洛阳的羽林、虎贲校尉对张彝父子进行殴打、焚烧其宅院的事件已经有几年时间，"神龟停年格"也已经颁布，北方的军镇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一如地火般涌动。尔朱荣了解这一切，所以他要回到自己的天地中，为即将到来的那个大时代做准备。

回到了秀容川，尔朱荣马上将家中的牛羊变卖，以所得的钱财招兵买马，为这些招募来的兵士提供铠甲和马匹。有了自己的军队之后，正巧柔然可汗阿那瓌举兵进犯北魏边疆——正是这一次柔然的入侵，成了六镇起兵的导火索——朝廷委任尔朱荣持节出征，并授予他冠军将军、别将的职位。当时朝廷派出了征讨柔然的大都督李崇，尔朱荣就在李崇的指挥之下，配合朝廷大军共讨柔然。这一战，尔朱荣十分英勇，率领自己手下的四千人马追击柔然骑兵，一直追到北边大漠地区。

在此之后，尔朱荣多次接受朝廷的命令，对其控制的秀容川附近发生的

大大小小的叛乱进行平定。由于戡乱有功，他先被封为安平县开国侯、通直散骑常侍，后来升任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假安北将军、北道都督等职，成为政坛上一颗璀璨的新星。

但是，尔朱荣并未将这些官爵当成多么重要的事情，他的志向比这要大得多。有一次，尔朱荣率兵到肆州（今山西忻州代县），肆州刺史尉庆宾对尔朱荣既讨厌又害怕，关闭州城的城门不让他进入。尔朱荣大怒，发兵攻城，拿下肆州城之后，生擒尉庆宾，并且羁押到秀容川，留下自己的叔叔尔朱羽生做肆州刺史。这件事发生之后，朝廷并没有怪罪尔朱荣——这和他的判断一样，在天下大乱之时，所谓的皇帝、朝廷、贵族，都比不上自己手中的铁骑。枪杆子里出政权，尔朱荣早在洛阳军士哗变之时就领悟了这个道理。



六镇起兵的战火越烧越旺，尔朱荣主动请缨，要求到前线去剿灭叛乱。洛阳朝廷这次给了他极大的权力，任命他为征东将军、右卫将军、假车骑将军、都督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又晋升他做大都督、加官金紫光禄大夫。这一系列的官号，意味着朝廷将北边的防务拱手交给了尔朱荣。这也说明，当时的都城洛阳，虽然文人才子辈出，但提到上马安天下，却是人才匮乏。

尔朱荣一方面继续进行对北魏内地叛乱的镇压，另一方面也在继续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为了对山东地区、六镇地区进行有效控制，他选择了处于“四战之地”的晋阳作为自己的军事大本营。晋阳与北魏的旧都平城相距不远，无论是在文化意义上还是军事意义上都是一座重镇。此地也靠近尔朱荣的家乡秀容，选择这里做自己的基地，确实进可攻退可守。

通过一系列的出征和招抚工作，尔朱荣最大的收获还不是打了多少胜仗，而是招纳了一大批乱世英豪。鲜于修礼、杜洛周这些出身六镇的义军首领，在北魏官军的打压以及友军的互相倾轧之下相继失败，而在六镇之乱中离开家园、投身军旅的一大批地方豪杰，有如游龙入海一般，先后加入了尔朱荣的队伍。贺拔岳、司马子如、侯景、刘贵、段荣、宇文泰、高欢、独孤信，这样一批出身怀朔镇（今内蒙包头固阳境内）与武川镇（今内蒙呼和浩特武川）的地方豪强，都成为尔朱荣身边的猛将与谋士。尔朱荣从此坐镇晋阳，大有在朝廷之外另立军政府的架势。

过了不久，孝明帝突然驾崩，随后，胡太后宣布由刚刚出生不久的“皇

子”（其实是个女孩）继位，自己继续临朝听政。过了不久，胡太后为这位小皇帝恢复了公主身份，又改立年仅三岁的元钊为帝。这一系列的意外，不免令人生疑：年仅十九岁的孝明帝竟然不明不白地去世，而他近年来一直想要亲政，和胡太后发生了一系列摩擦，那么，孝明帝的死真的那么简单吗？胡太后为什么要先立一个女孩做皇帝，是因为怕大权旁落吗？当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族成年子弟并不少，为什么胡太后要选择一个只有三岁的小孩继位，她是想要长期把持朝政吗？一时舆论哗然，很多人都认为孝明帝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人杀害，肯定是胡太后和她的宠臣郑俨、徐纥所为，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将北魏的江山变成胡太后和她的亲信们的权力场。

尔朱荣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一次，尔朱荣看到了机会，他打算去洛阳。和上一次胡太后召他入朝不同，这回他是要带上自己的军队接管洛阳朝廷。

尔朱荣为了谨慎起见，专门请来好友元天穆商议。元天穆是北魏皇族，和尔朱荣一样，相貌俊秀，擅长骑射，但不同之处在于元天穆的性格温和宽厚，不像尔朱荣那样严厉。他与尔朱荣在平定六镇之乱时相识，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兄弟之好。后来，尔朱荣向朝廷上表保荐元天穆为行台（中央的派出机构，行台往往统辖几个州，多者控制十几个州，其机构设置与朝廷大同小异），但胡太后只任命元天穆为别将，让他到秀容去。从此，元天穆就成了尔朱荣的心腹。到了尔朱荣找元天穆商议起兵大事时，元天穆已经做到了并州刺史。

尔朱荣对元天穆说：“皇帝（孝明帝）十九岁就去世了，朝野都认为他是个夭折的少年天子。现在太后又挑出一个话都说不全的孩子来做皇帝，还想着这样就能够天下太平，这可能吗？我不能坐视不管，现在我打算带上我手下的五千名铁骑，到洛阳去为皇帝送殡，而且我还要问问皇帝是怎么去世的。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元天穆与尔朱荣肝胆相照，自然了解尔朱荣的心思。他赞同尔朱荣的计划，并且公开表示支持尔朱荣对胡太后立幼主之事进行干涉，要改立他们心目中有资格的人做皇帝。

得到了元天穆的支持，尔朱荣就向朝廷上表。在表文中，他对孝明帝之死提出质疑，要求公布孝明帝的死因；同时，他对胡太后立女孩为帝进行批评，说这是戏弄天下官民；他还对胡太后立三岁的元钊为帝提出质疑，要求

胡太后收回成命。在表文中，他还提出自己要进京吊唁孝明帝，并表示待他进京之日，胡太后必须就前面的几个问题作出答复。

这篇表文没有太多的客套话，句句直指问题所在，不留情面，骄横之气跃然纸上，实则是一篇檄文！胡太后看后大惊，马上任命李神轨为大都督，预防尔朱荣在孝明帝出殡时突然发难。

当时，尔朱荣的同族兄弟尔朱世隆在洛阳担任禁军将领，他对皇宫中发生的大小事情多有耳闻，对胡太后打算对付尔朱荣的打算自然也心知肚明。胡太后为了稳住尔朱荣，就派尔朱世隆前去慰劳尔朱荣及其麾下的将士。当然，主要任务还是让他宣布自己的诏令，阻止尔朱荣进京吊唁孝明帝。

尔朱世隆到了晋阳，在完成劳军和宣布诏令的任务之后，就开始和尔朱荣密谈。他将洛阳最近的形势对尔朱荣简介之后，就开始分析胡太后不希望尔朱荣入朝的动机——事实上，尔朱世隆正是尔朱荣安排在朝中的密探，洛阳的一举一动，都由尔朱世隆负责探听汇报。

尔朱世隆对尔朱荣说："现在你的功劳越来越大，而且和朝廷的关系是若即若离，洛阳新贵们对你很不满意。你最近又上表对太后发难，太后这才派我来稳住你。这说明她已经开始猜疑你了。而且，她为什么派我来？就是想让你知道她的诚意，但是又怕派别人来有危险，这其实说明太后拿你没办法，说得简单一点，太后怕你。依我看，现在你如果不做任何准备就去洛阳，那就犹如鱼儿离水、鸟儿入笼，因为你的资本就是军队。你可以带着军队进洛阳，但是吊唁时你怎么能带着千军万马？你离开了军队，就像孩子失去了大人的庇护。往好了说，胡太后可以来个突然袭击抓住你，然后让你担任一个朝中的闲散官职，从此你就成了洛阳城里的闲人，你的军队也会由朝廷收编。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年的努力不是都白费了？往坏了想，你这一去，一着不慎就可能有去无回，太后完全可以先杀掉你再编造你的罪名——先帝是她的亲儿子，都死得不明不白！而且要给你制造罪名简直太容易了，出征的将帅在战场上不遵守朝廷号令、放纵士兵打砸抢烧的事情是难免的，他们随便抓住一个罪名整治你很容易，更何况，洛阳的那些文人最擅长的就是摇唇鼓舌，他们要想算计你，岂不是易如反掌？还有，现在正是敏感时期，你却偏偏要把大家在背地里议论的事情写在上表里，这不是公开表明你对太后不信任吗？你公开和太后叫板，太后就会把你当成先帝一党，先帝的亲信这些年都一个个不是被贬就是被杀，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样吧，如果



你非要来洛阳，我劝你赶紧做好准备。而且，洛阳城里能制服你的，就只有禁军将士了，必须要说服他们，让他们做你的内应才行。”

尔朱荣听了尔朱世隆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打发尔朱世隆回到洛阳继续担任坐探，自己以静制动。

尔朱荣并没有仓促赶赴洛阳。在发出表文之后，他就开始准备推出一个新的皇帝人选，与胡太后拥立的小皇帝进行角逐。为此，他派出了同族的侄儿尔朱天光、自己的亲信奚毅以及家人王相赶赴洛阳，与在那里负责打探消息的尔朱世隆商议新皇帝的人选。尔朱世隆此时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替尔朱荣与禁军将领们联络，让他们支持尔朱荣的军事行动。果然，禁军接受了尔朱荣的计划，整个洛阳城在尔朱荣面前已经完全不设防了。

经过了秘密的选择，尔朱世隆等人终于选定了彭城王元勰之子元子攸。

元子攸何许人也？

他在孝明帝时期担任过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务，得到孝明帝的信任，长期在皇宫直宿。后来，他被提升为散骑常侍、御史中尉、侍中、中军将军等职，而且被封为长乐王。在同龄的皇族子弟中，像元子攸这样的飞黄腾达也是并不多见的。

胡太后对孝明帝如此提拔元子攸十分不满，她找了一个借口，剥夺了元子攸的实权，将他排挤出朝廷的权力核心。被雪藏的元子攸没有表现出愤怒与怨恨，而是回到自己的王府静养。名为静养，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他在朝廷担任要职期间，身旁聚集了一批汉人大族子弟。他们或是因为与元子攸为同僚而与之结交，或是因为自己不被当政者所赏识而成为元子攸的座上客。他们希望元子攸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自己也可以随之荣登高位。

但是，皇族中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并不止元子攸一个，为什么他会被尔朱荣推到前台，成为新朝廷的总代表呢？

史书中对尔朱世隆等选定元子攸的原因有不同的记载。记载北魏历史的权威史学著作《魏书》的《孝庄帝纪》（孝庄帝即元子攸）叙述说：“武泰元年春二月，肃宗崩，大都督尔朱荣将向京师，谋欲废立。以帝家有忠勋，且兼民望，阴与帝通，荣乃率众来赴。”

而由东魏抚军司马杨衒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与《魏书・尔朱荣传》则有另外一段记录。《洛阳伽蓝记》说：“（尔朱荣等）密议长君诸王之中，

不知谁应当璧。遂于晋阳，人各铸像不成，唯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是以荣意在长乐，遣苍头王丰入洛约以为主。长乐即许之，共克期契。”

《魏书·尔朱荣传》则记载得更为具体：“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师次河内，重遣王相密来奉迎，帝与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于高渚潜渡以赴之。荣军将士咸称万岁。”

到底是尔朱荣派人与元子攸直接接触就确定他为新皇帝，还是尔朱荣用铸像占卜的方式选定了元子攸？抑或尔朱天光先和元子攸接触，而后尔朱荣选择铸像的方式确定？从表面上看，这几种说法互不相容，实际上，三者有共通之处。

首先，从做皇帝的声望和资格上来看，当时皇族中有声望、与孝明帝血缘接近（即“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因为他们都是魏孝文帝之父献文帝的子孙）且成年者，除了元子攸之外，还有北海王元颢、广陵王元恭、中书侍郎元脩等中青年，更不要说高阳王元雍这样的朝廷重臣了。

其次，从候选者能够被尔朱荣控制的可能性上来看，高阳王元雍等一批德高望重的皇族会被排除，因为他们在朝日久，自己的权力网已经非常发达，不好驾驭。（当然，元雍当时是胡太后非常倚重的执政大臣，尔朱荣也不会与他联络。）所以，中青年皇族就是首选。

再次，从与尔朱荣合作、推翻胡太后统治的可能性上来看，对朝政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元子攸一人。当时，广陵王元恭觉得朝政昏暗，托病不朝，在家中伪装哑病多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尔朱荣的选择余地也并不很小。

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我们大致能够猜测出尔朱荣选择元子攸的过程：首先，他派尔朱天光、奚毅与王相到洛阳与尔朱世隆密谋，先基本确定了一个候选人范围，可能尔朱天光、尔朱世隆会对候选者先进行试探，因为当时尔朱荣已经上表朝廷，此事人所共知，让他们谈谈对尔朱荣此举的看法，借以观察他们是否能与尔朱荣志趣相投，也是合理的。然后，尔朱世隆等人将这份候选人名单密送到晋阳，可能送信之人就是尔朱荣的家人王相。接下来，决定权就在尔朱荣手中了。尔朱荣选择了一个最直接而又最神秘的方式——占卜，他在晋阳通过铸像的方式确定谁是最后的胜出者。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尔朱荣和元子攸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元子攸的像成功铸成，让尔朱荣打定了主意。此时，他需要马上将消息通知在洛阳等候的尔朱世隆等人，这次他派出的是家人王丰——有学者认为，《洛阳伽蓝记》此处记载与《魏书》不同，王丰或王相只能是一个人，其实这不一定。为了保密起见，所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都让一个人送达，否则此人一旦被敌人所获，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另换王丰是可能的。王丰到洛阳通知尔朱世隆和尔朱天光，同时与元子攸联络，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尔朱荣率军开赴洛阳。

三、河阴之变

尔朱荣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饮马黄河、直取洛阳。为了体现出吊唁孝明帝的诚意，他命令所有士兵都全身缟素。

胡太后得到消息后，马上召集群臣讨论对策，但是胡太后一党把持朝政已久，大臣们都习惯了做摆设，一律缄口不言。胡太后的亲信徐纥见状，便上前安慰胡太后，说尔朱荣为“马邑小胡”，才能平庸，此次居然敢率军进逼洛阳，完全是自寻死路，只要禁军守住河桥，就可与尔朱荣一决高下。到那时，远道而来的尔朱荣军队疲惫难当，自然不是禁军的对手。胡太后觉得这番话有道理，就派李神轨、郑季明等率领五千人马镇守河桥。

对胡太后君臣的对策，尔朱荣其实早就有了破解的办法。他之前担任禁军将领数年，对洛阳的地形和军事防务了然于胸，当然明白河桥的战略意义。他通过在禁军任职的尔朱世隆对禁军将士进行游说，消解了很多敌意。而且，负责把守河桥的将领中，有一些都是尔朱荣的好友，比如尔朱荣兵临城下时率先投降的武卫将军费穆。

同时，作为一名善于用兵的将领，尔朱荣知道能否夺取洛阳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突破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城门，因此他走了另外一步棋：当他的队伍行进到河内郡时，就派家人王相进入洛阳，秘密迎接元子攸出城与自己会合。元子攸和自己的兄长元劭、弟弟元子正偷偷渡过黄河，赶到尔朱荣的军中。尔朱荣及其部下齐声对元子攸高呼“万岁”，随后，尔朱荣与元子攸商议好了让洛阳守军不战自败的策略，将元子攸的拥护者郑先护安排到守卫洛阳的军中。等到尔朱荣的军队来到城外，郑先护打开城门迎接，洛阳城不战

而降。

如此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北魏的都城，尔朱荣自然非常高兴。他马上以新皇帝元子攸的名义颁布诏书，封元子攸之兄彭城王元劭为无上王，其弟霸城公元子正为始平王。这其实只是礼节上的表示，真正的实质性内容，是封尔朱荣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尔朱荣借新皇帝元子攸之口，自封为北魏最高的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为元子攸扫清称帝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尔朱荣在洛阳投降的当天，就召见了禁军将领、当年的好友费穆。费穆在尔朱荣的军队到来时率先投诚，尔朱荣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见面后，费穆对尔朱荣说："您的军队现在不足一万，和国家的军队比起来，数量上不占优势。这次您之所以没有遇到抵抗就成功入城，是因为您顺应人心拥立了新皇帝，并不是因为天下人怕您。这样一来，您没有攻克洛阳的战绩，洛阳城内的这些大臣又怎么会心悦诚服？与洛阳城的人口相比，您的军队是少数；与朝廷的百官相比，您和您的手下人也是少数。他们一旦知道了您的虚实，必然会轻视您，甚至还会找机会将您废黜。如果不对朝廷进行一次大清洗，把自己的亲信安置在重要的位置上，您离开洛阳回到北边的时候，恐怕还没有越过太行山就发生内乱了。"

尔朱荣深以为然。实际上，费穆所言正是尔朱荣所担心的。如果仅仅是兵力不足的问题，尔朱荣大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虚张声势，震慑洛阳人士——东汉末年，董卓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狡黠的董卓想出一条妙计，让自己的队伍在夜间出城，第二天清晨又排好队列进入东汉的京城洛阳，如此循环多日，洛阳官民不知道董卓有多少兵马，只见每日都有进城的军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真正的问题在于洛阳新贵们不会轻易地臣服。孝明帝时期张彝父子对武人升迁问题的态度就能表明这些文职官员对军事将领的轻视，虽然后来胡太后对武人作出了妥协，但是朝廷百官对武人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徐纥的一句"尔朱荣，马邑小胡"就能看出当时洛阳人士对尔朱荣的基本看法。徐纥说的这句话，费穆作为禁军将领，应该是有所耳闻的，所以他才会劝尔朱荣杀人立威。

如果在战场上与对手当面拼杀，尔朱荣一点都不害怕，但如果讲控制朝

廷、搞权谋斗争，尔朱荣基本上是业余水平。作为一个长期在帝国北部边境地区生活的武人，尔朱荣对洛阳的那一套中原礼节与文化不感兴趣；作为一个生活在北魏的羯胡，其民族文化中也没有教给他如何与人在政坛上周旋。一想到要和那些老谋深算的洛阳政客打交道，尔朱荣就从心底里不舒服，一半是因为厌恶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另一半是因为他面对着朝廷百官、各类行政机构，心里没有驾驭这架大机器的把握。尔朱荣的军人经历只能提供给他一条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不服者死。费穆非常清楚尔朱荣的性格，所以才会建议他屠刀出鞘。试想，如果费穆建议尔朱荣礼贤下士，结果会如何？恐怕尔朱荣不会采纳这类建议。

但是，尔朱荣也知道大杀百官对自己的形象肯定有影响，所以他没有马上行动。他还想听听其他人的想法，便找到了自己的远方表兄弟慕容绍宗。他对慕容绍宗说："洛阳城内人才众多，但他们平素骄横，生活奢侈，如果不将他们清除，恐怕洛阳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我打算趁百官到洛阳城外迎接新皇帝的时候下手，把他们都杀掉，怎么样？"慕容绍宗当即表示，对大臣进行大屠杀不得人心，希望尔朱荣不要这样做。根据史书的记载，对慕容绍宗的劝说，尔朱荣的反应是"不从"。不过，慕容绍宗的话起码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尔朱荣没有马上动手。

经过慕容绍宗的劝说，尔朱荣没有在元子攸与群臣见面当天就下毒手。他也觉得，当下最稳妥的，是要让元子攸顺利进入洛阳正式登基。在洛阳投降的次日，他保护着元子攸进入洛阳。

当尔朱荣大兵压境时，洛阳的百官忐忑不安，他们又听说元子攸已经在城外即位做了皇帝，对胡太后及其党羽的一言堂已经厌倦的朝臣们自然愿意识时务。所以元子攸在尔朱荣的护送下渡过黄河进入洛阳时，他们纷纷出迎，在道路两旁行礼，表现出了打算为新朝廷效力的姿态。

胡太后听闻元子攸要进城，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便削发为尼，同时命令孝明帝后宫的嫔妃们也都出家为尼。出家为尼，就代表抛弃人间所有的荣华富贵，放弃一切现实中的利益斗争。胡太后想要以此表示自己在这场皇位之争中弃权，换来元子攸和尔朱荣对她的赦免。

在此等微妙的局势下，各怀私心的人们在洛阳城北迎接这位尔朱荣拥立的新皇帝元子攸。官员们奉上天子所用的印玺，让这位由军阀推举出来的君主乘上皇帝专用的辇驾。这些仪式，等于洛阳朝廷认可了元子攸的皇帝身



份。从这一天起，他就是北魏的正式君主，即魏孝庄帝。

即位大典完成之后，朝廷官员们都认为一次和平夺权已经顺利结束，殊不知，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当时，尔朱荣的军队依然驻扎在洛阳城北，而尔朱荣通过尔朱世隆和费穆等人，与禁军的高级将领联络。禁军首领、领军将军元鸷与尔朱荣私下达成协议，双方打算联手行动，大规模屠杀朝廷官员。

孝庄帝即位的次日，洛阳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刚刚登基的皇帝离开洛阳城，到城北的黄河一线巡游。最高权力的交接刚刚完成，朝廷中有很多人事上的问题需要处理，各地的叛乱问题也需要朝廷调兵遣将去平定，而即位刚刚一天的孝庄帝居然放下这些问题出城巡游，未免有点离谱。

孝庄帝刚刚离开洛阳，尔朱荣就开始行动。他以祭天的名义将百官召集到河阴，并且派手下的骑兵把胡太后及其所立的幼主元钊押送到这里。胡太后被押到这里时，就知道凶多吉少，出家为尼也挽救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在见到尔朱荣之后，还百般辩解，想让尔朱荣饶过她的性命。尔朱荣根本不听她解释，拂袖而起，一声令下，胡太后和幼主元钊被投入黄河淹死。



此时胡太后虽然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被迫放弃最高权力，但与她结成利益联盟的人不少，孝庄帝和尔朱荣得势，这批依附于胡太后的人如果想要恢复往日的权位，就必然要借助胡太后兴风作浪。而且，胡太后也曾经有过被元叉等人软禁之后卷土重来的经历，尔朱荣不想冒险，所以釜底抽薪，先杀胡太后与元钊，免除后患。

接下来，尔朱荣挥手之间，埋伏下的秀容铁骑与禁军出现在公卿大臣们的周围。尔朱荣大声呵斥他们，指责他们不好好辅佐皇帝治国，只顾个人的奢华生活和高官厚禄。之后，尔朱荣宣称高阳王元雍阴谋造反，他要清除乱党。

一开始，尔朱荣的屠杀目标是北魏皇族，高阳王元雍、司空公元钦、仪同三司元恒芝、东平王元略、广平王元悌、常山王元邵、北平王元超、任城王元彝、赵郡王元毓、中山王元叔仁、齐郡王元温等都被杀害。这批被杀害的北魏皇室，基本上都是魏孝文帝以来地位显赫的皇室成员。他们是洛阳新贵的核心，也是孝庄帝潜在的敌人。为了孝庄帝与尔朱荣的联盟能够长期执政，尔朱荣决不会心慈手软。

接下来，尔朱荣要做的，是除掉对孝庄帝最后的威胁——孝庄帝的哥哥

无上王元劭和弟弟始平王元子正。当时，他们正和孝庄帝一起，在黄河岸边的行宫之中。尔朱荣派了二三十人赶去将其杀害，而孝庄帝则被他之前派去的郭罗察与叱列杀鬼保护着先行离开。这一对两天前刚刚享受到特殊待遇的兄弟，就这样成了元子攸稳固帝位的牺牲品。

本来，杀太后、除皇族，这些行动都是可控而且目的明确的。从对这些人的处治可以看出，尔朱荣完全可以做到准确地杀掉某些人而不祸及无辜。可事实上却是接下来进入了无理性的屠杀，朝廷官员、贵族子弟在铁骑的扫荡下纷纷倒地身亡，尔朱荣原本想要保护的一些人也在乱军中被杀。

现场的死者，据说有一千三百余人，还有的说法是两千余人。而《洛阳伽蓝记》认为遇害者有三千余人。这场大屠杀，就是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古代都十分著名的“河阴之变”。

为什么会导致局面失去控制？是尔朱荣灭绝人性、以杀人为乐吗？显然不是。而且，这场大规模的屠杀似乎也并不是为了赶尽杀绝，因为天黑之后，尔朱荣就宣布收兵，甚至都没有对现场进行仔细的清理。

是不是其中另有隐情？在河阴之变后，有两个事件似乎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一是尔朱荣在这场屠杀之后感到十分后悔，所以上书给孝庄帝，要求为遇害者进行厚葬，并赠与他们官爵，使其得享哀荣。尔朱荣建议，追封元劭为皇帝，而其他的皇族和刺史级别的官员则追赠司徒、司马、司空的高位，三品及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追赠尚书令、尚书仆射，五品及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追赠方伯，六品以下的官员以及平民可以追赠镇、郡的封爵。对死者给予如此高的追赠，在北魏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如果他的本意就是滥杀而扬威，那么提出如此建议以表示忏悔，岂不是自相矛盾？

二是尔朱荣在河阴之变后的反应。尔朱荣及其部下在河阴之变后，十分惊恐，不敢进入洛阳。后来虽然勉强护送孝庄帝返回洛阳，但见到洛阳的城阙，尔朱荣又狐疑不前，在禁军将领的劝说下才进入城内，但包括尔朱荣在内的人都全副武装，甚至不肯下马。为什么尔朱荣和他的手下会如此恐惧？史书中的解释是因为杀人太多，可是尔朱荣既然已经接受了费穆的建议，打算对官员队伍进行清洗，此刻为什么又如此胆小？简单地说杀人太多是解释不通的。

尔朱荣会出现如此反常的举动，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尔朱荣成了禁军的替罪羊。

在河阴之变中，执行杀人任务的，是尔朱荣的铁骑与禁军，其中，屠杀皇族、溺死胡太后是出自尔朱荣的命令，而开始不加甄别地滥杀时，尔朱荣与领军将军元鸷一起登上高处掌握全局，说明禁军是参与了此次屠杀的。尔朱荣远道而来，他与朝廷百官没有深仇大恨，即使听信了费穆的话打算杀人，杀掉太后和皇族，已经可以起到震慑朝野的作用，最多是将依附于胡太后的朝臣除掉，尔朱荣的任务就完成了。而且，在河阴之变前，尔朱荣有意地放过了一些人，比如尚书仆射元顺等，说明他的计划本来就不是滥杀无辜。可是，屠杀开始之后，尔朱荣要保护的一些人也被杀了，这说明什么？——有人在借刀杀人。“有人”是谁？禁军。在洛阳，与大臣们矛盾最大、积怨最深的，就是包括羽林、虎贲将士在内的禁军。孝明帝在位时他们就曾聚众暴乱，只是当时上层政治较为稳定，所以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而这一次，尔朱荣想为孝庄帝除掉对手，并对胡太后及其党羽进行清算，已经知道尔朱荣行动计划的禁军很可能推波助澜，借机发泄长久以来对文治政府的怨气，杀人以泄愤。而且，他们与尔朱荣的关系只是合作，并不是完全听命于尔朱荣。正是因为出乎意料地见识到他们的凶残之后，尔朱荣才会惊恐得不敢进入洛阳，甚至进城以后还要和将士们一起在马上全副武装，随时打算逃跑。另外，很多人并不是尔朱荣想杀的，尽管他们在尔朱荣的心目中可能无足轻重，对这批枉死之人，尔朱荣并不想将罪过全部揽在自己头上，同时也不想和这些人的亲友们为敌，所以才会想出对他们赠与高级官爵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原因是，屠杀变得不可控制，甚至出现了军士们打算拥立尔朱荣称帝的闹剧，让尔朱荣和刚刚登基的元子攸之间关系恶化。

应该说，对于河阴之变，元子攸至少了解屠杀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才会配合尔朱荣，在这一天出城巡游。尔朱荣要杀胡太后，元子攸至少应是知道的，因为元子攸本人与胡太后一党结怨，所以除掉胡太后是符合其利益的，也许就是他本人提出要处死胡太后的。

那么杀他的兄弟，他是否知道？这是历史留下的疑案。据记载，尔朱荣率军朝洛阳进发时，元劭感觉到不能幸免，就将儿子托付给他人。他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忧虑呢？前文我们分析过，元子攸不一定是尔朱荣心目中做皇帝的唯一人选，尔朱世隆等人可能物色了几位候选人。元劭是元子攸的大

哥，同时他的官职也一直很高，兄弟之间相比，元劭可能还略占上风。也许尔朱世隆、尔朱天光等人之前也和元劭联络过，但最后尔朱荣选择的却是元子攸。如果确实如此，落选的元劭怎能不感觉来日凶险？而且，我们看元子攸和尔朱荣赐给元劭的封号“无上王”，等于说他是仅次于皇帝的人，当时元子攸没有立太子，没有指定继承人，元劭的这个封号，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

假如元子攸知道尔朱荣打算杀掉元劭和元子正的计划，那么我们只能慨叹帝王之家的无情。因为在皇冠上泛着血色的南北朝时期，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南朝宋、齐的皇族内战比这还要惨烈，假如他不知道，那么兄弟的被杀，肯定会让他产生疑虑，认为尔朱荣是在威胁自己。

当河阴之变从清除政敌变成大屠杀，元子攸也会不满意。毕竟他已经是一国之君，杀光了大臣，他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就算成为全天下的皇帝恐怕也没有味道。假如他知道尔朱荣的计划，而尸横遍野的结果是计划中没有的，他可能也会怪尔朱荣欺瞒自己。

当然，对尔朱荣和孝庄帝关系恶化影响最大的，恐怕不是以上的这些原因，而是事变时有人推举尔朱荣称帝。究竟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希望尔朱荣称帝，已经难以探明，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尔朱荣确实是考虑过这个建议的，甚至还找了专人打算起草禅让文书。虽然尔朱荣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消息已经走漏出去，孝庄帝觉得尔朱荣并非想与自己结成稳固的政治同盟，而是想要把自己作为他控制北魏的一个跳板，就像胡太后在孝明帝去世后推到前台的那个女孩一样，怎能不怒？

尔朱荣与孝庄帝的政治联盟刚刚取得胜利，就遭遇了危机。孝庄帝派人给尔朱荣捎去了口信，大意是自己本来不想做皇帝，是在尔朱荣的鼓动和逼迫下才不得不勉为其难。现在如果尔朱荣想要称帝，就应该及早行动，如果尔朱荣想要继续保留北魏政权，就应该选择得力的臣子与他一起辅佐朝政。

这段口信中，孝庄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一切决定权都在尔朱荣手中，自己不会为了帝位而与尔朱荣作对。孝庄帝的姿态很低，并不以皇帝的身份对尔朱荣进行训斥，但是也委婉地提醒尔朱荣，是继续合作还是另起炉灶都应该早下决定，不要两手都抓、顾此失彼。接到口信，尔朱荣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下属们也劝说尔朱荣还是尊奉孝庄帝，不要贸然行事，尔朱荣这才向孝庄帝表示会继续效忠。

如果说禁军能够对尔朱荣形成现实威胁，那么孝庄帝是否有实力和尔朱荣翻脸？答案是肯定的。别忘了，孝庄帝曾经在禁军中任职，禁军很可能成为他的同盟，而且他既然能与尔朱荣这样的边境之人合作，与洛阳的禁军合作自然更加可能。禁军的疯狂和暴戾，尔朱荣已经见识过了，如果孝庄帝和禁军站到一起，尔朱荣也难以想象后果将会如何。而通过河阴之变，禁军与孝庄帝这两支让尔朱荣担心的势力很可能走到一起，尔朱荣焉能不担心？

恢复理智的尔朱荣面对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作出了最恰当的选择：向孝庄帝道歉，对孝庄帝宣誓效忠，对禁军栽赃给他的大屠杀罪名不解释，并积极处理善后事宜。终于，局面缓和下来，在他的道歉和宣誓效忠下，孝庄帝表示接受，在河阴之变的次日就回到洛阳城，宣布大赦天下，免除百姓赋役，对尔朱荣的手下以及京城的文武官员给予级别不同的封赏，改年号为“建义”。禁军将领见尔朱荣和孝庄帝没有找他们的麻烦，便也放下心来。就这样，尔朱荣躲过了生平最危险的时刻。



四、三十功名尘与土

尽管孝庄帝和禁军没有对尔朱荣不利，但河阴之变对洛阳朝廷的打击实在太大，这个烂摊子还是要收拾的。尔朱荣及其手下在洛阳城中高度戒备的状态，也让城中居民十分不安。当时还传出谣言，说尔朱荣要把都城迁到他的大本营晋阳，又有谣言说尔朱荣打算让手下的军队将洛阳城洗劫一空，人们听了无不惊慌，纷纷外逃。尔朱荣便上奏孝庄帝，要求对河阴之变的死难者赠与高级官爵，以稳定人心。他还请求孝庄帝派使者到地方安抚百姓，向他们宣布新朝廷不会再出现大规模杀害士人的行为，洛阳城的居民才陆续返回。

当时，孝庄帝对尔朱荣是怀有戒心的。返回洛阳之后，孝庄帝曾经想要趁尔朱荣酒后沉醉的机会将他杀掉，在旁人的劝说下才没有下手。尔朱荣醒来后也十分后怕，于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在宫中留宿。这说明二人虽然维持着政治上的合作关系，但都是戒心大于诚意，无法互信，只不过当时双方的势力都不足以将对方一脚踢开，所以才勉强结合在一起。

为了巩固与孝庄帝的关系，尔朱荣想让自己的女儿做孝庄帝的皇后。他的女儿做过孝明帝后宫的嫔妃，现在又要再嫁为皇后，这是违反礼法的行

为。但白色恐怖依然笼罩在洛阳上空，所以这件事没有得到有力的反对，尔朱荣顺利地成为孝庄帝的岳父。

过了一个月，尔朱荣见洛阳朝廷的重建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日常的政务也步入正轨，便起身回到晋阳。相比之下，他不喜欢洛阳人那种文质彬彬的样子，洛阳的文化与风景，总让他有种沉沦的堕落感。而回到晋阳，塞上的朔风迎面吹来，放眼望去，远处是无尽的青山与丘陵，一股英雄情怀就油然而生。所以，他可以征服洛阳，但无法驾驭这座城市、这个王朝，于是他选择了离开。但洛阳的事情也不能不管不顾，他临行前将元天穆留下，并要求孝庄帝封元天穆为侍中、太尉、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并将元天穆的爵位升为上党王。这样一来，元天穆就成了洛阳城内的军政长官，不但掌握了行政事务，而且还兼任禁军最高将领。换言之，他就是尔朱荣在洛阳的全权代理人，可以决定洛阳的大小事务。最关键的是，元天穆这个人性格很随和，不像尔朱荣那么严厉，所以洛阳城内文官、禁军和皇族这些纷繁复杂的事情对他来说不是太难处理，也不会闹出大矛盾。

回到晋阳之后，孝庄帝晋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兼任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名义上是最高的行政官员，北魏时期基本上只有位高权重的亲王、功臣才能被任命为这一官职；而“柱国大将军”更是孝庄帝专门为尔朱荣发明的一个新称号，就像“齐天大圣”一样。正所谓投桃报李，尔朱荣通过嫁女儿的方式表示了他对孝庄帝的支持，孝庄帝则用特殊的荣誉表示了他对尔朱荣的倚重。

同年八月，尔朱荣出兵讨伐当时实力最强的义军葛荣部。葛荣出身于六镇，但他与其他六镇起兵的领袖不同，他不但攻打北魏的城池与军队，而且还对其他义军进行吞并，手下人马号称百万，一路向洛阳进发，成为当时北魏政权的最大威胁。

战场是尔朱荣的舞台，他的谋略、他的勇猛和他严明的组织纪律只有在这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针对自己兵力不如葛荣的劣势，让手下军卒分成若干小队，每队几百人，行动时高声喊叫，搅得尘土飞扬，让葛荣弄不清有多少人。接下来，他又从武器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让每名士兵都把佩刀换成木棒，因为对阵临敌时普通佩刀的重量无法与棍棒碰撞，通过对敌军武器的克制，尔朱荣稳操胜券。最后，尔朱荣率领精锐的勇士对葛荣的部队进行突袭，他亲自冲锋陷阵，激起战士们的勇气，果然生擒了葛荣，将他押

送到洛阳交给孝庄帝处置。孝庄帝随即又封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将他的封邑增加到三万户。尔后，孝庄帝又将尔朱荣的封邑增至十万户，并授予他太师的荣誉头衔。

不久以后，北魏皇族元颢又发动了对洛阳的攻击。因为河阴之变的发生，若干皇族子弟都逃往南朝的萧梁政权寻求政治避难，当时在前线平叛的元颢也是如此。梁武帝萧衍对元颢以礼相待，并封他为北魏皇帝，想借助他的名望来削弱北魏的实力，通过制造“两个北魏”从中渔利。萧衍还专门拨给元颢兵将，协助他进行推翻孝庄帝政权的活动。

经过几年的准备，元颢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在孝庄帝永安三年（530）春天北魏大军出征时乘虚而入，迅速攻陷洛阳附近的战略要地荥阳与虎牢。孝庄帝大惊，马上出逃。元颢进入洛阳城，自称北魏皇帝。

尔朱荣闻讯，立刻赶到上党朝见孝庄帝，然后保护着孝庄帝出征元颢。尔朱荣亲自带领先锋部队与元天穆会合，二人指挥军队收复了被元颢占领的州县，与元颢在黄河两岸对峙。尔朱荣派侄子尔朱兆率领精锐骑兵连夜渡河，对元颢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大获全胜。元颢见大势已去，只得放弃洛阳继续到萧梁政权过着逃亡生活。凭借着光复洛阳的功绩，尔朱荣又被孝庄帝封为“天柱大将军”——这自然也是孝庄帝专为尔朱荣发明的新称号，又将他的封邑增至二十万户，赐给他天子所用的仪仗鼓乐。

对孝庄帝而言，尔朱荣有拥立之功，又通过屠杀皇族稳固了他的地位，并先后击败葛荣和元颢，保证了孝庄帝政权的安全，可谓“三番护主，两致太平”。但是，随着尔朱荣一次次立下大功，孝庄帝也越来越不安，越来越厌恶他。尔朱荣派堂侄尔朱天光平定关中地区，当尔朱天光取得全胜，捷报传到朝廷时，孝庄帝却并不高兴，对身边的临淮王元彧说：“是不是从今以后，天下就没有贼寇了？”元彧察言观色，明白了孝庄帝的心思，就说：“微臣担心贼寇全都平定之后，才是陛下需要担心的时刻。”二人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担心尔朱荣在将境内外的反对势力都清除之后，开始动手颠覆孝庄帝的政权，自己称帝。

孝庄帝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尔朱荣虽然人在晋阳，但他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在洛阳处理国家事务，而且朝廷的人事权也被他把持，如果他要任用某人，基本上不会受到反对。他也逐步地对北魏政权进行蚕食，将自己手下有能力的军事统帅安排在战略要地控制地方，又将尔朱氏的成员安插在朝廷，



陆续将自己的手下任命为国家官员。孝庄帝对此早有察觉，所以拒绝过尔朱荣的一些用人要求。尔朱荣闻讯大怒，大放厥词，表现出对孝庄帝的不屑。他的女儿、孝庄帝的皇后也十分嚣张，让孝庄帝十分苦恼。

被尔朱荣步步紧逼的孝庄帝决定先发制人。永安三年的秋天，尔朱荣上书孝庄帝，说自己打算到洛阳来朝觐。当时，他已经率领几千军队在路上了。孝庄帝又恨又怕，就动了杀机。

当时洛阳城内的官员们听说尔朱荣要进京，害怕河阴之变的惨剧再次发生，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说尔朱荣要谋反，还有人说孝庄帝会趁机杀掉尔朱荣。长期在洛阳监控局势的尔朱世隆感觉到气氛的异常，马上去信请求尔朱荣不要来洛阳。尔朱荣不听，到了洛阳，还把从尔朱世隆那里听来的消息当面向孝庄帝求证："我听人说陛下想要杀掉我，这是真是假?"

孝庄帝十分紧张，但他急中生智，回答说："外面也有人说大将军您要谋害朕，我又怎么会相信这种胡话?"尔朱荣闻言大喜，便不再怀疑孝庄帝。

孝庄帝当时没有下手，是因为尔朱荣最亲密的战友元天穆此时正好去了并州，不在洛阳，孝庄帝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便等待着元天穆回京。

元天穆回到洛阳后，孝庄帝便与亲信密议如何除掉尔朱荣与元天穆，以及杀掉他们之后的善后问题。当时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将尔朱氏及其亲属全部铲除，另一种意见则是只杀尔朱荣与元天穆，对其党羽进行大赦，以免尔朱氏其他成员铤而走险，对皇帝不利。最后，孝庄帝认可了第二种。

永安三年九月十八日，孝庄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准备会见尔朱荣与元天穆的殿外埋伏了十余名武士。二人进殿之后，孝庄帝赐他们酒食，打算在酒过三巡后下手，结果二人没吃完就起身告辞，武士们得到消息时已经看到他们离开，这次暗杀宣告失败。

孝庄帝与大臣们密谋杀掉尔朱荣的计划也并非绝对机密，尔朱世隆已经探听到了消息，便在自己家的门上张贴匿名信曝光此事，还假作不知，将这封信呈给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郡长公主。尔朱荣看到这封匿名信，大骂尔朱世隆胆小。尔朱世隆又劝尔朱荣速速离开洛阳回晋阳，毫不在乎的尔朱荣的回答是："急什么?"并没有把尔朱世隆的劝告放在心上。

十八日之后的几天，孝庄帝都没有得到机会下手。中间尔朱荣还生了一场病，孝庄帝只能等待。等待对孝庄帝而言就如同用钢线割喉一般难以忍受，最后，他以皇后（尔朱荣的女儿）生下太子为名，邀请尔朱荣入宫。



当时强势的尔朱荣已经对孝庄帝完全放下了戒心，每次进宫都只带几十个人，而且这些人都没有全副武装。九月二十五日，尔朱荣与其长子尔朱菩提以及元天穆一起被邀请入宫，刚刚坐下，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等就拔刀冲向他们。尔朱荣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还以为是这些大臣对自己不满，便朝着孝庄帝的御座逃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孝庄帝早把佩刀藏在了膝下，见尔朱荣逃过来，孝庄帝马上拔刀砍去，只见红光闪过，尔朱荣已倒在血泊之中。鲁安等怕尔朱荣并未死去，冲上来挥刀一阵乱砍。在场的元天穆与尔朱菩提也无一幸免，都被乱刀所杀。

在确认尔朱荣已死后，孝庄帝身边的人高兴得大叫，声音传到了洛阳的每一个角落。孝庄帝按照既定的政策，对其他人不予追究，宣布大赦。

尔朱荣被杀时，正好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对一个大臣而言，正是逐渐成熟、能够建立功业的年纪。尔朱荣显然已经提前完成了建功立业的任务，废立皇帝、平定内乱、击退篡权者，任何的一项都足以令他名留史册。“三十功名尘与土”，尔朱荣的功绩，正是来自尘土飞扬的征战之路，也同样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化为尘土。

他为后人留下的最大谜团是：他到底想不想称帝？

他确实想过，在河阴之变时就想过，但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他动过这个念头而判他谋反的罪名。就算他不动这个念头，他也已经是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独裁者。他控制朝廷、任用亲信，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对北魏政权的控制。因此，无论他有没有做出称帝的实质性准备，他其实已经是没有皇冠的帝王。

在一个以帝制为合法统治形式的时代，对帝位的追求也是合理的欲望。关键在于如何去追求帝位。尔朱荣拥立孝庄帝元子攸来反对胡太后的昏庸统治，所以得到了支持；尔后，他四处征讨，平定内部叛乱，打击有南朝支持的夺权者，都是为了北魏的稳定与强大。他没有北魏的皇室血统，但是他有越来越强大的功勋，因此，他如果发动兵变，建立新王朝，恐怕也没有不妥之处。而且，他代表着魏孝文帝以来一直被压制的军人利益，他那些看似无理的主张与政策，正是为军人谋利的，只不过史书由文人书写，而且由胜利者委派的文人书写，他既不是文人，也不是胜利者，所以才会被塑造成一个杀人狂，一个心怀不轨的叛臣。

尔朱荣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违反当时的任何社会道德。如果说违反，他

只违反了称帝所需的一些基本要素：作为上一代皇帝的直系亲属，由于功劳大或是道德高而令上一任皇帝“主动禅让”。但在那个年代，孝庄帝也没有这些资本，但他一旦坐在皇位上，就认为自己与皇帝身份是绑定的，自己是毫无争议的君主，只要反对他就是谋反、篡位，所以才把尔朱荣定位成谋反未遂的失败者。

在写《魏书》时，魏收评价尔朱荣的话是：“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彭、韦、伊、霍夫何足数?”按照魏收的理解，如果尔朱荣没有制造河阴之变，而且能够一心辅佐孝庄帝而不是与之夺权，就会成为与伊尹、霍光等人齐名的大臣楷模。事实上，对于河阴之变的问题，确实不能让尔朱荣负全部责任；对于辅佐孝庄帝还是自己做幕后统治者的问题，也不能流于道德批判，假如尔朱荣真的那样做，恐怕也会像伊尹、霍光一样，或是被杀，或是死后家族被满门抄斩吧？有趣的是，因为这句评语，魏收被人诽谤，说他是因为收了尔朱荣之子尔朱文略的贿赂才为尔朱荣说了好话。——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将别人批得体无完肤，而且还要以自己的标准来党同伐异，这恐怕也是我们千年的传统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行大赦之后，孝庄帝并没有换来长久的统治，尔朱荣的侄儿尔朱兆紧急发兵攻占洛阳，将孝庄帝囚禁在永宁寺中——当年尔朱荣在河阴之变后进入洛阳，就在此地驻军，孝庄帝在经受了百般折磨后被处死，他的地位由尔朱荣而来，他的生命也因尔朱荣而去。

以尔朱兆为首的尔朱氏党羽控制了北魏朝廷后，原来尔朱荣手下的一些豪杰纷纷产生了独立的想法。高欢在河北，贺拔岳、宇文泰在关西，都已经打算与尔朱氏脱离关系，开创自己的基业。终结魏孝文帝的文治时代、为北中国重新设计发展模式的大时代，就要到来了。



独孤信

——三朝国丈独孤郎

在历史的舞台上，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并不是被聚光灯追逐的主角，并没有炙手可热的大权，甚至不在舞台的中央。然而，与主角相比，他们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能够让人难以忘怀。

往事越千年，当舞台上的主角所创立的功业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主角成为历史发展某一环节中的路标时，那些原本并不起眼的配角，正是因为他们远离“时代主题”而又与时代的主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后人心目中最能代表那个时代、最值得提起的人物。

比如独孤信。

一、英雄父亲的诞生

独孤信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数，他所拥有的特殊身份，令人难以相比，最特别的是，他的特殊身份，完全不是有意经营，而是无心插柳。

这身份，并不是所谓的“三朝元老”。在中国古代，“三朝元老”总代表着一份殊荣，比如北魏时期的高允。高允从北魏太武帝时期入仕算起，一共经历了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和孝文帝四朝，活到九十八岁。高允一生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甚至在太武帝时期著名的“崔浩国史之狱”时也坚

持不说假话，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低头认错，他的品格让几位北魏皇帝都十分敬佩，文成帝更是以高允为例，指责那些只知道求升官而不关心国家与皇帝的大臣。比起“三朝元老”，能够在几个朝代都地位稳固的“不倒翁”更是传奇，比如五代时期从后唐开始，历经后晋、后汉直到后周都官居宰相的“长乐老”冯道（其实，在后晋被契丹进攻时，他还曾经是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任命的宰相，可以称得上“历仕五朝”）。冯道所求的，不过是在乱世之中能够明哲保身，但他确有过人之处，能够让帝王们对他委以重任。

与“三朝元老”和“历仕数朝”相比，无论江山易手还是时势变换，都能够以外戚的身份存在的家族，就更为难得。无论是西汉时期显赫一时的吕氏家族、窦氏家族，还是东汉时期的邓氏家族，都无法达到这种境界。只有欧洲历史上，深受贵族血统观念影响的各国皇室通婚，才基本符合这一状况。欧洲各国皇室之间的通婚起于中世纪，延续到近代。英国、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等国家就靠着婚姻这一纽带，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日不落”时代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被称为“欧洲的祖母”，也正是因为这种血缘的力量。当然，维多利亚女王成为“欧洲的祖母”的历史背景在于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君主。

在中国古代的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位颇具欧洲贵族意味的“三朝国丈”，只不过他并非一国之君，甚至连一方霸主都不是。

在人们印象中充满了“胡气”、充斥着“战乱”的北朝，这位“三朝国丈”的大女儿、四女儿、七女儿分别嫁给了三位皇帝候选人或是皇帝候选人的父亲：大女儿的丈夫宇文毓，是北周的第二代皇帝周明帝；四女儿的丈夫叫做李昞，是后来建立唐朝的唐高祖李渊之父；七女儿的丈夫叫做杨坚，也就是“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隋文帝。因此之故，这三个女儿，后来或被册封、或被追封为皇后，这位父亲，自然也就成了北周、隋朝和唐朝的“国丈”。

他的名字叫独孤信。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北朝特色”的名字。在后人的心目中，十六国北朝的人物必须要带上宇文、独孤、拓跋、慕容、赫连之类的姓氏才显得“正宗”，相反，与中原人一样的“刘”、“石”、“高”、“李”、“杨”一类的姓氏就会让人觉得形迹可疑。的确，很多顶着此类姓氏的人物往往行为举止不像“正宗”的汉人，尤其是不读诗书而好骑射。于是，后人追寻着这些蛛丝马



迹，翻检这些可疑人物的家世，便也确实发现了很多胡人改汉姓的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叫做姚薇元的史学家就曾经撰写了名为《北朝胡姓考》的著作，对改称汉姓的胡人家族及其成员进行了考释与统计。

找出汉姓胡人家族原本使用的胡姓，是历史学家们在对史料的爬梳基础上所做的溯源工作，而发现使用汉姓的人原本是胡人，这种敏感的思路大抵来自对姓氏上具有的“北朝特色”的认识。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们暂且打住。

从独孤信的姓氏就可以看出，他并非中原汉人的后裔。他的家族本是匈奴贵族的一支，姓刘（这其实也是匈奴人对汉朝国姓的搬用，刘渊即是如此），后来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战乱，最后改姓独孤，并成为鲜卑拓跋部的盟友，与拓跋部世代通婚——作为皇室的外戚，对独孤部来说，是早已有之的传统，正所谓“日光底下，并无新事”。

然而，作为外戚，在拓跋部建国之后，独孤部却并未因此登上权力的顶峰，而是与此相反，势力迅速萎缩。究其原因，在于独孤部干涉拓跋氏内部的权力争夺，并与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兵戎相见。为了保持拓跋部的绝对权力，对可能左右政局的外戚部族进行打压，也为了惩治政敌，拓跋珪将战败的独孤部迁徙离散，使其部众与部落大人失去了原有的隶属关系，使他们只能成为拓跋部的附庸。

三军夺帅，其部族力量自然如冰消雪融。失去了首领统属的独孤部，面前只有三条路：一是顺从命运，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缴纳租税、出力服役；二是举部远迁，逃出拓跋部的手掌心，恢复匈奴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三是在沉默中爆发，举部起义，对抗北魏的打压政策。当然，这只是历史的可能性而已。实际上，独孤部没有走向第二、第三条道路，他们被动地接受了成为编户齐民的安排，铸剑为犁，男耕女织。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独孤信的祖父独孤俟尼以“良家子”的身份应召，从家乡云中郡出发，去边境六镇之一的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戍守，其家族便在此定居。

武川镇是北魏为了抵御北方强敌柔然而设立的北部边镇之一，在北魏前期，能够镇守六镇的将士，都被视为国家的“股肱爪牙”之臣，必须由出身良好的鲜卑“国人”担任。由于地处边塞，“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自不必说，号角胡笳、鸣镝烽火更是独特的风景。这里原本就是匈奴南下牧



马的所在，有着匈奴血统的独孤俟尼在此安家，颇有回归祖先故地的意味在里面。

未见过草原的台湾女诗人席慕蓉心中永久的咏叹是“敕勒川，阴山下，今宵夜色应如水”。也许，从古到今，对游牧民族的后代来说，回到祖先生活的那片草原，聆听那些在塞外的风中飘荡着的、祖先留下的歌谣，是心中永远的梦想。对一个已经离散的部族而言，这份梦想尤其珍贵。

事实上，如果没有他戍守武川镇的经历，如果他的家族没有因此而于此定居，独孤信就不会与那批成长于武川镇的英豪相识，更不会成为北朝史上的名臣，更不会出现“三代皆为外戚”的盛景。

二、乱世军中独孤郎

成长于边塞，感受着祖先的生活方式，独孤信在少年时代就颇有风度。当时他的名字还不是独孤信，他的本名叫做独孤如愿。他的相貌俊美，想来是因为其家族回归祖先故地，让内在的遗传基因和外在的生活环境达到了和谐，使他获得了最优的外在容貌。

他的父亲独孤库者雄武豪迈，在当地担任领民酋长。所谓“领民酋长”，就是北魏在边境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官职，专门授予那些统领不在国家户籍之中的部族居民的部落酋长，让他们和他们的族人成为北魏的臣民。领民酋长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几个级别，独孤库者到底属于哪个级别，已经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独孤家族在武川镇属于地方豪强，拥有极强的地方影响力。

父辈的气质对独孤如愿的人格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与他同一辈成长起来的很多少年豪侠，也就是那批后来成为西魏、北周政权中流砥柱的武将，比如宇文泰，再比如开创了关西根据地的贺拔岳、贺拔胜兄弟，都拥有仗义疏财、雄武重义的特点。这样一批年龄相仿的人互相影响，共同塑造了这个群体的性格——“同伴教育”，是现代心理学在观察青春期少年性格与行为逻辑时使用的一个名词，在笔者看来，这也适用于当时较为封闭的武川镇少年们的成长经历。

在这样的环境下，独孤如愿成长为一个大气、儒雅、俊秀、机智的青年。与北魏末年边镇的很多青年才俊一样，他也有过讨伐六镇起义、成为葛

荣部将、被尔朱荣招纳、在北魏分裂过程中明确政治立场这些经历。这种大致类似的政治经历，也让他与出身于武川镇的其他将领有着很多共同的见解、共同的感触。

且让我们从六镇起义说起。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国家转向文治，崇尚儒学、文学，因此文官受重用、升迁快，而将士们，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将士，地位越来越低，不仅升迁无门，而且生活水平极低，与都城洛阳那种豪奢的生活相比，六镇的军民们无疑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贫困人群。而且，自从迁都洛阳，六镇地区的地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原来的拱卫京师变成了边境上无足轻重的关塞，成为流放罪犯的场所。

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四年（523），塞外遭遇了严寒，北边的柔然汗国缺少水源和草木，他们的畜牧业也因此遭受沉重的打击。次年，柔然向北魏求援，但北魏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援助。缺乏粮食的柔然于是南侵，对六镇地区进行洗劫。



本来就处于贫困线上的六镇地区，抵受不住柔然的掠夺，怀荒镇（今河北张家口张北）的百姓请求军方救济无果，人们一怒之下杀掉了当地的武将于景，然后匆匆出逃，一直逃到西陲的沃野镇（今内蒙五原）。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发动当地军民起兵，一来为抵御柔然，二来为改变生计。由此，六镇地区的军民纷纷起兵，一时间战火不断，好几个军镇都被攻陷。

六镇风暴自然也对武川镇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当时，义军将领卫可孤率军包围了武川镇，又分兵进攻怀朔镇——不得不说，卫可孤这次军事行动，就如同核聚变反应中撞击原子核的中子一样，因为很多北朝后期的英雄人物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登上了历史舞台，比如贺拔胜、贺拔岳兄弟，比如后来东魏的缔造者高欢，西魏的掌权人宇文泰，再比如独孤如愿。

武川被攻陷以后，贺拔岳的父亲贺拔度、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等举兵与卫可孤对抗。在少年时代就以擅长骑射而知名的独孤如愿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和他们一起联手击杀了卫可孤。经此一役，独孤如愿少年成名。

斩杀了卫可孤，武川镇也并未就此安宁。杜洛周、鲜于修礼等率领的六镇流民队伍扫荡着这一地区，如果靠个人的勇武与他们对抗，不要说保卫乡里，就是自保也非常之难。于是，独孤如愿投靠了葛荣。

葛荣原本是怀朔镇的武将，在六镇起兵之后，他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后

来成为鲜于修礼帐下的武将。鲜于修礼死后，其部众最后都落在葛荣的控制之中，葛荣四处征战，一时成为北魏政权最头疼的敌人。

在葛荣军中时，独孤如愿成为明星将领。这并不是他立下了多大的战功，而是因为他“既少年，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

按照史书的记载，他是因为年轻，所以比较重视仪容，服饰和其他的将领有所区别，所以被军中称为“独孤郎”。如果将“因为年轻”理解成年少无知的话，恐怕会对独孤如愿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是和平年代，一位青年如此重视外表，是无可厚非的，但当时他身在军中，而且正是国家危急的时刻，如果他还是“因为年轻”，所以控制不住对美的渴望，那么他就变成了爱惜容貌的公子哥儿，不仅不像在边塞成长起来的青年，而且不像游牧民族的后代，倒像是在灯红酒绿的洛阳城里吟风弄月的北魏贵族子弟了。

那么，是不是他觉得人生无常，所以寄情于服饰呢？从他此前此后的表现来看，似乎也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在成为葛荣的部将之前，他就有过击杀卫可孤的战绩；在葛荣败亡之后，他在尔朱荣的委派下四处征战，屡立战功。从这一前一后的表现，我们看不出他在中间的阶段有过人生观上的动摇，所以寄情的说法似乎也不能成立。那么他会不会以此来迷惑葛荣、表示自己只是空有一副好皮囊呢？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我们在史书中找不到任何直接的线索，就只能从时代背景出发，探讨孕育出独孤如愿这一异于常人的表现的外因了。

当时北魏政权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起义和叛乱此起彼伏，身处战乱旋涡之中的人更能够感受到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的那种幻灭感。因此，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在此后的风云变幻中展示才干的将相们，在政治与人生观上都十分早熟。从时势论心态，独孤如愿都不会无忧无虑地在意仪表。

在小说《红岩》里，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江姐也要保持服饰的整洁和仪容的端庄。评论者认为，这体现了革命者对待人生、对待未来的一种态度，是“革命乐观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

在笔者看来，独孤如愿在葛荣帐下时注重仪表的行为，应该也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在。身处葛荣——叛乱者——的军中，前途未卜、战乱不断，将士们即使不是个个灰头土脸、面有菜色，恐怕仪容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但独孤如愿因为“既少年”，因为他觉得北魏王朝不会就此结束，自己也不会长期寄人篱下，他也确实在思想上做好了振兴北魏、为国效力的准备，既然如

此，又有什么需要忧虑的呢？比起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寄居在葛荣帐下（战败被俘、主动投靠、暂时依附等）的人，他活得更有目标、更有动力，所以他才能从容而优雅地注意仪容的修饰。

他的着意修饰，正是军营中的风景。在尘满征衣的将士队伍中，衣着光鲜、整洁的独孤如愿就是淤泥中的莲花，不但难得，而且让其他人自惭形秽。将士们对他的这种与众不同十分欣赏，一传十、十传百，“独孤郎”的称呼就此传开，独孤如愿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翩翩浊世佳公子”。

也许，越是乱世，人们对美的渴望就越是强烈。独孤如愿的所谓“服章有殊于众”，不但代表着华美的服饰，更代表着和平时代人们所能享用的正常衣着。将士们欣赏的，不但是他的风流倜傥，更有一种乱世中人对正常生活的憧憬。

无独有偶。在北魏分裂之后，东部的北齐也出了一位与独孤如愿齐名的美男子——兰陵王高长恭。

高长恭是那位被刺杀身亡的霸主高澄之子，史书中对他的评价是“貌柔心壮，音容兼美”，相貌出众，举止潇洒，而又骁勇善战、满怀壮志。他作战时英勇、屡败敌军（西魏北周的军队）。有一次，北周进攻北齐，围困了北齐控制下的洛阳。当时，高长恭指挥中军，率领五百名骑兵杀入北周阵中，北周军队招架不住，觉得对手是虎狼一样的战将，于是就被高长恭杀出一条血路，直至洛阳金墉城下。当时城中的北齐军队被围困了很多天，忽见敌军阵营大乱，阵中尘土飞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们看到城下有一名浑身是血的将领，看不出是敌是友，守军当然不敢随便打开城门放高长恭进来。高长恭会意，马上摘下头盔，让城中军卒看到自己的脸，守军才知道是北齐来了援军，马上派出弩手进行掩护，高长恭率领部下继续厮杀，撕开了北周的包围圈。这场胜利过后，将士们便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来歌颂高长恭的功绩。可惜，他因为受到北齐后主的猜忌，正当盛年便被赐毒酒而亡。

为了纪念这位“貌柔心壮”的兰陵王，人们将《兰陵王入阵曲》代代相传，传到后世，高长恭的形象也被神化了，他成了人们传说中的另一种样子——因为相貌过于俊秀，人们觉得他不像一个武将，更像一个误闯战场的公子哥儿，敌方军队也对他没有恐惧之心，反而有轻视之意。所以他特别制造了一个面具，上阵时就戴在脸上。这个“兰陵王面具”相貌凶恶，面目狰



狞，让敌人远远望见就心惊胆战。靠着这个面具，兰陵王才百战百胜。

很显然，这是后代好事者的虚构，史书中并没有说高长恭的相貌对战斗产生过什么影响。

在北朝后期，东有高长恭，西有独孤信，都以相貌俊美而著称于世，可见乱世也并非仅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对美的渴望，对美好人物的欣赏。

在军中卓尔不群的“独孤郎”，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三、不受欢迎的远方来客

葛荣屡败北魏军队，声势越来越大，对同样出自六镇的义军杜洛周进行了兼并，势力达到顶峰。可是，就在葛荣志得意满之时，尔朱荣接受任命征讨葛荣。

葛荣丝毫没有把尔朱荣放在眼里。首先，与葛荣交战的北魏将领很多，其中不乏功成名就的宿将和德高望重的大臣，但他们都一一败下阵去。其次，尔朱荣的兵力与葛荣相比，也是众寡悬殊。谁料尔朱荣出其不意，以精锐骑兵突入葛荣军中，葛荣阵脚大乱，兵败被擒。

尔朱荣取得胜利之后，收编了葛荣的军队，并对葛荣部下的将领进行了招安。独孤如愿和其他在葛荣帐下的将领一样，归附于尔朱荣，跟随他征战四方，因军功而加官晋爵。这些归顺尔朱荣的葛荣部下，很多人都在尔朱荣的身边，形成几个小集团，相互之间壁垒森严，最终分道扬镳。而独孤如愿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在归附尔朱荣之后三年左右，独孤如愿被委派到荆州做新野（今河南南阳新野）镇将，兼任新野郡守。荆州本是北魏与南朝进行领土争夺的重要地区，因而独孤如愿此次前往，肩负了在离乱之世保卫边疆的重任。此后，因为防卫有方，他又被任命为荆州防城大都督，兼任南乡郡守。

不久以后，朝廷的一次人事安排，改变了独孤如愿的命运。同样出身于武川镇的将领、与独孤如愿一起诛杀卫可孤的贺拔度之子贺拔胜出镇荆州，担任荆州前线的军政长官。贺拔胜到任后，上表请求任命独孤如愿为大都督。他对独孤如愿十分信任，二人在荆州前线并肩作战，合作颇佳。

在荆州与贺拔胜建立的上下级关系，使独孤如愿迅速进入武川军事集团

的核心——就在他归附尔朱荣的同一年，尔朱荣的堂侄尔朱天光率领贺拔岳、侯莫陈悦等人讨伐关中和西北地区（简称关西）的六镇义军余部万俟丑奴。关西地区平定之后，贺拔岳在一批出自武川镇的将领支持下，在此处落地生根，当地的兵马、地方州郡也都接受贺拔岳的管理。这支西部的势力，由于其核心集团大多都是出自武川镇的军人，所以被称为“武川军事集团”。与此相对，还有一批出身怀朔镇的将领受尔朱荣的委托，主要负责洛阳以东地区的平叛与重建工作，他们后来与山东、河北地区的豪族相结合，形成了“怀朔军事集团”，其首领就是高欢。随着尔朱荣被杀、尔朱氏内部后继乏人，这两个军事集团日趋独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剑拔弩张。

已经离开权力核心的独孤如愿，就这么被动地卷入了出身六镇又进入尔朱氏集团的派系斗争之中。如果说此前他只是一个因相貌著称的青年，那么此刻他就成了武川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贺拔胜控制南方重镇，贺拔岳控制关西地区，与怀朔军事集团分庭抗礼，而独孤如愿作为贺拔胜十分欣赏的部下，在武川军事集团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但是，独孤如愿因为远在荆州，所以武川军事集团的大本营关西地区发生的微妙变化他并不了解，也并未参与。



不久，大权在握的高欢与魏孝武帝进行权力争夺，不愿成为傀儡的魏孝武帝想依靠贺拔岳在关西的兵力与高欢对抗。老谋深算的高欢自然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挑起了关西地区内部的权力争夺，唆使侯莫陈悦杀掉了贺拔岳。贺拔胜闻讯大惊，可是他肩负着前敌总指挥的重任，无法抽身去关中主持大局，便命独孤如愿前去抚慰贺拔岳的部下。

可以说，这是贺拔胜打算对关中的贺拔岳部属进行“遥控”的信号：从道义上讲，他与贺拔岳是兄弟，兄弟被杀，自然要前去慰问家属、抚恤部下；从利益上讲，贺拔氏兄弟创立了在西北和南部的基业，现在需要对西北的势力进行重新安排，也需要有得力之人前去部署。而带着这两大使命代替贺拔胜前往的，就是独孤如愿。

不过，贺拔胜的安排因时空的阻隔而慢了一拍。早在贺拔岳在世时，同样出身于武川镇的宇文泰就已经在关中建立起个人的威信，成为贺拔岳比较信任的部下。

宇文泰跟随贺拔岳平定关西，立下了不少战功，他尤其擅长安抚人心。平定关西时期，他暂时代理原州地区事务，对百姓施以恩惠，执政以信义为

本，百姓十分拥护他的统治。

在尔朱荣被杀后，高欢与尔朱氏集团走向决裂，当时掌权的尔朱世隆等人极力催促尔朱天光从关西出兵，与高欢决战。尔朱天光出兵之后，贺拔岳打算将尔朱氏的势力从关西地区清除，就打算和关西的另一位重要将领侯莫陈悦联手，但不知应该如何与其进行沟通。宇文泰献计说："现在尔朱天光出兵不久，侯莫陈悦肯定不敢有贰心，如果现在和他联络，他肯定会畏惧而不敢答应，也许还会走漏风声。况且他这个人虽然是武将，但对部下缺乏统驭能力，我们不如先游说他的部下，让他们先站在我们一边，这样一来，侯莫陈悦只能选择和我们共进退。"贺拔岳采纳了宇文泰的计策，果然一举成功。从此以后，宇文泰就成为贺拔岳身边重要的谋臣。

在贺拔岳被害后，关西地区武川军事集团的首领位置暂时空缺。这时，贺拔胜派独孤如愿赶赴关西，醉翁之意已经呼之欲出。

独孤如愿与宇文泰，一个是贺拔胜信任的将领，一个是贺拔岳的心腹，他们两个谁能够成为关西地区的新掌门呢？

贺拔岳手下的大都督赵贵在贺拔岳遇害后为其收尸，当时很多将领都认为年长的都督寇洛可以暂时代理关西地区的军务。寇洛严词拒绝，认为自己难堪大任，建议大家另选贤能。赵贵便抓住机会，对将领们说："贺拔元帅功高盖世，但是却意外遭人暗害，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为他报仇。如果我们推举不出合适的领头人，那么复仇的大计就不会成功。宇文泰是不世出的英才，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将士们舍生忘死，而且他执法公平，赏罚分明，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如果我们向他报丧，他肯定会来吊孝。我们借机拥立他为新主，何愁大事不成？"群龙无首的关西众将见大都督赵贵都如此说，便纷纷表示赞成。宇文泰闻讯后也迅速赶赴贺拔岳灵柩所在地，在其灵前失声痛哭，关西众将按照赵贵先前的谋划，共推宇文泰为首领。

就这样，宇文泰顺利地将关中地区的势力从贺拔氏手中夺取过来。等到独孤如愿到达关中时，宇文泰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为贺拔岳的继承人，控制了贺拔岳手下的将士与地盘。

这个时候，独孤如愿的身份十分尴尬——招抚贺拔岳部众、维持其势力归贺拔氏控制的任务已经宣告失败，除非他能够以非常手段解决掉宇文泰。以宇文泰的精明老练，对独孤如愿此来的目的自然十分清楚，他不会让独孤如愿真正"如愿"地达成使命。所以，无奈之下的独孤如愿，也就只剩下了

对贺拔岳的家属与部将进行安慰、抚恤的道义性任务。

史书对此事的记载十分简略：

> 属太祖已统岳兵，信与太祖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欢。

二人都出身于武川，本是熟人，而且关系不错，所以这次见面，十分喜悦——这就是史书的记载。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否如此呢？

我们已经找不到对此事更详细的说法，更没有不同的说法出现。以理度之，独孤如愿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举动。

独孤如愿与宇文泰的这次会面，在宇文泰主动、独孤如愿被动的情况下展开，远道而来的独孤如愿没能为贺拔氏赚得任何的政治利益，贺拔胜没有获得对关中的控制权，独孤如愿自己自然也就没能拥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在礼节上，他受到了厚待，然而掌控局面的，则是宇文泰，就像一个姨太太出身、已经坐稳了诰命夫人位子的女子热情接待从故乡赶来投靠丈夫的原配一样，礼貌十足，但是利益分毫不让。

如果独孤如愿在此时使用非常手段，不要说成功率极低，就算成功，也必将带来关中的再次动荡，贺拔岳辛苦经营起来的关中根据地很可能就此倾覆。而且，此时的关西地区，名义上、手段上最紧要的任务是为贺拔岳复仇，就像《水浒传》中天王晁盖遇害后，各位头领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复仇而非推举谁为首领一样。宇文泰不失时机地在此时打出“复仇牌”，无论是对内部还是对朝廷，都立于道德上的不败之地。而这时如果要和他争夺关西的控制权，势必会成为道德上的小人，即使除掉了宇文泰，也无法控制局面。事已至此，独孤如愿还能做什么、说什么呢？

此等尴尬局势下，独孤如愿与宇文泰只能回忆往事，谈谈少年时一起做过的事、见过的人，看上去十分融洽。对独孤如愿而言，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务虚”。接下来，宇文泰便让他到都城洛阳去觐见北魏皇帝，通报关中的情况——这是宇文泰有意将他支开，即便独孤如愿无心搞破坏，但混乱的局势之下，对这样一个危险的远方来客不得不防。

可以说，在贺拔岳死后独孤如愿赶赴关西的这件事，成为横在宇文泰心中永远的一根刺，这使得他们二人终身都没有建立起绝对的信任。尽管日后贺拔氏的影响力风流云散，但当日独孤如愿扮演的危险角色，总是会让宇文



泰不舒服的。

受到贺拔氏的信任，独孤如愿能够在南部边防迅速建功立业、获得政治资本，但也由于与贺拔氏走得太近，让他被新霸主宇文泰从心理上疏远。这一切，都是独孤如愿自己始料未及的，这正是政治的吊诡之处——那些改变命运的重要事件，总是你以为把握十足但实际上不在你个人掌控之中的。

独孤如愿正带着宇文泰的命令赶赴洛阳时，在雍州（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及其附近地区）又被大使元毗命令迅速返回荆州。半路开了小差，虽然可以用朝廷的命令作解释，但也会让宇文泰产生其他的联想——他是不是回去向贺拔胜通风报信，然后他们一起盘算下一步如何行动？也许，这个小插曲，就让独孤如愿在宇文泰的心中以“不是自己人”的形象定格。

四、山河破碎风飘絮

独孤如愿回到荆州之后不久，魏孝武帝与高欢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双方都各自调动军队，准备一决高下。魏孝武帝依靠的关西军阀中，贺拔岳已死，宇文泰则刚继任武川军事集团的首领不久，一切求稳，并不真的打算领兵到洛阳支援皇帝，而魏孝武帝自己招募的军队根本无法与高欢骁勇善战的铁骑相比。争取一切可能支持自己的力量，是摆在魏孝武帝面前的头等要务。

魏孝武帝想到了独孤如愿。这位昔日在葛荣军中颇负盛名的“独孤郎”，魏孝武帝早有耳闻；贺拔胜对他的信任，魏孝武帝也看在眼里；更重要的是，他是贺拔胜委派去关西安抚贺拔岳的家属和旧部的使者，如果拉拢他，可以震慑一直拖着不出兵的宇文泰。深谙权术的魏孝武帝想以独孤如愿为突破口，让武川军事集团能为己所用。

打定了主意，魏孝武帝就召独孤如愿入朝。独孤如愿来到洛阳后，魏孝武帝表现得十分热情，对他十分欣赏，并委以重任。独孤如愿自然是感恩戴德，把孝武帝当成了值得辅佐的英明君主。可是，与魏孝武帝的这层关系，也成为独孤如愿与宇文泰之间的隔膜——宇文泰是关西的新主人，为什么你独孤如愿要去和魏孝武帝走得那么近呢？宇文泰都选择了按兵不动，你为什么表现出效忠魏孝武帝的决心呢？即使独孤如愿本人没有与宇文泰对抗的意愿，二人对待魏孝武帝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反差，也不能不让他人多心。正所

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独孤如愿一次又一次走进宇文泰心理上的雷区，也难怪他日后会被宇文泰雪藏。

就在这一年，魏孝武帝与高欢终于兵戎相见，仓促作战后溃不成军，魏孝武帝只能仓皇出逃，把关西当成自己的庇护所。独孤如愿听说魏孝武帝向关西撤退，便扔下了家人，只身前去追随，终于在洛阳城外追上了这位流亡皇帝。此举对魏孝武帝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在自己落难的时刻，能够不顾安危前来护驾的人少得可怜，更何况还是独孤如愿这样主动前来的。他表彰了独孤如愿的忠诚，赐给他一匹御马，晋封他为浮阳郡公，封食邑一千户。

魏孝武帝与高欢开战之前，也征调独孤如愿的上司贺拔胜率军到洛阳勤王。贺拔胜也和宇文泰的心思一样，不想让自己的军队成为双方厮杀的牺牲品，而是想趁着两边进入人困马乏的境地时坐收渔翁之利。就在他实行拖延战术的时候，魏孝武帝已经向着关西出逃了。贺拔胜闻讯大惊，迅速返回荆州，想固守荆州之地，然后反攻中原。这一切都在高欢的盘算之中。贺拔胜刚刚返回荆州不久，高欢手下将领侯景就率领大军到达。贺拔胜严阵以待，不料高欢策动了荆州内乱，州中百姓生擒了贺拔胜的部下并引侯景入城，贺拔胜亲自领兵来到时，侯景率军对其进行了阻击。



侯景也是六镇起义后崭露头角的人物，他善于用兵，而且智谋过人，尔朱荣对他十分器重。论打仗，贺拔胜根本不是侯景的对手，加之侯景已经取得荆州州城，以逸待劳，贺拔胜更加不是对手。这一战，贺拔胜大败，失去了立足之地，只得逃奔南朝，暂时寄居在梁武帝萧衍那里。

魏孝武帝进入关中，高欢穷追不舍，攻陷潼关，继续进逼长安。双方交战一段时间，高欢回师，另立北魏皇族子弟元善见为帝，而魏孝武帝则在宇文泰的支持下在长安继续做皇帝。曾经一统北方的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

当时，高欢控制的东魏占据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而且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人才方面，都比宇文泰控制的关西地区强。为了扭转这种局势，必须要将极具战略意义的荆州从东魏的手中夺回。魏孝武帝便任命独孤如愿为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兼领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经营南方。

此时，独孤如愿刚刚到而立之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像独孤如愿这样年纪轻轻就节度一方的大将并不少见，一个时代之所以有活力，就在于年轻人

能够走到前台，施展自己的抱负。

对手是沙场老手高欢，就注定了独孤如愿此行并不轻松。他出兵不久，就在半路上遭到了东魏军队的拦截。当时，东魏的弘农太守田八能在淅阳（今河南西峡）阻挡了独孤如愿的去路，而东魏的都督张齐民也率军在他背后进行堵截。在这样的情势下，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军首尾夹击。

独孤如愿当时所带的兵将不到一千人，但他却没有惊慌。他冷静地对部下进行分析："现在的情况是，敌军想让我们无法前进，又断了我们的退路，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这淅阳城外。而且兵力对比上，敌众我寡，不能草率出兵。按照现在的形势，田八能是阻击我们的主要力量，张齐民是对他进行接应的。假如我们后退去攻击张齐民，田八能肯定要出兵，那我们必将被夹击，凶多吉少；而如果我们攻打田八能，在胜负未分的时候，张齐民未必会出兵，因为他的任务是守住我们的退路，让我们无法逃跑。如果我们战胜了田八能，张齐民也就不足为虑了。"

分析了战局之后，独孤如愿果断出兵，凭借着自己的勇猛与斗志，将田八能打得落花流水。在后方负责接应田八能的张齐民得到战报，果然草草收兵撤退，独孤如愿就这样瓦解了敌人的半路截击。

取胜之后，独孤如愿继续进兵，对东魏控制下的荆州进行突袭。东魏荆州刺史辛纂率军出战，谁料这一次独孤如愿并没有马上与辛纂进行厮杀，而是开始了演说。

独孤如愿先前在荆州之时颇有善政，而且作战英勇，得到了当地官民的拥戴。辛纂开城门出战时，独孤如愿就在阵前演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得荆州的官民们纷纷临阵倒戈，辛纂的军队也随之溃散。独孤如愿一看形势有利，马上号令三军进攻，辛纂大败，往荆州城门逃窜。他进了城门后，门还没有关闭时，独孤如愿手下的都督杨忠催马向前，将辛纂斩于荆州城下。接下来，独孤如愿数战数捷，从东魏手中夺回了荆州。因为这一功劳，独孤如愿被提升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失去了荆州，高欢十分恼怒，马上令自己手中的王牌——汉人将领高昂（字敖曹）与胡人将领侯景率大军围攻荆州。高昂与侯景都勇猛善战，而且经验丰富，用兵如神。独孤如愿因寡不敌众，在抵抗了一阵之后便率部南逃，暂时归附梁武帝萧衍。

在梁朝暂住了三年，梁武帝才同意独孤如愿返回西魏。在他返回北方之

前，梁武帝问他：你的父母在东魏，你这次回去是投奔东魏，还是投奔西魏？

这是看似关心的试探。此时东魏、西魏与梁的“后三国”关系十分微妙，梁武帝不得不为自己考虑。虽然独孤如愿一个人的去就可能不会影响全局，但他的选择可以代表一批北方将领对时局的看法，也可能会影响其他人——尽管独孤如愿对魏孝武帝十分忠诚，但当年徐庶不也是为了母亲而归顺曹操吗？事实上，梁武帝的忧虑也并非空穴来风，后来侯景向梁朝请降时，东魏的著名文人魏收就在檄文中诈称独孤信虽然身在西魏，但实际是东魏的内应，用以恐吓梁武帝。当然，这是后话，此处先按下不表。



面对梁武帝的试探，独孤如愿的回答非常简单：事君无二。这句话表明他以忠君为先，把孝道放在忠君之下。他作出这样的回答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当年魏孝武帝败退关中时，他也是抛下家人前去投奔的。

梁武帝听了独孤如愿的回答，半是感动半是放心，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送别仪式。

西魏大统三年（537）秋，独孤如愿终于回到了西魏的都城长安。只不过，当年他效忠的魏孝武帝已经在三年前的冬天被鸩杀，现在的天子已是西魏文帝。在南朝蛰居三年的独孤如愿觉得自己有愧于朝廷——既没有在沙场上为国捐躯，也没有像苏武一般身陷敌营而不改志向，所以便上表请罪。魏文帝自己并没有作出裁断，而是让尚书们商议此事。

试想，如果独孤如愿回到长安时魏孝武帝还在世的话，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由尚书们集体商议后作出决议的过程？很可能是不用的。魏孝武帝对于自己的追随者往往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而独孤如愿显然是获得他信任的武将。而独孤如愿最初肯抛弃家人去投奔魏孝武帝，除了利益的权衡之外，这位北魏一统时代的末代皇帝那种刚强的性格、爱憎分明的态度无疑也是令独孤如愿心动的。然而，物是人非，那位令独孤如愿有惺惺相惜之感、具有个人魅力但在政治上十分失败的皇帝已经去世，往昔的荣宠也一去不复返了。

五、关西的多余人

独孤如愿离开萧梁政权回归西魏，就如一块石子敲破冰冻的湖面，并激起浮冰下的水花。

当时的西魏政权，虽然魏文帝是形式上的皇帝，但一切军国大事都需要经过宇文泰定夺。魏文帝并不是刚烈的魏孝武帝，但他也不愿做一个提线木偶。因此，在外人看来，西魏政权就像覆盖了冰层的河流，是浑然一体的整个冰面；然而，冰面下面的暗流涌动，只有内部的人才心知肚明。

独孤如愿回归之事，正好可以投石问路。魏文帝想试探宇文泰对此事的态度，又不愿公开询问宇文泰，所以他想到让尚书们商议此事。对魏文帝来说，他显然不愿轻易表露自己对独孤如愿的态度，因为他深知独孤如愿是先帝——被宇文泰用鸩酒毒死的魏孝武帝——信任的武将，是追随先帝到关西的忠臣。换句话说，是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可是，宇文泰横在中间，他是不希望魏文帝和那些忠于皇室的人走得太近的。魏文帝觉得，自己如果马上赦免独孤如愿，无异于打草惊蛇，日后要想和宇文泰争夺国家的控制权，恐怕就非常之难了。所以，他扣住自己的底牌，将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交给尚书们去商议。

但是他忽视了独孤如愿的感受。独孤如愿对此会有如何的反应？等待、无奈、悲哀，都有可能，但面对自己选择的命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国家有疑难，让尚书们商议，是原有的制度规定，所以魏文帝这一招显得不露声色。然而，宇文泰并没有接招。他没有干涉这件事，他甚至不关心这件事——朝廷和军队的控制权都在自己手里，一个独孤如愿又能带来多大的变数呢？

最后的结果，是尚书们一致认为独孤如愿虽然因兵败寄居南朝，但没有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而且他也是出于无奈，所以不但应该赦免他战败之罪，还应该官复原职。魏文帝于是顺水推舟，下诏恢复独孤如愿的官爵，并授予侍中、开府之职。

刚刚回到西魏，独孤如愿就投入了战斗。他跟随宇文泰出征，在沙苑与东魏鏖战，打退了高欢亲自率领的东魏军队。魏文帝对参与作战的将士们进行封赏，独孤如愿晋封为河内郡公，封邑增加到两千户。

此次出征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战争过后，他在战俘营中发现了一位久别的亲戚。这位亲戚和独孤如愿的父母都居住在东魏。二人相见，独孤如愿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世。为人子女却不能为父母送终，让独孤如愿悔恨、悲伤，他马上辞职为父亲发丧守孝。服丧过后，他又随军出征，参加了几次大

的战役。大统六年（540），在打退了东魏大将侯景对荆州的进攻之后，独孤如愿又被任命为大使，对荆州地区进行安抚。荆州的百姓见到久别的“独孤郎”，在荆州走过麦城的独孤如愿故地重游，都有无限的感慨。

安抚荆州的工作完成之后，他被任命为陇右（即陇西）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陇右十州是西魏政权的大后方，因此保持这片地区的安定是重中之重。独孤如愿显然是受到了西魏朝廷的信任，加之他战功赫赫，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

也许有人会疑惑，独孤如愿与宇文泰之间不是有隔阂么，为什么宇文泰控制的西魏朝廷还会将如此重要的陇右地区交给独孤如愿来管理呢？这正是宇文泰的高明之处。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会因为一个人与自己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而轻易地将此人一笔抹杀，对于政治家来说，“喜欢”和“需要”是两回事——一个人有能力，比如独孤如愿，那么就“需要”他，但是作为执政者，宇文泰因为先前的事情，并不“喜欢”他。所以，对于独孤如愿，宇文泰让他施展自己的才干，只要他不触碰宇文泰的底线，不损害宇文泰的利益，就能相安无事。



宇文泰的底线，就是大权独揽，成为西魏实际上的独裁者。显然，独孤如愿归国以后并没有在这方面对宇文泰进行挑战，也没有质疑宇文泰的权威，因此，宇文泰需要独孤如愿。

在陇右地区，独孤如愿让世人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并不仅仅是疆场上骁勇善战的武夫，更是治理地方的能臣。他就任秦州刺史后，一扫过去地方官贪渎、昏庸的习气，处理长期搁置的案件，鼓励人民进行农业生产，整肃了地方风气，同时发展了地方经济，让秦州百姓的生活殷实起来。因为有这样的政绩，有数万户流民表示愿意归附。

数万户流民的归附请求意味着什么？北魏末年，由于政治腐败、盘剥的加重，再加上连年的战乱，很多百姓都背井离乡，或是逃到没有遭遇战事之处，或是隐居山林、寺院之中，为了生存，成为流民的一分子。流民是社会上的隐性成员，他们没有合法的土地与户籍，不受国家的保护，同时也不向国家承担任何义务。一旦有风吹草动，流民不但会影响地方经济，更可能成为叛乱分子煽动、拉拢的对象。因而，招抚流民不仅是一个让地方增加多少劳动力、增加多少纳税人口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否保证地方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的大问题。独孤如愿没有靠空头宣传来劝服流民们归附，他只是尽自己

所能，将秦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流民们觉得这里可以作为自己的安身之所。

数万户流民，假如每一户有五口人，那么就将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流亡人口。招抚、吸纳了他们，相当于为西魏拆除了陇右大后方最危险的定时炸弹。

宇文泰对独孤如愿的成绩十分赞许。当然，他也愿意和独孤如愿交好。现在手握陇右十州，独孤如愿已经成为西魏的地方实权派，宇文泰自然希望他与自己同心同德。因为独孤如愿在陇右地区靠信义争取百姓的支持，宇文泰便为他赐名“信”。从此，独孤如愿就变成了独孤信。

然而，宇文泰对他的赞许，仅限于对他成绩的肯定，并不包括对他这个人的全盘认可。或者说，宇文泰只是刚刚开始在情感上接受独孤信，而不是把他当做可以放心的自己人。

独孤信在陇右十几年，曾上表要求返回朝廷，但宇文泰都没有批准。其间有东魏来人通知他，他的母亲已经过世。独孤信只能身着丧服遥祭亡母。当时正赶上宇文泰陪同西魏皇太子巡视北方，顺路来慰问独孤信。独孤信当面陈说了母亲去世，自己想解职服丧的愿望，也没有被允许。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宇文泰对他的信任，认为他镇守陇右责任重大，不能轻易换别人前去，不过这只是托词而已。以常理度之，陇右属于后方，而东部、东南部的州镇属于前方，在那样一个战事频发的年代，镇守之地离前线越近，就越是可能立大功、加官晋爵，而镇守后方者往往不容易有突出的成绩。事实上，与杨忠、李虎等新崛起的将领相比，独孤信的战绩在西魏还真排不到第一流。

镇守陇右地区期间，独孤信还参与了西魏与东魏之间的几次大战，也平定了几次陇右地区爆发的叛乱。靠着这些功劳，他被封为大司马、柱国大将军，几个儿子也借着他的功劳获得爵位，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点补偿。

“柱国大将军”是西魏时期极高的军事级别，在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550）之前，被授予这一职位的只有八个人。这八个人中，一个是西魏实际上的统治者宇文泰，另一个是西魏的皇室、广陵王元欣。在另外的六个人中，独孤信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说明在宇文泰的心目中，他是举足轻重的。所谓“八柱国之家”，从西魏直到唐初，都是极高的门第，相当于山东第一等的门阀崔、卢、李、郑、王。

这么举足轻重的一个人，偏偏是宇文泰不放心的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独孤信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东魏武定五年（547），高欢去世，镇守河南的大将侯景随即发动叛乱。在与东魏作战后，侯景失利，最终投靠了南朝的萧梁政权。在侯景向梁武帝求降时，东魏为了威胁梁朝，由魏收起草了檄文，希望梁武帝能够将是否接收侯景的问题看成两国之间是战是和、是友是敌的严肃问题。其中，魏收提到，独孤信据守陇右，虽然名义上是西魏臣子，但他却不听宇文泰的号令，因为他是东魏的内应，东魏一旦与梁朝开战，由于有独孤信的暗中帮忙，可以保证“西线无战事”。这自然只是魏收虚张声势之言，但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镇守陇右多年的独孤信终于被调离，宇文泰先把他安置在河阳（今河南孟州境内），此后西魏与东魏之间有大规模战事，宇文泰都让他随军出征。到了大统十六年，独孤信终于回到朝廷，由宇文泰的侄子宇文导正式接任秦州刺史、陇右大都督等官职。

为什么魏收的檄文一出，十几年要求调回朝廷未被允许的独孤信就马上被调离陇右地区呢？在宇文泰看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独孤信毕竟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宇文泰不能做到用人不疑。而宇文泰的这个动作，也让独孤信感到十分尴尬。当然，宇文泰还是找好了台阶。独孤信回朝之后，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宇文泰宣布升任他为尚书令，是文官系统中职位最高的官员之一。等到宇文泰托古改制、创立六官制度后，独孤信又担任职位最高的六个官员之一——夏官大司马。从表面上看，独孤信的地位越来越高，官职也越做越大，但他却并不处于权力核心。

六、晚景凄凉哀荣盛

作为“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让宇文泰觉得很不舒服。论武功，论才能，独孤信都是一流的，但是他却不能像其他将领一样，对宇文泰死心塌地——这其实不怪独孤信，贺拔岳去世后关西众将向宇文泰效忠时，独孤信不是贺拔岳的部下；在魏孝武帝和高欢决裂，宇文泰作壁上观时，独孤信不是宇文泰的部下；在毒杀魏孝武帝改立魏文帝、大臣们都以宇文泰马首是瞻时，独孤信不在西魏。他素来没有表现出对宇文泰的忠诚，也没有机会接受这几次历史的考验。

但是，宇文泰还是打算给独孤信一个机会。他为自己的长子宇文毓娶了独孤信的长女为妻。宇文毓和独孤信长女成亲的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根据从北魏到隋朝的普遍成婚年龄，宇文毓最迟的成婚年龄应该是16岁，那时应该是西魏大统十六年（550），正是独孤信从陇右被调回长安之后的事情。

结成姻亲，从而成为稳固的政治联盟，这是当时惯用的一种结盟方式。宇文泰和独孤信，从此拉近了距离。而以他们为核心的“八柱国之家”以及西魏北周的上层军人阶层，正是通过互相联姻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即“关陇集团”。

让军人上层通过联姻的形式加强联系，然后让他们的子孙世代担任最重要的军事职务，是宇文泰有意推行的一种策略。在当时，东魏的力量依然强于西魏，因此，只有让西魏地区的核心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凝聚力；同样，只有结成利益联盟，让婚姻纽带将这些家族绑在一起，才能抵御东魏招抚西部人士的蚕食攻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宇文泰才与独孤信结为儿女亲家，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独孤信的四女儿和七女儿才会嫁给李昞和杨坚，因此，独孤信成为北周、隋、唐的三朝国丈，完全是时势使然。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但是，从和独孤信联姻的事情中可以看出，宇文泰是有保留的。宇文毓虽然是长子，但并非正室所生，嫡子宇文觉才是宇文泰心目中最为理想的继承人。这次联姻，总有点两汉时期用宫女冒充公主与匈奴和亲的味道——巧的是，独孤信就是匈奴的后裔。

当时，宇文毓因为年长，已经在大臣中树立了威信，而宇文觉年纪尚幼，根基不稳。如果仅仅是要确立宇文觉作为继承人的合法地位，对于老练深沉的宇文泰来说绝非难事，但其中的另一层关系让他心生疑虑：因为对独孤信的一贯猜疑，宇文泰唯恐独孤信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做手脚，扶植自己的女婿宇文毓，从而以外戚的身份控制宇文毓，危及宇文氏的统治。过了这么多年，宇文泰对独孤信的猜疑简直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只能说，这变成了他的一种本能的行为。

为此，宇文泰专门为独孤信安排了一出好戏。

一次，宇文泰与公卿大臣们议论政事，说到了确立继承人的问题。宇文泰面露难色，公开表示自己想要立嫡子宇文觉为接班人，可是又怕大司马

（也就是独孤信）有想法，征询大家的意见。

当时，独孤信就在座中，面对宇文泰的这番话，他作何反应？史书中没有记载。他真的对继承人问题有想法吗？可以说，他不可能没有任何想法，以个人利益来考虑，他当然更希望自己的女婿宇文毓成为宇文泰的接班人，但他并非以此为终极目的来为女儿挑选夫婿——否则，另外的两个女婿——李昞与杨坚在当时又不是第一流的权臣或权臣之后，为何他要作出那样的选择？

宇文泰的一番话，不啻于公开表示了独孤信不支持宇文觉，即便独孤信确实对宇文觉没有恶感，这番话也足以让拥护宇文觉的人对独孤信不满。宇文泰巧妙地将自己对独孤信的猜忌转化为继承人问题上的立场不同，又成功地为独孤信树立了敌人。独孤信那俊美的面庞上，也许此时会出现惶惑的表情，而这，正是宇文泰希望看到的。

这一刻，出现了僵局。一面是位高权重、只手遮天的权臣宇文泰，一面是久负盛名、风流倜傥的“独孤郎”，一对儿女亲家，此时却被硬生生划成了两个山头、两种势力。群臣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应宇文泰。



就在这时，功勋卓著的尚书左仆射李远朗声答道：“确立继承人当然要立嫡而不立长，这是《礼经》里明确指出的重要原则。立宇文觉为继承人，根本不需要畏首畏尾。如果您真觉得独孤信是这个问题上的绊脚石，那我请求您马上斩杀独孤信，以绝后患！”说罢，李远拔刀出鞘，起身向前，似乎真的要给独孤信来个血溅五步的突袭。

宇文泰看到李远的表态，十分满意，便也连忙起身，对李远说：“不要冲动，为什么要这样说独孤公呢？”宇文泰也不希望独孤信真的被杀，因为独孤信镇守陇右地区十几年，威望极高，如果没有适当的理由而除掉他，恐怕会失去人心。

到了这一刻，独孤信也不能保持缄默了。他只能在群臣面前表示自己并没有反对宇文觉的心思，更不会为了支持自己的女婿宇文毓而破坏嫡长子继承制。这番当众表态结束之后，李远才收起杀气腾腾的架势。然而经过他这么一闹，大臣们也都纷纷跟风表态，支持宇文觉为继承人。

事后，李远向独孤信赔礼，说是为了大计不得不出此下策。独孤信又能说什么呢？只得客套地说：“今天全是靠着您，大计才定下来啊。”

事实上，宇文泰不仅逼迫独孤信在众人面前作出保证，而且还当场确立

了宇文觉的继承人地位，把一个本来依靠领袖意志、暗箱操作来完成的工作摆到台前，让所有当事人都无法反悔，更是让任何人都不能在暗地里做手脚。这一石三鸟的计策，是宇文泰一生权谋的精华所在，而他之所以使用这样的手腕，主要还是为了防范独孤信。

宇文泰去世后，宇文觉就顺理成章地以继承人的身份，在宇文护等人的辅佐下改朝换代，建立北周。独孤信因为是前朝老臣，所以被封为太保、大宗伯，封卫国公。当权位上升到最高峰的时候，他的一生也即将终结。

此时，掌握大权的晋公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少年时便跟随宇文泰东征西讨，对宇文泰的忠诚无可置疑。正因此，宇文泰也早有将儿子们托付给他的心思。所以，宇文泰刚刚去世，宇文护就推翻了西魏王朝，把宇文觉抬上了皇帝的宝座，然后只手遮天，号令天下。

宇文护其人本质不坏，但头脑有些简单，最大的问题是思考方式过于直接，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虽然是宇文氏子弟，但军功、名望都和那些老臣无法相比，要论韬略与口才，也远远不如老臣们。所以，他在执行自己的意志时，便采取了非常手段。他专横独断，很少与人商议，也很少采纳大臣们的意见，如果私下议论政策的得失，他还要采取高压手段震慑反对者。

老臣们对宇文护的做法十分反感，他们觉得，西魏的江山是他们和宇文泰一起打下的，现在宇文泰去世了，他的子孙做皇帝，他们不反对，宇文护作为宇文泰的侄子，身居高位，他们也不反对。但是宇文护凌驾于老臣之上，重大决策都不和他们商量，还因为老臣们提出不同意见而对他们进行打击，绝对难以忍受。

老臣们对宇文护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甚至有人采取了极端手段。当初拥护宇文泰继承贺拔岳武装的赵贵就是这样的人。赵贵受到宇文护的排挤，十分不满，想要推翻宇文护的统治，然后让真正的北周皇帝宇文觉亲政，希望他给老臣们更多的政治特权与实权。

虽然赵贵在当年叱咤一时，甚至宇文泰都要借助他的力量才能控制关西，但此一时彼一时，而今大权集中在宇文护及其拥护者手中，赵贵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孤掌难鸣，便想要与独孤信一同起事。

在这件事中，究竟是赵贵去说服独孤信一同参与，还是最初他们就共同谋划，史书上的记载非常模糊。有一处记载说“（赵贵）乃与信谋杀护”，似

乎表明这是两个人的共同计划，但从事发后宇文护对二人的处治来看，记载是“（独孤）信以同谋坐免”，又像是赵贵为主谋、独孤信是从犯。究竟真相如何，今人已经很难得知。

制订好除掉宇文护的计划之后，到了约定的日期，赵贵已经打算动手，但独孤信却劝赵贵放弃这个计划。可是，他们的密谋被人探知，开府（西魏、北周府兵制中的职务，地位仅次于“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共设二十四员）宇文盛将此事告发，赵贵因此被杀，独孤信也被免官。

独孤信为什么要阻止赵贵对宇文护动手？是投鼠忌器、怕事件扩大化而不可收拾，还是怕行动失败、祸及全家？因为没有记载，所以这也已经成为千古之谜了。如果我们从独孤信与赵贵两个人的性格入手来分析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独孤信比赵贵要温和、谨慎，而赵贵则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考虑问题不够全面。从宇文护对待反对者的态度来看，一旦有人想要通过各种形式对他进行废黜、弹劾、刺杀，他都会予以疯狂的反击，而且他执政期间先后发生过几次遇刺或阴谋废黜之事，但无一成功。后来北周武帝宇文邕靠着韬光养晦，才让宇文护放松了警惕，用巧计将其除掉。

独孤信在高层中长期处于不尴不尬的位置，因此面对问题时常常先考虑自保，再考虑进取，这也许是他反对赵贵下手的一个原因。刺杀宇文护的成功率微乎其微，让独孤信不愿冒险；宇文护报复敌对者的疯狂，也是独孤信不愿见到的。

但宇文护并没有因为独孤信劝阻赵贵之事而将他放过。不久以后，宇文护还是不放心，想要除掉独孤信，但因为独孤信威望甚高，宇文护不想将此事公开化——一位有威望、有功勋的老臣反对自己，这说明自己的品德和才能不够啊！最终，宇文护逼迫独孤信在家中自尽。直到隋文帝杨坚——独孤信的小女婿——登基称帝之后，才对独孤信进行隆重的追赠。

依靠女婿，独孤信才得以获得死后的哀荣。莫非在古代，人情就真的胜过理与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独孤信的被平反，并不一定要依赖于杨坚，但如果没有杨坚，作为政治失败者的独孤信未必会被追赠很多官爵、很美好的谥号。唐人的牢骚“不重生男重生女”看来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但是，不是说多生女孩、将女孩送入豪门，就会真的让自己的家族飞黄腾达。且不说唐玄宗时代的杨氏家族，就以独孤信家族的情况而言，独孤信



之所以成为“三朝国丈”，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西部统治上层的封闭性与薄弱性。

宇文泰采用军事高层内部通婚的策略，将原来靠义气、隶属关系形成的政治团体转变成依靠婚姻关系联结起来的亲族，这是其高明之处。与此相配套，宇文泰还采取了胡人一律恢复祖先姓氏、废除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他们所改的汉姓等策略，让旧有的鲜卑部落习俗在西部复兴，所有的兵卒都是领兵大将的“部落兵”，连姓氏都要和主将一致。

通过这些改革，宇文泰成功地提高了西魏内部的凝聚力，让所有人都为了西魏的富强、战胜东魏的目标而努力，西魏也就是这样起步腾飞，成为强大的军事帝国的。但是当隋唐帝国建立之后，宇文泰推行的这些政策，都先后被放弃，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政策不适合在全国统一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统治。

关陇集团本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中寻找联姻对象，而且最好还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对象，选择余地自然很小。另外，由于关陇集团内部对军事权的绝对控制，所以朝政主宰者基本都出于这个集团中最有实力的家族。杨坚以外戚身份把持朝政、改朝换代，李渊也以皇室姻亲身份镇守太原、伺机起兵，而处于这个统治集团之外的人士尽管也会暂时占据天时、地利，却无法成功，这正是北朝到隋唐之间政治变迁的特色。

因此，独孤信女儿所嫁的人家，建立了三个王朝，这不是独孤信的眼光有多独到，也不是独孤信的命运有多好，可以说，这简直是个没有太大悬念的结果。关陇集团内部，不是宇文氏掌权，就是其他的权势家族崛起，这些家族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一荣俱荣，即使独孤信的这三个女儿没有成为皇后或被追认的皇后，其他的四个女儿可能还有机会。独孤信成为三朝国丈，大抵是注定的事情。

独孤信的一生纠缠于斗争——与六镇反叛者的斗争、对关西武装领导权的斗争、魏孝武帝与高欢的斗争、东魏与西魏的斗争、宇文氏继承人的斗争、朝臣与权臣宇文护的斗争，真可谓“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然而，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最值得怀念的，并不是被搅在权力的漩涡中所经历的那些事，而是年少时的风华绝代，尽管时光如水，但“独孤郎”的风流倜傥却是水中不可磨灭的倒影。

据传，独孤信在陇右地区的秦州担任刺史期间，有一次外出行猎，黄昏时分才回城。因为长途跋涉，他的帽子略微侧向一边，而他没有发觉。就是这无意的“侧帽”，在秦州百姓看来却更添独孤信的风雅，以至于第二天清晨时，州城内所有戴着帽子出行的人都模仿独孤信前一日的造型，纷纷将帽子侧向一边。

模仿一个男子的造型，竟然成为一种群体行为，这和邻家东施模仿“西子捧心”的姿态相比，岂不更胜千万筹？而无论被模仿的这个人是权力场上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在百姓眼里都不重要，他们只愿意捕捉他侧帽回城的那一瞬——在他们看来，只有这一瞬，才是最真实的存在，而历史舞台的主角们，终究是“玉环飞燕皆尘土”。



高洋

——文明时代的疯癫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出现了几种怪现象，一是多次王朝更迭都采用“禅让”的形式来完成，曹魏、西晋、北齐、北周都是如此，这一现象还影响到后来的隋唐两朝；二是很多功勋卓著的霸主在世时都不会将旧王朝推翻，而要等到自己的继承人来完成这一任务，比如曹丕之于曹操、司马炎之于司马昭；三是到了这个时代的末期，很多帝王都表现出一种病态，不但身体为疾病所累，而且精神似乎也十分不正常。

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两种现象，都是因为当时的霸主多是依靠军事起家，虽然实力强、权力大，但不足以统治整个国家，所以必须要通过一两代的经营，才能将行政系统完全控制，真正地完成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禅让”无疑是最能证明新王朝顺应天意民情的形式，所以就被频繁地使用了。相反，不这样做的王朝，往往短命，而且内乱不断，南朝的宋、齐两朝就是这样。

至于第三种现象，多半有两个原因：一是南北朝后期局势瞬息万变，从军阀转变为皇帝的枭雄们精神上往往紧张害怕，撑不住，于是要靠杀人、赌博、淫乱等方式来释放压力；二是南北朝后期的王朝基本都过不了五十年，新王朝建立之后，拼命抹黑被推翻的旧王朝，所以旧王朝的统治者就被塑造

成无恶不作的妖魔了。

从这几方面来看，北齐王朝的开国皇帝高洋是在这三种现象上都体现得非常明显的一个人。在网络作为信息主要传递平台的今日，花边新闻往往最能吸引眼球，所以高洋再次被描绘成一个疯癫者和色情狂。

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当代的悲哀。

一、前传之一：霸业的缔造者

高洋并非一个白手打天下的布衣天子，而是继承了其父高欢和其兄高澄的事业。要了解高洋，就必须了解高欢和高澄；要了解高洋建立的北齐王朝，就必须了解高欢与高澄控制的东魏政权。

高欢在北魏孝文帝末年出生于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因为他的祖父高谧在北魏朝廷任职时犯法而被流放到此地，从此便在这里安家。其家族据说出自河北大族渤海高氏，但史学家们对此多有怀疑。有些史学家认为高欢家族本来就是鲜卑人，后来改姓高；也有史学家认为其家族是归顺北魏的高丽人；当然，有的学者坚持认为他们就是出自渤海高氏的汉人。究竟高氏出自何方，是什么种族，已经无法考证清楚。北朝时代，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未解之谜留给后人。

高欢家族迁徙到怀朔镇之后，可以说家境每况愈下，其父高树为人性情率直，不喜欢从事生产，只喜欢与人结交。朋友倒是认识了不少，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差。高欢出生时，其母韩氏因难产而去世，所以他是在姐夫尉景家里长大的。因为高氏迁徙到怀朔镇已经几代，被当地民风所染，生活习惯也和当地的鲜卑人一样。

高欢长大以后，他的家境已经非常窘迫，要靠高欢加入当地军队任职才能维持生计。但是高欢似乎并没有因生活而困扰，他性格深沉，颇有器量，还遗传了其父仗义疏财的作风，成为当地豪侠们的领袖。

当时已经是北魏后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已经被汉文化所感染，以读书为荣、习武为耻，只有北部边境地区还保留着任侠的民风，因此六镇英雄们才能在北魏末年大乱中脱颖而出。高欢在生活拮据时依然呼朋唤友，大有汉高祖刘邦的风格，也许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日后将会成为北中国东部的主人，而他所率领的一批文武大臣，有很多就是当年的玩伴。



高欢的生活贫困到什么程度？作为有尚武之风的边境男子，他甚至没有一匹属于自己的战马，一直到娶了妻子娄氏之后才有了坐骑。娄氏的家族是当地的豪强，她也有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名字：昭君。因为家境殷实，而且她本人聪明过人，所以当地的大族都来上门提亲，可她就是不同意。直到有一天，她在城中游玩，看到城楼上站岗值班的高欢，才惊呼："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丈夫啊！"接下来的故事有点像唐代传奇小说的风格：娄昭君派自己的贴身婢女去向高欢表白她的心意，并将自己的私房钱偷偷送给高欢，让他来求亲。

娄昭君不仅慧眼识英雄，俨然红拂女看中李靖，而且对高欢确实有情有义，高欢在怀朔镇从军时，曾经有一次被长官责罚，后背被打得皮开肉绽，娄昭君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照顾得无微不至。

因为娶了娄昭君，高欢有了战马，他在军队中的身份马上提升，担任了军中的小头目。由此也可看出北魏对六镇地区的军人已经忽视到了无视的地步，连作战所用的军马都需要他们自备。

后来，高欢转职做了信使，经常往来于怀朔镇与中原之间，因此也增加了许多见闻，对时局也有了很多了解。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高欢去洛阳送信，回乡之后就散尽家财结交地方的豪杰。亲友们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把刚刚好起来的小日子折腾得一无所有，高欢回答说："我这次到洛阳，见到守卫京城的羽林、虎贲卫士们集合起来焚烧领军张彝的家，朝廷怕他们闹出更大的乱子而不予追究。现在既然可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未来肯定更加不可收拾。难道我们还能奢望守住个人的那一点财产吗？"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高欢的眼光和决断能力。神龟二年距离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和中原动荡还有五年左右的时间，而高欢就能根据自己对边境和洛阳局势的判断，清楚地认识到北魏将要发生大的灾难，可谓有先见之明。

作为一个乱世英雄，只有清醒的头脑还不够，关键还要有魄力。他刚刚脱贫不久，就再次散尽家财，根本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这也是常人做不到的。

高欢从此开始为那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做准备，他和怀朔镇的一些军事干将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批人包括云中人司马子如、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另外，他和怀朔镇的户曹史（地方上负责户口管理的官员）孙腾、外兵曹史（地方上负责军事管理的官员）侯景也十分友善。这样一批

人，就是高欢日后建立自己武装的核心力量。

魏孝明帝孝昌元年（525），随着六镇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柔玄镇（今河北张家口尚义）人杜洛周也在上谷郡起兵，高欢觉得时候终于到了，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去投奔。他们去投奔杜洛周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一个将军、元帅，而是为了找机会将这支军队据为己有。当时，高欢就与亲信尉景、段荣、蔡儁等密谋杀掉杜洛周，但是计划失败，反而被杜洛周追杀。

高欢是带着家眷去投靠杜洛周的，所以逃亡时也要带上他们。当时他的长子高澄和后来做了魏孝武帝皇后的长女还十分年幼，他们的母亲娄昭君就骑在牛背上抱着他们。因为颠簸，高澄总是从牛背上摔下去，这样就影响了众人的逃亡速度。高欢为保住众人的性命，便张弓搭箭想要射死高澄，幸亏段荣将高澄一把抱起带在怀中，否则北朝的历史上将会少一位青年霸主。——这也颇类汉高祖刘邦的做派，当初刘邦逃跑时就因怕连累自己跑不快，几次将儿子推下车去。

为了生存，高欢先投奔了当时实力强大的义军领袖葛荣，后来又因为好友刘贵的引荐，到秀容川投奔了尔朱荣。当时尔朱荣也准备凭借自己的军力控制洛阳朝廷，所以二人见面之后，高欢就极力劝说尔朱荣肃清当时临朝听政的胡太后势力，尔朱荣因此对他十分赏识。从此以后，高欢就经常参加尔朱荣的秘密军事会议，还被尔朱荣任命为亲信都督。

此时魏孝明帝与胡太后之间的母子矛盾已经非常激烈，孝明帝怨恨郑俨、徐纥等人靠着胡太后的势力而扰乱朝政，但又不敢处治他们，便私下与尔朱荣联系，让他带兵进入洛阳“清君侧”。尔朱荣于是任命高欢为前锋，向洛阳进发。兵至上党时，孝明帝又下了密诏让尔朱荣停止进军。后来孝明帝突然驾崩，尔朱荣拥立孝庄帝元子攸，控制了洛阳。高欢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在河阴之变时就鼓动尔朱荣篡位称帝，遭到尔朱荣的其他部将反对，贺拔岳甚至请求尔朱荣杀掉高欢以杜绝谗言。但在高欢等人的鼓吹之下，尔朱荣已经有所动心，虽然此事后来没有落实，不过尔朱荣也因此对高欢另眼相看。而高欢也看到尔朱荣手下对他的孤立，便开始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

后来，高欢跟随尔朱荣出征，立下不少战功，尔朱荣对他更加满意。当时，尔朱荣手下的很多人都以贺拔岳作为领袖，因此贺拔岳成了尔朱荣集团中的小头目。尔朱荣对此十分担心，所以他开始树立高欢的地位，经常让他在身边参加所有机密大事的讨论，试图瓦解围绕着贺拔岳建立起来的小



团体。

有一次，尔朱荣想要试探手下众将的心意，就问："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谁能统领我的军队？"当时尔朱荣不过三十几岁，而且北魏境内的强敌基本已经被消灭，他在战场上牺牲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大多数人都看得出这是一个试探。尽管很多人都拥戴贺拔岳，但他们嘴上却说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最适合继承尔朱荣的事业。尔朱荣不以为然，因为谁都看得出尔朱兆只有匹夫之勇，而没有政治能力。众将的这个回答，只能说明他们在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尔朱荣想再次警告贺拔岳一党，便说："尔朱兆也就能率领三千人回到秀容川去罢了。真正能够代替我统领大军的，只有贺六浑。"

"贺六浑"是高欢的鲜卑名，因为他生活在怀朔镇，当地保留了拓跋鲜卑早期的习俗，常以鲜卑名作为正式称谓，就像今天国人动辄起一个"亨利"、"比尔"的外国名字一样。后来的史官为了掩盖这一事实，便说高欢是正宗的汉人，字"贺六浑"，真是为了美化帝王而煞费苦心。

同时，尔朱荣还告诫尔朱兆："你不是贺六浑的对手，将来恐怕要成为他家的奴仆。"尔朱荣的这些话，半真半假，真的部分是他对高欢才能的肯定，假的则是借告诫尔朱兆对贺拔岳等人提出警告。当时尔朱氏众人中，尔朱兆和尔朱天光以武力知名，尔朱世隆以韬略见长，但都并非出类拔萃，所以拥戴贺拔岳的人便认为，只要胜过尔朱氏子弟就能掌握大权。尔朱荣无疑是在告诫他们，高欢比你们高明得多，你们真想夺取天下，胜过我的子侄并不难，难的是过高欢这一关。尔朱荣这样故意制造属下的矛盾，为的是保证自己对大局的控制，不过，后来贺拔岳一党果然和高欢反目成仇，并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其后，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所杀，尔朱兆打算从晋阳起兵攻打洛阳，召高欢一同前往。高欢派手下的长史孙腾到晋阳回复说，自己统辖区域内的绛蜀、汾胡想要造反，所以不能擅离驻地。尔朱兆因此对高欢心生怨恨，但高欢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尔朱氏控制朝廷，已经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所以才会有尔朱荣被杀的事情发生。现在尔朱兆又要兴兵作乱，必将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自己不但不能与之同流合污，而且还要及早与之划清界限，自立门户。

尔朱兆顺利攻占了北魏都城洛阳后，将孝庄帝挟持到尔朱氏的军事中心晋阳。高欢闻讯大惊，因为他知道控制了皇帝就相当于控制了发布命令的权

力，尔朱兆这个头脑简单的人如果利用孝庄帝的名义讨伐自己，又将如何应对呢？冷静了片刻，高欢决定派孙腾假装去恭贺尔朱兆，趁机暗中观察孝庄帝的住处，打算暗中将孝庄帝劫走，然后与尔朱氏公开决裂。可是孙腾到了晋阳，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好在尔朱兆是个被感情牵着走的人，他十分痛恨孝庄帝杀死尔朱荣的行为，因此忽视了孝庄帝的利用价值。他将孝庄帝拘禁起来，非打即骂。高欢于是改变策略，写信劝尔朱兆释放孝庄帝，可尔朱兆根本不理，反而将孝庄帝杀死，并与尔朱世隆等人立长广王元晔为帝。

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尔朱荣死后，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本来就出现了分化，尔朱兆的无知与暴虐，更加速了这一分化。但此时大家都不愿主动与尔朱氏闹翻，只因为尔朱兆手握重兵，所以都在静待时机。

高欢也是如此。他假意表示效忠尔朱氏，还在晋阳遭遇进攻时出兵援助，尔朱兆因此对他十分感激，发誓与他结为兄弟之好——我们经常在史书中看到尔朱兆这样的人物，一腔热血、一身武艺，但是对政治一窍不通。

当时，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控制了洛阳朝廷，尔朱天光占据关西，尔朱兆占据晋阳附近的北部地区，尔朱仲远占据东郡，尔朱氏已经成了北魏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仗恃自己手中的武力横行霸道，民间苦不堪言。高欢心中却暗自高兴，人民受尔朱氏的欺压越重，他的春天来得越快。

机会终于等到了。当年尔朱荣生擒葛荣之后，将其军队遣散，这些散兵游勇分成几股，在中原地区流亡，其中滞留在并、肆二州的葛荣余部就有二十余万人。在尔朱氏的高压统治下，他们难以生活，发生大小叛乱二十六次，被杀者过半，其余人依然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尔朱兆将他们视为大患，便向高欢咨询应该如何处理。高欢回答说：“应该选太原王（即尔朱荣）的亲信去招抚他们，如果他们作乱，就责罚他们的首领。”尔朱兆认为此计甚妙，便派高欢前去招抚这些葛荣余党。高欢连夜出发，很快就招抚了这批流民。

葛荣余部之所以会被高欢招抚，史书中说是因为他们向来厌恶尔朱兆而喜欢高欢，实际上不完全对。其实是因为高欢曾经投靠过葛荣，这些将士以前可能见过或听过高欢的名字，因此他们觉得高欢是自己人，自然感觉亲切。相比之下，虽然尔朱荣生擒葛荣之后，对其部下采取了安抚政策，让他们返回乡里，但是尔朱荣死后，目光短浅的尔朱兆等人却对他们穷追猛打，这才让他们对尔朱氏产生仇视情绪。因此，“向来厌恶”云云，并不成立。



高欢想要做的，并不仅仅是为尔朱氏解决治安问题，他是要将葛荣余部全部招到自己的麾下，将他们转化成正规军，给他们粮饷。这批来自六镇地区的流民为生计所困才落草为寇，听说高欢不但不打算追究他们的罪过，反而要优待他们，自然愿意投降。

得到了葛荣余部将近十万人，高欢赚得了他的第一桶金。接下来，他又以并州、肆州连年发生霜冻和旱灾的理由派刘贵去请示尔朱兆，请求将新收编的葛荣余部带到太行山以东去谋生。尔朱荣的远房表弟慕容绍宗极力反对，但精明的高欢早已事先贿赂了尔朱兆身边的人，让他们诋毁慕容绍宗是寻隙报复，所以尔朱兆还是同意了高欢的请求。

不过，素来办事滴水不漏的高欢这一次却节外生枝。在赶赴山东地区的途中，他遇到了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郡长公主，他不但不以礼相待，反而劫走了这位原来的主母带着的三百匹马。尔朱兆闻讯，觉得高欢此举非常可疑，便亲自前去追赶。结果，二人相遇，高欢巧舌如簧，骗过了尔朱兆，尔朱兆感觉非常过意不去，便向高欢请罪，二人再次对天盟誓，结为兄弟。

高欢的计划是到达大族集中的河北地区，与汉人豪强联合，起兵推翻尔朱氏的统治。因此，他强调军纪，秋毫无犯，赢得了当地官民的信任。尔朱兆得知高欢的真正意图后，便与他决裂了。

公元 531 年，对北魏王朝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首先，尔朱氏内部出现了分裂，尔朱世隆等人在洛阳改立广陵王元恭为皇帝，废黜了长广王元晔。这么大的事情，尔朱兆居然一无所知，他十分气愤，想要起兵攻打尔朱世隆。后来双方虽然和解，但彼此心中都有了解不开的疙瘩。

其次，北魏的地方势力开始反抗尔朱氏的统治。颇受尔朱荣器重的预言家刘灵助起兵自立为王，河北大族纷纷响应。他们驱赶尔朱氏派去的地方官吏，占据州县，实行自治。这说明反抗尔朱氏的星星之火已经燃起，只要将火种保存下去，就能将尔朱氏的统治烧成一片灰烬。

高欢就想搭乘河北地区反抗尔朱氏的这一班车。当时，太行山以西的中原地区基本被尔朱兆控制，而潼关以西地区则是尔朱天光和贺拔岳的天下，黄河以南的地区是北魏和南朝开战的中间地带，只有河北可以作为反抗尔朱氏的大本营。高欢诈称要攻打河北重镇信都（今河北冀州），实际上却与河

北豪强高乾、封隆之、李元忠等联络，在得到他们的支持后，高欢进入信都城，占据了冀州。

高欢在建立了信都根据地之后，并没有急于马上与尔朱氏交战，而是一面加强与当地大族豪强的联系，一面对自己招纳的这批六镇流民进行整编，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因为他知道，当时河北大族并未完全认同他，而是公推刘灵助为主，所以他要先扩充自己的实力。实力强了才能有话语权。另外，他还整顿军纪，在北魏末年军队猛于匪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禁止士兵掠夺，使当地的大族放心。当年四月，刘灵助的部队被尔朱氏击败，他本人也被杀，高欢意识到自己的出头之日到了，便开始加紧筹备起兵事宜。

善于谋略的高欢先是制造了谣言，激起他收编的葛荣余部对尔朱氏的仇恨，并将他们改编为自己的直属部队，与他们订下“不得欺侮汉人、不得违反军令”的约定，然后开始准备起兵。同年六月，高欢正式在信都起兵。尔后，李元忠与高乾斩杀了尔朱荣的叔父尔朱羽生，前来投靠高欢。

起兵之初，高欢的进展并不顺利。他上表罗列尔朱氏的罪状，结果被把持洛阳朝廷的尔朱世隆等人扣留，没有产生预期的舆论影响。后来，尔朱兆又攻陷了李元忠镇守的殷州（今河北中南部，包括赵县、高邑县、元氏县、栾城县等地），高欢所部本来高涨的士气受挫低落。



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冷静地分析局势。孙腾认为朝廷被尔朱氏把持，必须另立皇帝与之抗衡，为自己赢得号召力。高欢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当时在河北地区的渤海太守元朗立为皇帝。元朗是章武王元融之子，并不是魏孝文帝的嫡系子孙，但是当时高欢所能找到的皇族也就是他一个人了，于是改年号为“中兴”，正式与洛阳朝廷分庭抗礼。

当时尔朱度律、尔朱仲远驻军于晋阳，尔朱兆也去与他们会师，号称十万大军。高欢采纳了窦泰的计策，在尔朱氏阵营内使用反间计，先说尔朱世隆、尔朱度律等打算谋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打算与高欢合谋除掉尔朱仲远等人，使他们互相怀疑，最终尔朱度律、尔朱仲远不战而退，高欢便在广阿县击败了尔朱兆。尔后他进攻邺城，经过苦战，终于攻下了这座军事重镇。

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尔朱氏成员基本被清除，高欢顺利进入洛阳，废掉尔朱世隆所立的皇帝元恭，又废掉自己所立的元朗，改立元脩为帝，即北魏孝武帝。高欢任命自己的亲信孙腾等人在洛阳朝廷一面处理政务，一面监视孝武帝，自己则以大丞相、渤海王的身份坐镇军事中心晋阳，并将大女儿

嫁给孝武帝。这一切安排，就像当初尔朱荣对孝庄帝的控制一样。

但是，尔朱荣对孝庄帝的控制并不成功，否则他也不会死于孝庄帝之手。同样，高欢对孝武帝的控制太紧，而魏孝武帝也是一个跟孝庄帝一样的皇帝，并不甘心被高欢控制。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高欢的反对者，斛斯椿、元宝炬、元毗、魏光、王思政等人成为他的心腹。在他们的建议下，孝武帝决定利用关西的军阀贺拔岳牵制高欢。

魏孝武帝一面表现出对贺拔岳和关西将领的信任，另一方面通过斛斯椿建立一支直属于皇帝的军队，并频频出面亲自处理政事，表现出了与高欢唱对台戏的姿态。而高欢派到洛阳去分管各项事务的封隆之、孙腾、娄昭等人则因各种原因没有尽到监视魏孝武帝的责任。

随后，魏孝武帝开始对人事安排动手，他杀掉了河北大族的代表人物司空高乾，并打算除掉高乾的几个兄弟。这个举动，让河北大族十分愤怒，他们因此自觉地站在高欢一边，与孝武帝对抗。以此为导火线，高欢与孝武帝都调动了各自掌握的军队。孝武帝本想借助贺拔岳的兵力，可是贺拔岳被关西的另外一个军阀侯莫陈悦所杀。贺拔岳的部下宇文泰接管了贺拔岳的势力范围，但根基未稳，所以没有给孝武帝实质性的帮助。高欢大军到达洛阳城外，孝武帝的军队一战即溃，无奈之下，孝武帝只能出奔长安。

高欢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失去了孝武帝这个傀儡，十分不安。他一面亲自率军赶赴潼关，打算将宇文泰控制的关西地区一举拿下，一面则连发四十道文书请孝武帝回洛阳。见过了尔朱氏的败亡，高欢深知，如果不能将北魏皇权作为自己最尖锐的武器和最坚固的铠甲，即使有几十万大军，也终将被各路敌人撕得粉碎。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孝武帝回洛阳，就是因为害怕孝武帝成为宇文泰发号施令的工具，那样他将陷入被动的局面。

可是，孝武帝不但没有与高欢和解，反而在宇文泰的拥护下在长安继续做皇帝。高欢只能另立新君元善见，即魏孝静帝。两个皇帝分居东西，北魏从此也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高欢在立元善见为帝后，马上部署迁都邺城。因为北魏分裂之后，与西魏的战争注定是旷日持久的，洛阳这座旧日都城势必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此一来，此地作为都城就有欠安全。而且，邺城地处河北地区，当地的大族拥护高欢，迁都之后更加便于统治。为了保证迁都之后的繁荣，高欢还将洛阳的四十万户居民迁到邺城周边居住。

在经历了与孝武帝决裂的尴尬后，高欢认识到对皇帝的控制不能过于直接，而且也不能让自己过多地干涉行政事务。所以，他自己坐镇晋阳，并封自己为丞相，一切军国大事都由他在晋阳的大丞相府决断。他自己会不定期地从晋阳到邺城拜见东魏孝静帝，对朝廷中一些悬而未决的事务进行裁决。另外，他派长子高澄担任京畿大都督，到都城邺城去主管朝廷事务，朝廷的官员，除了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这些高欢的亲信外，都由高澄选拔有才能的汉人名士担任。

经过这样的调整，高欢与东魏孝静帝之间的关系渐渐和缓。为了保证孝静帝不会像孝武帝一样与自己反目，高欢每次从晋阳到邺城，都毕恭毕敬地拜见孝静帝；在路上与孝静帝的辇车相遇，他也要亲自下车在路旁致敬，并让自己的队伍避让。

高欢后半生最大的事情，就是经营东魏。他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个方面，就是持续不断地对西魏进行军事打击，并想尽办法将西魏的高级人才笼络过来。

在北魏分裂之初，西魏和东魏的力量对比悬殊。从领土上看，东魏占据了东部最富饶、汉人大族分布最多的区域，而且势力直逼潼关。西魏真正有效控制的，只有潼关以西的关中地区，以及陇西的部分地区，而洛阳以西到潼关的地带则为双方开战的区域。从人口和军事实力上看，东魏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北魏建国以来的军事中心——从平城到晋阳都在东魏的控制之下，而西魏由于经济实力差，所拥有的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战斗力上都远不如东魏。但是，宇文泰韬略过人，他手下的战将赵贵、独孤信等人也能征善战，在与东魏的战争中虽然未取得过大胜，但勉强也能保持不败。

高欢知道西魏不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消灭，于是就以黄河作为前线，不时对西魏进行打击。他在世期间，发动对西魏的战争大小几十次，西魏军队十分头疼。每到冬天，西魏的军队都要将黄河上的坚冰凿漏，以防东魏的骑兵渡过冰河发动进攻。

同时，高欢在军事上强调六镇军人的主体性。他以窦泰、侯景等出身六镇之人作为军事大将，凡是六镇出身者，都能在高欢的帐下得到很快的提拔。而且，高欢还对西魏宣扬自己善待鲜卑人、优待将士的立场，使得很多西魏军官偷偷地跑来投靠他。



但是，高欢强调六镇军人的地位、对军人的特别优待，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很多文武官员都贪赃枉法，高欢却视而不见。丞相府的幕僚杜弼将此事反映给高欢，高欢却回答说："我告诉你，这些事我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过问。从北魏迁都洛阳以来，奢侈腐化就已经变成官场痼疾，很少有人能够将这个风气扭转过来。现在很多武将的家属都在关西，宇文泰总是用这一点来诱惑他们。而江南那个小朝廷的皇帝萧衍总是靠制礼作乐来吸引中原士人，很多士大夫都把他当做正统。现在我如果严查贪腐问题，必将引起官场的动荡，恐怕很多武将都会投靠宇文泰，而文官都会投靠萧衍。到了那时，国将不国，你我也没有惩治贪腐的必要了。"可见，高欢不是不了解问题所在，而是考虑到当前形势才迁就大臣们。如果没有北魏的分裂，也许高欢不会听之任之。

第二个方面，是成功地将高氏家族对东魏的控制模式建立起来。

高欢之前，尔朱氏之所以败亡，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没有一套合适的控制模式。高欢在孝武帝西逃之后，痛定思痛，将高氏家族对东魏的控制模式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最高权力的控制。最高权力可以分为三类：军事指挥权、行政处理权和大政裁决权。高欢自己坐镇晋阳，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而他派家族中地位仅次于自己的直系亲属高澄到邺城统领朝廷，掌握最高行政处理权。靠着晋阳的丞相府，他能够随时从邺城获得消息，从而对国家发生的大事了如指掌。每次从晋阳到邺城，他都有行使大政裁决权的行为，而且并不给人以事事插手、高度控制朝廷的感觉。

第二部分是人员控制。尔朱氏的失败，缘于内部缺乏控制，导致派系林立。高欢集团的核心成员基本都出自怀朔镇，而且高欢通过通婚等形式与他们建立联系，并通过爵位、官职将他们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另外，他任用出身不高的人担任丞相府重要幕僚，与他们商议机密事务，一切重要命令也由他们发布，成功地将集团内人士控制在自己身旁。

第三部分是政权基础控制。东魏得以建立的基础有两部分，即河北的汉人大族和六镇的军人。他们的利益并不一致，生活习俗与文化也并不相同。因此，如何弥合二者的区别，让他们都能为自己服务，就是摆在高欢面前的大问题。高欢采取的手段是通过自己的权威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比如，对于渤海高氏的名将高昂，高欢就采取了优待的办法。平时高欢在军队中以鲜卑语发布号令，每当高昂在场时，高欢都要特意使用汉语，以示对他的尊重。

另外，高欢还通过有利于汉人的选官改革笼络汉人大族，同时他又以大丞相府为依托，为军人谋求爵位与官职。这种平衡策略，使得东魏内部的统治基础较为牢固。

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东魏营造良好的对外环境。北魏最大的敌人是北边的柔然汗国，六镇起兵的导火索就是柔然的入侵。因此，高欢决定与柔然结成军事同盟。他通过通婚、互派使节等方式，与柔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对西魏形成了牵制。尽管后来宇文泰也与柔然交好，但两国发生矛盾时，柔然依然比较倾向于帮助东魏。



就这样，在高欢的经营之下，东魏成为北魏实际上的继承人。但是，戎马一生的高欢，没有看到北魏重新统一的一天。

公元 546 年，时为东魏武定四年，高欢率领大军进攻西魏的军事重镇玉壁。西魏将领韦孝宽凭借深沟高垒，不肯出战，高欢使用了筑土山、断绝城中水源等方式进攻，但韦孝宽依然死守城池。

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但东魏军队因为高欢病重而退兵。回到晋阳之后，西魏宣传说高欢已经中箭身亡，高欢唯恐动摇军心，强支病体召见各路将领。他的身体已经如风中之烛，无法再支撑下去，但他实在不甘心。于是，他命大将斛律金唱《敕勒歌》，自己在旁边应和。

这首歌谣后来被收入《乐府歌辞》，内容非常简洁直白：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魏六镇大多在阴山附近，因此这首《敕勒歌》也是高欢儿时就非常熟悉的。此刻高欢让斛律金唱这首歌，就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数十年往事历历在目，他不禁感伤，泪流不止。

如果高欢的一生就此结束，那么这一刻无疑是悲凉且充满英雄情结的。一个从北部边境走出来的年轻人，戎马一生，临死前还唱着如此豪迈的牧歌，是怎样的一种情怀！但是，高欢还不能如此潇洒地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因为他不放心。他派次子高洋去镇守邺城，并将世子高澄从邺城召到晋

阳，作最后的交代。

在把一切重要事务交代完毕之后，高欢心力交瘁。武定五年正月初一，出现了日食。高欢说：“难道日食是因为我要死而出现的吗？那我死有何憾！”几天之后，高欢去世，世子高澄继承了大丞相之职。从此，东魏进入了高氏加紧夺权的时代。

以前每次读到曹操的遗言，总觉得他过于琐碎，不像是一代枭雄的作风。现在看来，高欢又何尝不是？他们这样的霸主，将豪情留给观赏他们表现的看客，而把内心的脆弱展现给至亲之人。不过，高欢临终前没有说到生活琐事，而是将东魏政治中的关键之处一一告诉高澄，也许，他在前台表现得太久，已经放不下身段去展现自己的柔软内心了吧。

二、前传之二：霸主的意外死亡

如果说高欢是高氏霸业的开创者，那么高澄无疑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

高澄字子惠，是高欢的长子。东魏建立之后，为了表示出辅佐皇室的诚意，高欢不但将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孝静帝，而且还为时年十二岁的高澄娶了孝静帝的姐姐冯翊长公主为妻。政治婚姻带给高澄的自然不是幸福，因此他的一生中常有猎艳行为，而且每次都危及他的生命。

高澄是一个早慧的人，十一二岁的时候行为举止就像成年人一样，而且头脑非常清楚。为了培养他做接班人，高欢经常问他朝廷政策的得失，他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此后高欢便让他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

到了十六岁的时候，高欢正式派他到邺城辅佐朝政，任命他为领左右、京畿大都督之职。当时邺城的官民只听说这位渤海王世子有过人的器度和见识，非常期待，但见到他之后非常泄气——他还是个少年。但是高澄随之而来的几项政策，却让人们见识到他的深谋远虑和果敢。

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改革官员选拔制度。

担任京畿大都督之后两年，高澄就兼任吏部尚书，主管朝廷的选官事务。北魏自从神龟年间羽林、虎贲卫士暴乱之后，就制定了“神龟停年格”，规定无论才能高下，一律按照年限授予职位，这导致了官员素质的下降，很多熬年头的碌碌之辈成为行政机构的骨干，而有才能的人却因年资不够无法得到提拔。高澄刚刚兼任吏部尚书，就刚果地修改了选官标准，将才能作为

唯一的标准。

无疑，高澄的这项改革是得到高欢支持的，也是高欢背后的汉人大族极力促成的。但是，高澄敢于以一个少年的身份推行对政坛影响如此之大的改革，也可以看出其魄力和决心。经过这一番整顿，很多汉人士族成为东魏的中坚力量，而他们对以高澄为代表的高氏家族自然也更加拥护。

改革了官员选拔标准之后，高澄又开始对行政机构开刀。当时的主要行政机构是尚书省，高澄首先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尚书郎官，又选拔了才能出众、门第高的汉人接任这些职位。在高澄的选拔过程中，当时有才能、有名气的人基本上都被推荐任命。如果有实在找不到合适职位安排的名士，高澄也不肯错过，他将这些人都招到自己的门下作为宾客，让他们以私人的身份为自己担任参谋顾问。

高澄要进行的第二项改革，就是整顿吏治。

前文说过，杜弼曾经向高欢建议惩治贪腐，而当时形势紧迫，高欢并没有答应。到了高澄在邺城主政时，形势已经允许他这样做了。高澄继续他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先从高欢的亲信开始下手。

孙腾、高隆之、高岳和司马子如都是高欢的心腹，他们在邺城担任重要职务，被称为“四贵”。孙腾官居尚书左仆射、太傅，收受贿赂如同家常便饭，而且还侵吞官府财产，以敛财为爱好，声名狼藉。司马子如、高隆之虽然不像孙腾那么严重，但也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

为了整治“四贵”的不法行为，高澄任命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负责纠察弹劾权贵豪强。另外，崔季舒、崔昂、宋游道等人也被高澄重用，他们执法严明，弹劾官员时毫不留情，果决地处理了一批贪腐官员，使朝廷的政治风气为之一变，徇私枉法之路也基本被杜绝。

应该说，整顿吏治也是在高欢的默许下进行的。高欢在一次从晋阳到邺城朝觐孝静帝的时候，就曾褒奖崔暹的刚正不阿，而曾任御史中尉的宋游道也被高欢极力褒奖。

崔暹曾经弹劾的官员有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司州牧、咸阳王元坦，尚书元羡，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殷州刺史慕容献，冀州刺史韩轨。这些人或是高欢的亲信，或是东魏的皇族，都是极有背景的人。但高澄此次整治贪腐绝非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他按照他们的罪状一律上奏孝静帝，请求将这些人免官。为此，高欢还专门写信给这些被惩处的官员，说自己不会出手对他



们进行援助，让他们服法认罪，改过自新。

另一位铁面判官宋游道也毫不逊色。高欢曾经亲自任命他为御史中尉，主管官员的监察工作。高澄整肃官场期间，宋游道虽然从御史中尉的位置上离开，改任尚书左丞，但他依然疾恶如仇，弹劾太师、咸阳王元坦，太保孙腾，尚书令司马子如，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等人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征收私税。这只是宋游道提起的一次弹劾案例，在这起大案中，除了高岳之外，“四贵”被一网打尽。

高澄组织的惩治贪腐行动对朝廷高官们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司马子如被弹劾下狱后，一夜之间居然满头黑发全部变白，可见其惊恐程度。另外，高欢的姐夫尉景也因为藏匿流民而被惩治。为了表现出对他的优待，高澄命令将他软禁在家中。尉景不领情，怒气冲冲，对崔暹说：“你回去转告高澄那小子，是不是他富贵了就想杀掉我这个姑父！”高欢听说此事，不禁落泪，要知道，高欢自幼丧母，是寄住在尉景家中才得以长大成人的。因此，高欢要求对尉景法外施恩，这也是高澄处理贪腐官员时高欢唯一一次出面干预。

高澄的这项措施也确实产生了积极效果。司马子如在被惩处之后，再次出来做官时，就已经改掉了收受贿赂的恶习，而尉景的行为也颇为收敛。尉景在高欢的亲信中是出了名的贪财。一次高欢手下的鲜卑大将库狄干和尉景一起在高欢府中做客，库狄干请求做御史中尉，高欢感觉非常意外，便问库狄干：“为什么想着要当个名望不高的官儿呢？”库狄干说：“为了捉尉景。”尉景这个连高欢的劝说也听不进的人，因为高澄的严厉措施而有所改正，可见高澄的魄力之大。

辅政之后开展的这两项工作，让高澄赚得了足够的喝彩声。但是，他毕竟是生活在高欢羽翼下的“官二代”，真正考验他的时刻还未到来，所以他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做自己想要做、时代需要他做的事情。

武定五年（547）正月，东魏霸主高欢因病去世。高澄在晋阳接管了高欢大丞相府的一切事务。而他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即将出现的分裂和战乱。

东魏的大将侯景被高欢任命为河南大行台，东魏东南地区都在侯景的管辖范围内。但侯景十分轻视高澄，他曾经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我不敢说什么，假如有一天高王去世，我可不能受高澄那个鲜卑小儿的摆布。”侯景之所以发表如此嚣张的言论，一是因为他手握重兵，河南地区都是他的

"自留地"；二是因为高澄惩治贪腐，他的名字赫然在列。虽然他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处罚，但是跋扈惯了的侯景怎么受得了这口气，他依然将高澄视为自己的敌人。

果然，高欢刚刚去世，侯景就在河南举兵叛乱。这一切都在高欢的预料之中，他临终前就向高澄交代："厍狄干是鲜卑老将，斛律金是敕勒老将，这两个人忠诚可靠，可以作为你的坚强后盾。其他将领也都跟随我多年，对我高家十分忠诚。侯景主宰河南地区多年，我能够驾驭得了他，但如果是你主持大局的话，恐怕他会产生叛逆之心。我身边的武将虽然众多，真正能够与侯景匹敌的，就只有尔朱荣的表弟慕容绍宗。我之所以一直没有重用他，就是要将他留给你。假如你对他委以重任，他必将全力报效。"

侯景叛乱之后，高澄派出几路兵马讨伐，但是侯景对他们都非常轻视，指出每个人的弱点，极尽挖苦。直到慕容绍宗率兵出征，侯景才大惊失色，问身边的人："难道高王尚在人间？否则有谁会知道世上只有慕容绍宗能够做我的对手？"

靠着慕容绍宗等将领的进攻，东魏将侯景叛乱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小。东魏收复了侯景控制下的河南大半地区，而且还打退了梁武帝萧衍派来接应侯景的部队。侯景被慕容绍宗等合力击退，逃到萧梁境内。高澄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

从此，高澄将注意力放在加紧篡夺东魏政权、自立为王这件事上。

年少成名的高澄，已经无法忍耐孝静帝这个尸位素餐的君主存在。当时，高澄刚刚二十七岁，位极人臣，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极大胜利。自入仕以来未曾遭遇大挫折的高澄不免自我膨胀，想要取代孝静帝成为东魏的主人，因此他一有机会就要侮辱孝静帝。

有一次，高澄与孝静帝一起在邺城郊外打猎，孝静帝催马疾行，将高澄甩在后面。随行的一个武将马上赶过来对孝静帝说："陛下不要跑得太快了，大将军（即高澄）生气了。"身为一国之君，还要看大臣的脸色，孝静帝的压抑可想而知。高澄的父亲高欢在世之时可是对孝静帝以礼相待的，而高澄居然如此颐指气使，孝静帝怎能不心怀怨恨。

打猎之事过去不久，高澄向孝静帝劝酒，斟了满满一大杯，表情还十分不恭敬，说："臣高澄劝陛下满饮此杯。"孝静帝气愤地说："自古以来没有国家不灭亡的，朕又何必这样活在你的控制之下！"高澄发怒，大骂："朕、



朕，狗脚朕！”他命令崔季舒打孝静帝三拳，然后自己抖了抖衣服离开宫殿。

看着孝静帝不堪受辱、精神极度颓废的样子，大臣元瑾、荀济、刘思逸、元宣洪、元大器、元徽等人密谋从宫中挖一条地道，准备用来刺杀高澄。但在开凿地道的过程中被发现，高澄竟然愤恨地当面质问孝静帝是否要“谋反”——盛怒中的高澄也许没有意识到，孝静帝才是东魏名义上的主宰，他不会自己反自己，尽管他确实要反高澄。高澄宣布要杀掉孝静帝的嫔妃们以示警告，孝静帝回答说：“大将军你自己要谋反，为什么还要诬陷我呢？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的性命豁出去了，你杀掉我身边的人根本没有用！”高澄这才觉得失言，便向孝静帝谢罪，但三天之后还是将孝静帝软禁起来，将密谋挖地道杀高澄的人全部处死。

囚禁了孝静帝，高澄更加肆无忌惮，开始与陈元康、崔季舒、杨愔等心腹商讨改朝换代的各项事宜。他们议事的场所，就在邺城北部的东柏堂。这里是高澄的私人宅院，当时高澄与东魏的琅琊公主私通，为了让琅琊公主往来不至于尴尬，高澄撤掉了所有的警卫。

不得不说，女色是高澄一生中过不去的难关。高欢在世时，高澄就曾经因为与高欢的妃子郑氏私通而惹得高欢大怒，高欢将他囚禁起来，并打算废掉他的世子之位。其母娄昭君十分担忧，便请来司马子如说情。机智的司马子如劝高欢多想想娄昭君对他的恩德与感情，高欢这才委托司马子如重新审理此事。司马子如让婢女们翻供，才使高澄得以解脱。

琅琊公主的名字叫元玉仪，是北魏高阳王元斌的庶出妹妹。因为不是正室所生，所以她的日子很不好过，曾经做过高欢的亲信孙腾的家妓。孙腾也许是不喜欢她，将她赶走了，她就此流落街头。一个偶然的机会，高澄在街头见到了元玉仪，十分喜欢，经常与她幽会。为了让她有所保障，高澄让孝静帝封她为公主。高澄对她的感情人尽皆知，偏偏高澄自己还要掩耳盗铃，所以才会撤去保卫人员，以免琅琊公主来与他私会时被外人撞见。

可是高澄的运气似乎走到了尽头。他为了与琅琊公主私会而屏退侍卫的行为，使他完全失去了庇佑。当时，东魏孝静帝想要除掉他，对他推行的政策不满的大臣想要除掉他，觊觎他地位的兄弟想要除掉他，东魏的仇敌之国西魏想要除掉他，被他施反间计而不被梁武帝重用的侯景也想除掉他。而他竟然在此时不设防地与心腹们谈论改朝换代的细节，为了避免消息走漏，他还将身边人都打发走，结果，几名刺客突然闯入，高澄当场遇难。

这几名刺客的身份很特殊，他们都是被东魏擒获的战俘，以萧梁将军兰钦的儿子兰京为首。之前，兰京曾因事被高澄处以杖刑。在高澄和陈元康等人秘密商议改朝换代细节的时候，兰京擅自闯入他们的会谈场所，说要献上食物，高澄斥责了他两句，兰京就拔出刀来砍伤了高澄。高澄藏在床下，被兰京及其同党抓住杀死。在场的陈元康为了保护高澄，与兰京等人搏斗，被砍成重伤不治身亡。参与密谋的杨愔夺路而逃，丢了一只靴子，崔季舒则躲到厕所里。

究竟兰京等人的背后有没有主使者？很多人都认为主谋是他的兄弟、高欢的次子高洋，因为高澄去世，最大的受益人是他。但在笔者看来，历史最大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事后的获益者往往不是谋杀的策划人。比如秦始皇之死，二世皇帝胡亥即位，最大的得益人是宦官赵高，但目前我们找不到记载证明赵高谋害了秦始皇。再比如唐代的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杀了唐中宗李显，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得益，相反却被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所杀，真正的受益人是唐睿宗李旦。

以往我们对历史人物做的多是“有罪推定”，即先怀疑他有动机谋害他人，然后再寻找相关证据。要客观地看待历史，就必须做“无罪推定”，先不抱任何偏见，从史书提供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如果实在找不到确切的证据，就只能存疑。

高澄之死，被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史书在记载此事时，使用了烘托的手法，讲到高澄死前曾经有过各种预兆，甚至他的亲信崔季舒无缘无故地吟诵起了鲍照的诗句：“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人们都觉得他的表现过于奇怪。其实，这是史书编纂者为了证明高澄将死而虚张声势的写法，并不能够为我们提供其他的有用信息。谋杀高澄的凶手究竟是谁，已经永远成谜了。

那么，为何那么多人都认为高澄的弟弟高洋有谋杀高澄的重大嫌疑呢？他到底有没有动机杀掉高澄？且让我们看看本篇的传主高洋是个什么样的人。

三、本传：“被暴君”的开国皇帝



高洋字子进，是高欢的次子、高澄的胞弟。他的幼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高欢刚刚投靠尔朱荣，家徒四壁，他的母亲娄昭君与亲戚们

都为一家人的衣食而忧虑，不自觉地抱怨几句：“我们可怎么活啊？”高洋当时还不会说话，突然应声说道：“能活。”娄昭君等人十分吃惊，甚至吓得说不出话来。

高洋和兄长高澄有些相似，都是过早地告别童年。也许，在乱世中成长，而且生长在政治高层，真的能够“英雄出少年”。还是一个儿童的他并不喜欢游戏，有什么心事也从不对人说。高欢曾试着审察儿子们的见识，让他们各自整理紊乱的丝线，在其他孩子都在面对着一团乱糟糟的丝线皱眉时，只有高洋拔出佩刀来砍断了乱丝，说：“乱的东西必须砍断。”高欢对他的这个做法十分满意。

为了培养儿子们的作战能力，高欢让他们各自率军出行，又派全副武装的骑兵假装攻击他们。高澄等人遇到“敌人”进攻，都非常恐惧，高洋却临危不乱，十分冷静地指挥士兵同伪装成敌人的彭乐厮杀。彭乐怕伤害王子，便脱下伪装表露身份，并说明高欢的用意，但高洋并不领情，还是将他生擒之后献给高欢。

从这两件小事就能看出高洋的个性：只求结果，不问手段。

但因为不是长子，高洋一直没有得到格外的栽培，而且他有了想法也不和别人讲，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笨孩子。高洋还有一项特殊的能力，就是过目不忘。但由于不大展示这项才能，就连他的启蒙老师卢景裕都只是知道他博闻强记，却不知道他的记忆力究竟有多好。

高洋有一项最大的“缺陷”——在兄弟们普遍俊秀的高氏家族，他却其貌不扬，就像一只丑小鸭。高澄常常嘲笑他，说：“这样的人也得到富贵，得怎么用相术解释啊？”只有高欢认为他与众不同，他曾经说：“这孩子的见识超过了我。”也许高欢本人也是只求结果不问过程的人，而且能够理性地作出决断。“快刀斩乱麻”的事件让高欢意识到高洋这方面很像自己，所以才对他另眼相看。

高欢去世之后，高澄在晋阳接管丞相府的事务，便委派高洋做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此时，初掌大权的高澄自我膨胀，目中无人，高洋知道这位大哥素来看不起自己，便故意扮出可怜相，面见高澄的时候畏畏缩缩，有时还流着鼻涕。高澄因此就消除了对他的戒心，但兄弟们也因此而轻视高洋，三弟高浚甚至带着挖苦的口气对高澄身边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二哥擦鼻涕？”

就这样，高洋韬光养晦，新霸主高澄也没有找他的麻烦。武定七年（549）八月，高澄被刺客所杀，由于事出仓促，邺城内外十分震惊。高洋面不改色，指挥、部署军队包围了东柏堂，将刺客捉拿后还亲自将他们砍成肉块，并将他们的头涂上漆，然后才对外宣告："奴婢造反，大将军受了伤，不过没有大的病痛。"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对他的表现感到惊讶。

他之所以对外隐瞒高澄已死的事实，是怕引起骚动。同样，他亲自将刺客处斩，也是为了免除祸患。历史上的很多人都是因为被栽赃上谋杀的罪名而洗脱不清，最后黯然出局的。高洋深知当时各派势力都在关注高澄遇刺之事，无论是东魏的皇室，还是晋阳的军阀，都希望能通过追查此事打击政敌，而他偏偏不给他们机会，直接将刺客灭口。可就是因为他性格深沉，喜怒不形于色，才会有人觉得他是高澄被刺的幕后主使人吧。

在稳定邺城局势的过程中，朝廷的权贵们劝高洋及早赶赴晋阳，因为东魏最精锐的部队都在那里，如果不去接管，恐怕会生事端。高洋因为一时走不开，便连夜接见大将军督护唐邕，命令他分派军队守卫四方。

在邺城的局势稳定以后，高洋留下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和杨愔等在邺城留守，其他高氏家族的亲信都跟随着他赶赴晋阳。当时高澄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孝静帝十分振奋，高洋便在出发之前给了孝静帝一个下马威。他突然率领这批权贵以及八千名军卒入宫觐见，只让人传达了一句"我家里有事，需要返回晋阳"就走了，令精神本来就很脆弱的孝静帝十分害怕。高洋这是要给孝静帝一个警示，不要因为高澄去世就以为东魏皇室可以左右政局，他高洋依然不是省油的灯。



接下来，他赶赴晋阳，接管大丞相府的事务。由于他既没有声望，又没有资历，所以晋阳的将领们一向对他很轻视。等到他到达晋阳，与文武大臣相见时，突然一改往日的模样，神采飞扬，言语流畅，在座的人都十分惊讶，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邋邋遢遢的二公子居然像变了个人似的。

晋阳的武将们没有想到高澄会突然去世，这已经是两年之内东魏的第二次大损失——前一次是两年前高欢病逝。当然，武将们也不会想到，那个前不久还拖着鼻涕在高澄面前唯唯诺诺的二殿下马上就要成为他们的新主人。高洋在见面会上的这番表现，让他们吃惊之后基本认可。随后，高洋对高澄主政时期的不合理措施进行改革，文武官员们这才看出了他的能力，原来这位爷是真人不露相啊。

武定八年（550）正月，魏孝静帝亲自为高澄治丧。尔后，高洋被任命为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食邑一万户。同年三月，孝静帝又晋封高洋为齐王。

对照高欢和高澄的经历，高洋受到这样的任命，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不过，高洋本人把这看成是他称帝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据说，在被封为齐王之后，高洋梦见有人用笔在自己的额头上点了一下。天亮后他把这个怪梦讲给门客王昙哲听，并向他询问："这是不是说我有了过错，不然为什么人家戳着我的额头？我要引退吗？"王昙哲拜了两拜祝贺道："'王'字上加一点，就成了'主'字，说明您的地位应该会更进一步。"

中国古代盛产此类预言，而中国字的组合原理也给这类预言提供了各种可能性。高洋的这个故事产生一千多年后，一个叫朱棣的人被封为燕王，一个叫做道衍的僧人就作出了一个预言："燕王如果让我来辅佐，我将会给他送上一顶白帽子。""王"字上面加一个"白"，就是"皇帝"的"皇"。朱棣听了这个预言，马上请求让道衍做自己的师傅。道衍凭借一个拆字法就赢得了朱棣的信任，这就是中国字在政治领域中的妙用。当然，道衍的确有过人的才能，成为朱棣的师傅之后，他为朱棣出谋划策，成为策划"靖难之役"的主要谋士。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更加为人所知——姚广孝。

王昙哲为高洋使用的拆字法，自然也是一种鼓励和心理暗示。那么，高洋自己究竟是否想要称帝？

他应该有称帝的想法，但是并不想这么快建立高氏政权。他的父亲高欢从拥立魏孝武帝起专政十五年，都未曾做过自己称帝的准备；其兄长高澄从执掌东魏行政大权开始，直到去世之前才开始打算称帝；而今，高洋继承父兄的事业才不过一年，无论是功勋还是名望都不如父兄，草率地称帝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直到他计划称帝之时，自己还犹豫不决，向大臣徐之才询问，徐之才回答说："正因为你不如父亲和兄长，所以才要及早称帝，这样就能赶得上他们了。"可见，高洋在主政一年后就称帝，很大程度上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本意。

那么是什么促使他草草结束了东魏的统治，建立北齐王朝的呢？

按照史书的记载，是因为他身边亲信们的怂恿。徐之才、宋景业二人都精通历算图谶之学，也就是擅长占卜预言。他们两个认为按照当时的天象，应该发生改朝换代的事情，所以就托高洋的老部下高德政去请求高洋称帝。

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之下，高洋才动了心。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么勉强可以信其有，但要放在高洋身上，我们只能信其无。前面说过，高洋是一个决断力极强的人，“快刀斩乱麻”事件就是最好的表现。而且，他还是一个不大会按照别人的言论改变初衷的人，生擒彭乐献给高欢是最好的证明；而且，改朝换代这么大的事情，又岂能靠别人的几句话？

史书中之所以把高洋写成一个被徐之才等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不过是想矮化他建立北齐的功绩，因此把他描绘成一个阴差阳错成了开国之君的幸运儿。实际上，高洋称帝，远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

从处理高澄遇刺事件，到被封为齐王之后梦见有人点自己的额头，应该说高洋做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强。事实上，高欢、高澄和高洋父子三人，先后在晋阳主持大政，都是东魏实际上的皇帝，只不过龙袍和皇冠并没有穿戴在身上。高欢因为要和西魏斗争，因此一直抑制自己的称帝欲望，甘为人臣；高澄已经抑制不住，但突然遇刺而未能称帝；高洋做了高氏集团的首领之后，执掌着生杀大权，皇帝的玉玺已经离他只有一步之遥。面对着如此大的诱惑，只有圣人才不会动心。

高洋显然不是圣人，他想做皇帝，但是他觉得还不是时候。可是，那个纷乱的时代，将机会推到了他的面前。

东魏武定八年（550），成鼎足之势的东魏、西魏和萧梁三国之间，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魏的掌权者宇文泰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而且还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西魏王朝的皇帝和皇室已经被极度边缘化，改朝换代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南方的萧梁政权，就在高澄去世的前一年，发生了侯景之乱。东魏的叛臣侯景在投靠梁武帝后，利用萧梁皇室内部的矛盾，发动兵变，围困了都城建康。梁武帝在一年之后——高澄打算称帝的那一年——被活活饿死，萧梁政权变为一盘散沙。

自从侯景背叛东魏以来，南方的萧梁政权就是东魏的主要防御对象。现在萧梁政权发生如此大的内乱，对于掌握着东魏政权的高氏家族而言，压力大大减轻，而年轻又禁不住诱惑的高澄自然开始着手准备称帝。到了高洋主政之时，侯景已经控制了建康，并立梁武帝之子萧纲为帝，但地方上的萧梁宗室不听其号令，大将陈霸先等人又起兵讨伐侯景，萧梁依然一片混乱。这样的局面不知何时会结束，所以对于高洋来说，确实时不我待。



这种局面上的大变化，有识之士自然都看在眼里。徐之才等人所谓的天象之变，不过是对时局的一种神秘化解读。但高洋还是担心晋阳的那批军事贵族不支持自己，所以没有正式表态。

作为高洋的亲信，高德政也觉得建立新王朝势在必行。因此，他一再催促高洋早下决定。高洋还是想求稳，于是写信给自己一向信赖的大臣杨愔，向他讲述了徐之才等人劝自己称帝的情况，希望杨愔给自己一些建议。高德政怕杨愔提出反对意见，便亲自跑到邺城游说。在高德政的劝说下，杨愔也表示了对高洋称帝的支持。

但高洋还是没有下定决心。他决定试探一下东魏的支柱——军事贵族们的意思。于是，他从晋阳出发，到达平都城。他将自己的打算对母亲娄昭君和军事贵族们稍作介绍，那些功臣宿将听了他的话，都十分惊讶，没有人应声。这时，娄昭君说出了武将们的心里话："你父亲如龙，兄长如虎，他们这样的人才，都因为天命不可违抗，没有自己登基，而是终生做东魏的臣子。你是什么样的材料，自己不知道吗？居然还想做皇帝？醒醒吧！"

高洋虽然没有对武将们的支持抱多大希望，但母亲的话确实很刺耳。太伤自尊了。而且，军事贵族们的沉默，其实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不支持。

高洋还是想再试试。于是，他找到父亲的老战友、敕勒人斛律金。斛律金这次表明了态度：不同意。高洋于是又召集了众将，再次与母亲讨论登基之事。娄昭君也意识到自己上次说的话有些过头，让高洋在武将们面前失去了面子。毕竟高氏的权威要维持下去，不能让武将们看到他们母子唱对台戏。她这次便对高洋进行了辩护："我儿子生性软弱，而且没有心计，他肯定不是自己打皇位的主意，必然是高德政这样的小人教唆他。"

娄昭君这次的言论其实更伤人：已经成为国家主宰者的高洋，居然被她说成一个任人摆布的白痴。要么是娄昭君确实对高洋不了解而且不喜欢，要么是她矫枉过正说错了话。但军事贵族们的态度依然不明朗，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接下来，那个当年向高欢建议惩治贪腐的杜弼给高洋上了一道密状。杜弼说，西魏一直以来都是东魏最有威胁的对手，因为他们也拥立了北魏皇室做皇帝，是在和东魏争夺正统。现在如果让东魏皇帝把江山让给高氏，就会落下口实，西魏到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征讨高氏，而东魏境内的官民也许会因为西魏皇帝的感召而背叛高氏，因此最好是敌不动、我不动。

杜弼的话说得确实在理，但这种情况高洋应该已经考虑过了。所以，他没有正面回应杜弼，而是找来徐之才和杜弼，让他们两个辩论。徐之才说："西魏是我们的敌人，而宇文泰自己其实也想做皇帝，所以关键就在于谁先称帝。这就好比大家在闹市中抓一只兔子，只要有人抓到了，别人也就放弃了。为什么现在会有两个大魏？就是因为我们和西魏都僵在那里，为了打击对方而抓一个北魏皇族来充门面。为今之计，我们如果先推翻了东魏，建立新政权，那就没有悬念了，西魏的皇帝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宇文泰自然也会效仿我国，自己称帝。既然大家都称帝，就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他们也不会拿这个借口来讨伐我们。所以必须要当机立断，占有先机，不然等宇文泰先做了皇帝，我们效仿他，就会落在下风。"

徐之才的分析切中了东魏、西魏政治中的要害，而且也符合当时的局势，所以杜弼无言以对。

高洋其实并不担心西魏找借口入侵，他真正担心的其实还是无人支持他称帝。军事贵族们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于是他又派高德政向那几位在邺城的实力派老臣询问。高德政将高洋的意思转达给高隆之、高岳、娄叡、杨愔等人，结果除了杨愔之外，其他人都不表态。高欢的亲信司马子如甚至还亲自跑去和高洋说绝对不能称帝。就这样，高洋怏怏不乐地回到晋阳。



现在，高洋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这倒不是最坏的，坏的是他已经进入尴尬的两难境地：坚持称帝，没人帮助他；放弃称帝，此事就将成为话柄，他一生恐怕都无法抬头。思前想后，高洋决定自己单干。因此，他在高德政、徐之才、杨愔和魏收等人的帮助下，做好了举行禅让仪式的各项准备，等他回到邺城准备举行禅让典礼时，包括娄昭君在内的高氏集团成员才知道消息，此时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事实了。

武定八年五月，高洋接受东魏孝静帝的"禅让"，登基称帝，定国号为"齐"，定年号为"天保"。由于此前南朝有过萧道成建立的齐政权，所以高洋建立的国家又被称为"北齐"。

由于称帝之前众人反应冷漠，所以高洋做了皇帝之后对他们也没有特别优待。他重用杨愔、魏收、高德政等帮助他操办禅让仪式的人，而对于军事贵族则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

为了建立起有效的统治，高洋也需要有一批人作为自己的支持者。他的策略是用汉人士大夫与军事贵族们抗衡。以往与高澄有矛盾的汉人名士崔㥄

被提拔为侍中，而且还将崔㥄的女儿嫁给自己最小的同胞兄弟高济。曾经深受高欢、高澄父子重视而被权贵们所仇恨的崔暹、崔昂等人也被高洋所器重。

在对汉人大力提拔的同时，高洋对武将们则是不动声色地低调处理。跟随高欢多年的老将们在高洋称帝后陆续去世，他们的子孙承袭了爵位，高洋就用国家法律来约束他们，只要他们违法，就严厉惩处。不过高洋深知乱世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才能生存，因此，他对德高望重的老将斛律金十分尊重，在其生病时亲自赐给医药，而且还频繁派宫中的宦官去探望斛律金的病情。高洋不但将斛律金的次子斛律丰乐封为武卫大将军，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斛律金的孙子斛律武都。

通过这一张一弛的办法，武将们与高洋的关系也稍有和缓，他们以往对高洋的不信任态度也渐渐有所收敛，对高洋十分敬畏。

高洋还大力发展儒学，这倒不是因为他本人对儒学有多热爱，而是因为儒学教育可以作为官员固定来源的保障。依靠儒学，北齐就拥有了一批高素质的文官，而他们就是高洋在政治上的资本。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高洋的韬略。不靠血淋淋的屠杀，而靠一代代人的自然更替和国家的价值倡导，完成从东魏到北齐统治基础的变化，使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不搞政治阴谋，不搞人身迫害而和平地完成这个过程，可见他的高明。

这只是高洋治理内部的才能，而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容忽视。在他刚刚即位不久，宇文泰就率军入侵，他亲自率领部队前去应战。看到高洋指挥的部队军容整齐、士气高涨，宇文泰不由自主地赞叹："高欢不死啊！"随后就撤军了。

高洋之父高欢素以善于用兵知名，东魏与西魏的几次大战，高欢基本上都占尽上风。"高欢不死"这句话出自对手之口，可以算是对高洋最高的评价。同样是高欢的儿子，他的长兄高澄就没有得到敌军的赞扬。

假如高洋将这种崇文重武的风格一直坚持下去，那么北齐王朝肯定会是南北朝时代最后的胜出者。但是，不知从哪天开始，高洋变成了一个疯子，他开始酗酒、纵欲，经常在白天裸奔，还滥杀大臣，甚至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也不放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的史学家认为他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史学家吕思勉和熊德基都持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高洋患有精神病，所以才会出现反常的举动。

首先，我们来看看高洋执政之初的情况。根据史书的记载，高洋称帝之初，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政务上，强调依法治国，任何人违法都要得到惩处，于是吏治得以清平。在经济上，他下令让地方官鼓励百姓以农耕为本，并改革赋役制度，让贫困百姓免除过重的负担，而富贵者则要承担较多的社会义务；在军事方面，他积极整顿军备、训练士兵，还专门从鲜卑人里选拔勇士，组织了“百保鲜卑”作为禁卫军，并从汉人中选拔精兵，打破了以前只有鲜卑人才能作为国家士兵的格局；在政治上，北齐建立之后，高洋就取消了东魏时期高氏的权力机构大丞相府，以免出现与朝廷相对立的势力；在地方管理上，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一些过小的郡县进行合并，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一系列措施，都显示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

除此以外，高洋还趁萧梁政权因侯景之乱而分崩离析的时刻，派兵征讨，试图夺得江淮之间的战略要地。每当发生战争时，他都亲自指挥，身先士卒，而且迎难直上，攻无不克。

可见，高洋是一个极度勤政的帝王。而且，他是一个近乎全才的皇帝，既能处理政务，又能领兵打仗，决断能力也极强。这些突出的素质，使他有点接近尼采所说的“超人”。

这样的一个人，是否会是精神病患者？而且，奇怪的是，之前的很多年他一直没有反常表现，为何会突然发病？就算是有潜伏期，那么致病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

史书中说，高洋是到了执政六七年之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肆行淫暴”。那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使他变成了一个狂躁的暴君？

我们找不到线索。因此，现在将高洋定义为精神病人未免言之过早。且让我们找找其他的理由，比如是某些外在的压力让他心情苦闷，因而有了过激的表现。

首先应该是太子问题。

高洋的太子高殷是李皇后所生。李皇后是高洋的原配夫人，高洋一直对她十分敬重。因为李皇后是汉人之女，在称帝之前，有大臣建议应该立有鲜

卑血统的段昭仪为皇后，高洋执意不允。因此，对李皇后所生的长子高殷，高洋是抱有希望的。谁料高殷只对儒学感兴趣，非常向往道德完美的人格，而对国家大事则基本上没有处理能力。高洋十分失望，但又没有办法。

有一次，高洋将一个死囚带到高殷面前，让他亲手杀了这个犯人。从未杀过人的高殷十分紧张，砍了好几次都没能把囚犯的头砍掉，反而让这个受刑者疼得不断呻吟，高殷便更加不忍心下手。高洋觉得儿子没有做帝王的气魄，用马鞭抽了高殷三下。高殷因此受到惊吓，从此就口齿不清，越到关键时刻越是说不出话。

高殷的心理素质和西汉的第二代皇帝汉惠帝有些相似。汉惠帝生性懦弱，其母吕后为此十分担忧。张良献计请出“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让刘邦觉得太子已经成为世人所拥戴的领袖，才保证了惠帝的顺利继位。可是做了皇帝之后的汉惠帝依然缺乏决断能力，不但没有帝王的器度，而且还常有妇人之仁。吕后将情敌戚夫人及其儿子赵王如意视为眼中钉，把如意召到京城长安，惠帝知道母亲想要杀掉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便亲自前去迎接，连饮食起居都和如意在一起，让吕后没有机会下手。后来，吕后趁惠帝出去打猎时将如意杀死，惠帝后悔不已。吕后又将戚夫人的手足砍断，眼睛挖出，还逼她喝了哑药，然后把她扔进茅厕，称她为“人彘”。惠帝无意中见到了被迫害的戚夫人，大哭一场，从此一病不起。

高殷的性格与心理承受能力都和汉惠帝不相上下，按照政坛的规则，他们这样的人都不适合做皇帝，因为帝王需要狮子般的威严和狐狸般的狡诈，但汉惠帝和高殷都是不谙世事的少年，他们认为只需与人为善，就能天下太平。他们就像是瓦砾中的芳草、淤泥中的白莲，没有被政坛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所污染，正因如此，他们也无法在凶险的政坛立足。

天保五年（554），高洋的胞弟、娄昭君颇为宠爱的常山王高演开始担任国家重要职务。高演的政治能力很强，处理政务有条不紊，为人较为宽厚，不像高洋那样眼中揉不得一粒沙子。且高演行事非常谨慎，就连平素因办事不力被他责罚的下属都说不出他的过错。这样一来，高演的声望越来越高，很多被高洋抑制的军事贵族也非常拥护他。这不得不让高洋提高警惕。

按说，高洋可以罗织罪名除掉高演，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高洋没有动用自己的智谋和权力杀害任何一个亲人，当初高澄之死就和他没有关系，现在对高演他也同样不会下手。他在位期间，被杀的只有高浚和高涣两个庶出

的弟弟。而且，高洋本来并不想杀他们，因为长广王高湛，也就是后来北齐的武成帝的挑拨离间，这两个弟弟才被处死。

但是，看着武将们越来越倾心于高演，而自己的太子高殷却不是一块治国的材料，他焉能不急？

其次，应该是发展的瓶颈对他的刺激。

在称帝之前，由于韬光养晦，高洋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政治才华。而从建立北齐开始，他的能力得到了集中表现，因此在两三年之间就将北齐的国力推向了一个小高潮。但是，在那之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北齐王朝，都没有新的发展。在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后，他基本上只是依照法律行事；而随着南方的局势日趋稳定，北齐开疆拓土的机会越来越小，与西魏之间的争夺也是呈拉锯状态，经常是朝得晚失。



作为一个对自己期望很高的人，而且还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高洋肯定会沉不住气。三四年的时间过去了，国家没有大踏步地向前走，自己也没有什么新的功绩，心理上肯定会压抑。久而久之，压抑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因此，以往反对过他的杜弼、高隆之等人就被他寻隙报复，他们的死，应该是高洋自我不满情绪的发泄。

当然，杜弼与高隆之等人之死，其实还有内情。

杜弼在高洋准备称帝时提出过反对意见，高隆之作为高欢的心腹老臣，曾经对高洋非常无礼。他们对高洋的反对，正代表了军事贵族们的普遍心理。高洋在心理极度压抑的情况下要找人出气，但也并非完全不可控制，他选择杀鸡儆猴的方式，是想通过杀掉杜弼和高隆之，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军事贵族，同时也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办法让常山王高演等人有所顾忌，好让自己的儿子高殷能够平安顺利地继承皇位。高洋还几次在醉酒后表现出想要除掉高演的样子，同样也是想让高演放弃与权贵结交，俯首帖耳地做一个辅政者。

再次，是西魏的变化带给他的影响。

天保七年（556），西魏的霸主宇文泰去世。自从称帝以来，高洋就在和宇文泰斗争，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与司马懿，棋逢对手，惺惺相惜。宇文泰突然去世，高洋一下子感觉失去了最强大的敌

人，最值得用尽全身的智慧去应付的对手，从而心理上出现失衡也是完全可能的。

宇文泰死后，其侄宇文护独揽大权，废黜西魏皇帝，立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帝，建立了北周政权。北周建国之后，宇文护依然嚣张跋扈，甚至多次对北齐边境用兵，高洋也派兵与之交战。宇文护虽然没有军事才能，但西部的将领却都是文武全才，特别是新成长起来的将领杨忠等人，在与北齐的交战中表现出了他们的军事才华，让高洋颇为头疼。

太子文弱不善用兵，让高洋想在有生之年解决掉北周这个对手。但是欲速则不达，北周根基已稳，又趁侯景之乱夺取了南方的大片土地，高洋慢慢地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将这个心腹大患连根拔除，心情也颇为沉重。

综合以上几种原因，高洋之所以突然开始饮酒、滥交，而且残暴地杀人，都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且，他所杀的人，大多数并不是枉死，只不过他们的死法都比较惨，所以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同情受害者的同时，高洋作为施暴者自然也就被妖魔化了。

还有一个问题：高洋是否就像记载中所说的那样荒淫无耻？

酗酒应该是有的，皇位继承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给自己施加的压力同样也让他头疼，借酒浇愁是这种情况下最常用的办法。魏晋时期的名士阮籍几乎酒不离口，高洋每天在酒精的麻醉下才能得到片刻安宁，也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杀人，刚刚已经说了，并不是滥杀，而是有理由的，尽管这理由可能过于私人化，某人因为得罪了高洋而被报复，某人因为不尊敬高洋而被处死。在帝制时代，被皇帝以私人化的理由所杀并不是个别现象，只要皇帝不是无目标的滥杀无辜，基本上就不能算“残暴”。

高洋虽然杀人，但也能够时刻反省自己，赦免本来在情绪激动时打算杀死的人。高澄遇刺时在旁边奋勇杀敌的王纮（hóng）就曾经历过这一幕。因为王纮讽刺高洋纵酒作乐，高洋在盛怒之下质问他：“你当年的职责是保护我的兄长，为什么纥奚舍乐与刺客搏斗被杀，而你却活了下来？”王纮回答说：“臣子为君主而死，自然是死得其所，但是刺客的力气小，刀也不锋利，我才得以苟活。”高洋十分生气，让人按住王纮，自己拿着刀做出要砍的架势。王纮临危不乱，说了一句：“杨愔、崔季舒这样的人在先王遇刺时夺路

而逃，可是他们却被您重用，做到了仆射、尚书，我与刺客浴血奋战，反而要被您处死，这可真是自古以来未有的咄咄怪事。”高洋的火气当时就消了，将王纮释放。

此事说明，高洋并非是丧失理性的精神病人，他杀人时的表现虽然匪夷所思，但估计都是以佯狂的状态来掩盖自己杀人的真实目的，因为毕竟与常山王高演和军事贵族的矛盾不能公开化，所以他只能表演一下狂躁症的症状，以对高演等人进行警示。

至于私生活混乱，实在无从考证。史书中记载了高洋的一些淫乱行为，但这基本上都是闺房秘事，被记载进史书，本身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其中最可疑的，就是高洋频繁到大臣家中饮酒作乐，甚至彻夜不归，与大臣家中的女眷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一条。因为君主到大臣家中做了什么，外界是无从得知的，也许高洋是为了替高殷铺平道路，所以经常去和大臣们联络，让他们向太子效忠也不一定。

而且，用私生活这种个人道德问题来为帝王定性，实在不伦不类。高洋即使真的有过荒唐的私生活，那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感情不专一吗？如果是那样，为何按照儒家的设计，皇帝的后宫要有很多嫔妃呢？说明他不把精力放在治国上吗？可是天保六年（555）到天保十年（559），北齐并没有出现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国家的各项行政工作也没有停止下来，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啊。而且，因道德高尚被儒家所称颂的周文王据说有一百个儿子，他肯定不是只有一个夫人，否则拥有百子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没有人指责周文王贪恋女色、感情不专一、影响国家呢？

总而言之，史书把高洋塑造成了一个自暴自弃、不顾国家安危的昏君加暴君，这显然是一种妖魔化的行为。而丑化、歪曲高洋的责任，并不能由史书作者自己来承担。

天保十年，年仅三十一岁的高洋去世，太子高殷即位。杨愔等辅政大臣也感觉到了来自高演和军事贵族们的压力，所以杨愔安排了一场鸿门宴，打算将高演除掉。可是此事走漏了消息，高演在高湛的鼓动和军事贵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掉了杨愔等人，废黜了新皇帝高殷，在娄太后的主持下自己登基即位。但是高演只做了一年多的皇帝便去世了，高湛便接过了那顶皇冠。由于高演和高湛的皇位来得不正当，所以要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找理由，否定高洋无疑是最有效的做法。于是，高洋被他们说成一个靠投机称帝

的平庸者，一个被小人包围的无知者，一个终日酗酒、淫乱的暴君，一个不顾北齐江山而只知个人享乐的昏君。

事实上，他们所塑造的高洋形象，倒活脱脱像是武成帝高湛本人。高湛缺乏治国能力，心胸狭窄，而且喜好赌博和女色。他任人唯亲，执政期间，一群靠着讨好他而受宠的胡人登上政治舞台，即北齐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恩幸”群体。而且，高湛对同胞兄弟毫不留情，对子侄们也会痛下杀手，但对西部的北周，却完全没有气魄去战斗，所以，人们发现，从高湛执政开始，每年凿穿黄河冰层以防对方进攻的，从原来的西部变成了东部。

高洋的历史形象背后，浓缩着一部北齐历史。如果没有皇位的恶性争夺，高洋的形象就不会如此可怕。只是因为皇帝久居深宫，过于神秘，而且国史的编纂不会随便向外界公布，所以当时的人不容易知道高演、高湛歪曲高洋形象的事情。高洋在位期间，还借《魏书》事件对张狂的汉人大族子弟进行过惩治，这批人的亲友自然十分不忿，而史书又是他们所写，所以本来就被歪曲的高洋形象便更加恐怖。

当这样一个现实的背景逐渐被时光侵蚀后，高洋就成了文明时代的疯癫者，供后人批判。就连唐太宗都曾经和大臣以他为话题进行过讨论：

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

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

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

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理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可见，到了唐朝，高洋的真实形象已经完全被高演、高湛塑造出来的形象所遮盖。这也算得上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

假如没有皇帝制度，没有权欲熏心的人对皇位的争夺，没有夺权后对自己的极力美化、对前人的刻意抹黑，也许我们的历史会比今天我们看到的真实得多。



魏收

——书生意气，留得“秽史”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备受关注的作家，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者，还是思想史、宗教研究者，都把他和他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而他一部小说的名字更是屡屡被引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在几千年的古代中国历史中，向来不缺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正如鲁迅所言，那段历史，要么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要么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太史便手捧国史当众宣布这一条新内容：“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继续这样写、这样宣布，于是屠刀再次举起。如此杀来杀去，最后只剩下太史最小的弟弟，依然坚持这么写、这么宣布。崔杼挥挥手，放弃了屠杀。

太史兄弟之死，令人震撼，而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崔杼弑其君”的记录，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们没有被侮辱，而是被屠杀；生命被损害，精神被褒扬。对他们来说，“秉笔直书”是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原则。

谁也没想到，另一位史学家付出了比太史兄弟更惨重的代价。他在世时，所写的史书被士人抨击、诟病，他去世后，被仇人掘墓抛尸。他没有因修史而被杀，但名誉被侮辱，遗体被损害，这与太史兄弟血溅简册相比，究竟谁受害更深？

也许如托尔斯泰之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苦难无法比较。而这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史学家——魏收，究竟为何让人如此仇恨？

一、乱世一书生

魏收是北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史学家，世人对他的了解，也大多是从“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而来。历史上的魏收，却远比“史学家”这个名号要活泼得多。

我们对古人的定位，往往是选取其最受我们关注的某个方面。比如，张衡是科学家（事实上他也很善于写赋），孙子是军事家（而从《史记》里孙子斩吴王宠姬的事件来看，他也称得上是政治家或“管理学家”），苏轼是文学家（而他其实是可以称得上一位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与名臣的），如此种种。古人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单面人”，而现代人则可以被冠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诸多头衔。这种古今异同，借用《世说新语》中的一句话来形容，真是“咄咄怪事”。

事实上，古人的世界与我们一样，并不只是某一项工作、某一种职业。他们可以既做名士，又做名臣，还可以在机缘巧合时做学问。而魏收，正是如此丰富多彩的一位名士、文人、宠臣、史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他的父亲魏子建是北魏后期的官员，在朝廷与地方都曾任职。生逢乱世，魏子建仍能洁身自好，在大乱来临之际也表现出了对朝廷的忠诚。由于谨慎，魏子建交游不广，只和少数至亲好友讨论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魏收应该是自幼便听父亲讲述时局，分析政治，体会到乱世之危局的。

每个人面对乱世时反应都不尽相同，有慷慨赴死的刚烈之士，有独撑危局的悲剧人物，也有随波逐流的普通人与蝇营狗苟的钻营者。魏收，在北魏末世时便是一个独善其身者。

魏收从小就特别机灵，可能是他的父亲为人一贯正直谨慎，使得处于少年时代的他处处受限制，因之产生了逆反心理，比较不拘小节。他的文学天赋很早就显现出来，十五岁的时候就“颇已属文”，按照现在的个人简历常用语来说，就是“具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已发表诗歌、散文若干篇”。

可是，他的人生轨迹却发生了转变，在跟随其父魏子建赴东益州就任之

后，他就对骑马射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弃文习武。

却说东益州是北魏与南朝进行军事争夺的重要区域，在争夺中几次发生叛乱事件。而且，此地还是氐族的聚居区，在北魏与南朝的争夺中，氐族首领也起了很大作用。氐族的仇池杨氏还曾经在此地割据，后几经反复，终于纳入北魏治下。北魏宣武帝在位期间，以武兴（今陕西略阳）为州治，建立了东益州。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可称敏感地带，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民族、政治问题集中的地区。可是，北魏政权所任非人，被派到这里的刺史与守将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地问题，所以引得氐族人经常发生骚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子建被派到东益州做刺史。他就任之后，以诚信为本，推恩于百姓，强调教化、淡化刑罚，使得素来多事的东益州一时安定下来。而魏子建在东益州推行德治教化，依然有不稳定的因素存在。氐族杨氏之后杨公熙假借慰问当地氐族人之机，与其中的豪强秘密联络准备谋反，此事被魏子建识破，使其计划落空；又有莫折念生等人聚众叛逆，也被魏子建击败。

总而言之，东益州的人文环境和政治局势，以及魏子建在东益州时所发生的各类危机，都会影响到魏收，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那样的环境下，魏收对习武产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也许，魏子建本人也是支持其家族成员习武的。据记载，就在莫折念生等的叛军即将到来之前，魏子建“渐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说明魏子建的这些“父兄子弟”应该是习过武的，否则他把他们派出去，无异于割肉饲鹰。

除了这些身边的环境因素，还有一重背景，那就是北魏末年的时局。北魏宣武帝以后，朝廷日渐浮华腐化，权臣当道、外戚专权，武人们的待遇日渐低下，他们的不满情绪也不时爆发，甚至在都城洛阳都发生了武人对文官的暴力事件。对于这些，魏子建自然会知道，他也会对家中人讲述，并教他们应对之策。因此，魏收的习武，应当也有这样的一重乱世自保的原因。

生逢乱世，习武自保，是魏收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魏收对此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还想要凭借武艺出人头地，立下一番功业。然而，就在他醉心于骑马射猎之时，有人对他进行了当头棒喝。

此人姓郑，在史书中被称为郑伯（按照《魏书》、《北史》等材料比对，从时间、姓名来看，此人似乎应是郑伯猷，伯猷在《魏书》中有传，其生活年代正与魏收相近。但证据不足，故此处仍作“郑伯”），出自北魏第一等高



门荥阳郑氏，他的家族是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变法以来最受重视的士人家族之一。在北魏末年的浮华风气下，士人无不以重文轻武为习气，因此他见魏收不读诗书而舞枪弄棒，便和魏收开了个玩笑，问他："魏郎弄戟多少?"

这句话不轻不重，而且是询问的口气，意思是：你的武艺怎么样啊？听上去没什么好恶褒贬，但在北魏末年，高门大族的士人们往往开口便是子曰诗云，而且对掌故文物津津乐道，他们认为习武不是士人所为，只有粗人才整天舞枪弄棒。所以问一个人武艺如何，相当于把这个人划为异类，将其排斥在士人之外。当然，郑伯说这句话时，可能脸上也有不屑的表情，只不过我们无从得知了。

当时的魏收，正是最敏感、最看重面子的年纪，自尊心极强，被郑伯这么一句话一激，顿时心生惭愧。据我推测，此时魏收应该是已经随其父魏子建从东益州回到了都城洛阳，而洛阳城内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妙语连珠、熟知掌故的文士，他们一面做着清要的官职，一面经常聚会游宴，洛阳城内关于他们的故事总是头条新闻。和他们一样风光，是每个青年都会有的梦想，而习武是艰苦又需要耐心的，武人又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士林的最前列，如此种种，让魏收被郑伯的一句玩笑所打动，从此改弦易辙，用心苦读。在夏日里，他坐在树荫下的胡床上读书，到后来胡床的板居然被他坐薄了——这说法未免有点夸张，只是用来说明他的用功程度，而这一传说早于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水泥地上留下鞋印一千多年，可见人类的想象一向发达。

终于，魏收读书有成，凭借文才赢得了众人的认可。这位青年才俊，也踌躇满志地想要迎来春风得意的时刻。然而，他却不知道，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正疾速逼近。

二、惊弓之鸟

在中国古代，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在"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究竟是悲是喜？这是谁都说不清的。

魏收潜心钻研经典、发奋读书得到了回报，他被北魏朝廷召为太学博士。太学是当时最权威的官方教育机构，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因此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在当时是对一个读书人才学的充分认可。

魏收做太学博士期间，似乎没有什么风流韵事留下，倒是遭遇了一桩大祸。北魏孝明帝去世后，其母胡太后继续把持朝政，引得政敌不满，出身于秀容川的羯胡酋长尔朱荣趁势率军进入洛阳，拥立魏孝庄帝，一时权倾朝野。可是洛阳的官员、士人对新即位的孝庄帝以及有“拥立之功”的尔朱荣并不十分敬服，于是，尔朱荣制造了“河阴之变”，将胡太后、胡太后所立的幼主、公卿士人聚集到河阴，谎称是参见皇帝，其实是用骑兵将他们包围起来，进行屠杀。这次屠杀的死难者，一说一千三百余人，一说两千余人，宗室、大臣、名士束手待毙，洛阳之菁华几乎消亡殆尽。

当时，担任太学博士的魏收也被召到河阴，与那些被杀的人一起被困在包围圈内。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心中的惊恐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天色已晚，尔朱荣也知道那些最重要的敌人——胡太后、幼主、宗室与公卿——都已杀得差不多了，便下令停止诛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也许他们的身上也溅到了同僚的鲜血，也许那些凄惨的哀号依然在耳边萦绕，但无论如何，他们从鬼门关逃了回来。

魏收在河阴之变中得以幸免，但他的姐夫李仁曜是遇难者。亲历的惨剧、姻亲的被杀，给了魏收很大的刺激。他知道，被杀的人中，有些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有些是与世无争的贤士，但在屠刀的挥舞下，他们往日的从容与淡定全都化作血痕与尘土。

乱世中，武力是最强的声音，霸权是极高的正义，这是魏收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他知道，自己不能成为手握重兵的军阀或号令天下的霸主，“弄戟”也早已成为旧日的记忆，他能做的，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不要成为砧板上待宰的羔羊。

当年，日后将成为大秦帝国丞相的李斯还是楚国的小吏时，看见厕所里的老鼠皮毛肮脏、瘦弱不堪，一见人和狗就仓皇逃窜，而粮仓中的老鼠毛色光鲜、大腹便便，而且还没有人和狗来打扰，便心生感慨，觉得人的得志与否，境遇正与这两种老鼠相近。李斯从此便以成为“仓中之鼠”作为人生的目标。李斯人生目标的确立，还没有经过腥风血雨的洗礼，而魏收则经历了惨烈的河阴之变，所以他以趋利避害为人生准则，虽然显得不那么正义凛然，但也值得同情和理解。



靠着自己的文才，魏收愈来愈受到重视。北魏节闵帝（又称前废帝，名元恭，为尔朱氏所立）即位后，选拔文学之士作为近侍，当时魏收也在被选

拔之列。节闵帝下诏让他写一篇封禅文，他不打草稿，一挥而就，近千字的文章，中间只改动了几处。这样的表现，令在场者无不称奇，认为他才思敏捷，即使是曹植七步成诗之才也不过如此。因此，他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不久又被委派负责起居注、修国史的工作，很快又兼任中书侍郎。

撰写起居注、修国史以及担任中书侍郎，在当时是对一个人文学才华的充分肯定，北魏著名的文臣基本都做过这些职位中的一个，因此，朝廷的任命相当于从制度上对魏收进行了资格认定。而魏收也许不知道，正是从这时起，他与北魏国史之间便有了一根剪不断的红线，甚至他的身后遭遇也要被这根红线所牵引。

过了不多久，由于尔朱氏被高欢击败，尔朱氏所立的节闵帝也被高欢所废，新皇帝——北魏孝武帝（也称出帝平阳王）元脩即位，但这并没有直接影响魏收的仕途生涯。在孝武帝即位之初，魏收从兼中书侍郎做到了代理中书侍郎，主要负责起草诏令，经他起草的诏令，都非常合孝武帝的意。

起草诏令，无异于做皇帝的代言人，而魏收年纪轻轻就以此获得魏孝武帝的嘉许，这让他开始飘飘然，暂时忘记了乱世的危险，不拘小节的性情再次抬头。洛阳人士送了他一个“惊蛱蝶”的绰号。顾名思义，人们认为他行事过于夸张且招摇——也许，在一代代累积下来的文化意识与社会心理熏陶下，我们只愿意看到中年人范进中举后的“放荡思无涯”，而不愿见到青年人的嚣张跋扈，只关注“富二代”包养女明星，而不追究老富豪绽放第N春。

这种张狂让魏收吃了苦头。魏孝武帝虽然信任他，但掌握大权的毕竟不是这位名义上的天子，而是坐镇晋阳的霸主高欢。在拥立孝武帝之后，高欢继续进行征伐以巩固胜局，而派了自己的心腹在朝中担任要职，既是替自己制定各项政策，同时也是监视孝武帝。在这些心腹中，有一位出自清河崔氏的崔㥄，魏收不买他的账，在他跟随高欢进洛阳时都没有前去拜望，后来还曾取笑他为孝武帝写的赦令过于直白，不合文雅之风。有人将魏收的话告诉了崔㥄，崔㥄大为恼火。

崔㥄和魏收有相似的性格：高傲、自负，但他也有此时的魏收所没有的一种做派：睚眦必报。这并不是说魏收不是睚眦必报之人，而是此时的魏收没有睚眦必报的资本。崔㥄在节闵帝去世、孝武帝命魏收起草为节闵帝治丧下葬的诏书时突然发难，说魏收在节闵帝在位时很受重用，经常出入于宫

禁，舞文弄墨、粉饰太平，而节闵帝是尔朱氏拥立的，所以魏收在当时起草诏书、参与谋划，就相当于为尔朱氏做帮凶；尔朱氏与高欢势不两立，是逆贼，所以魏收就是逆贼余孽，应该追究；魏收最大的罪过，就是在为节闵帝起草诏书时，把跟随高欢起义的功臣们都斥为叛逆者。所以，他提议弹劾魏收，查处他以往的恶行，并让他的家人都解职回家。

魏收没料到崔㥄会有如此狠辣的手段，涉世未深的他自然不知如何应付。幸亏有为人正直且颇具声望的辛雄为他周旋，才躲过了算旧账的黑狱。虽然有惊无险，但魏收也很受震动，这位飘飘然的“惊蛱蝶”猛然意识到，那些军阀、霸主不仅仅是佩刀悬剑的“拿枪的敌人”，他们身边其实还聚集着一批“不拿枪的敌人”。在霸主阵营无靠山无实权的魏收，开始收敛行迹，檐下低头。

他的低头功夫进步很快，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的谨慎。

魏孝武帝曾经兴师动众到嵩山之南围猎，为期长达十六天。大家日日在外宿营，而且还要列队跟随皇帝那奔驰的骏马，加上天寒地冻，苦不堪言。无论是随行的官兵还是当地的百姓都不堪重负，而孝武帝和随行的妃嫔、亲王、官员们此行的穿着用度十分过分，超出了礼法的限制，可是没有人敢进谏，因为年轻的孝武帝性格偏激，喜欢独断独行，而高欢对朝政控制得很紧，使这位充满激情的皇帝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便在其他领域宣泄，大臣自然不敢也不愿触犯天威。

魏收自然也是怀有怨言中的一个，但他也一样不敢犯颜直谏，却又不愿保持沉默，于是他采用迂回战术，写了一篇《南狩赋》呈献给孝武帝，用以讽谏。

这篇赋已经亡佚，具体的文字我们已经无法见到，而根据魏收本人的描述，此文“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按照这个说法，此文华丽铺张，词藻丰富，引经据典，看似不着边际，实际是委婉地批评孝武帝出行劳民伤财，应该马上停止，下不为例。由于魏收写得曲折迂回，孝武帝应该是在欣赏美文时渐渐被魏收说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便亲自下诏给魏收，褒奖他的良苦用心，并称赞他的才华与机智，其主旨大抵是“向你学习”之类。

这一年，魏收才二十七岁。从二十六岁的趾高气扬，到二十七岁的谨小慎微，魏收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尽管这只是并非出于本心的压抑，他也已经尝到了苦头，只希望祸患不要再次降临。不过，他在关键时刻还是按



捺不住，用委婉的方式进谏，可见他并非是所谓“大隐隐于朝”的苟且偷生之辈。

这个时候，那位荥阳郑氏的郑伯再次出现，对魏收说：“要不是我当年打趣你，现在你没准还扛着长矛追兔子呢！”——中国古代的记载中，常有这样神秘的人物，他们就如希区柯克一样，看似不起眼，但一出镜就会带出某些情节，而且令人难忘。

郑伯的这次出现，看上去是旧事重提，揶揄魏收，实际上无伤大雅，因为魏收曾习武是抹不掉的历史，因为郑伯的调笑才潜心读书也是确有之事，但其用功之勤、天赋之高，是郑伯无法左右的，也是魏收赢得孝武帝褒奖的真正原因。此时郑伯再次出场，对表现魏收的才华有一种欲扬先抑的作用——谁知这是不是出自魏收改编的故事呢。

三、暂入冷宫

刚刚收敛行迹不久，魏收又犯下一个无心之过。这一次，他不经意卷入了魏孝武帝和霸主高欢之间的暗中角力之中。

因为高欢有拥立孝武帝、消灭尔朱氏的大功，所以孝武帝在高欢亲信的要求下，想要给高欢“天柱大将军”的名号。高欢对此一再推辞——为什么他的亲信向孝武帝要求，他本人却要推辞呢？

因为高欢的本意并不是想要做“天柱大将军”，那个名号最初是尔朱荣的。尔朱荣拥立魏孝庄帝、整肃洛阳、清除政敌，魏孝庄帝便以尔朱荣“功高盖世”，以往的名号难以表彰他的功绩为由，发明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官号给他。尔朱荣死后，他的继承者尔朱兆便也继承了这一名号。的确，“天柱大将军”的名号十分荣耀，而且地位崇高，但高欢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的眼光比尔朱氏要远得多。他深知，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天柱大将军”这个名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尔朱氏，而自己最大的功绩就是平定了尔朱氏之乱，现在如果接受这一尊号，岂不是自认与尔朱氏一样是乱臣贼子？

高欢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彻底控制朝廷。之前魏孝武帝虽然对他表面上很尊敬，但并不真正信任他。他虽然派了心腹之人到朝中担任要职，可是孝武帝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甚至和高欢的对手——关中军阀暗中联系。因此，高欢想要实行最严密的控制，将朝廷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心。所以，他先

让亲信鼓动孝武帝封自己为“天柱大将军”，然后自己坚决推辞，接下来，就需要孝武帝慷慨大度，表现出高欢可以予取予求、自己有求必应的姿态了。

一切正如高欢所料。孝武帝见高欢不接受“天柱大将军”的封号，还是很开心的，他毕竟也怕高欢走上尔朱荣等人的老路，挟天子以令诸侯。天真的孝武帝落入了高欢设置好的圈套，表示只要高欢想做什么，自己一定满足。高欢见孝武帝表明态度，便要求做相国。

魏孝武帝向魏收询问，相国是什么品级。魏收据实以对，告诉他相国不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群臣之首，而且可以独断国家大事，做君主的副手。当然，魏孝武帝向魏收咨询时，并没有说这是高欢请求的职位，魏收也没有把这件事和之前高欢推辞“天柱大将军”的名号联系在一起。孝武帝对高欢始终不放心，在魏收告诉他相国位高权重之后，他开始犹豫，最终并没有任命高欢为相国。此后高欢与孝武帝这一对君臣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差，以至于兵戎相见，孝武帝出逃到长安，而高欢又立了一个小皇帝。当然，这是后话。

不久，魏收得知高欢请求做相国但孝武帝拒绝的消息，他想到孝武帝问自己相国品级之事，如梦方醒，觉得自己就像闯入角斗场的不幸的路人，而且还不小心撞到了剑拔弩张的决斗者。政治对他来说是如此捉摸不透，阴森恐怖，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独善其身，辞官回家。后来，他又被广平王征召，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次出仕，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虽然官职不如从前，但毕竟离政治中心稍远了。

凭借过人的才华，魏收和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温子昇、邢劭（字子才）齐名，被称为“三才”。这时，孝武帝和高欢之间的关系几近决裂，双方都摩拳擦掌，准备兵戎相见。魏收得知消息，再次忙不迭地辞官。他的舅父崔孝芬对这位年纪轻轻就两次辞官的外甥十分不理解，问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魏收回答说：“惧有晋阳之甲。”

所谓“晋阳之甲”，就是高欢的军队。高欢拥立孝武帝之后，以晋阳为中心经营自己的势力。他手下的军队都听命于自己，而不是效忠于朝廷。明眼人都能看出，孝武帝手中的军队，一旦与高欢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而孝武帝倚重的关中军阀，和高欢相比也不占天时、地利，双方一旦交手，洛阳肯定会落入高欢之手。



值得玩味的是，有些人看出了苗头，便主动向高欢效忠，有些人则坚定地站在孝武帝的阵营。而魏收，既没有选择忠君，也没有投靠霸主，他只愿

自己和家人能够安全地躲过这场祸患。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不愿与高欢同流合污，又觉得孝武帝没前途么？应该不是。当时的高欢名声不差，行事为人比骄横跋扈的尔朱氏要好很多，而孝武帝对魏收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恩惠，更没有把他当成心腹。从多年以后的情况来看，魏收是个任性而又简单的人，胸无城府且无远见，这说明他完全不适合在政坛打拼。而他也不愿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所以才一再选择辞官而不是钻营。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他的父亲魏子建对他的影响。

魏子建是个深沉的人。在魏孝庄帝与尔朱荣产生矛盾后，孝庄帝假借皇后（尔朱荣之女）生下皇子的名义，邀请尔朱荣进宫，暗中设下埋伏。尔朱荣不顾亲信的劝说进宫，结果在宫中被杀。这个消息一传开，当年死于河阴之变者的亲友们都拍手称快。前面我们说过，魏收的姐夫李仁曜在河阴之变中遇害了，李氏一门得知尔朱荣已死，也进行庆祝。魏子建得知后，和表弟卢道虔说："现在皇帝虽然已经把尔朱荣这个元凶除掉了，但是他的党羽尚在，而且更为凶狠。皇帝没有拿出惩处他们的方略，也没有周密的安排，恐怕会被他们所害。而李氏在内的各家现在庆祝尔朱荣被杀，太早了啊，恐怕他们以后还要遭到清洗。"事实正如魏子建所判断的那样，尔朱荣余党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李氏一门或流离失所，或被诛杀。

魏收经常能听到魏子建对这类问题的分析，因此他"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猜测霸主、军阀的行为。同样，对皇帝与霸主之间的斗争，他的预先判断总是霸主会战胜皇帝。魏子建不会想到，自己平日的言行会在关键时刻救魏收一命。

果然，魏孝武帝与高欢开始交兵，孝武帝的军队一触即溃，而后孝武帝奔逃入关，做了宇文泰手下的傀儡，最终被一杯鸩酒送终。

早早辞官的魏收躲过了这一劫，之后又被征召入朝，做的却都是闲散职位。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祸患又从天降：他曾经和王昕一起出使南朝，高欢的亲信高隆之向他们索要南朝的货物珍宝未遂，便授意御史罗织罪名，将魏收和王昕羁押在御史台，过了很久才释放。

后来，魏收终于得到机会，由高欢的另一个心腹司马子如将他推荐给高欢，他便到了晋阳，做了高欢手下军府中的文职官员。可是他并不适应这里的生活，有时接到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不能很好地执行，便经常被申斥、

责骂，甚至鞭打。郁郁不得志的他十分狼狈，幸好遇到司马子如要去晋阳觐见高欢，便向司马子如求救。

他如何求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司马子如对高欢的建议来看，他不过是想过得体面一些，没有想过向上爬，也没有想过报复那些责骂、殴打他的人。

司马子如是在一次宴会上半开玩笑地推荐魏收的。他对高欢说："魏收当年是做过皇帝身边的中书侍郎的，那可是国家的文胆，希望大王能够稍稍重视他一下，给他点体面的事儿做。"司马子如说话非常得体，没有说魏收在晋阳的不适应，也没有说魏收如何一次次被斥责、惩罚，只说魏收是个才子。

高欢与司马子如关系向来密切，甚至于家庭事务都要靠司马子如出面调停。所以，他将魏收从军府中调出，让他做了自己大丞相府的文职官员，可是依然没有信任他。

魏收也知道，这是自己当年惹下的祸。高欢身边的红人，崔㥄和高隆之，自己都得罪过，而孝武帝在位时自己无意中卷入的是否授予高欢相国的风波，估计高欢也已经得知。只不过高欢并非暴虐好杀之人，所以只是将他雪藏，并没有对他进一步地处治。对此，他泰然处之，觉得能够在这位高深莫测的霸主治下平安生活，已经是万幸了。

这时，那个当年想凭借文才平步青云的魏收，已经逐渐心灰意冷，他想要寻找另外的一条道路进行自我实现。"立功、立德、立言"是古人心目中的"三不朽"，既然立功难以实现，立德在乱世又不现实，那么就立言吧。

想到自己曾经负责过的起居注与北魏国史撰写的工作，魏收认为，写一部北魏的国史，是自己足以流传后世以为不朽的事业。

于是，他请求离开晋阳，做一个朝廷中的小官，专职写作国史。当时北魏已经分裂，高欢治下的东魏迁都邺城，而在邺城的朝廷中主事之人，就是高欢的长子高澄。高澄同意了魏收的请求，委任他专职负责国史的写作。

遭受冷遇之后的选择，就决定了魏收一生的事业、千秋的功过。

四、峰回路转

专职负责北魏国史写作期间，魏收其实也无法阻止外界事务的干扰。一

方面，高欢和高澄父子把他当成可以狎亵的弄臣，时常开他的玩笑；另一方面，他们又认可他的文学才华，经常命他捉刀写作重要文章。而这对父子对他的态度，又被其他人看在眼中，并悄悄将他卷入另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高欢、高澄父子常常借故笑话魏收，虽然不一定有恶意，但魏收本人估计很难接受。

有一次，高欢从晋阳来到邺城，并在邺城城外的西门豹祠举行大宴，招待邺城的朝廷官员们。在宴席上，高欢见到魏收，便对身边的司马子如说："你知道吗，魏收现在可是史官，他在写国史啊，国史里肯定会写到我和你，要给我们定性的，到底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就看他的一支笔了。我听说当年的史官都是被那些权贵巴结着，达官贵人们还总是抢着送吃喝给史官呢。你现在可是朝中的尚书仆射，你有没有给魏收送吃的啊？"说罢，高欢和司马子如一起哈哈大笑。——其实，如果把高欢的这段话中的每一句都加上"哈哈"、"呵呵"一类的笑声，应该更为形象。作为出身于北部边境军事地区的人，高欢和司马子如恐怕早就养成了拿读书人开玩笑的习惯，这就如同汉高祖刘邦见到儒生就要破口大骂一样，是他们自小便从周遭环境中培养起的格调。然而，魏收毕竟长年与士人交往，对这种嘲笑自己事业与人格的言辞，自然心有不甘。

可是，高欢又会突然一本正经地将他叫到身边，严肃地说："你曾经在晋阳做过一段时间，你也知道，大家都说我丞相府中现在最为炙手可热的就是陈元康。他是我现在很看重的人，因为我府中的很多事都需要他去处理，需要他去奔忙。可是啊，你知道吗，我很清楚，后世的人怎么说我，都要靠你来写啊。千万别以为我不知道哦！"

高欢的这番话的确需要好好琢磨一下。他到底是开魏收的玩笑之后稍稍安慰一下，还是用"千万别以为我不知道哦"来威胁魏收不要把自己写成恶人？抑或他是要表示，虽然自己目前最看重身边办事的人，但其实是不敢怠慢魏收这个为自己盖棺定论的史官？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高欢很少在臣下面前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只有面对少数心腹时，他才会说得清楚一些。因此，这番话看上去很含糊，也确实会让魏收难以摸透他的心思。

如果说高欢对魏收的态度还算得上温和，那么高澄对魏收就完全是戏谑了。一次出游，魏收等朝臣都随高澄一同出行。高澄暗地里对众人说："魏

收这个人恃才傲物，你们一定要揭他的短，让他难堪。”在高澄的授意下，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揭魏收的短处，甚至还提到他当年在洛阳的绰号“惊蛱蝶”，用以笑话他当年是如何令人厌烦。

魏收尽管机智过人，终究不能像小说中的诸葛亮一样舌战群儒。但就是这样被戏弄，高澄还觉得不过瘾，下令说：“你们说得太轻了，还得来点儿猛料，要狠狠地批评。”于是，有人说起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说魏收在晋阳时，写了一首诗，给大家读完之后还顺带诋毁了一下自己的叔父魏季景。高澄等人随声附和，都说曾经听过这个故事，并斥责魏收不懂尊敬长辈。

魏收百口莫辩，尽管他想要澄清事实，但高澄就是想看他的笑话，所以他的努力毫无作用。当然，他是对叔父魏季景不大满意，自己少年成名时，魏季景的名气和官职都在他之上，所以当有人将他叔侄二人相提并论时，他不屑一顾，认为这位叔父不但是个草包，而且根本无法和自己相比。可是那毕竟是年少轻狂者一时的激愤之言，现在却被高澄等人拿来似模似样地讲，而且添油加醋、以讹传讹，这对自己的名声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可是，高澄等人并不在乎他的名声，他们只想从他身上找一些低层次的快乐而已，至于尊重，那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因为他既无社会号召力，又无政治影响力，只不过是一个文人，还不是高澄的心腹，所以随意践踏也无所谓。

魏收就这样忍气吞声，没见他有什么反抗，也没见他日后对这些伤害过他的人有什么过火的报复。可见，后人传说魏收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似乎也并非事实的全部。

尽管被当做弄臣，但魏收依然有高欢、高澄们所重视的才能，那就是做檄文、写政论的大手笔。北魏末年的三位才子——温子昇、邢卲和魏收，虽然名气不相上下，但温、邢二人的笔调温婉哀伤有余，豪放大气不足。而高欢、高澄这样的霸主，最喜欢的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气概，所以，魏收就成了他们外交文章的首选撰稿人。

南北朝从相互敌对到相互通好之后，经常有国书往来。最初的国书总是显得比较生分，而且还是有点冷战的味道。魏收对此进行了改写，创立了来往国书中互致诚意的文字定稿，内容是“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看上去既不生疏，而且又能显示出对南朝示好的意思，于是南朝也十分欣赏，以此为定本。

在高欢去世、高澄继任大丞相后，为东魏守河南之地的侯景发动叛乱，先联系西魏，而后又投靠萧梁。当时，高澄已经坐镇晋阳，他命魏收起草檄文，魏收很快就写了五十余页，可见其急智。而高澄最为看重的，是写给萧梁的檄文，他既希望萧梁能够和侯景断绝联系，让侯景孤立无援，又要震慑侯景，让他感觉到压力。这个重任自然也是落在魏收的身上。魏收在刚入夜时接到任务，三更就已完成，而且写了有七页纸之多。高澄见到这檄文，赞叹不已——他完全忘了自己当日对魏收的奚落。

在高欢、高澄执政期间，魏收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虽然他的文才被重视，但他并未被重用，可他就是凭着文才与机智，受到了另一个人的关注。

这个人是高澄的弟弟、高欢的次子高洋，也就是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洋为人深沉，但由于不大表现出来，所以外人总认为他反应很迟钝，高澄尤其看不起他。在高欢去世之后，高澄赶赴晋阳接管大丞相府，而在邺城统领朝廷百官的任务就落在了高洋的头上。高洋不露声色，暗中寻找能够为自己所用之人作为心腹，一来帮助自己管理朝政，二来以备不时之需。备受冷落与嘲笑的魏收，也进入高洋的眼中。

究竟高洋是怎样结交魏收的，现在已经找不到线索，但可以想见，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文人，终于能够遇到一个肯倾听他的心声、对他表示出信任、事事与他商议而且对他平等相待的主政者，会是怎样的心情。即使魏收做不到肝脑涂地，也会决心以国士报之。

终于，机会来了。高澄突然遇刺，高洋在迅速解决了刺客、安定了邺城局势之后，马上赶赴晋阳接管大丞相府，他秘密下令，让崔季舒、高德正、尉瑾和魏收一同参议国家的机密事务。在高洋准备建立北齐前夕，魏收又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起草禅让文书，包括诏书和禅让仪式上的册文。

当时，这是高洋的头号机密，很多人不知道改朝换代即将来临。而魏收就承担了这项秘密任务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可见高洋对他的信任。

魏收起草的禅让文书中，禅让册文写得最为大气，原文如下：

咨尔相国齐王：夫气分形化，物系君长，皇王递兴，人非一姓。昔放勋驭世，沉璧属子；重华握历，持衡拥璇。所以英贤茂实，昭晰千古，岂盛衰有运，兴废在时，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汉刘告否，当涂顺

民，曹历不永，金行纳禅，此皆重规袭矩，率由旧章者也。

我祖宗光宅，混一万寓。迨于正光之末，奸孽乘权，厥政多僻，九域离荡。永安运穷，人灵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国土臣民，行非魏有。齐献武王应期授手，凤举龙骧，举废极以立天，扶倾柱而镇地，剪灭黎毒，匡我坠历，有大德于魏室，被博利于苍生。及文襄继轨，诞光前业，内剿凶权，外摧侵叛，遐迩肃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协德，舟梁一世，体文昭武，追变穷微。自举迹藩旟，颂歌总集，入统机衡，风猷弘远。及大承世业，扶国昌家，相德日跻，霸风愈邈，威灵斯畅，则荒远奔驰，声略所播，而邻敌顺款。以富有之资，运英特之气，顾眄之间，无思不服。图谍潜蕴，千祀彰明，嘉祯幽秘，一朝纷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启兴邦之迹，苍苍在上，照临不远。朕以虚昧，犹未逡巡，静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时来运往，妫舜不暇以当阳，世革命改，伯禹不容于北面，况于寡薄，而可踟蹰。是以仰协穹旻，俯从百姓，敬以帝位式授于王。天禄永终，大命格矣。於戏！其祗承历数，允执其中，对扬天休，斯年千万，岂不盛欤！

从字面上，丝毫看不出这是一场披着禅让外衣的夺权，倒更像是如同尧舜禹一样将天下交给有德者统领的光荣仪式。文字的魔力就是如此神奇，驾驭这文字的魏收则是在用才思对高洋的知遇之恩进行回报。

在高洋接受禅让、建立北齐后，魏收作为最早参与密谋的心腹之一，自然得到了封赏。他被任命为中书令，一跃成为位高权重的宰相，同时还兼任著作郎，负责编纂国史。第二年，高洋又专门下诏让他修北魏的国史，并给予十分优厚的待遇。

高洋对魏收是信任的，同时也是十分尊重的。在魏收不得志时，肯定对高洋诉说过自己要撰写北魏之史流传后世的理想，难得的是高洋在登基之后并没有忘记魏收昔日的志向，还专门任命魏收为魏尹，但不需要去处理实际事务，因为他要将魏尹的俸禄作为特殊的津贴发给魏收，为的是让他能专心撰写北魏史。

谁知，这部史书，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五、“秽史”的诞生

高洋对魏收十分信任，并不过问他编纂北魏史的细节。之前魏收虽然几次被任命为修史官员，但也只是负责记录当时之事或整理原有的北魏国史，这一次，他才真正被授权写作一部完整的北魏史。经过近四年的编写，魏收修成了《魏书》。

四年左右的时间，写出一部史书，而且涉及的主要时段有二百年左右，这速度未免过快了。明代初年修《元史》，前后两次开史馆，总共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存在的错误就极多。而班彪、班固父子续写《史记》、编纂《汉书》，前后虽然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可《汉书》依然被后世学者找出若干记载错误。虽然时间不是衡量史书水平的标准，可时间过短也容易造成写作不够严谨、考辨不够精审等问题。那么，魏收这部在数年之中就修成的《魏书》，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就要从北魏史的编写过程来看了。北魏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整理国史，前后经过邓渊、崔浩与高允等人，李彪、邢峦、崔鸿与王遵业、温子昇等人在内的多次编修，已经粗具规模。

魏收这次编修《魏书》，依然采取纪传体形式，包括本纪、列传和志三部分。在本纪和列传的部分，以魏收为主的史臣所做的最大工作是“专总斟酌”、“辩定名称，随条甄举”以及“搜采亡遗，缀续后事”。他们对以往修成的北魏国史进行审定与改写，同时制定出分卷分篇的原则，将已有内容置入其中，同时还要在国史之外再寻找其他相关材料，以做到完备、精当、真实。

除去纪、传之外，魏收在志书的写作上也下了很多功夫。针对北魏的实际状况，他创立了《官氏》、《释老》二志，《官氏志》主要将北魏自立国以来主要的官职与各姓氏的发展与势力演变作了大致交代，《释老志》则将佛教、道教对北魏历史的影响作为专篇。在纪、传部分完成之后，高洋本想让魏收到地方任实职，魏收就以志书尚未修成为由推辞，可见这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按照后人的记载，与魏收一起修《魏书》的其他人，都没有史学才能，所以《魏书》中“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以及上呈时的“前后二



表一启”都出自魏收之手。

这么一部魏收付出很大心血和努力的《魏书》，却遭遇了一问世便被非议的命运。当时传出若干的流言，比如魏收曾经在阳休之的帮助下才谋得修国史的职位，所以他表示要为阳休之的父亲阳固写一篇好的传记作为报答；又如魏收接受了尔朱荣之子尔朱文略的贿赂，故意隐去尔朱荣的若干罪行，还在传记最末说他“如果能够以德服人、推行教化，那么他的武功就比得上韩信、彭越，辅弼朝廷的业绩也堪比伊尹、霍光”。

这些传言，直指魏收修史的道德操守，说他生性褊狭，当年和他有过节的人都被他写得一无是处，因此认为《魏书》不但不能公允地讲述北魏历史，而且还是魏收挟私报复的工具，是一部“谤书”。

这些针对魏收和《魏书》的传言，究竟是真是假？当然，魏收是否要报答阳休之、是否收了尔朱文略的贿赂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可是说他用《魏书》作为报复的工具，或是以《魏书》作为私人交易的筹码，是站不住脚的。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针对这些对《魏书》与魏收的非议，就举例证明在阳固、尔朱荣的传记写作上，魏收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那样进行违背事实的描述和评论。而《魏书》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著名的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与田余庆先生都曾撰文表示了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周一良先生的《魏收之史学》写作于他在燕京大学三年级时，当时他年仅 21 岁。其文章的深度以及对《魏书》了解的深入，今日大三学生绝难与之相比。)

既然《魏书》并非传言者所说的那般不堪，为什么还会传出这些对魏收与《魏书》不利的谣言呢？空穴来风，必有其故。《魏书》遭到如此诋毁，与魏收本人以及当时史官的生活状况不无关系。

之前说过，高洋为了让魏收能够安心编写《魏书》，特别任命他为挂名的魏尹，只拿俸禄而不需处理当地事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史官的待遇普遍偏低，专职史官的俸禄无法保障正常的生活，只能从其他渠道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而自北魏后期开始，官场腐败、贪污纳贿的行为几乎已经成为常态，有实权的官员自然是利用职务之便广收贿赂，而史官不处理实际政务，只能靠别人接济或是宣称写史书时要如何如何，接受入传者后人的贿赂。这种情况在当时完全不是秘密，所以人们认为魏收也是如此，也要收受贿赂才在史书中给人好评，属于“合情”的猜测。

除去这层原因之外，魏收个人的性格也确实存在问题。他在洛阳时被称为“惊蛱蝶”之事，一直被人提起，加上高澄等人对他的取笑，使他恃才傲物、任意妄为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虽然他的性格已经不再如此，但在旁人的心目中，他依然是唯我独尊、党同伐异的一个人。据说，魏收曾经说过：“那些家伙，居然敢得罪我！我抬举他，他就能上天；如果我踩他，他就被压到地底下了！”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要在史书里做手脚，对得罪过他的人进行不公正的记载。

到底魏收在写作《魏书》时有没有受贿而为人粉饰、因私仇而诋毁他人的行为呢？

首先来看受贿一事。史官的俸禄低、待遇差，确实如此，不过高洋对魏收是有特殊优待的：魏收先后以中书令和魏尹的身份修史，其原来官职的待遇在当时都非常高，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还能保证家人的正常消费需求。既然已经没有生计上的忧虑，魏收为何还要收取贿赂呢？从魏收一生的情况来看，他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被查处过，也没有因此受到过非议，这就可以从侧面证明他不是一个索取无度、见钱眼开的人。而且，尔朱荣是什么人？是北魏末年十分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写北魏史必须重视的敏感人物。他确实做过一些残忍的事情，可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人们对他拥立孝庄帝、终止胡太后专权乱政一事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魏收对他的好评，也并非出于受贿而刻意为之，从北魏末年对尔朱荣的议论来看，魏收的观点更接近当时的普遍认识。所谓受贿而为尔朱荣文过饰非，不过是捕风捉影之词而已。

再来看他因私怨而贬低他人之事。魏收的性格确实有偏执、好斗的一面，但这一方面的性格会不会带入《魏书》的创作中？从《魏书》的内容来看，那些被魏收写得较为不堪之人，的确是有各方面污点的，或是道德有污点，或是政治上平庸，或是文化水平不高，魏收本人强加诋毁或捏造的内容可以说基本没有。而最重要的是，《魏书》中与魏收有过交往的、被评价不高的人，或是因为北魏分裂后东西对峙时互相仇视的政治原因，或是因为此人对高欢父子以及东魏政权的态度问题而被批评。魏收本人的情感因素有多少？很难说，我们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也绝不会成为左右一篇传记基调的决定因素。

可是，流言就这样越传越广，到最后连皇帝高洋都被惊动了，便下诏让《魏书》中有传者的子孙后人到尚书省进行讨论，类似于对新问世作品的学术研讨会。这一下，有上百个世家子弟都表示了对《魏书》的不满，有人说自己先祖地位显赫，但魏收却未予记录；有人说自己家族流传久远，可《魏书》却没有记载；有人说魏收在史书中诋毁其先祖的光辉形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这种情况，魏收见到批评就马上作出回答，表示自己根据什么材料作出这样的描写，或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将某些家族和人物纳入史书。

世家子弟们对魏收的这场大批判，更像是为自己的先祖在史书中找个位置，以表示其崇高与伟大——在他们看来，史书更像是光荣榜与陈列馆，而非反映一个时代最重要人与事的典籍。的确，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家族作为社会与政治实体的发展，表彰家族的谱牒学与家传成为一时之显学。每个家族貌似都出自上古某个圣王，而且都做过屠龙斩蛟、移山填海的大事业。谱牒学与家传中的人物，都是高大完美的，他们做过的事情，都是重要而伟大的，而他们对后世的影响，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些家族的子孙们，也就信以为真，当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祖先在《魏书》中竟然不那么崇高，甚至只字未提，他们岂能不怒？于是，他们纷纷指责魏收，并要求将自己先人写进去，而且要写得如圣徒一般。



如果真的如他们所愿，《魏书》就会从“竹林七贤图”变成“清明上河图”，充斥着不相干的人和事，变成不伦不类的大杂烩。他们指责魏收的理由，还不仅仅是不写他们的祖先。范阳卢氏的卢斐指出，自己的父亲卢同没有单独的传记，相反只作为本族先祖卢玄传记中的附传出现，这与卢同在北魏后期重要的地位、显赫的身份很不相符；顿丘李氏的家族传记，被魏收说成来自南朝的萧梁而非北方的赵郡，其后人李庶也表示不满。他们对魏收的指责，是认为魏收不能秉笔直书，而是尽情诋毁他人先祖与家族。这顶大帽子扣下来，相当于抹杀了魏收的史学，而且还要把魏收钉在史学的耻辱柱上。魏收哪里受得起，他暴跳如雷，上奏高洋，认为他们想要借讨论史书之机谋害自己。高洋大怒，亲自过问此事，但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可是，就因为这次关于《魏书》的讨论，高洋专门下令，将若干对魏收和《魏书》进行猛烈抨击的世家子弟逮捕下狱，有人不堪劳役之苦，因此死去。为什么高洋要逮捕他们呢？这倒并不是魏收进谗，也不是因言获罪。众

人对《魏书》议论纷纷的时候，正是高洋本人性情发生大转变的时期，他一方面终日饮酒作乐，一方面对朝臣、宗亲进行屠杀，因为杀人较多，有时让人找不到真实原因，便以“暴君”斥之了事。

按照高洋执政后期杀人的情况来看，世家子弟只是被逮捕而非处死，说明高洋对他们还算宽容。而他之所以因非议《魏书》便逮捕他们，原因本不在《魏书》。

高洋建立北齐之初，很多元老重臣并不支持他，所以他一方面逐渐削弱老臣们的权力，另一方面向大族伸出橄榄枝。可是，那些一等的高门大族对他也并不是很支持，对他的态度一向不瘟不火，也不愿与他的联系过于紧密。生性隐忍的高洋终于在自己对南朝用兵失利后大发雷霆，将多年来积郁的情绪全部发泄出来，这其中，就包括对世家大族的不满。而通过对《魏书》的讨论，他看到了世家子弟们以门第自傲的情绪，这正是大族不肯与自己亲密合作的最重要原因。所以，他下令将那些抨击《魏书》最卖力的世家子弟下狱，其实为的是泄自己之私愤，并给大族敲敲警钟，让他们真正臣服于自己。

可是，这笔账还是算在了魏收的头上。对《魏书》的批评并没有因此而平息，高洋也不清楚到底此书是不是有问题。他知道自己对史学没有判断能力，所以没有妄下结论，而是命令先不要将此书公布流传，并让百官商讨，还允许那些被写入《魏书》者的家人和认为此书不尽不实者参与讨论或笔谈。这样一来，世家子弟更是认为皇帝都不再支持魏收，便继续抨击《魏书》，上书指摘《魏书》不当之处的更多，让魏收难以应付。而且抗议者还称《魏书》为“秽史”——此后一千多年，人们提到《魏书》，总会认为它是“秽史”，是史书中最大的耻辱，而魏收也是史学家中最大的败类。

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大的误会。事实上，魏收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表现家族在北魏的发展了。后代史学家们在评价《魏书》时，认为将以往的以人物为一篇传记中心的形式变为家族传记的形式是《魏书》的一个缺陷，而就在《魏书》问世之初，因自己家族被详细记载且颇为称赞的北齐宰相杨愔就曾提到过这个问题，认为《魏书》的美中不足就是叙述家族情况过多且细碎，不同于以前史书那种以人为传主、清楚明白的叙述方式。魏收当时的回答是：“之前中原发生大变乱，关于家族谱牒的资料大多都散佚了，现在十不存一，无法让后人了解北魏时中原大族的情况。基于此点，我才根据可信

的材料，吸收族谱的写法，在《魏书》中将各家族的情况写出来。希望您能从这个缺陷里看出我的良苦用心，以免求全责备啊。"

魏收就这么被误解着，只能在信任他的人面前稍微倾诉自己撰史的用意。可惜，这样的谈话机会并不多，让我们很难听到他诉说一些细微之处的精妙了。

六、失意人改失意史

《魏书》问世后三四年间，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去世。围绕着皇位，北齐皇室展开了争夺。高洋的太子高殷即位后，宰相杨愔等密谋，打算除掉对新皇帝威胁最大的两位王叔——常山王高演和长广王高湛。计划败露，"二王"率先发难，将他们一网打尽，然后在太皇太后娄氏的许可下，废黜高殷，由常山王高演称帝，是为北齐孝昭帝。

这件事，对魏收与《魏书》的命运也产生了影响。魏收一生的沉浮，总是伴随着权力更迭，他没有主动投入其中，但权力的漩涡总是将其卷入。中国文人的命运，大抵如是。

魏收受高洋信任，众人皆知，他确实也为高洋献计献策，以报答当初的知遇之恩。高洋执政晚期，总担心太子高殷性情怯懦，难堪大任，觉得自己百年之后太子即位，北齐政权会出现危机。魏收当时担任太子少傅，他知道高洋对太子的不放心，想要劝说，但因为高洋此时已经整日沉迷于酒色，不肯听他人劝告，他便转而对高洋最信任的大臣杨愔说："古人云：太子为国家根本，不可动摇。现在主上喝了酒之后就说太子无法继承大统，而且我听说他有时还提出要传位给常山王，这是会让臣下生异心的啊。如果主上的确下定决心要让常山王继承皇位，那就该早下决定，确定名分；如果这只不过是酒后的戏言，我忝居太子少傅之职，就要辅弼太子，死而后已，只怕戏言也会扰乱朝纲啊。"

杨愔将魏收的话上奏给高洋，高洋觉得魏收所言有理，从此以后再也不说要传位给常山王高演的话了。从魏收的立场来讲，他作为东宫重要官员，要为太子争名分，同时也为高洋建立的北齐江山着想，此举十分应当。然而，若站在后来夺权成功的孝昭帝高演的立场上来看，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假如魏收当初是力劝高洋传位给自己，又何必以臣犯君、发动宫廷政变，最

后逼得高殷退位呢？最重要的是，高演觉得魏收是站在高洋、高殷父子那边的，不能收为心腹。

就如同当年为魏孝武帝解释相国位高权重，最终导致高欢没有做上相国之事一样，魏收再次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为自己树了敌。高演也没有直接将魏收革职雪藏，他掌握了北齐政权之后，让魏收在禁中起草诏令，很多天都不让他出宫回家，并任命他为中书监。中书监是中书省最高的官职，而且一向是由德高望重者担任，当初高洋曾想任命魏收为中书监，但后来觉得魏收虽然才华横溢，但过于轻率，所以并未任命。高演此时安排魏收做中书监，也是主动示好，希望魏收能够效忠。

魏收没有作出明确的表示。的确，他与高洋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做过太子少傅的经历，让他很难一下子转变立场去接近篡位者高演。他的确是对高洋与高殷有感情的，因此他自己在情感上很难接受，更不要说真心真意地向高演效忠。在政治中投入感情，本就是宦海中的大忌，更何况是站在已被推翻一方的阵营中。可是，魏收就这样天真，天真得似乎有点可笑——已经经历过北魏末年孝庄帝、节闵帝、孝武帝几次皇位易手，都未坚贞不屈以身殉主的魏收，为何此刻要对已经死去的高洋、已经被废黜的高殷如此难以忘情？后人可能觉得他不够理性，也可能觉得他没有资格去坚守什么，但他确实就是这样，为了曾经的君臣之情，坐失了被当下主宰者高演信任的良机。

他是天真的，而且任性。但每次读到他这段经历时，总让我想到一句话：贞妇失节，不如老妓从良。

我们每每看到颜真卿、文天祥、方孝孺、史可法的就义便唏嘘不已，而对那些并未舍身赴死的人却诸多非难。颜、文诸人最后的结局很壮烈，但那也不代表他们的人生毫无污点。那些没有为国、为主、为他人去赴死的人，的确没那么壮烈，但他们也并非一无是处。那些选择舍生取义的人，是鲁迅所说的“有缺点的战士”，那些活下来的，比如魏收，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他没有做出颜真卿们的超道德行为，但他也保持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情感。要知道，他在表现出对故主的不舍时，已经五十多岁，不再是莽撞少年。

果然，当高演返回大本营晋阳时，魏收被留在了邺城。他中书监的职位也转成了侍中，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变远了。有人说，这是因为高演十分信赖的大臣王晞从中作梗，因为王晞是当年与魏收一起出使萧梁的王昕的胞弟，而王昕与魏收不和，故而王晞暗中进谗，让高演疏远魏收。这种说法是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所谓“物必先腐而后生虫”，假如高演心中没有一根刺，王晞与他再亲密，高演也不会贸然作出政治上的大转变——除非他是个昏君。

高演自然不是昏庸之辈，所以魏收被疏远是他个人的选择，与人无尤。

当时的魏收，还在负责北齐国史的编撰工作，而高演又委派一位年轻的才子祖珽为著作郎，想逐渐将魏收修国史的任务接过去，彻底架空魏收。后来，高演又让魏收做太子少傅，将他侍中的职位也免去了。

高演死后，当年的长广王高湛通过努力成为北齐第四位君主，是为武成帝。高湛和他的儿子、后主高纬都是穷奢极欲而不愿处理政事之人，朝政都交给亲信佞臣处理，这时的魏收被他们抬上尊位，但已经没什么实际的发言权了。

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失意者，后半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修改令世家子弟不满的《魏书》。

当年高洋因为众人不满，只是宣布《魏书》暂不通行于世，并没有说要修改。而高演在位时，则基于北魏早已灭亡、北齐应作为北魏的合法继承人而推出一部北魏史的理由，要求魏收对《魏书》进行修改。魏收遵照高演的命令，对《魏书》作了调整，很多地方都作了修改，但这次修改涉及哪些篇幅、具体文字，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后来，魏收因为《魏书》只藏在皇家，世人根本无法得见，便建议誊写两本，一本送到晋阳，一本放在邺城，任世人抄写流传。

到了高湛称帝之后，又有大臣上奏说北魏史还是有不符合实际之处，高湛便下诏要求魏收再次作修改。这次修改，则全面吸收世家子弟们的意见，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当年卢同之子卢斐要求为卢同单独立传，魏收在这一次修改中满足了，不过卢同的传中，除了其任职为官的经历之外乏善可陈，倒更显得是滥竽充数。而原本有个人传记的崔绰，反而被放在了崔氏家族的合传之中。杨愔由于当年策划谋杀高演、高湛，导致其家族的传记也被修改，原有的“有魏以来，一门而已”八个字被删去。总之，这第三次修改，完全是出于行政命令，而行政命令则来自世家子弟的请求。这次修改，并不算是《魏书》真正意义上的修改，而是粗暴的政治力与骄横的家族势力对《魏书》的合力易容与阉割。

魏收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



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放过魏收。北齐灭亡后，魏收的坟墓被发掘，遗体被抛尸，不知道是谁如此恶毒，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凶手来自《魏书》所得罪的那些人。

七、千载骂名

魏收的仕途崎岖坎坷，人生也是一波三折。最有戏剧性的是，他想要作为名山事业的《魏书》，竟为他赢得了千古骂名。

前面已经说过，而且很多学者也论证过，《魏书》不但不是报复工具、献媚工具，相反，是准确、真实地反映北魏历史的一部史书。那么，为什么后人提起《魏书》，还是会说"秽史"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魏书》的被损害，魏收的被侮辱，不是一人一时的力量导致的。在几重因素的作用下，《魏书》被打上"秽史"的标签，而这一标签的张贴过程，正体现了中国文化观念的弱点与弊端。

第一重因素，就是政治因素。

魏收写《魏书》，完成《魏书》，是在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在位时期，而魏收与高洋有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他是高洋主动结交并引为心腹的人。高洋对他很信任，而且对他的事业不作过多的干涉，所以尽管高洋在位时很多人指责《魏书》不尽不实，高洋也没有妄下判断，让他按照旁人的意思进行修改。

但高演与高湛则不同。高演对魏收是比较排斥的，二人之间谈不上信任。高演对魏收所作的《魏书》也不大尊重，因为这部书被高洋下令暂时不予发布，加上他听说此书有问题，就下令让魏收进行修改。高湛对魏收的风度很欣赏，但他对史书这种传之千古的事业并不十分重视，因为世家子弟们还在讽刺此书，就要求魏收按照他们的意见改。他本人对魏收的态度，是比较狎昵的，新造了游乐场所，专门把魏收的画像挂在里面，颇有叶公好龙的意思。

魏收对《魏书》的两次改写，就是这么一个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力指挥学术的行为，本身并无太多价值可言。可是，后人一看，为什么皇帝都要求你改？因为你有问题。为什么你自己也修改了？因为确实有问题，不改说不过去。所以，《魏书》是"秽史"的说法就被外行领导内行下的这场闹剧给

坐实了。

除去这个因素之外，到了隋朝，隋文帝对《魏书》也十分不满，认为此书以东魏为正统，一笔抹杀了西魏的历史地位。西魏后来被北周取代，而北周又被隋文帝以禅让的形式取代，从隋文帝的政治角度去考虑，如果西魏不是北魏的合法继承者，那么北周和隋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此外，他觉得此书褒贬不当，将一些后来投效西魏北周的官员过分贬低，因此，他要求魏收的族弟魏澹重写一部北魏史，用以取代《魏书》。

隋文帝杨坚从政治宣传的角度上，对《魏书》所持的正统论进行否定，这本来就是政治领域的事情。而后人不明就里，以为魏澹重写北魏史，正是《魏书》为“秽史”的最大证明。政治干涉修史，只能搅得一潭浑水。而魏澹所修的《后魏书》虽然符合了隋文帝的需要，可终究没能流传下来，这也算是无情的时间所作的自然筛选吧。



第二重因素，是世家大族的作用。

《魏书》问世之后，坚持最久的反对声音，来自世家大族。大族子弟们认为自己的先人无论是家族出身还是官位都应该大书特书，但在《魏书》中，或是一笔带过，或是直言其短，有些人还干脆没有被写入书中。这是看重家族声誉、要求家族青史留名的世家子弟们所不能接受的。

他们投诉、上访，制造舆论压力，并诋毁魏收修史的道德，就是想换得自己的先人在《魏书》中的一席之地。谁料，高洋将其中反应最激烈者下狱，还出了人命，这无疑引起了他们情绪上更大的反弹。高洋制裁他们，是因为其自恃门第而保持与皇帝的距离，并非因为他们诋毁《魏书》，但他们却将这笔账算在魏收头上，认为是魏收睚眦必报的性格导致了这场冤狱。

从这场牢狱之灾来看，世家子弟是弱势的一方，但并非弱势者就一定正义。在中国古代，弱势群体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是我们文化与法治传统中的缺陷，可失去权益保障的人是否就绝对正确呢？并不一定。他们受到打击，不等于他们站在正义的一边。

可是他们认为，只有将其先人写入《魏书》，让他们名标青史，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所以他们持续抵制《魏书》，并不断要求改写。当魏收迫于政治压力两次改写此书时，他们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并更加鄙视原本《魏书》。而且，高洋对他们的抑制也是暂时性的，随着他们在政治上再次抬

头并实力越来越强，他们所左右的舆论也就自然将魏收和《魏书》斥为小人、秽史。

世家大族有生命力，其生命力就在于一代代传承中不断强化的家族意识。随着这种意识的不断加强，身份认同就成为他们每个成员的共同信条。而利用仇恨来强化家族意识，无疑是最有效的，《魏书》就是见证着他们"被侮辱"、"被损害"，甚至"遭受不白之冤"，最后终于斗争胜利的样本，他们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历史见证呢？

第三重因素，是文化观念不同而导致的歧视。

魏收曾经和王昕出使南朝的萧梁，王昕任大使，魏收任副使。王昕风流倜傥、颇善言辞，魏收文采斐然、出口成章，萧梁皇帝萧衍君臣对他们的才华十分惊叹。但南朝文人对魏收的才华或是嫉妒，或是否定，后来还流传出这样一段故事：

萧梁派文士徐陵出使北齐，当时的魏收已是北齐首屈一指的文臣。见到南朝有使臣来到，魏收便将自己的文章编为一集赠给徐陵。魏收的意思，是想让徐陵把自己的文章传到南朝。

以文会友，特别是文字外交，是分裂时期常有之事，谁料在出使结束返程时，徐陵上船渡江，行至江心，把魏收赠送的文集掷入江中。身边的随从问他为何要做出如此失礼的行为，徐陵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我这是在给魏收藏拙啊，免得他被我们南朝士人嘲笑。"

徐陵也是颇负盛名的文人，他这样的举动，明显是对魏收文学才能的否定。而这桩轶事被后人记在《隋唐嘉话》中，说明到了唐朝，此事依然能够流传，这就是恶趣味了。

当然，魏收在做人方面有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还都在出使南朝的时候表现出来了。他和王昕到了南朝，买了当地的奴婢到使臣居住的驿馆，这就是借职务之便揩油了。使臣到达他国，购买当地人口为奴婢，这就是"国际问题"，而魏收不但不注意，还积极参与。他手下的随行者有人做奴婢贩卖生意，他不但不制止，还主动去购买。此事被萧梁得知，驿馆中的官员都因此被判罪。自此，南朝人士都觉得魏收品位不高，虽然有才但为人太差。

对魏收的这种印象，就这样存在于南朝人士的心中。而且，北齐派遣到南朝访问的使者，有些来自世家大族，有些与魏收不和，比如王昕，因此魏

收在南朝的形象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到了隋唐时期，南北一统，在文化上宗奉南朝，因此南朝人的一些评论，也被隋唐全盘吸收。

第四重因素，是盲从心理。

一般人对《魏书》这样的史书是不具有判断力的，即便能说出个好坏，也只是出自个人好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能够影响一本史书在他人心目中印象的，就是专家与权威了。

一个专家、权威，莫名其妙地将魏收给盖棺论定了，而且坐实了《魏书》是“秽史”。

这位专家，叫做刘知幾。

刘知幾是唐代的史学家，曾几次担任史官，负责唐代国史的编纂工作。后来他因为史官制度存在很多弊病，一怒之下辞官回家，闭门著书，写成了《史通》。《史通》是中国古代专门探讨史书写作方法、立意原则等历史编纂学话题的第一部著作，其中很多次提到魏收。



刘知幾在论述史学家应该具有的修史道德时，就以陈寿、魏收等人为例，认为他们创作动机不纯，如果有人和他们有私人恩怨，或是他们索贿不成，就对史书中的人物进行恶意攻击。在讲述一些史书写作的原则与技巧问题时，刘知幾也几次对魏收点名批评，认为其《魏书》存在很多破绽。

《史通》这部书在中国古代流传并不广，因为其中有着和正统儒家观点相冲突之处，所以一直以“非主流”状态存在着。但由于它是第一部论述中国史学的书，所以修史者会翻看。而刘知幾批评魏收的言辞，也以各种形式流传了下去，使得不读《史通》的人也有机会知道。

单看刘知幾评价《魏书》的某一句话，会让我们觉得《魏书》是一部烂书：收受贿赂写好评、挟私报复打击人、别出心裁添内容、生造词汇贬南朝，而且还为早亡太子立本纪，村言全部改典雅。也许我们接触到刘知幾的这番言论，会产生一个印象：《魏书》一无是处，作者魏收完全是欺世盗名、贻害后世读者。

事实上又如何？

刘知幾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他在批评前代史学家的错误时，不遗余力，过激之词比比皆是，有时讨论到他不喜欢的历史人物还要爆粗口，比如称西汉开国皇后吕雉为“野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

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上十分浓厚的文人气质。另外，《史通》借评价历代史书来提出自己的修史观点，所以分析案例时，充满了矫枉过正之言。所以，单看刘知幾的话，会造成《魏书》水平低劣的印象，可是只要细读《史通》，就会发现，被批评的不仅是《魏书》。脍炙人口的“前四史”，无一不被刘知幾批评，其中尤以司马迁和班固受到的非议最多。若是用批评的激烈程度来作比较的话，似乎《史记》还不如《魏书》呢。

而且，刘知幾也经常有失察之处。比如他说魏收受贿和报复的事，就属于不明真相的愤怒。可惜的是，后人更加不明真相，他们见到刘知幾批评了魏收，指摘了《魏书》的缺陷，就认定《魏书》果然是“秽史”。

这完全是一种生吞活剥、不辨真假的盲从心理。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可是，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信了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就到处传扬的人并不少，道听途说便义愤填膺的人则更多。

就是这几个因素，导致了魏收被后世打翻在地，《魏书》上也被踏了亿万只脚。

平心而论，魏收不是一个很高尚的人，《魏书》也不是毫无破绽、不容批评，但如此一边倒地对其进行道德批判，并总以“秽史”做其标签，绝对是不仁不智。

魏收，只是乱世中的一个普通人，只是大时代阴影笼罩下的一个正常生命，不是纯洁无瑕，但也非一无是处。他的一生，是在乱世中挣扎着挨过去的，但挣扎时他并没有害人；他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中求生，好不容易学乖，但并未学坏。

他的《魏书》，对北魏的兴衰轨迹有整体的描述，也有细微之处的探索。其中的精妙之处，可能二三十万字也说不完。他将《魏书》看成自己“立言”的事业，怎么会自毁清誉、到处夹杂些乱七八糟的私人恩怨在里头呢？

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魏收与《魏书》的联系，也是如此。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魏收与《魏书》，我想用周一良先生自传的名字。周先生是现代学者中最早全面研究魏收史学的，他对魏收的认识与理解至今很少有学者能够超越。他自传的名字用在魏收身上也十分贴切：

毕竟是书生。



祖珽

——才子为何变成权臣

西方学者曾经对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古代中国的官僚，往往有着复合型的身份：他们既是国家的行政官员，同时因为研习儒家经典，又具有学者的特征，这其中为数不少的人还是有作品传世的文人雅士。这种情况是最让西方学者们感兴趣的——为什么中国古代官僚的学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如此之高，而不只是行政管理层次的技术官僚？

这其实是个尴尬的话题，但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因为贵族体制过早地瓦解，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成为集行政权、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于一身的庞然大物。官场，在中国古代有着“万流归宗”的地位，而“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其实正是中国古代士人为着晋身官僚阶层那种迫切心理的真实写照。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政治权力、经济、文化”这三种社会上独立存在的影响力，在古代中国则是政治权力独大，经济影响力会很轻易地被描绘成“商人重利轻别离”，文化影响力也像白居易在李白墓前作出的慨叹一样，“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正是因为如此，成为官僚，成为更有政治权力的官僚，就成了一批人的奋斗目标。值得深思的是，很多有才情的文人，有学问的儒生，也并没有在这一“目标”前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参与，以致落下恶名。

一、文人世家的“传统”

乱世就如大浪淘沙，能够砥砺出坚韧的品格，也能孕育出奸恶的心机。祖珽本可以是一个纯粹的杰出文人，但因为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的乱世，他成了官僚体制下机关算尽的权臣。

祖珽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这样的家庭，也许会给子孙以文化上的熏陶，但未必能给他们人格上的陶冶。从祖珽及其家族的情况，就能看出这一点。

祖珽的祖父祖季真，因为“多识前言往行”这一博闻强记的能力而担任过北魏的中书舍人，其父祖莹更是一时文人之翘楚，曾任北魏的太学博士、国子祭酒、幽州大中正（主地方人物品评、为授予官职提供鉴定参考的官职）等职。

相传祖莹少年时代醉心于读书，他的父母担心夜以继日的苦读累坏了他的身子，便禁止他夜间读书。但他自有对策，经常偷偷地在煤炭的灰烬中藏下火种，然后支开仆人假装就寝，等待父母入睡后就取出火种为室内照明。因为怕家人发觉，所以他用衣服和被子把门窗都遮挡起来，唯恐光线外泄。一般来说，这样的事迹总是会被人知晓的，果然，祖莹的这一事迹很快传遍四方，家族中人都称呼他为“圣小儿”，意思是他是个读书种子。

“圣小儿”这样的评论还真不是言过其实。祖莹读书特别勤奋，一次通宵达旦地阅读后，正好轮到他去讲《尚书》，结果他匆忙之间，拿了住在同一房间的同学的《礼经》就赶赴讲坛。无奈之下，他把《礼经》放在面前，全凭记忆将《尚书》中的内容复述出来，一字不差，震惊四座。

祖莹的文采很好，做中书学生的时候，北魏著名的文臣、几朝元老高允就对他大加称赞，认为其他学生的才气都无法与他相比。高允从北魏太武帝时期开始就以文章知名，而且性情耿直，被视为北魏文人的良心。得到他的夸奖，祖莹一时身价暴涨，成为青年中的翘楚。而祖莹背诵《尚书》之事更是让北魏孝文帝吃惊，他亲自接见了祖莹，并任命他为太学博士，彭城王元勰要征召他做法曹参军，魏孝文帝爱其才，亲自下敕令任命他做元勰的掌书记。

年纪轻轻就有了这么多美誉，而且还有一个大好的前途，祖莹应该在自

己的儒学和文章这两大优势上继续努力才是。然而，世事往往是出人意料的。祖莹后来做到冀州镇东府长史，因为贿赂官员被告发，被免职。这应该给他一个警醒，让他以后守法遵礼。可是，他并没有就此收手。北魏后期，六镇叛乱，当时朝廷派李崇为北讨大都督。李崇爱惜祖莹的才华，征召他做大都督府长史，可是祖莹却虚报战功、挪用军用物资，因此再次被免职。

偶然一念之差而犯错是难免的，但是两次都是相似的原因而被免职，不得不说，祖莹虽有学问和才气，但做人的操守和做官的职业道德是有问题的。当然，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随着崇尚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整个北魏的道德标准有了变化，很多官员都有贪赃之习，生活之奢侈更是令人咋舌。在这种社会状况下，祖莹若想跻身上流社会的生活，凭借自己的俸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用尽心思，或是结交大臣，或是虚报战功以求晋升，还动用手中权力损公肥私。若没有这种社会背景，也许祖莹就不会做出那些丑行。但是即便有了这一背景原因，祖莹也可以选择安贫乐道，就像他研习的儒家经典中孔子的高足颜回一样。但是，他选择了无条件地拥抱这个畸形的社会。

社会的畸形，能否成为他个人随波逐流、违反律法的辩护词？显然不能。作为国家的官员，特别是像他这样有着儒学修养的官员，应该尽己所能，让这个社会朝着善的一面发展，而不是自己也成为社会中的畸形细胞。所以，他的这种经历，不值得同情，也不应该得到辩护。

非常有趣的是，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所生活的时代将继续恶化下去，而他也将继续成为恶化社会的恶化细胞，最终演化为毒瘤。

在六镇起兵已经难以控制时，出身秀容川的胡人酋长尔朱荣成了拯救北魏政权的政坛重量级人物。他给了六镇流民武装极大的打击，并且收编了大量叛军，还进军洛阳，成为北魏中央政权的新主人。

尔朱荣拥立了北魏孝庄帝，为了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打算将自己的女儿立为孝庄帝的皇后。可是，他的女儿之前是北魏孝明帝的嫔妃。孝庄帝和若干大臣对这件事犹豫不定，已经被中原文化熏陶了半个多世纪的北魏皇室，对于尔朱荣之女“先帝妃子”这一身份还是有所排斥的。这时，已经复出担任黄门侍郎的祖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援引《左传》中的典故，对尔朱荣进行声援：“当年晋文公在秦国流亡的时候，就纳自己的侄儿晋怀公之妻怀嬴为妃，不能说没有先例。这样的事情虽然有违常理，但是也合乎大



义。陛下为什么要对此疑虑不决呢?”

祖莹的这番话，可谓十分机智。既讨好了尔朱荣，又有经典作为理论基础，如果不是他这样有才学的人绝对想不出。只可惜，才思敏捷用在了取悦当权者上。

也许世间之事就是阴差阳错。祖莹靠着在立皇后这件事上的功劳，本想得到尔朱荣的提拔重用，但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的这番努力宣告失败。

北魏宗室北海王元颢在尔朱荣进入洛阳把持朝政时南逃，投降了南朝的萧梁政权。凭借萧梁的军力，元颢率军进攻洛阳，孝庄帝仓皇出逃，元颢便在洛阳称帝。当时，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北魏官员做了元颢手下的官，祖莹也是其中之一。他担任殿中尚书，还为元颢起草了讨伐尔朱荣的诏书。后来元颢被尔朱荣击败，祖莹替元颢起草诏书指责尔朱荣之事成了他的罪状，他又一次被免官。

此后，因为他有才华，得以再次被起用。祖莹的一生就在这起起落落中度过，但每一次被免官，都不是因为犯颜直谏或坚持原则，而恰恰与此相反。世人评价祖莹的品格，都认为能够收容、救助那些窘迫、遭难之人是他可以称道之处，对于他做官时的道德、品行问题，却选择了缄默，看来这一点确实是他无法直面的疮疤。

一生都在随波逐流，希望能够跻身上层，这就是祖莹的人生基调。他也许没有想到，他那位和他一样有才情的儿子祖珽，就像是他的翻版一样，重复着他随波逐流、钻营上位的故事。

二、劣迹斑斑的才子

祖珽字孝徵，他继承了其父祖莹的博闻强记和敏捷才思，少年时代就以此知名，而且入仕做了尚书仪曹郎中，掌管朝廷的礼仪规定制作。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在东魏的统治下，高洋担任并州刺史，开府治事，征召他做府中的仓曹参军。仓曹参军主管地方上的土地丈量、田租赋税收纳、集市管理、地区馆驿和过所（通行证）管理、户籍管理等事项，按照现在的说法，属于民政官员。不过，高洋之父、北魏末年的权臣高欢也欣赏祖珽的文采，因此对他也十分器重。

有一次，也许是事务繁忙，也许是为了考验一下祖珽，高欢向祖珽当面口述三十六件公文的内容梗概。祖珽出来之后将这三十六件公文书写出来，分毫不差。他这种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被同僚们所推重。

但是，祖珽也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弱点。他担任的职务是并州仓曹参军，不过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租税也都归并州管理，所以祖珽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事实上，他正是这么做的。他收取了很多贿赂，财产十分富足。祖珽还对当时的流行音乐十分在行，从西域传来的乐器琵琶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祖珽不但会弹琵琶，而且能自己谱写新的琵琶曲。他喜欢招引那些城中的少年一起伴着琵琶曲载歌载舞作为娱乐。他还经常到娼家流连，而当时高欢大将军府中的重要幕僚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也是与他同游声色场所的伙伴。他们也经常到祖珽的居所举行夜宴或是留宿，祖珽就拿出山东地区的高档丝织品——大文绫以及连珠孔雀罗一百多匹——作为赌注，让那些娼家女子用当时流行的赌博形式“樗蒱”来争夺这些奢侈品，他就和陈元康等人在一旁围观，把这当成一种取乐的方式。

祖珽等人所享受的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北魏后期洛阳城里上层人士生活的延续。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中原文化大兴，很多鲜卑贵族也都纷纷招揽名士作为门客。但是，文化水平提升的同时，生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很多皇室成员和朝廷高官都聚敛财富、互相炫耀。

当时，最喜欢斗富的，就是北魏的高阳王元雍和河间王元琛。二人之间的炫富举动，就如同西晋时期的王恺和石崇斗富之举。元雍一顿饭就要花费数万钱，令同为富人的李崇艳羡。李崇说，元雍一顿饭的花费，够他吃上三年。而且，元雍的王府、花园和猎场的规模都和皇帝的宫殿、园囿等在面积上和装潢上相差无几，平时的排场也非常之大。

为了和元雍一较高下，元琛用近乎变态的方式炫耀自己的财富。元琛家里有几十匹良马，他用纯银打造喂马的食槽；宴请宾客，所用的酒具和食器也都是来自西域的奇珍异宝。他个人积累的财富也数不胜数，还特别喜欢让来访的亲友宾客参观自己仓库中的金银珠宝。元琛认为自己的排场已经超越了西晋大商人石崇，他自傲地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暴发户的嘴脸暴露无遗。



经过了北魏后期的大乱，元雍、元琛等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并未被荡涤殆

尽，而是顽固地保存在了战乱过后的新贵生活之中。这些新贵，包括祖珽，肆意挥霍，放浪形骸，以缓解自己那颗在纷乱时局中忐忑不安的心。

祖珽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他的家庭并没有为他打下什么基础，没有过多的财物供他挥霍，他完全靠的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收受贿赂使他能够和当时政坛的红人们打成一片，他们声色犬马，甚至还做出十分出格的事情，那就是把参军元景献的妻子——北魏孝静帝时期的博陵长公主之女接到他们聚会的晚宴上，并让她给当晚赴宴的诸人轮流侍寝。让有夫之妇做这样的事，不禁令人瞠目结舌，而这个女子也并非作风开放，只是祖珽用了足够多的钱财让她就范。

对这样的生活，祖珽没有什么愧意，按照柏杨先生的说法，他挥霍的钱财，都是取自百姓血汗的“凶钱”。出身书香门第的祖珽，应该知道这是士大夫阶层坚决反对的行为，可他对此的解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丈夫一生不负身”，如同当年的元雍和元琛一样，散发着暴发户的气息。

也许，当一个人没有什么信条，行事没有底线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就会一次次冲破我们的认知范围。而祖珽此时的作为，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

后来，高洋不再担任并州刺史，按照当时的惯例，作为高洋属下的祖珽应该跟随高洋一同前往新的任所就职。但是，并州仓曹参军的肥差让祖珽无法放手，于是他请求陈元康助自己一臂之力。陈元康是高欢眼前的红人，高欢对他的建议基本上言听计从。因为和祖珽一起花天酒地，陈元康觉得祖珽是个可以共同享乐的人，更何况祖珽对自己一向尊敬，在游戏玩耍方面也贡献了很多新创意，所以陈元康向高欢汇报，让祖珽留任并州仓曹参军。

祖珽继续留在这个位子上，并不是为了恪尽职守、造福百姓，而是为了继续收取不义之财。留任之后，他的胆子变得更大，不但收取地方官员的贿赂，而且还挪用自己所掌管的物资。当时，他和典签陆子先商议，定了一条计策：在申请派发粮食的时候，伪造一份高欢的命令，让陆子先以此为由从粮仓中支取十车谷物，用来为个人牟利。结果这件事情被发现，高欢十分震惊，亲自审问此案。祖珽说自己并没有签发这样一道命令，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陆子先身上。高欢见他言之凿凿，就听信了他的辩词。

盗用粮仓储备，本身是一个不小的罪名，而伪造高欢的命令来盗用，则罪上加罪。面对审问和可以预见的惩罚，祖珽内心没有任何挣扎，也没有丝

毫忐忑，他直接将自己的同伙交出去，而将自己完全撇清，心理素质之强，道德品质之差，都突破了笔者的想象。可最令人大跌眼镜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在高欢信任自己之后，走出审问的场所，对着外面的人大声宣布："丞相（即高欢）在这件事上裁断确实英明，不过吧，这个事儿还真就是我干的，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是高欢，对他这种恬不知耻、自曝其短的表现会如何处理？想来高欢一定是心中恼恨，但是又不能推翻已有的判决，因为那样只能显示自己偏听偏信，缺乏判断力。这一情景，像极了《三国演义》里杨修一而再、再而三地曲解曹操的意思去挤对曹操的样子，也许祖珽的言行真的给了后代的小说家以灵感也说不定。

鲁迅曾经用"才子加流氓"形容某个时期的某些知识分子，现在看来，这个称谓用在祖珽身上，真是丝毫不为过。



三、流氓的运气

祖珽就这样继续放荡地生活着，而且越来越离谱。他曾经到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中饮酒，趁人不注意就藏起了两个铜碟子。餐具少了，司马世云家中的厨师自然认为有蹊跷，便请求为在场者搜身。搜身的结果，是在祖珽的身上发现了这两个丢失的铜碟子。

以祖珽的财富，这两个铜碟子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事，但他还是伸出手去盗窃，这可能是一时的游戏心理，也可能是一直以来凭借着收取贿赂所得的钱财，想要什么就唾手可得，让他感觉没有了新鲜感和挑战性，所以宁愿在人前失去尊严，也要体验一下通过盗窃这种非正当途径获得某种物品的满足感。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此刻他的精神已经非常空虚。当然，如果是游戏心理的话，当场的其他宾客显然都不买他的账，人们都为他感到羞耻。

这样的离奇举动不一而足。祖珽称呼自己乘坐的老马为"骝驹"，不知道这是自己故为滑稽之语，还是以此来讽刺别人动辄就在人前夸耀自己得到一匹良马？

更有甚者，祖珽在私生活方面也不检点。他和寡妇王氏私通，而且毫不避忌，经常当着他人的面互通消息。

因为他的才气，高欢任命他做大丞相府的中外府功曹。进入了政治中

心，祖珽依然没有任何收敛。有一次，高欢设宴邀请手下，结果在酒席宴上，丢失了一件金叵罗。高欢权倾朝野，是当时国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谁敢偷他的东西？高欢的亲信窦泰命令所有人脱帽接受检查，结果就像在司马世云家里搜寻铜碟子的情形一样，金叵罗就安静地放在祖珽的发髻之上。

也许，祖珽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无论是地方刺史还是国家的大丞相，无论是铜碟子还是金叵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区别。他就是对于新奇而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产生占有欲的时候本能地伸出手去攫取，但就是这种无差别的偷盗行为，让人看到了他是一个为了获取自己所要的东西而不顾对象、不顾后果的人。既然可以为了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不惜冒得罪权贵的危险，那么一旦他想得到的东西——比如钱财——是要盘剥百姓才能获得的，他就会不顾一切，践踏人间的法律和道德准则。

这固然是基于他的表现所作的逻辑推演，但毕竟属于诛心之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不能为他定罪。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高欢在看到金叵罗被祖珽私藏时，也面对着同样的困境。高欢选择了不追究，因为祖珽的不端表现只体现在对高欢个人财物的侵犯上，而不是渎职、损公肥私。

也不是没有人对祖珽的类似行为进行惩罚。祖珽在金叵罗事件后，担任秘书丞，在东魏的都城邺城供职，而此时主持邺城事务的，是高欢的长子高澄。高澄素来对贪赃枉法、奢侈浮华之事十分反感，在他的主持下，御史台曾经对不法官员进行过大规模的弹劾和审查。祖珽在高澄的管制之下，被责罚是迟早的事。

一次，地方上有人带着一部《华林遍略》要卖给邺城朝廷。高澄集中了很多抄写书籍的写手，只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就把这部书抄录了副本，然后将原本还给了拥有者，并答复说不需要买下此书。结果祖珽竟把一部分《华林遍略》的抄本典当了作为赌资，高澄发现之后，对他处以杖责四十的惩罚。

另一次，祖珽和令史李双、仓督成祖等人伪造晋阳大丞相府的公文，请求邺城供给粟米三千石。这份伪造的公文交到典签高景略手中时，高景略怀疑其真实性，就向熟知高欢各项政策的代理功曹参军赵彦渊询问。赵彦渊回答说根本没有这样一项请求，于是高景略开始审查此事，祖珽在逼问下供认了自己的罪行。高欢这一次勃然大怒，因为他从金叵罗事件和伪造公文支取粟米这两件事中，证实了我们之前所推演出的祖珽的行事逻辑。这一次，高

欢没有对祖珽采取姑息的态度，他判祖珽鞭打二百、服刑和劳役，并对他征收双倍的租税。

高欢、高澄父子对祖珽乖张放荡的惩罚，如果祖珽能够吸取教训，过而改之，也许他的人生会发生改变，甚至会对历史的进程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是，祖珽的才气经常成为他放荡行为的保护伞，一旦他因为举止不当而遭受危难时，他的才气就会变成救命稻草，把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高欢对祖珽的惩罚正在执行过程中时，并州的定国寺建成，高欢想找能文之士撰写一篇碑文，以记载建寺的始末，并表彰功劳。陈元康此时乘机向高欢进言，说祖珽的文才出众，可以作为撰写碑文的人选，他还着重介绍了祖珽天资聪颖，懂得鲜卑语。高欢闻言，打算给祖珽一个机会，就派人给服刑中的祖珽送去笔墨，让他在看守所里起草定国寺碑文。祖珽只用了两天就写好了，而且文辞华丽，令人无可挑剔。高欢被他敏捷的才思和动人的文采所折服，便下了特赦令，但没有恢复他的官职，让他以平民的身份在大丞相府参与一些事务的处理。



假如祖珽没有结交陈元康，他就不会被推荐给高欢撰写定国寺碑文；假如他没有文学才华，也就不会被高欢所赏识而特赦。简单地说，才华是充分条件，结交陈元康是必要条件，缺了任何一样，他都不会被特赦。浮华的生活习气和过人的文学才能在祖珽身上就是如此浑然一体，有时我们甚至说不清他这一生是凭着才气度过的还是凭着运气度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特赦，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而是坚定地认为，靠着才能和人际关系，他就能够渡过所有的难关。

东魏武定五年（547），高欢去世。高澄继承了高欢的事业，回到大本营晋阳就任大丞相。东魏武定七年，高澄和陈元康、杨愔等人正在讨论废黜东魏皇帝、自立为帝的时候，遭遇刺杀。高澄当场身亡，陈元康也身受重伤。弥留之际，陈元康委托祖珽为他写遗书交代后事，其中就提到祖喜欠了自己的债而未还，让家人及早催祖喜还债的事情。祖珽就没有把这封遗书交给陈元康的家人，而是自己去质问祖喜，拿到了祖喜欠陈元康的二十五铤金。祖珽将其中的两铤交给祖喜，余下的他都放进了自己的腰包。收拾陈元康的遗物时，他又将藏书一千多卷私吞。祖喜气不过钱财被祖珽吞没之事，就通知了陈元康的两个弟弟陈叔谌和陈季璩。陈叔谌把这件事告诉了杨愔。

当时，高洋全盘接管了东魏的最高权力，杨愔也深得高洋的信任。杨愔

听了陈叔谌的陈述，皱眉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即使追回那些钱财，恐怕也对死者没有什么帮助吧。"

杨愔如此回答，一半是因为陈元康与高澄关系密切，而高澄主政时，对高洋经常侮辱责骂，因此高洋不会为这样一个死者主持公道；二来是因为祖珽早年间在高洋府中做幕僚，未必有深交，但一定有旧情。为了一个与新当家人关系不好的死者而得罪与这个当家人有关系的活人，杨愔觉得是不划算的，更何况这笔钱财即便追回，也是被陈元康的家人瓜分，并不能让陈元康在九泉之下瞑目，所以杨愔的这个回答也算是合情合理。

高洋在高澄遇刺后，作为高氏家族的嫡系接班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东魏的大丞相。他任命祖珽为大丞相府功曹参军，祖珽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拟报十几名可以做令史之人的名单。他为什么要推荐这些人为令史呢？因为他收受了这些人的贿赂，就想促成这件事。这种卖官鬻爵的行为，如果放在高澄在世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高澄对这类问题十分反感。高澄早年在东魏的都城邺城担任京畿大都督时，就大规模地整肃过吏治，严厉地惩罚过那些为官不正的权贵，连那些早年追随高欢出生入死的老臣也不放过。不过现在时势变迁，高澄已死，高洋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结束东魏政权，正式建立高氏的统治，祖珽就铤而走险，在高洋的眼皮底下搞起了小动作。

不单是这样，祖珽还盗取了官府的一部《华林遍略》。上一次他被高澄杖责，就是因为《华林遍略》这部书，此次他二番出手，不知是想要报复一下呢，还是真的对这部书有特别的感情。

过了不久，高洋就任命祖珽为秘书丞，也就是他被高欢免官之前的职位。祖珽回到邺城就职，结果卖官鬻爵和盗取《华林遍略》的事情全都东窗事发。当时高洋十分震惊，也十分反感，虽然他曾和祖珽有过宾主之谊，但祖珽所犯的过错让他无法包庇。高洋命令从事中郎王士阙对祖珽所犯之罪进行审查复核，同时让平阳公高淹把祖珽看押起来，不让他逃跑。高淹接到命令，就派田曹参军孙子宽前去，吩咐祖珽不得逃走，必须接受审查。祖珽接到这个命令后，马上打算出逃。高洋的亲信、黄门郎高德政得知高淹已经正式通知祖珽不得外出的事情后，出了一条计策。他说："祖珽犯了过错，他自己心知肚明，我们现在通知他要进行审查，他在这种情况下畏罪潜逃，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所以，要稳住他，只要派人去秘书省，就说接到了大丞相的命令，需要秘书省准备三部'五经'，需要秘书丞祖珽亲自检查校对后

火速送出。祖珽接到这样的命令，就会觉得自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晚上就会回家休息。我们就趁着他在家的时候来个突然袭击，把他控制起来，这样他就逃脱不了了。”

高德政的确了解祖珽的心理。当接到“大丞相”的命令之后，祖珽觉得既然高洋依然将如此紧急重要的工作交给自己负责，就必然不会对自己免官、判刑，于是行动如常，没有逃走。当晚，高淹就率人去祖珽家中将他擒拿，捆绑起来后送到廷尉处接受审理。

祖珽被高德政的稳军之计所迷惑，懵懵懂懂地成为砧板上的肉，靠着小聪明混迹官场的他这次可能真的感受到了危机的来临。经过审理之后，祖珽收受贿赂为人跑官的行为被查实，按照律法的规定，应该判处绞刑。

以前的几次化险为夷，祖珽都是靠陈元康的帮助。这一次，陈元康已死，祖珽还在陈元康死后吞没了他的财物，恐怕在这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祖珽会有一点点内疚或者悔恨吧。

命运对祖珽是不无眷顾的。高洋虽然下令对祖珽的案子严查，但查实之后，高洋倒又生出了恻隐之心。昔日与祖珽的宾主关系，让高洋觉得祖珽的才能可为己用。在高洋准备改朝换代的时候，很多元老大臣都不支持他，能够与他站在一起的，都是他旧日的亲信，若能让祖珽也甘心为自己效忠，在当时的高洋看来，是一个对他和祖珽都有益无害的选择。因此，高洋以祖珽曾经在高欢手下供职的理由，特意对执法官员进行暗示，要求他们对祖珽进行轻判。结果，祖珽的判罚就从绞刑变成了免除死刑、免去官职。

等到高洋改朝换代成功，建立北齐王朝，他便征召祖珽，让他成为自己身边的随驾者。对祖珽来说，放荡的半生过得颠簸起伏，他仕途上的春天刚刚来到。

四、当放荡成为资本

祖珽有才，但是任命他做什么官呢？这是一个让高洋颇为头疼的问题。如果任命他主持军国大事，依着他的个性，必然要上下其手、翻云覆雨，这是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可是如果任命他做一个闲职，就无法发挥他的机敏才智，同样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



在当时，祖珽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任何技艺对他来说都不难

学。除了辞赋文章，他还精通音律（这也算是家学，因为他的父亲祖莹在北魏末年就曾经参与讨论过朝廷音律中“正声”的问题），而且对于阴阳家的占卜之术也颇为内行。因为当时有很多权贵都出身于北方地区，他们常说鲜卑语等胡语，祖珽也与时俱进，对四夷语言都十分精熟。在各种技艺之中，祖珽最擅长的是医药之学。各种病症及治疗方法，草药的药性，他都了如指掌。

高洋深知祖珽的过去，知道他曾经多次触犯刑律，也知道他生活上的浮华和性格的乖张，但高洋依然想让祖珽做一个名臣。所以，他任命祖珽在中书省掌管起草诏书的任务。这是对他文学才能的肯定，也是对他政治立场的认可。北齐著名的文人、史学家魏收就因支持高洋，在北齐建立之前被委派秘密起草东魏皇帝的禅让诏书。现在高洋让祖珽负责诏书的起草，无疑是对他的看重。

祖珽没有辜负高洋的信任。他上了一道密状，告发中书侍郎陆元规。经过查问，陆元规被判刑，祖珽也因为这个“功劳”而被任命为尚药丞。他又上奏高洋，要制造胡桃油。在当时，胡桃油主要用来涂在宫殿顶上的屋瓦之上，而且还是绘画的调色颜料。祖珽要炼制胡桃油的建议，就是针对当时上层的消费需要。

炼制胡桃油，对于国计民生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帮闲工作。不久，祖珽再次因为挪用国家财物被免官。此后，高洋每次见到他，基本上都要叫他“贼”。高洋在世时期，祖珽的仕途基本无望。

北齐天保十年（559），高洋去世，高洋之子高殷继位之后，对以前为北齐做过贡献的人进行恩赏，祖珽也因此被任命为章武太守。他还没有赴任，就发生了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发动政变，将辅政大臣杨愔等人处死的事情，祖珽就留下观察动静。常山王高演很快就登基称帝，是为北齐孝昭帝。

孝昭帝即位之后，任命祖珽为著作郎。祖珽为了争取孝昭帝的信任，多次上密状告发大臣。他还想像高洋在位时期一样，用告密来为自己争取晋升的机会。结果，孝昭帝对祖珽的这种行为十分反感，甚至下令中书、门下二省不得把祖珽的上书进呈。

想要通过投机取巧而上位的祖珽，碰壁之后仍没有死心。他觉得自己的多才多艺一定会有人赏识。于是，他用当时流行的西域绘画手艺，采用胡桃油调色绘画，进献给当时在都城邺城主持政务的长广王高湛。高湛是个胸怀

大志但才能平庸的人，由于胸怀大志，所以要网罗人才作为自己将来执政的班底；因为才能平庸，便时刻都需要他人进行夸赞来获得自信。同时，高湛还是个追求享乐、生活奢侈的人。对祖珽用胡桃油绘制的画卷，他自然乐于接受。祖珽看出高湛是一个不安本分的亲王，恐怕日后会有所动作，登上皇位，所以他就将宝押在了高湛身上。因此，祖珽不失时机地对高湛进行吹捧，他说："殿下您骨骼清奇，必然有非常之功业。小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殿下您乘龙飞上云霄，这是大贵之象啊。"

高湛对祖珽的奉承照单全收，而且开出了空头支票："假如这个梦以后实现了，我一定会让老兄你大富大贵。"

高湛对祖珽之言是真心相信，只要我们翻检高湛的履历，就会发现，高洋在位时期，作为亲王的高湛就因为佞臣、胡人和士开的一句"殿下根本不是天人，而是天帝"而心花怒放，对和士开说"卿家也不是普通的世人，而是世上的神"。高湛就是这样一个目光短浅、容易满足的昏庸之人，所以在他掌握了北齐的大权之后，身边就聚集了和士开、祖珽这样以阿谀奉承或奇技淫巧而做到高官的人。



孝昭帝高演去世之后，高湛即位为皇帝，是为北齐武成帝。武成帝任命祖珽为中书侍郎，经常让祖珽在皇宫的后花园弹琵琶，让和士开跳胡人的舞蹈，自己在一旁观赏，尽兴之后赏赐二人各领丝织品百段。和士开是高湛身边的旧臣，高湛一直对他宠爱有加、言听计从，他觉得祖珽现在和高湛关系密切，于是心怀猜忌，将祖珽外放。祖珽觉得自己前途暗淡，就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辞官回家侍奉母亲。高湛批准了他的请求，等到南朝使者前来通好时，他又任命祖珽负责接待，祖珽就借着这个机会重返官场。

此时，祖珽认识到不能与和士开硬碰硬，因为在高湛的心目中，和士开的分量明显比自己重得多。所以，他开始结交和士开，并为和士开献上了一条"妙计"："您现在受到皇帝的宠爱，可以说自古以来都没有如此的情形。但是，如果皇帝万一有一天不幸去世，您的后路又在哪里呢？"

和士开虽然没有什么治国才能，但是对自己的荣辱可是非常敏感的。他问祖珽应该如何做好准备，祖珽就说："你应该和皇帝说，皇家的继承制度里，兄终弟及无疑盖过了父死子继，所以文襄帝高澄（北齐建立后追尊的称号）、文宣帝高洋和孝昭帝高演的儿子都没有成为继承人，而是弟弟们相继登位。皇帝如果想要长治久安，让自己的儿孙能够继承帝业，就应该让皇太

子早日登基，确定与大臣们，特别是诸王之间的名分。如果这件事能够办成，皇帝和皇太子都得偿所愿，您的荣华富贵也可以自然延续，这才是万全之策啊。您应该先去和皇帝吹风，然后我再策应一下，此事必将大功告成。”

对祖珽的建议，和士开十分满意，于是他去游说武成帝高湛，而祖珽则公开上书请求高湛传位于皇太子高纬。可以说，祖珽此计一石三鸟，为自己争得的利益最大。

首先，这个计策帮助高湛解除了他一直以来的心头大患。北齐的最高权力继承，一直都没有将嫡长子继承制落实，而是靠着一批元老功臣的人心向背来决定。高洋去世后，太子高殷虽然即位，但功臣们拥护的是常山王高演，高演因此能够政变成功；高演即位后也想让其子继承皇位，但终究拗不过功臣们的意志，所以长广王高湛能够登基。高湛深知，在功臣们的心目中，年长的亲王，特别是参加过东魏北齐开国的亲王，才是他们心中的同盟者，现在虽然功臣们大多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孙依然是这样一种心态。而趁着自己在世时禅让皇位给太子，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威令功臣们认可这一既定事实。

其次，祖珽让和士开感觉到他是在为和士开出谋划策夺取利益。其实，鼓动武成帝禅让皇位，虽然和士开是以近臣的身份说服皇帝的主要力量，但要考虑到，武成帝对和士开已经是绝对信任、绝对宠爱了，再增加一点点，也依然是绝对信任，所以这件事对和士开其实没有加分。而和士开显然觉得这“一点点”还是有意义的，所以，和士开会对祖珽放松警惕，不再排挤。

再次，祖珽让新即位的皇太子高纬看到了自己的立场。和士开说服武成帝，是在暗处；祖珽上书请求武成帝让位给太子，却是在明处。后主可能不会知道和士开对自己即位的帮助，但一定会看到祖珽的表现。而且，祖珽的公开表态，也会让武成帝觉得他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所以此举对祖珽的利益最大。

于是，祖珽再次进入了北齐的政治核心，而且深受武成帝宠信。

对于祖珽这种凭借奇技淫巧博眼球、靠着耍心机谋私利的行为，当时的人并不认同。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对祖珽进行了不点名的讽刺：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

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

他告诫子孙，不要做“近世两人”那样靠着小聪明、小技艺而获一时之利的人，而这“近世两人”中，有一个就是祖珽。

五、盲眼老公偏弄权

祖珽靠着献计让皇太子、北齐后主高纬即位的举动，重新获得了太上皇武成帝的宠信。他这一次得志之后有些猖狂，想借着武成帝与后主对自己的信任，扳倒和士开，自己做宰相，而且居然猖狂到要将当时与和士开一同担任宰相的其他人也一并扳倒。不料此事泄露，武成帝得知后暴怒，派人捉拿祖珽，押到自己面前，厉声质问他为什么要诋毁和士开。

祖珽此时面临着他人生中最大的危机。他深知武成帝的暴戾，也深知武成帝对和士开的宠爱，觉得自己可能无法生还。这样一来，他反倒轻松下来，便在武成帝面前大骂和士开等人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假如不加整治，恐怕北齐江山会毁在和士开手中——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但是在他讨好和士开的时候，这些情况就已经存在了，他那时候为什么不说呢？他又指责武成帝只知道声色犬马，让国人心生怨怒，武成帝气得用佩刀上的金环打他的嘴，并且用鞭子和木杖殴打他，想要将他活活打死。

祖珽感觉到死亡的临近，又燃起了求生的意志。他对武成帝大声呼喊：“如果陛下您杀了我，我就会获得美名；假如不杀我，您就会获得美名。您不要杀我，我将给您炼制长生金丹。”武成帝闻言才饶恕了他，结果他又满口抱怨，最后被武成帝判鞭打二百，然后流放。在流放服刑期间，他被关在地牢里，整日戴着枷锁，到了夜里，典狱还用芜菁子做成的蜡烛熏他的眼睛，过了不久，他就双目失明了。

武成帝去世之后，后主高纬想起祖珽当年拥立之功，就赦免了他，任命他做海州刺史。这时，最受后主宠信的是其乳母陆令萱和陆令萱之子穆提婆。祖珽再次走上层路线，与陆令萱的弟弟相结交。和士开见到祖珽已经成为盲人，觉得他不会再对自己产生威胁，而且颇有计谋，愿意捐弃前嫌与祖珽合作。这样一来，祖珽就自然而然地重回朝廷。



祖珽这次重回中央，吸取了早先的教训，他决定稳扎稳打，与皇帝最信

任的人合作。后来和士开被杀，他就屡屡在陆令萱面前表现，游说后主立陆令萱为太后。自此，他过得顺风顺水，终于做到了宰相。

凭借着对陆令萱的献媚，祖珽终于权倾朝野，但朝中的实权派对他十分厌恶。后主的岳父、咸阳王斛律光就非常讨厌他，屡屡在人前讽刺祖珽是“盲人掌机密”，说他贻误军机。祖珽一开始还想讨好斛律光，但斛律光丝毫不假以颜色，于是他就动了杀机。

斛律光作为北齐大将，长年与北周作战。当时北周的将领韦孝宽想用反间之计除掉斛律光，就制造了一条谣言：“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所谓“百升”，即斛律光的“斛”，而“明月”，则是斛律光的字。

谣言有时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杀伤力，比如东汉末年董卓专权时，就流传出了“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谣言，鼓动官民反对董卓。而韦孝宽制造的这条谣言，想要让北齐君臣觉得斛律光打算推翻北齐，自己称帝，借以让北齐杀掉斛律光。

这条谣言传到北齐境内后，其实并没引起多大的反响。一来是当时朝政混乱，一批佞幸之人占据高位，他们并不关心江山社稷；二来是后主在位时期卖官鬻爵情况十分普遍，地方上的很多官员也都忙于盘剥乡里，同样对这类谣言并不关心；三来是斛律光本身在北齐境内声望极高，而且素来有忠臣之名，人们觉得这首歌谣完全是捏造的。

韦孝宽的计策眼看就要失败，却被祖珽发现了它的价值。他进行了一番盘算，然后让人将这首歌谣上奏给后主高纬。后主当然不相信自己的岳父会做出这样的事，就向祖珽询问，祖珽证实了这首歌谣的存在。

祖珽是一个善于打心理战的高手。他知道斛律光之女斛律皇后并不被后主所宠爱，所以后宫里支持斛律光的人很少。他在证实了歌谣内容之后，又对后主上奏说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歌谣，比如：“高山崩，槲树举，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语。”（按照《周书》记载，韦孝宽还另外做了一首歌谣，内容是“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与祖珽此处所举的歌谣前半部分大致相同，因此祖珽所念诵者，应是在韦孝宽歌谣基础上的改编与添枝加叶。）然后，祖珽说，这个“盲老公”指的就是微臣，而“多事老母”可能是指陆令萱。

后主最难忍受的就是有人攻击自己的乳母，于是他召见几名心腹大臣——其实都是佞臣——韩凤、穆提婆等，他们都证实了祖珽的证词。

其实，“高山崩”云云，都是祖珽所造，他知道，一般的谣言不会撼动斛律光的地位，只有将矛头引向陆令萱，才会让后主发怒。后主大怒之下，废掉了斛律皇后，并将斛律光全家处斩。

祖珽针对斛律光制造冤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也为着报斛律光蔑视自己的仇。他就未曾想过，斛律光一死，对于北齐而言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正是斛律光的被杀，使北齐王朝在西线与北周无法抗衡，也使得韦孝宽的军事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最后，正是韦孝宽为北周制定的战略方针，开赴河东，围攻晋阳，灭亡了北齐。

明朝的海瑞评价名相张居正的时候，用了“善于谋国，不善谋身”的评语，而祖珽恰恰相反，他善于谋身，而无心谋国。

斛律光一死，祖珽距离大权独揽又靠近了一点点。

接下来，祖珽继续依附陆令萱，请求做领军，想要在做宰相的同时也染指军权。后主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诏书颁下的过程中，宗室成员高元海认为此举十分荒唐，祖珽作为一个盲人，根本无法担任领军。祖珽恼羞成怒，罗织罪名，诬告高元海等人结党危害朝廷。在陆令萱的支持下，祖珽取得胜利，高元海等人被贬黜，而祖珽获得领军的身份，权力如日中天。

通过一次次阴谋而夺得权力的祖珽，开始自我膨胀，他还想大权独揽，将陆令萱、穆提婆母子清除掉，自己成为后主身边独一无二的掌权者。于是他又开始制造事端，抓住主书王子冲受贿事件，要把与此事有牵连的穆提婆也一并治罪，并对陆令萱进行连坐的惩罚。可是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陆令萱母子的能量，错估了后主对他的信任程度。陆令萱母子迅速作出反应，陆令萱将能够与祖珽互相声援的力量连根拔除，并释放了王子冲，还与宫中的宦官们整日在后主面前数落祖珽的不是。陆令萱还用起了悲情攻势，在后主面前跪下哭诉，说自己看错了祖珽，也错信了和士开之言而重用祖珽。

后主最见不得陆令萱被别人“冤枉”，于是他命令韩凤对祖珽进行审查。祖珽自做宰相以来，不法行为车载斗量，韩凤对其伪造皇帝诏书骗取赏赐的事情进行了重点纠察，后主一怒之下将祖珽免官，将他贬为北徐州刺史。

在北齐日薄西山之际，一个日薄西山的盲人，怀着落寞的心情，去北徐州赴任，此景此情，真可以配得上“断肠人在天涯”的评语。祖珽积累了多年的弄权技巧和政治斗争经验在这里失去了用武之地，不过他的权变之才却



得以发挥。他采用虚虚实实的战术，对困扰此地的盗贼进行了清剿，最后盗贼败退逃走，北徐州也恢复了安定。

也许，将自己的才智用在讨敌安民上，祖珽也能做到像斛律光那样的高位。可惜，他大半生都在钻营，但每一次都是大败而归。此时，享受到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完胜，祖珽不知会不会感叹自己选错了生存方式。

但是，时光已经不允许他从头来过。他很快就在刺史的任上去世，留下的，是祸乱朝政的骂名。回望祖珽的一生，总让人产生很多疑问：为何多才多艺的人，不把自己的才能真正施展到实际的事业之中，而用来损人利己？如果他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是否还会如此浮躁急进地用旁门左道的方式上位？假如他生活在汉末三国时期，是否会被“唯才是举”的曹操重用？

真实，使历史厚重；假设，使历史深邃。我们可以对祖珽的人生作出很多种假设，而祖珽真实的一生，却足以让我们得到才能与品德、个人与时代、家族传统与自身选择等各方面的借鉴了。